

# 良乡古镇史话

赵润东

良乡古镇，历经千年，历史文化十分悠久，古迹逸闻也非常之多，不但是京西南第一座古县城，而且为京郊最古老的名镇之一。

良乡位于北京西南 20 公里，自古以来是北京西南郊的重要交通枢纽。京周、京保、良黄公路和京广铁路、京石高速公路贯穿全境，加上十几条区、镇级公路与之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立体交通网络。现在的良乡，已成为房山区政府所在地，是建设和发展中的精品卫星城。

追溯良乡古镇历史沿革，无不令人为之赞叹。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良乡在春秋时期属“燕中都地，辽燕为中都县。”“汉置广阳县，即今之良乡。”据有关资料记载，中都改为良乡，应在秦汉之际。《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良乡，汉县，属涿郡。后汉仍曰良乡。”“晋属范阳国，元魏属燕郡，北齐天保七年，省入蓟县，武平六年复置。”在隋朝时期，良乡隶属涿郡。“唐圣历元年（公元 698 年），改固节县，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复为良乡。唐以不从安史之叛，改名固节。”沿至后唐长兴三年（公元 932 年），幽州设县“移至于此”。

“良乡县乃唐庄宗时赵德均所镇也。幽州岁苦辽兵侵抄转响，辽兵既强，侵抄诸州皆遍。幽州城门之外，甲骑充斥，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辄伏兵于阎沟掠取之。及赵德均为节度使，城阎沟而戍之，为良乡县。”到了“晋天福中，入于辽，属燕京析津府，金属大兴府，元属大都路。”明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隶北平府，永乐元年（公元 1403 年），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良乡隶属之。

那么，良乡城又建于什么时候呢？据史书记载，明景泰元年（公元 1450 年）十二月，筑良乡城。明弘治六年（公元 1494 年）二月，兵部主事欧铎曾上书道：“良乡涿州在京师肘腋，只有土城而无石郭。正统末年，额森深入，如蹈无人之境。方今无事，宜豫为之计。上命所司知之。”又据《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良乡土城旧高二丈二尺，隆庆中知县事贵安上达增筑之，高三丈二尺，东南有公城，而西门独缺。垂二十年，济阳王道定来知县事遂完之。”修补后的良乡土城增宽后周长只不过一千三百丈，总计有六里三分而已。城的

四门，东曰迎曦，西曰宝城，南曰就日，北曰拱辰。就是全县辖域也为数不多。

“东至宛平县界十二里，西至房山县界二十二里，南至涿州界五十里，北至房山县界十五里。”论地盘“其富不及大县一里。”然而，就在这块狭窄的土地上，当年也是车水马龙，市井繁华，最负盛名的良乡板栗及大枣、核桃等土特产品充满市场，并因经销海外而蜚声遐迩。

说起良乡，自然要说行宫。黄辛庄行宫，位于京石高速公路良乡段东侧、良乡拱辰北大街西侧，这是北京西南郊第一座清代行宫。这座行宫建于清朝乾隆十三年，坐北朝南，四进院落，整体建筑占地面积四十余亩。规模宏大，豪华壮观。正殿与配殿，主次分明。执房与膳房，错落有致。四面建有回廊，连接各宫。后面有花园，砌有山石，周围植有奇花异木，整座行宫庄严肃穆。据《良乡县志·古迹》记载：“行宫在县治北黄辛庄西南，距城二里许，乾隆十三年建，为（皇帝）谒陵驻蹕之地。”当年，皇帝与王公大臣每岁出宫赴西陵谒陵，都要经过此地并驻足歇息。乾隆十八年（公元1754年），乾隆皇帝曾作《良乡行宫晚坐》，诗曰：“又驻行时蹕，萧齐可意清。去来时屡易，今昔念交索。习武遵前迹，均劳验众情。春云傍晚重，希泽为新耕。”行宫毁于建国初期，现在仅存后花园中的一株古松。

郊劳台是良乡的又一古迹，位于良乡大南关村外。这座郊劳台又称接将台，是清代乾隆皇帝郊迎犒赏出征凯旋将士举行盛典之所。据《良乡县志·古迹》记载：郊劳台建于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二月，将军兆惠、富德等平定准葛尔回部叛乱凯旋，清高宗携文武百官、王公大臣等，从京城出发到郊外迎接将士。劳师之前，高宗及文武大臣驻蹕于黄辛庄行宫。同时，在郊劳台北侧设置黄幄及青幕，供君臣礼拜之用。郊劳台坐北朝南，原为琉璃瓦顶，汉白玉梁柱，呈八角亭状，高2.26米，每面宽2.26米，总面积约500平方米。可惜的是，昔日富丽堂皇、庄严壮观的郊劳台，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被英法联军所毁。残存下来的御碑亭内，立着乾隆二十五年御制郊劳出征将军兆惠及诸将士礼成记事碑。1995年10月20日公布为北京市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良乡城东燎石岗上的昊天塔是古良乡城的重要标志，为古良乡八景之一。（良乡八景：燎岗古塔、城脚鸡鸣、盐沟雪浪、广阳遗城、燕谷长桥、梁公芳沼、望诸君墓、贺云夕照。）昊天塔又称多宝佛塔，创建于隋，现存者为辽塔，辽金时期用于军事了望和观察敌情。据《良乡县志》记载：“多宝佛塔，隋建，在燎石岗上，五级玲珑，高十五丈，围十五丈，四面门二十座……唐蔚

迟公敬德重修。”昊天塔为五级楼阁式仿木结构空心砖塔，高 36 米，平面呈八角型。塔基为八角仰莲座式，基座高 6.3 米，雕有花卉、走兽、人物等；浮雕图案均为单个纹饰组成，上下两层，共计 64 幅。塔身五层，每层都有须弥座和层檐，四个正面设有券门，其余四面为方形仿木结构的实心直棂窗，内有砖砌阶梯，可盘旋而上，直至塔顶。塔身四面设有佛龕，龕内雕有佛像。据《良乡县志》记载：“阶级环上，北望都城，南眺涿鹿，举在目前。”辽宋对峙时期，战事频繁，昊天塔曾起到过燕京门户军事了望的重要作用。邑人陈番作《燎岗古塔》诗道：“云霞片片出燎岗，铃铎声闻十里扬。插破青宵通日午，冲开碧落促风狂。几层瞻仰寻龙窟，数级登临礼梵王。果是真身藏舍利，浮屠古貌不寻常。”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1901 年），昊天塔被八国联军捣毁。1983 年进行维修，1979 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良乡地处京畿，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并且有着特殊的历史环境。自古以来，良乡始终是京城与南北连接的交通要冲。上至帝王皇亲，下至官宦庶民，或觐见皇帝，或岁贡朝廷，或犒劳出征将帅，或西行谒陵驻足，这里都是必经之路。境内遗存下来的历代古迹除清代行宫、郊劳台、昊天塔外，还有乐毅墓、城隍庙、孔庙、良乡驿站以及良乡板栗等风物特产，均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物遗存，这些都给良乡这块沃土增添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浓厚的色彩。

古时的良乡，地域较为宽阔。据清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 年）《良乡县志》记载，旧时的良乡县，置 12 乡，“初编里二十有五，继为二十二里者，犹百年前旧志也。”康熙四十年《良乡县志》载：巨富屯并入燕谷里，普安屯并入厚俗里。至康熙年间，仅存二十里。同治二年（公元 1863 年）始，京畿实行保甲制。光绪十五年（公元 1889 年）《良乡县志》载，顺天府良乡县凡 23 里屯 187 甲，良乡城东关、西关、南关各设一甲。所辖 117 村，东关辖塔湾、梅家庄等 5 村，西关辖苏家庄、西太平庄、西杨家庄 3 村，南关辖纸房村、东杨家庄等 6 村，治东及东南 28 村，治西及东南 28 村，治西及西南 30 村，治南 30 村，治北兼东北西北 29 村。占有土地“四百八十七顷九十一亩，全县二千九百一十户，一万四千八百六丁口”。

良乡通达四方，且有众生云集，或闲游、或贸易，表面看起来繁华富庶，而实际上百姓多苦于天灾水患及繁重的税差，人们背井离乡，四处逃荒，疲于奔命，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有魏大中作《良乡县诗》道：“彰义门西路，桑乾古渡分。长羁乘传马，不断出关军。沙白连荒戍，城黄压暮云。车牛征到骨，募派底纷纷。”视闻良乡之地，人们害怕在此久留，就是登科皇

榜，也不愿赴此就任。据史书记载，明时县令樊巍曾在《良乡行》一诗中叹道：“官钱私债贫年借，前官后宦总凄凉。”而且，“寄语四方游宦客，选官切莫选良乡。”由此可见，古时候的良乡县是多么的穷困。

到了民国时期，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良乡为 20 个辖县之一。1917 年，曹錕部西路“讨逆军”，以征伐北京拥戴清室复辟的张勋，很快进驻涿县和良乡。1920 年，直奉两系军阀与皖系于高碑店、涿州、良乡、琉璃河一带激战，结果皖系败退。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8 月 1 日，日军南侵，良乡城失陷。8 月 5 日，国民革命军收复良乡。15 日，日本侵略军又复占良乡。此后，良乡地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中国领土的重要军事基地。为抗击日寇的侵略，良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顽强不屈，浴血奋战，与敌人展开英勇斗争，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调整区划，良乡县设 7 个区，即城厢区、魏各庄、小十三里、六股道、琉璃河、窑上、稻田。总辖村 187 个。1950 年 2 月，调整为 5 个区。1951 年，城厢区与第二区合并，区数减为 4 个。1954 年，河北省在房山县进行“撤区建乡”试点。是年 6 月完成。1956 年 8 月，合并为 30 个乡，良乡县区一级设置于同年 9 月废除，全县划为 21 个乡。1958 年县以下始实行人民公社建置，良乡改称良乡公社。1983 年县以下行乡（镇）村制，良乡改为镇。1990 年房山区区以下实行行政区划，良乡改为地区办事处，辖行政村 28 个，街道里巷 25 个，自然村 33 个。

一座古镇，几易变迁，而作为政治、经济、商贸和文化的中心始终未变。良乡沿袭先人之名，直至今日。1998 年 11 月 18 日，房山区政府东移良乡，良乡更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房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强劲的经济实力进入北京市强乡镇之列，并于 1999 年 3 月 10 日成为市政府新增 8 个小城镇建设试点单位之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共房山区委于 2002 年 1 月做出关于撤乡并镇机构改革的决定，撤消原良乡镇与官道镇，组成了新的良乡镇，从而使全地区的变化日新月异，令人瞩目。新组建的良乡镇地域面积扩大，东至长阳镇，西到闫村镇、北邻青龙湖镇和丰台区，南至窦店镇。属地辖村 46 个，27 居委会。181 家镇村及集体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个体企业 1200 余家。还有中央、市、区属企业及驻军 120 余个单位。人才济济，技术力量雄厚。全镇总人口 12 万人，拥有耕地 2.1 万亩，万头猪厂、万只蛋鸡厂、千亩果园、蔬菜大棚、养鱼等已形成一定规模，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村镇建设各项事业达到一定水

平。良乡作为精品卫星城，重点建设的高科技园区、高教园区、绿色生态居住区、旅游休闲度假区和仓储物流区，将给良乡的经济带来更大的发展，现代化的新良乡正在展示着特有的风姿。

参考书目：

- |              |         |
|--------------|---------|
| 1、《良乡县志》     | 民国十三年本  |
| 2、《日下旧闻考》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3、《北京市房山区志》  | 北京出版社   |
| 4、《北京名胜古迹词典》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 黑龙关村史话（上）

栗景鸿

佛子庄乡黑龙关村，地处大石河东岸，南与佛子庄村接壤，东北与班各庄村为邻，西隔大石河与西坡烟筒尖相望，东倚后岭。该村海拔 156 米，聚落呈现带状。全村 265 户，642 人。该村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民情醇朴，物产资源丰富。自古以关险、水秀、景丽著称，境内多有令世人瞩目之处，在房山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今略以此文为引，以见龙乡丰韵之一斑。

大石河，古称“圣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北拒马河支流，黑龙关村为其必经之地。该河纵穿房山全境，其芦村以下河段称琉璃河。源出两支：一为霞云岭堂上村西北，一为史家营西北部山区。流经长操、红煤厂、佛子庄、黑龙关、班各庄、陈家台、河北、磁家务诸村，于坨里辛开口村出山，至琉璃河祖村出房山境，入河北省涿洲。境内河长 108 公里，其中山区河长 85 公里；流域面积 1243.4 平方公里，其中山区流域面积 567.5 平方公里。

黑龙关村南于唐未曾建有关卡，为房山境内古代一处重要军事关口。据《畿辅通志》记，黑龙关口又名“乌龙潭口”，“在房山县西北七十里”；《紫荆关志》言该关“西至紫荆关二百八十里，为涿县里口，稍缓”；明万历《保定府志》载：“（黑龙关）外通大龙门口一百八十里，内连房山县地方”，均可见黑龙关地形之险要。

## 村制沿革

黑龙关村，定名约于唐末，成村始自金代，此二说在区内文史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而有关该村村制沿革方面的其它资料目前还没有人关注，更未有人做过专门整理。现根据笔者的一点积累，做一些尝试性探讨，以求日后方家一鸣。

汉朝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又称十三州），黑龙关村所在地当属十三州之一的幽州所辖，至于此地其时是否有人居住，目前尚无据可查。

从北朝至五代的五百余年间，由于战乱不息，北方行政区属更迭频繁，幽

州的名称也累经变更，先后称为燕都、燕郡、幽州、涿郡、范阳郡、广阳郡，也曾以官府命名为总管府、大都督府等，但都是治所或首府。居民多是从塞外迁来的少数民族，其中有奚人、契丹人、室韦人、高丽人、突厥人等。他们几乎家家从戎为业，妇女儿童也娴习弓矢，常驻兵丁过十万，加上家属，总人口不下二三十万。可见，该城是有雄厚军事力量的重镇。

其中北魏年间“徙民”与“流民”之事，似乎与黑龙关地何时有人居住关系密切，值得一提的是：北魏太兴二年（432），随着幽州地区民族融合步伐加快，自东北诸郡徙民三万户于幽州。又因当时中原混乱，四方流民亦纷纷来幽蓟汇聚。自此时起，黑龙关地当为人居生息之开始。

隋朝（581~618）初年，燕郡改称幽州，隋炀帝时改为涿郡，治所仍在蓟城。

涿郡的名称，随着隋朝的灭亡而消失。唐朝，将这里复更名为幽州，蓟城是其治所。唐时幽州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市及所辖通县、房山、大兴和天津武清、河北永清、安次等地。《旧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九载：“（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改为幽州总管府。管幽、易、平、檀、燕、北燕、营、辽等八州。……六年，改总管为大总管，管三十九州。七年，改为大都督府，……九年，改大都督为都督，管幽、易、景、瀛、东盐、沧、蒲、蠡、北义、燕、营、辽、平、檀、玄、北燕等十七州。……（贞观）八年（634），……都督幽、易、燕、北燕、平、檀六州。……开元十三年（725），升为大都督府”。这段记载，记述了唐代幽州辖区的变化，黑龙关村自然随之而变。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深州乐寿（今河北献县）人刘仁恭（？—914）初任幽州节度使。翌年，任检校司空、幽州卢龙节度使。光化元年（898）三月，刘仁恭进占沧、景、德三州，以图扩张地区。天佑四年（907）几次出征，屡占屡败，遂于地属太行山余脉、历来为军事重地的大安山建筑别宫，更大安山之名为大恩山。并于今黑龙关村南筑建关墙，于黑龙关村西山（烟筒尖）筑建烽火台。黑龙关村村名由此得之。

唐乾宁三年（896），李克用兵征幽州卢龙军节使刘仁恭，被刘所败。刘仁恭撤矾山县、幽都县置玉河县，黑龙关村当属玉河县所辖（见赵其昌《辽代玉河县考》）。

关于设立玉河县的原因，《辽史·地理志四》说的很清楚：“玉河县，本泉山之地。刘仁恭于大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讷，因割蓟县分置，以供给之。在京西四十里。户一千。”

辽代，北京地区为南京析津府，领十一县，玉河县仍为其一。根据赵其昌《辽代玉河县考》的考证文章及其所作辽代玉河县县境图，均可确定自唐末置玉河县至辽，黑龙关村属玉河县所辖。

五代初，契丹势力进入华北。天福三年（938），后晋高祖石敬瑭割燕、云等 16 州归契丹，玉河县属契丹。开泰元年（1012），辽改幽都县为宛平县，宛平县名始于此。宋、金结盟攻辽，辽败，玉河县先属宋，后归金。金天眷元年（1138），玉河县废（改玉河乡），区境归属宛平县。黑龙关村是否亦随之归属宛平县，目前无考。

金贞元三年（1155），海陵王在大房山营造山陵，并于当年迁始祖以下十帝梓宫礼葬；大定年间（1169—1189），为奉山陵，析良乡、范阳、宛平三县边地置万宁县；明昌年间（1190—1196），万宁改称奉先。“奉先”县即后来房山县，此时的黑龙关村是否属“奉先”县所辖，暂无考。

元至元年向（1264—1294），“奉先”始更名“房山”。

元至正十年（1350），京师大旱。朝廷遣留守司都事萨理弥实至黑龙关村北之黑龙潭“奉香币行”，祷雨则“辄应”，后遂建黑龙潭庙。

元至正十二年（1352），翰林学士欧阳玄撰《大都房山县大安山创建黑龙潭庙记》。据碑额及文中有“房山有黑龙潭”句，应可推知：“奉先”始更名“房山”之后，黑龙关村已开始与“房山”发生联系，此时的黑龙关村当归属房山县管辖。

元朝末年，准河南北各自为王，连年兴乱，互相抗争。最后朱元璋统一南北，建立明朝。为了保卫北方边防，继续征讨元军残余，充实北京人口，解决粮食问题，故大臣上奏朝廷提出了“移民、屯田、开垦荒地”以恢复生产的措施。永乐年后，冀、鲁、豫等省连年灾荒，黄河、淮河又数次决口，中原一带“赤地千里，荒无人烟”，而当时山西由于兵乱较少，环境安定，所以经济繁荣，人口众多。为此，朱元璋下令从山西向外地移民。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朝廷曾先后八次将移民在洪洞汉代槐树下集中，给移民办理迁移手续，发给凭照川资，然后将他们迁往异乡。

据《明实录》、《明史》等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月、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永乐二年（1402）九月、永乐三年（1403）九月、永乐四年（1404）正月、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均有山西移民迁往北京地区。黑龙关村中彼时即有部分移民迁来定居，村制规模已具成型。

入清后，据康熙三年《房山县志》所录其时房山县凡 179 村，黑龙关村未

在其列。

至清光绪年间，黑龙关村时为顺天府宛平县辖，《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一”之“疆域”卷有着明确记载。

之后，始纂于民国二十年（1931）的《河北通志稿》所载有当时河北省《行政区划整理各县插花区域》，该文有关于黑龙关村曾为宛平县插花之地的文字记载。由于黑龙关村涉及到“插花地制度”，这里将《行政区划整理各县插花区域》一文照录如下，作为参考：

插花地制度，肇自明季驻军屯垦，后屯垦虽废，而习惯相沿，遂成为今日之插花飞地一种畸形状态。此类插花区域之弊害因某区域明为甲县土地，而归乙县管辖。甲县既无权过问，乙县又视同瓯脱。人民形同化分，非特对于一切行政设施均阳奉阴违，甚且作奸犯科。凡窝藏盗匪、庇护赌娼、贩卖毒物等罪恶亦悍然为之，而无所顾及。本省整理此类插花区域始于十九年（指民国纪年，时当公元1920年——笔者注，下同）间，最初在第一次内政会议提出《提议勘划各省县插花地以清疆界而一政权案》，经会议通过后送内政部，依提议决案，拟订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呈准行政院公布施行。本省奉到前项整理办法大纲后，于廿一年六月间，依照拟订河北省各县插花区域整理方案，嗣因原方案施行颇多窒碍，复于廿四年九月另行指定河北省各县插花区域整理办法，公布施行，截止廿五年终计实行整理插花区域如下表：

本管县	划归县	村庄数目	村庄名称	备考
宛平县	房山县	5	车厂村、西庄、 坟上村、沙峪村、 黑龙关村	

以上表明，黑龙关村与今房山区车厂村、西庄、坟上村、沙峪村当时统属宛平县在房山县的“插花区域”，是五村划归河北省房山县管辖的时间在“廿五年”，即1936年（《北京市房山区志》记为1935年，存疑）。

根据上述文字，约略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黑龙关村自“明季驻军屯垦”之后至1936年止，此间当属“插花区域”，为宛平县所辖。此前，查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沈榜《宛署杂记》卷五所录当时宛平县所辖村中并无黑龙关村，可知至少在1593年以前，黑龙关村不为宛平县所辖（当宋代玉河县废改玉河乡、区境归属宛平县时，黑龙关村也许亦随之归属过宛平县，入元后，归属房山县，“明季驻军屯垦”之后，复归宛平县，惜无确考）；1936年后，该村始脱离宛平县始归河北省房山县管辖。

既然黑龙关村曾与宛平县有过密切联系，那么宛平地区的建制变化又如何呢？宛平地区，作为县置的建立起于汉代，公元前 117 年，汉武帝立皇子刘旦为燕王，都城在蓟。其领县为蓟、方城、广阳、阴乡、良乡、安次、元安 7 县。其中阴乡县即在后来的宛平县内。唐天宝年间，析蓟，置广平县。唐建中年间，废燕州衙属，置幽都县，与蓟县同为幽州属辖。五代时，刘仁恭将幽都县的一部分分出，建玉河县，辽开泰元年（1012）改幽都县为宛平县，为辽南京析津府管辖。北宋占据辽南京后，宛平县归属燕山府，同时撤掉玉河县。金代宛平县隶属于中都大兴府，元代隶属于中都路，明初隶属于北平府，明永乐年间隶属顺天府。清代依旧隶属于顺天府。1912—1928 年间，隶属于京兆地方。1928 年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宛平、大兴、房山等 22 县划归河北省。1949 年后，一部分划入北京市。1952 年其建制撤销，属地并入京西矿区。

民国五年（1916），河北省房山县设有 9 区，辖 256 村；时五区区址为北窖（后迁南窖），辖陈家台、南北窖、佛子庄、大安山、葫芦棚、下寺共 19 村。黑龙关村 1936 年划归房山县后，位在五区之列。

1938 年 5 月 8 日，设立中共房良联合县，县址长操村；1939 年 3 月，设立中共房良联合县五区区委，黑龙关村仍为五区所辖，属我平西根据地。

1941 年 6 月，房良联合县与涞涿联合县合并，成立房涞涿联合县。此间，随形势变化，我根据地缩小，黑龙关村为敌战区，不在房涞涿联合县之列。

1944 年 10 月，房涞涿联合县与昌宛房联合县合并，分设房山县、涿县、宛平县，黑龙关村仍为敌战区（或巩固区），属房山县所辖。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房山县下辖 8 区，黑龙关村为七区所辖，区址佛子庄。

1947 年 2 月，平西地委决定将房山县七区划归良乡县，为五区；黑龙关村随之为良乡县五区所辖，区址佛子庄。

1949 年 4 月，良乡县三区、五区划回房山县，分别改为八区、九区（时房山县辖 10 区）；黑龙关村随之划归房山县九区所辖，并为该区区址。10 月，房山县隶属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时黑龙关村仍为房山县九区所辖，并为该区区址（1950 年 5 月区址由黑龙关村迁至河北村）。

1952 年 9 月 1 日，经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本市门头沟地区及其以西河北省属的矿区必须统一管理。将河北省宛平县全县及房山、良乡两县部分村

划归市辖，同本市原 16 区合并组成京西矿区”。黑龙关村在调整之列，遂从属京西矿区所辖。京西矿区委员会隶属中共北京市领导，驻西辛房村（1953 年 8 月迁至大峪村）。

1958 年 2 月，京西矿区中现属房山区的 12 个乡，黑龙关村从属佛子庄乡。4 月，河北省房山县与良乡县合并，划归北京市，更名为周口店区。5 月 21 日，京西矿区中现属房山区的 12 个乡，划归北京市周口店区，黑龙关村从属佛子庄乡归北京市周口店区管辖。9 月，周口店区撤消乡（镇）建制，建立人民公社 8 个（不久为 7 个），黑龙关村属河北公社辖。11 月，河北公社与百花山公社合并，名百花山公社（1959 年改称河北公社），黑龙关村从之。

1960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消北京市周口店区，设置北京市房山县，下辖人民公社 7 个，黑龙关村属北京市房山县河北公社辖。

1961 年 6 月，黑龙关村属东班各庄公社辖。

1966 年 5 月，房山县辖公社 35 个，黑龙关村属东班各庄公社辖（1961 年 6 月—1962 年 5 月，东班各庄公社改称佛子庄公社）。

1968 年 2 月 13 日，成立房山县革命委员会，辖公社 31 个，黑龙关村属班各庄公社辖。

1971 年 1 月，班各庄公社改称东班各庄公社，黑龙关村属东班各庄公社辖。

1981 年 1 月 1 日，北京矿务局工农区成立。该区辖门头沟区北岭、色树坟 2 公社和房山县河北、东班各庄、南窖、大安山、黄山店 5 公社及史家营公社金鸡台村、周口店公社良各庄等 5 村，面积 421.2 平方公里，属北京矿务局管辖，黑龙关村从东班各庄公社改由北京矿务局所辖。[笔者按：北京矿务局工农区属非正式行政区划，所属房山县（区）河北、东班各庄、南窖、大安山、黄山店公社（乡）等地，位于房山辖境之内，既划归工农区而又未完全脱离房山。而在具体行业和部门隶属关系上，又分属于两个行政单位：凡属农、工、商等经济部门，归工农区管；属人大、政法、交通、邮电等部门，又归房山县（区）区管理]

1983 年 3 月至 6 月，撤消自 1958 年以来实行的人民公社、大队建制，实行乡、村建制。时房山县计设 29 乡 3 镇，黑龙关村从属于班各庄乡（后又为“东班各庄乡”）。

1993 年 11 月，原属北京矿务局所辖的河北、东班各庄、南窖等地区归属房山区；本年，东班各庄乡与长操乡合并，成立佛子庄乡，乡址东班各庄村，后

迁至黑龙关村村北。黑龙关村从属于佛子庄乡复归北京市房山区管辖至今。

# 黑龙关村史话（下）

栗景鸿

## 圣水险隘

黑龙关村为外人所知，一因其水；二由其关。

水，即指村北之龙潭。该潭分布呈弧形，长七八百米。泉水从河道中多处岩石溶洞和裂隙中涌出，在河道中汇成潭，其溢流构成大石河的补给源。雨季与河水合流，难以分别。旱季潭水最深处 4 至 5 米，宽 10 至 15 米。1981 年实测流量 0.52 立方米/秒。日平均溢流量大于 1 万吨。水质为重碳酸—钙—镁型，清澈干冽，水温 13.5℃，有“冬暖夏凉”之感。

由于黑龙关村水源、地理等条件特殊，1969 年，北京市水利规划队（北京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前身），针对大石河上游没有骨干控制工程的情况，在河道上游长操、花港、七道河、教军场、佛子庄勘查、选择水库坝址，但因地质、技术和经济问题，上述坝址均趋于否定。最后建议在黑龙关村建库削洪。1972 年，根据房山县委提出的“上蓄、中滞、下泄”的规划原则，又一次提出在黑龙关建设水库，并作了不同规模大小的组合方案进行比较。初步设计黑龙关水库控制面积 509 平方公里，占大石河主河道山区面积 75% 左右。建一座中型水库，削减 10 年、20 年一遇洪峰。由于地形条件所限，采用坝顶溢流，分大库、小库两个方案（见下表）。

黑龙关水库方案指标项目

项目	小库方案	大库方案
最大坝高（高）	55.0	65.0
库容（万立方米）	5840.0	9300.0
混凝土（万立方米）	34.0	47.5
拆迁	720 户，粮库一座	780 户，粮库一座
工程总造价（万元）	2100.0	2700.0

项目	小库方案	大库方案
效益	削减 10 年一遇洪峰 78%，20 年一遇洪峰 67%	能存蓄 10 年一遇洪水

1974 年，对大石河上游进行第三次规划。在前两次规划的基础上，经综合考虑，推荐在黑龙关村建大型水库（该水库设计初步完成，并开设进行坝址地质勘探）。

黑龙关水库提出高坝方案：坝高 85 米，坝顶高程 216 米，总库容 1.35 亿立方米。

但最终几经勘探，担心黑龙关水库坝址建在寒武纪灰岩之上可能漏水，上述规划未能实施。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水文队曾有《北京黑龙关水库拱坝方案工程地质勘测简报》（1979.6）和《北京市房山县黑龙关水库土坝方案补充工程地质勘测报告》（1978.12）的资料备案。

黑龙潭上有龙王庙，建于元至正十年（1350）。该庙左右皆山，下临绝涧。潭西北有孤峰，俗称“烟筒尖”。庙为三合院结构，靠山崖有正殿三间，座北朝南，东西配殿各一间。院内植侧柏四棵。西配殿后有砖瓦结构塔坟一座，高约 3 米。

《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卷二十四）记有建庙原因：“在县治北七十里大安山之上，有龙湫，深不见底，相传有黑龙君居之。元至正十年，京师大旱，遣留守都事萨里默色往祷，大雨沾足。于是依山为坛，因坛为庙，正殿三间，东西屋如之，外为神门，设栏盾临潭上，中塑龙神像，被服如王者”（笔者按：萨里默色，又称萨里弥实，字谦斋。《中国人名大辞典》有传，记其人“以御使出为建昌太守。著有《瑞竹堂经验方》，颇醇正周备”）。

元至正十二年（1352），翰林学士欧阳玄撰《大都房山县大安山创建黑龙潭庙记》，以记黑龙潭庙建立原委，较详细。

碑文照录如下：

“房山之大安山，山之上有利湫，深不见底，以势度之，下彻山趾。世相传有黑龙君居之。至正十年，岁庚寅夏五月至六月不雨，银青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搠思监奉诏留镇京师，召京尹、县令等官，徧走群望，又率僚属诣在京名寺观咸祷焉，雨不至。平章公忧之，归家，露香祷於庭。左右曰：房山有黑龙潭，祷雨辄应，盍往扣之！公遣今留守司都事萨理弥实奉香币行，仍戒有司遣价，又玉虚宫十一代真人张公门徒明道洞微大师毕辅贵偕往。既至，辅贵等

沂平章公问雨之诚於龙，明日龙见灵异，观者喜曰：雨之徵也。既而大雷电以雨，圻甸方数百里皆沾足，槁苗尽起。及秋，五谷胥熟。於是父老以龙君未有祠，请作新庙以彰神庥。辅贵愿募众财，冯潭依山，叠石筑坛，高二丈许，广可二百余步，因坛为庙，中作正殿三间，东西屋如之，外为神门，设栏楯临潭上，中塑龙神像，服饰如贵者仪，旁列雷雨部诸神以侑，次及祀神之庖，守祠之舍，内外偕作，经始於十年之秋，落成於十二年之冬，费楮币五万三千缗有奇。十四年夏六月，京师又踰月不雨，公复遣萨理弥实祷如前，将行，致公之意以庙记属元。时元感暑下利，连日病不能兴，闻命强起，而默祷曰：龙君即致甘澍，已时菑，当力疾以偿诺责。十三日壬寅往祷，丙午大雨，己酉又大雨，自是雨大集，是岁有秋。都人每雨，见风云雷电突起西南，自房山来，知为龙君所致。萨理弥实竣事还，以喜雨告，元疾亦稍苏，乃记之曰：天有三垣，帝座所在，诸星环之。国有京城，天子所居，百神卫之。房山密迩燕都，多深山修谷，实生神龙，疏附奔走，居百神之先，理之必然也。且京师天下之本，盛夏兼旬不雨，舟漕不<sup>二</sup>既，物贾日翔，四方辅<sup>二</sup>者忧之。又旬日不雨，饥馑疾疫将作，居民忧之，斗讼盗贼滋蕃，朝廷有司忧之。一雨而百忧释，四方安，故房山之龙能雨京师，有功於国甚大。礼记祭法曰：能御大灾者祀之，捍大患者祀之。新庙之作，於祭法为宜。或曰：社土遗而不宇，今庙焉，以居龙何？曰：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社欲其露处以受生气也。龙者天之生气，能为膏泽以生万物者也。其质为阳，阳动必静，静必伏藏，宇以栖神固宜。又曰：肖龙像以人何？曰：龙有变化不测之神，人而为龙，龙而为人，古今多有之，异时褒崇之典，请於大廷，祀於奉常，为侯，为公，衣冠牲特，祝号祭式，必视人爵。庙也，像也，揆之事理皆宜。平章公，蒙古怯烈氏，国初以来，元勋世臣之胄，其父祖子孙，群从昆弟，丞相御使大夫，接踵不绝於朝，故其体国也切，其忧民也深，其祷神能竭其诚。乃作迎享送神诗，俾工歌其辞以祀，并刻之石。辞曰：龙胡为兮山之盭，风气固密兮冈峦绸繆。龙奉命兮宅阻幽，扈帝室兮拱神州。神州兮盛夏不雨，相臣忧兮奉牲醑。牲肥兮醑香，龙来歆兮不遑处。大振雷兮从元冥，云飞缴兮雨建瓴。雨优渥兮年谷熟，年谷熟兮神州足。神州足兮万邦福，龙盘桓兮此有屋。龙焱欠起兮安之？乘灵和兮薄希夷。风雨旗兮绝天河，滹元云兮扬素波。帝曰劳女兮复女居，新庙翼翼兮山盘纡。房之山兮雨之府，鼓坎坎兮巫屢舞。泽我民兮万万古，国大秩兮食兹土（《光绪顺天府志》）”。

查《房山县志》并《日下旧闻考》均载有此碑文，只是在个别文字上略有

出入。

碑文作者欧阳玄（1273-1357），元代文学家，字原功。本欧阳修的同族而迁居潭州浏阳（今属湖南）。延佑二年（1315）进士，做过元朝中央和地方官吏 40 多年，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曾奉诏纂修《经世大典》，编修四朝实录，在诏修辽、金、宋三史时，召为总裁官。曾请求退休回乡，因中原道阻，未能成行，逝于大都。作文必求实事而后动笔，不肯涉及虚夸妄诞之言。欧阳玄的碑铭墓志一类作品，写得十分平实，力去浮夸。著有《圭斋集》，原本 44 卷，宋濂作序时说 24 卷，今存 16 卷。《创建黑龙潭庙碑记》收入《圭斋集》。《元史》有传，谈其文时有言：“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贵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辞以为荣。片言只字，流传人间，咸知宝贵。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可见玄文之影响。

此后，“京师”附近每有旱情，黑龙潭庙遂成为朝廷及附近村民祈雨胜地，黑龙关村因而名声骤起。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传说，如“凉水泉乃仙人所掷茶壶之说”、“黑牛沟尝有金牛偶现之说”、“黑龙潭古有‘黑龙君居之之说”、“黑白二龙相争之说”、“旧村村形为蝎形之说”、“村之山势呈龙形之说”等等。

这是《日下旧闻考》中引自《玉壶清话》的一个关于黑龙潭庙的例子：

范阳卢文进，少从军，身長八尺，姿貌伟异，名震燕蓟。与庄宗屡战获胜。一夕忽败，夜走马坠涧中。才及水，一跃而出。明日视之，乃郡之黑龙潭，绝岸高险，身不可测。文进知有神助己，气复振。

文中所谈卢文进，确有其人。查宋·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杂传·第三十六》“卢文进”条，可知：

文进，字大用，范阳人也。为刘守光骑将。唐庄宗攻范阳，文进以先降拜寿州刺史，庄宗以属其弟存矩。存矩为新州团练使，统山后八军。……明宗即位，文进自平州率众数万归唐，明宗得之，喜甚，以为义成军节度使。……文进居数镇，颇有善政，兵民爱之。……文进身長七尺，状貌伟然。……同光中，契丹数以奚骑出入塞上，攻掠燕、赵，人无宁岁。唐兵屯涿州，岁时馈运，自瓦桥关至幽州，严兵斥候，常苦钞夺，为唐患者十余年，皆文进为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务为恭谨，礼接文士，谦谦若不足，其所谈论，近代朝廷仪制、台阁故事而已，未尝言兵。后以左卫上将军卒于金陵。

从中我们既可以了解卢文进身事大概，同时又给卢文进在黑龙潭发生的“异事”提供一些佐证。

至明，有学者李濂曾游黑龙潭庙，并留下一首诗作：

阴云袅袅黑龙湾，瑶草丹崖不可攀。

越客漫夸天姥胜，渔阳还有大房山。

李濂（1488-约 1566），字川父，明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少负俊才，正德八年（1513），河南乡试夺魁。翌年中进士，年 27 岁。自此到 38 岁之间，历任沔阳知州、宁波同知、山西按察司佥事等职。任沔阳知州期间，逢大水灾，他上报朝廷请求赈贷，大力抢救赈济，全活数万人。在山西任职时，因提学缺职，代其事，“不两月试竣，士人悦服”。然而李濂的宦游生涯，很快就因“坐忤权贵”而过早地结束。从此杜门谢客，日以著述自娱，著述甚富。有《嵩渚集》100 卷（《明史》），《汴京遗迹志》24 卷及《乙巳春游稿》等书传世。并参与了嘉靖《河南通志》的纂修。因历代著名医家缺传或传记过于简略，遂从古代文献中选录名医事迹，著成《医史》十卷，内容较丰富，可称现存最早的医吏人物传记专著。

入清后，有雍正御笔赐匾：“甘泽普应”，乾隆亦赐联于黑龙潭庙：“御四海济苍生，功能配社；驾六龙享庶物，德可参天。”

随着黑龙潭庙的“灵性”益显，后来逐渐成为附近近百里乡民每年三月初三庙会时祈风调雨顺的必选之所。

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北平《艺林旬刊》曾出一册《游山专号》，记载了当时六位藏书大家游历京西百花山一带所作的六十余篇游记、题名和诗作，其中有多篇涉及黑龙关村潭及庙。例如名儒傅增湘在《游百花山记》中谈到黑龙关村时说：

……黑龙关，冈峦回互，峡气阴沉，宛行夔巫道中。关外龙王庙，雄踞石壁上，碧石献压其冠，清流啮其趾，尤为胜观。

解放后，由于各种原因，黑龙潭庙已缺乏有效的管理与修缮。“文革”中，庙中龙王塑像被拆毁，投入庙前龙潭之中。后来庙中曾设有烈士灵牌，供学生吊拜，山门两侧的墙壁上，曾书写过毛泽东主席词《七律·到韶山》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两句。“文革”后期，该庙日渐颓废，一度成为村中圈养牲畜、存放杂物之地。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庙中正殿全部被毁，只存两座钟鼓楼。

1984 年，曾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市人大常委会的段天顺先生（房山东庄子村人），在观罢黑龙潭庙后，以竹枝词诗体即兴赋诗咏之：

—

百家村舍绕龙湾，壁立丹崖负小庵；

柳影泉声回翠谷，渔阳风景在房山。

## 二

三月乡民祷雨神，龙庵百戏竞争先；  
至今村老津津道，维妙猴王李万春。

据段先生所记，北京京剧名流李万春曾到黑龙潭庙前演出过。时“名泉”、“名家”，彼此呼应，传为一时佳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黑龙潭庙终于得以重修复建。历经六百余年风雨的一处区级文物有了新的开始。

总结黑龙关村“水”与“庙”的关系，是否可以用“水因庙显，庙因水成”八字？另外，除了黑龙潭水名极一时外，黑龙关村尚有数处山泉值得一记。这些泉眼均位于该村西山坡脚下，如“白城湾”、“凉水泉”、“大白水”、“杨树坑”、“柳树坑”等处，此不再赘言。

下面谈“关”。

关，即指村南之唐末所建关口，历代驻兵防守，稽其出入。关之左右皆山，下临绝涧“白城湾”。关城东墙自东山至河边 150 米，西墙自西山至河边 200 米；墙高 10 米，底厚 2.5 米，顶厚 1.6 米。今仅存关城遗迹。

论及黑龙关口修建因由，当与唐末刘仁恭其人建大安山馆，欲霸京蓟有关。

刘仁恭（？—914），深州乐寿（今河北献县）人。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初任幽州节度使。翌年，任检校司空、幽州卢龙节度使。光化元年（898）三月，刘仁恭进占沧、景、德三州，以图扩张地区。天佑四年（907）几次出征，屡占屡败，遂于地属太行山余脉、历来为军事重地的大安山建筑别宫，更大安山之名为大恩山。并于今黑龙关村南筑建关墙，于黑龙关村西山顶（烟筒尖）筑建烽火台。黑龙关村村名由此得之。

关于刘仁恭其人其事，民间多有传说。下面介绍一二：

刘仁恭有二子，长子刘守文，次子刘守光。刘仁恭驻守在幽州任卢龙节度使时，刘守文也是节度使，驻守在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和德州（今山东陵县）一带。父子两的地盘相连，成为河北地区的一大割据势力。

二子刘守光好色且狡猾奸诈，趁父亲不在的时候将父亲的美妾霸占了。被刘仁恭乱棍教训了一番，罚他远到外地驻守。

其时，刘仁恭一方面为争夺幽州地盘苦心积虑，一方面招宋道士王若讷给他炼长生不老之药。刘还在幽州西边的大安山里建造了豪华的宫殿，又从民间挑选了大批美女充实宫中，对于幽州城内的一切事务极少过问，但他这种生活

并没有持续多久。朱温早就有意征服幽州地区，在刘仁恭享受的时候，他出其不意地派大将李思安领兵攻到了幽州城下。

此时幽州城内防备空虚，刘守光听到消息，立即领兵急奔幽州，抢在后梁军队的前面进入了幽州，率领幽州守军将李思安赶走了，立下一功。

但刘守光此后不肯再回到外地，以为自己守城有功，于是他自己便宣布由他任卢龙节度使，不声不响地罢了父亲的职务。然后又派属将李小喜领兵围攻大安山，刘仁恭派兵出击，却不堪一击，最后刘仁恭做了儿子的俘虏。刘守光将这个贪图享乐不务正业的父亲押回了幽州，囚禁起来。刘仁恭从此便当起了儿子的长期囚徒，直到幽州被李存勖攻陷，父子又一起被抓处死。

上面所讲，虽然与黑龙关口关系不大，但可以多少给我们这样一个认识：当时作为军事关口的黑龙关，应当成为过各样军队出入的咽喉要地，甚至在这里发生过许多你死我活的争夺，只是缺乏史料记载罢了。

### 抚今追昔

历史上的黑龙关村有过令人追想的记录，进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黑龙关村依然发生过不能令人忘怀的往事：

1944年3月，宛平县政府派公安科长王再田带领手枪队十余人奔赴大安山一带开展抗日工作。时昌宛房二区民兵大队长杜凤鸣和当时名震一方的“锄奸英雄”于振边（1920年生，大安山人，曾锄奸15人，1944年牺牲于大安山水峪村）等率民兵密切配合。在黑龙关村附近的公路上伏击了大安山伪军队长尤茂志部，给了日伪一个不小的打击。

1946年3月4日（农历二月初二），房山七区区委书记杨树清和区长许德民等主持召开了全区清算报仇大会，把张定宇（当地恶霸，曾于1938年5月至1939年8月任房良县政府旧四区区长）、马金生（曾任良乡县三区伪大边乡乡长，绰号“马大刀”）拉来进行斗争。后在黑龙潭庙前，召开了房山四、五两区群众大会。当场枪毙了这两个罪恶累累的汉奸，当时到会群众过万。在这次大会上，北窖村剧团演出了自编的评剧《汉奸的下场》。

黑龙关村虽然是个不足千户的小村，但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同样涌现出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

孙玉林（1921年—1939年），牺牲地密云县。

燕俊清（1922年—1940年7月），牺牲地不详。

栗稳（1893年—1940年11月），牺牲地房山县霞云岭村。

李佃丰（1912年—1944年），牺牲地河北省涞水县。

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

郭老虎（1926年—1947年6月），牺牲地宛平县。

孙玉臣（1921年—1947年9月），牺牲地河北省涞水县。

王桂永（1924年—1947年10月），牺牲地河北省徐水县城。

李兴堂（1920年—1947年11月），牺牲地宛平县达摩庄村。

### 趣谈一例

根据笔者索查，除上所谈黑龙关村的黑龙潭外，北京地区尚有其它两处著名的黑龙潭。

其一为海淀区的黑龙潭和龙王庙。位于海淀区西山北部的寿安山（又名聚宝山）北麓。冷泉村北，距城22公里。龙王庙兴建于明成化二十二年。乾隆三年（1738）封龙神为昭灵沛泽龙王之神。明万历及清康熙、乾隆等帝王，都曾来此祈雨观潭。寺院依山而建，有殿堂和碑楼。1949年后在这里修建了疗养院。

其二为密云黑龙潭风景区。

谈到黑龙关村，全国也不单单房山一处，亦至少有四地。其余三处是：山西省蒲县的黑龙关镇、陕西省延川县的黑龙关乡以及广东省境内的一山地关口黑龙关（此处关口曾流传有“邓廷楠智破黑龙关”的传说）。

房山，古称“幽燕奥室”，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黑龙关村作为房山之一地，无处不张扬着龙乡精神。我们相信，新世纪的黑龙关村将越来越焕发出更新的光彩。

参考书目：

《辽史》中华书局

《明史》中华书局

《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

《顺天府志》（光绪本）北京古籍出版社

《顺天府志》（永乐大典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游山专号》北平“中国画学研究会”《艺林月刊》编

- 《河北通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  
《中外历史年表》翦伯赞主编中华书局  
《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历代帝王世系年表》杜建民齐鲁书社  
《百家姓考略》王相笺注中国书店  
《洪洞古大槐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  
《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  
《北京传统文化便览》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史苑》（第一辑）北京出版社  
《房山县志》（民国十七年本）  
《北京市房山区志》  
《北京大百科全书·房山卷》  
《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  
《中共北京市房山区组织史资料》  
《房山革命斗争史》北京出版社  
《房山区水利志》  
《新竹枝词》段天顺作家出版社

# 燕山白水寺

赵思敬

白水寺座落在燕山东风生活区西面的西虎岭。1985 年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寺内石佛造像为北京最大的石佛。从 1990 年开始，以白水寺为中心，已逐步建成占地 50 公顷的白水寺森林公园。

## 白水寺的三次重建



燕山白水寺（赵思敬提供）

白水寺的建筑年代，史无记载。第一次重建，见于民国十七年（1928）编修的《房山县志》卷八中收入明代郑民悦撰文的《重修白水兴隆寺记》。文中说：“景泰中，智莲辈再造之。”明朝景泰年为公元 1450——1457 年，这次重修距今至少已有 546 年。第二次重修，见于清人于敏中等人编纂的《日下旧

闻考》卷一百三十二中，有“白水寺又名兴隆寺，成化元年重修，僧道深撰文，住持净广立石”的记载。明朝成化元年为公元 1465 年。这次重修距第一次重修，相隔至少有 9 年。第三次重修仍见于郑民悦《重修白水兴隆寺记》，开工于“万历丙子”，即公元 1576 年，完工于“万历丙戌”，即公元 1586 年。重修时间达 10 年。这次重修，距第二次重修相距 212 年。

白水寺第三次修建的风格，一直沿续到今天。修建寺院的主持人，为“北邱常缘”，他来到白水寺时，成化年间修建的木制寺院已不复存在，佛像则立于旷野之中。他慨叹“原构之三阁燔于樵火，风雨日侵之莫能识。”于是，常缘“乃以身自矢，顾为之募缘遐尔。乐善者翕然响应，货镪之助罔恒。”其中

有“李君世强、李君善”二人，皆“大檀越也”。“檀越”即施舍信众别称。这次重修，考虑到过去“结木为祠”的弊端，便“采石于山，瓷之为阁。”“阁成，金其像，绘其壁，丹 赭妍，瞻者竦然起敬。”之后，寺院建筑依次展开，“次禅堂，次山门，颜其门曰：‘兴隆’，袭以故也。钟楼有 ，厨灶有舍，钜纤器用，靡有不周。”“寺以上有岩秀峙，曲径萦纡，有华表树之于巅。登眺者，赫然一胜概也。”白水寺在明朝的三次修建，使寺院达到了全盛时期，目睹寺院修建的郑民悦，有《白水寺和李孝廉》诗一首，抄录如下：

云护高峰石磴斜，翠微隐隐梵王家。

雨馀烟暝苔径口，风静萍开水见沙。

飞锡璇空垂法象，谈经金界雨天花。

夕阳啼鸟催行急，杖履徘徊兴未赊。

《房山县志》卷六“人物”篇中，有“郑民悦”条说民悦：“别号肖泉，博学能文，举隆庆丁卯年乡荐。初任山西寿阳县尹，政授河南阌乡，升应州牧，再调睢州，迁归德二守，继迁汝宁；历任卓有政声，告归林泉，筑别墅于（房山）城东北隅，诗酒娱志，乐以卒岁，所著别集多遗失，今仅存一二。”

## 白水寺的诗文

在民国十七年编修的《房山县志》中，有一篇《游白水寺记》，作者刘伯敷于咸丰八年（公元 1858 年）九月与家人到白水寺一带奠祭先祖妣之墓，因“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便来白水寺一游。于是白水寺周围的环境便一一展现在眼前：“未里许，得石涧，宽可数十步，水清细，虽季秋下旬，岸草犹碧，随涧西行数武，古石嶙峋，幽林蓊郁，遂不知有尘世间也。已而泉流奔响，树尽桥横，仰视山腰，古寺在焉。拨荆榛，援藤葛，盘转而上，但见寺荒僧去，只馀一钟，碑老苔生，微存数字。”从这些记载中，可见此时白水寺已久无人烟，但“殿宇甚雄，自神像以及窗棂门限，俱属石成，亦今时之庙所罕有者也。”

在白水寺石桥上，刘伯敷扶栏俯视细流，但见“鱼小如秧针，千百为群，泳游可爱。”坐于石涧古树下，“渴饮清泉，凉入腋侧，听野鸟琴筑，宛然因思佳山雅水，筑室于兹，不亦世远而尘清乎”。在夕阳西下时，刘伯敷还作诗一首：

泉石清洁兮林木幽，红尘不到兮白云留。

洗我俗虑兮豁双眸，何能视此兮日遨游。

作歌者虽然有超离尘世之感，但也足以说明，白水寺已绝少有人来往！

清人刘荫《重游白水寺》，更是感叹白水寺的衰败：

几年不到次禅游，昔日风光回不眸。  
老树半山无岁月，荒芜一院自春秋。  
石掀桥上人踪少，苔满碑间鸟篆幽。  
古殿云封僧化去，清溪空对寺门流。

清末民初的高官书，有《白水寺和郑民悦》诗，也道出了白水寺的清幽：

清溪环抱玉山斜，不是仙家是梵家。  
云絮遮山僧补衲，银鱼戏水浪淘沙。  
一尊石佛庄严像，两岸秋风芦荻花。  
六十衰翁犹健步，游情诗思两无赊。

此外，还有清代房山县令佟有年和邑人齐推的《白水异浆》诗两首。佟有年诗为：

玉洁波光信异浆，旃檀林外尽闻香。  
甘芳可夺金茎露，色味兼优选佛场。  
不有琼瑶难共垢，只应鸥鹭浑相忘。  
蒹葭若许盟秋水，不放红尘渡野航。

从“尽闻香”中，我们可以想见，此时的白水寺已有许多“进香”的人。再看齐推的诗：

白水涓涓喷玉浆，东风散作百花香。  
平桥接岸通莲社，曲径穿林入稻场。  
鹿饮溪频苔鲜破，狐参禅久俗尘忘。  
昔年扬子栖真地，旷代犹堪渡苇航。

这首诗说明，在白水寺周围，不光有溪边饮水的野鹿，还有以寺为穴“参禅”的狐仙。诗里还透出一个信息，就是有人已经在白水河开辟“稻田”。从上述诗文中，可以想见一百多年来白水寺的自然风貌和环境变迁。

## 白水寺的石阁石佛

白水寺是一座座北朝南的无梁殿，重檐庑殿顶，砖石结构，平面呈正方形，穹隆顶，中央雕有龙头藻井。寺的外观为两重方阁，阁户南开，成拱形，门西侧为对称券形石片牖，正对释迦佛上层石阁正中，亦开一卷门，两重之间可行

人。阳光从上端直卷门直射殿内，殿内生辉，佛像为之灿然。

白水寺的山门、禅堂、钟楼毁于清代，石桥毁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1993年重修白水寺时，只有塌落半边的石阁和三尊石佛，还有竖立山顶的华表。

白水寺内的三尊石佛，中者为释迦牟尼，高5.8米，为北京地区石佛之冠。释迦佛面部丰满，两耳垂肩，螺发，无高肉髻，双手平端在胸前做等印式。两旁二胁体微前而立，左为阿难，面目虔诚，双手合十。右为迦叶，双手合并，身往前倾。二像身披袈裟，站在圆形莲花座上。可惜迦叶的头颅在“十年浩劫”中被人搬掉，至今下落不明。

据佛经记载，阿难跟随释迦佛二十多年，因长于记忆，故被称为“多闻第一”。迦叶在释迦弟子中年高望重，故造像应为长者形象。现在迦叶头颅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信众募化，与其原有风貌和造像风格极不协调。

仔细观察释迦佛造像的衣褶，可看见当年泥皮彩绘的痕迹。从佛像清晰流畅的线条中，我们可以想见造像者的虔诚。从“谷中秀石屹立，昔人因之为大觉像”的记载看，三尊石佛像属于就地取材雕刻而成。对于三尊石佛造像的年代，存在金代说、元代说两种观点。1992年，我们陪同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清到白水寺考察，史先生倾向于金代造像。

## 白水寺华表

白水寺后面山顶上的华表，有人以为是石塔，也有人以为是石经幢。从明朝郑民悦《重修白水兴隆寺记》中“有华表树之于巅”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其为华表，距今已有417年。

华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古人说：“尧立诽谤之木。”三国时的韦昭说，诽谤木是考虑到政治措施或有得失，让人们把意见写在上面的。诽谤木当时是“四柱木”，又称“交午柱”。后来，人们把这种木柱或石柱立于明显之地，用以“表识衢路”，白水寺的华表，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华表为花岗岩雕凿而成。形制亦为四方形，每面50公分宽，高306公分，从柱基至第一层为225公分，华表为四层，从下至上层层收缩，第一层到第二层距离10公分，第二层到第三层距离8公分，第三层到第四层距离7公分，攒尖顶为36公分。每个华表层的高度为20公分，每层飞檐宽出华表柱身9公分。在四层华表石面底部，还向四边刻有整齐的竖线，根据每层石面的宽窄不同，分别刻有60至40条竖线。这种横线加上直立的华表柱身正好表现了

“一纵一横”“交午柱”的含义，同时也对华表起到了装饰作用。华表的底部为圆形，周长 152 公分，可见华表是先在地面雕凿安装好，然后又凿石为穴竖立于坑中，在石柱与石坑之间，还有为起固定作用而镶嵌的铁板残片。

这座石刻华表，常被当地人附会为穆桂英的拴马桩，并衍生出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

## 白水寺石桥

白水寺在明朝万历十四年（公元 1586 年）重修时，并没有石桥的记载，但在清咸丰八年（公元 1858 年）时，石桥已经存在了。这之间相差 272 年，石桥肯定是在这期间修建的，因为有了这座石桥，古寺、石桥、溪水，才构成了“有桥无路”的趣话，以后又形成了“白水异浆”的独特景观，并被列入“房山八景”之一。

白水寺石桥毁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人说，桥宽 5 米有余，长约 10 米。桥上有汉白玉栏板，桥面中间的一块石板上，有一个漏雕的花岗岩石球，能转动，但拿不出来。1995 年白水寺石桥修复前，堪察石桥与白水寺山门中轴线相对应。东边的封土遗址底宽 6 米，高约 5 米，西边的封土遗址底宽 4 米，高近 3 米，两封土之间相距 11 米，白水河穿行其间。河边碧草葱笼，泉水叮咚。白水寺石桥残石，多见于铁路护坡台阶，台阶宽 130 公分，64 阶，每阶高 20-26 公分不等。台阶条石每块长约 100 公分，高 12 公分，宽 30 公分。在铁路桥涵洞东面的洞壁上，有 12 块雕有花纹的石料，其中一雕有花瓣的石块高 25 公分，长 32 公分。花瓣的直径为 30 公分，呈菱形，8 片，每片长 11 公分，宽 5.5 公分，条石厚度不明。另一条石高 19 公分，长 40 公分，云团形对称纹长 23 公分，线条清晰明快。涵洞西边洞壁还有雕刻极细竖纹的汉白玉石一块，石长 86 公分，高 20 公分，疑为石桥上的条石。此外，还有雕刻团叶形的条石垒砌其间。

## 白水寺残碑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市文物部门对白水寺进行调查时，发现“两碑扑地”。这两块碑到底是明朝的，还是清朝的，不敢妄断。

在铁路桥涵洞左边的护坡上，有两块被当作基石的残碑。碑厚 15 公分，一块为 44×55 公分；一块为 63×59 公分。其中一块为碑之上部，且刻有云纹，

从两边齐整来看，这块碑宽为 64 公分，但高度不明。又因碑文一面朝下，故不知有无文字。另一块碑阴上刻有 8 行字，有“高明通齐氏、桑大川李氏、杜门刘氏、赵门苑氏”等 50 个施主的姓名，与此相应的另一块残碑则被垒在涵洞右边的台阶上。如果有朝一日把这几块残碑清理出来，或许能了解白水寺更多的历史资料。

## 白水寺的今天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日益增强。白水寺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1993 年，北京市文物部门拨款 3000 元，房山区政府拨款 2000 元，燕山园林局自筹资金 8000 元，合计 13000 元，修复了残破的白水寺建筑和寺庙路面。此后，又投资 7 万元，恢复了寺庙石桥。同时在山坡上建重檐亭一座，并修建了山路。

白水寺森林公园总建筑面积为 322 平米，其中古建 100 平米。重修了白水河，水面达到 850 平米。绿化 55.6 公顷。覆盖率 99.87%，其中乔木 13000 多株；落叶乔木 9846 株；长绿乔木 3616 株；落叶灌木 56159 株；长绿灌木 217 株；绿篱 1200 株。可以说，白水寺森林公园，已经达到了“八百年古寺，八百亩森林”的建设初衷，它已经成为燕山地区一处供人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之一。

### 参考书目

- |                |         |
|----------------|---------|
| 1、《房山县志》       | 民国十七年版  |
| 2、《日下旧闻考》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3、《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 4、《中国古代史常识》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 上方山七十二庵

杨亦武

上方山位于我区韩村河镇，距北京约 70 公里，原始次生林密布，自然景观奇特，它集自然、历史、文化、佛教为一体，具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韵味。上方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上方山佛教发展史不仅在北京地区有着独特的地位，甚至成为北方地区佛教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传，上方山的开山祖师东汉的华严法师。其实，上方山的佛教始于北朝东魏时期，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535）邺水赵广度大师到上方山建寺，距今已有 1460 多年的历史了。隋唐时期，以兜率寺为中心，上方山诸寺初具规模，辽金时期进一步兴旺，到了明代进入全盛期，上方山寺庵达到一百二十座之多，清代康乾时期，上方山寺仅存寺庵七十二座，民国时期进一步衰落，所存寺庵不足五十座。

## 兜率寺山门之外诸庵

接待庵，居于入山之口，经此可达兜率寺及环山诸寺。庵后山峰耸峙，形状诡奇，名狮子岭。庵前有平台，原有明万历六年（1578）所铸大钟一口，另有清康熙十六年（1677）碑一方。

庵门有额，题“接待庵”，入庵有武圣关帝塑像，左右各有马一匹，马夫牵之，左边的马为关圣的座骑赤兔。这里奉关帝，意在镇守山门。

一进为关圣殿，正殿内亦奉关帝，左右二侍者。二进为住庵方丈的丈室和接待室，三进为地藏殿，奉地藏菩萨。

接待庵规模不大，历代为接待入山香客和游客之所。入山者一般先进接待庵休息一下，做上山前的准备，也可以在此住宿。清代及民国期间，上方山旅游渐兴，上下山还可以在这里租驴、租乘轿、滑杆和背行李的肩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接待庵被二七八医院拆毁。

自接待庵入山，行于涧底，石或立或卧，散布于枯涧间，两壁峭削，中通

一径，狭而曲折，看似无路，转而又一境，途有一个小山洞，名大千洞，原奉有石雕天王神像。行少许达发汗岭，此地形势险峻，所以得此名。古人这样形容攀岭时的感觉，“一步一喘息，五步一从顾。”自岭下在攀行，得一平台，名欢喜台，台久废，不可名其处。西望冠几坠，见一峰突出霄半，这就是摘星陀，为上方山绝顶。台四周，佳林秀出，奇峰环之，自台而上，达云梯之下。

云梯始建于元代，明永乐、万历两次重修，依壁随岩，阶阶而上，凡二百六十二级，左压千岩，或临万仞谷。上列石柱，环垂铁索。堪为壮观。

临梯仰望，于万树丛中见庙舍数楹缀半峰间，这就是云梯庵。绝崖千丈，壁立天成，云梯庵悬其上，轩窗四辟，红墙映翠，宛若仙山楼阁。庵左有瀑布，每逢夏季，上方山诸涧之水汇流于此，奔腾倾注 70 余米，仰望之若白练垂天，澎湃之声，不可名状，瀑布之奇，令人叹为观止。

云梯下有山神庙一座。坐西面东，一间，内供山神一尊，由青石雕成。长络长髯，披盔挂甲，武将装束，手握一柄开山斧，正襟危坐于宝座之上。山神庵左侧北山崖上竖镌“幽燕奥室”四个楷书大字，上款楷书小字注明时间“民国壬申年十月”，下款属名“陈兴亚”。

攀云梯较为惊险，石阶陡峭狭窄，挽索而攀，步步为艰，身悬半空，形同鸟道，渐觉汗溢筋弛，喘息不定，驻足回首，惴惴生畏。行至 50 余级，至一平台，可纵目一览四山之景。山壁凹处一小洞名清陀洞。

云梯庵位于云梯顶端，为一间楼阁式建筑，上下两重，下重前后开敞为云梯上端出口；上重窗轩具全。登上云梯，东向有一门，进门有北殿 1 间，这是云梯庵的正殿。

云梯庵又称接引弥勒佛殿，明永乐年间由上方山僧人然义与内官监太监向福善发心创建。成化二年（1466），僧人昌友与兜率住持常文及信士陈普寿等募化重修。当年接引弥勒佛殿内奉泥塑接引弥勒佛，壁画诸佛影像如“观音势至、童子善财、十六高僧、观音八难、地藏十五”等。殿内还陈设钟、鼓、磬板、香炉、花瓶等物。

早年庵内住有僧人，由于交通不便，来山光观的游客不多，偶尔有客前来，庵内的僧人极为欣喜，必献茶，并拿出上方山的特产黄精招待来客。

云梯庵背北面南，居于绝壁之上，左临摩天苍岭，右俯百丈云梯，与云梯相应成势，为上方山第一名胜。立于庵前，扶栏俯瞰，云梯危倾，心怀惕怵。

过云梯庵北行 2 里许，一桥东横，名款龙桥，过款龙桥为兜率诸寺山门。款龙桥是一座单孔券形石桥，桥长 8.30 米，宽 2.90 米，孔径 3.10 米。桥对

面路边的山崖上嵌一方石刻，高 0.79 米，宽 0.52 米，云纹首，竖提：“款龙桥”，上款：“康熙丙辰仲春吉旦”，下款“住山沙门智眼捐资造”可知此桥为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上方僧人智眼所造。

据传康熙年间，上方山有一逆僧，酗酒作恶，滥伐山林，真伦和尚维护佛律寺规，状诉当朝，康熙帝降旨，严惩恶僧，封真伦为五品并上方山寺住持。此桥即众僧山门前接旨之地。

过款龙桥而北，即山门，南向，门嵌石额，楷书：“兜率神林”右竖式落款：“大清光绪七年四月初八日”。可知山门为光绪七年（1881）重修。驻足四顾，松柏阴翳，寂无人声，苍翠盈崖，山寺错落。

山门外有碑刻 6 通：自依次为，乾隆三年（1738）《上方山供众地亩碑记》、康熙六十一年（1722）《邵氏兄弟捐地碑》、清雍正三年（1725）碑、乾隆四十年（1776）《华严米会碑》、乾隆二十二年（1757）《明贤圣修尊宿供众碑记》、清乾隆二十一（1756）《建立供众斋僧碑记》。

进山门有碑 1 通：为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上方山义田碑记》。山门内原有一座亭子，名一览亭，民国时已破败，今遗址无存。

## 兜率寺

兜率寺为七十二庵之总汇，居山正中，群峰环拱，诸庵翼附。寺后一峰独秀，名锦绣峰，为上方山十二峰之一。前为天王殿，天王殿左为有钟楼，右为鼓楼。均圯废无存。正殿为释伽殿，门旁有大琉璃砖二方，左边琉璃砖上刻“清”字，右边的琉璃砖上刻“规”字。殿内奉释伽牟尼，后立香神花神各一尊，手执日月扇。释伽佛前为四尊小佛，左为药师佛和观音，右为弥陀佛和大势至，大殿两侧为十二天神，每侧六尊。殿角有明万历年间所铸铜钟一口。佛像前的香案上陈经卷及木鱼、鼓等法器。此殿最后奉一尊倒座观音。

殿宇后的外壁嵌万历五年（1577）司礼监掌监事冯保所书《四十二章经》，刻石十五条。后有观察大夫刘效祖跋。冯保作为一个明庭太监，在历史上并不以书法著称，所以清人曾怀疑是托迹宦门，以邀显达者代笔。

东为积香厨，即诸寺僧人的厨房。早年，合山僧众以晨钟暮鼓为号，集于兜率寺的积香厨吃斋，每逢晨钟响时，或暮鼓声起，众僧持钵齐集于山门，披袈裟绕殿诵经，诵罢持钵讨斋而食。

二进殿为斋堂，殿前原有二碑，一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立，一为

清光绪二年（1876）立，二碑中有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经幢一座。

由斋堂左行，过积香厨，向北登上石阶，升上一个高台，此台与释迦殿顶平，台上为兜率天宫，额题“兜率天宫”，此殿为上方山诸寺的藏经楼，清代曾叫弥勒阁，有藏经四柜。兜率天宫在佛教中为第八重天，乃诸菩萨功德圆满得成正果的归宿。兜率天宫殿门前，有两块和释迦殿前一样一琉璃砖，上面分别刻着“清规”二字。兜率天宫旁为本寺住持的丈室，丈室内原藏有舍利，小如粟，白而晶莹。兜率天宫和方丈的丈室均圯废。

兜率天宫左侧有石阶北上，达第二层平台，中间为大钟楼。内有乾隆五十年（1786）所铸的大钟一口，钟前奉观音大士，后奉千手千眼观音。道光时，有位四川籍的僧人在此撞钟，昼夜不停。大钟楼左右为禅室，为修禅的僧人坐禅之地。

### 兜率寺东南诸庵

进兜率寺山门，一寺在望，灰瓦红墙，跃入眼帘，这就是瓣香庵。瓣香庵为兜率第一寺，也是兜率寺东南诸寺第一寺。背北面南保存最为完整，正殿3间，内奉玉皇大帝神像，左右二侍者，二侍者左右为四功曹与四将军。东西配殿各3间。山门南向。瓣香庵外原有《当寺瑜珈院故山主崇公灵塔记》石幢，金大定二十年立（1180）。石幢上有《大宝广博庵楼阁善住秘密真言》梵文。瑜珈院、广博庵无考。

山径自兜率寺山门南来，至瓣香庵前而西，过瓣香庵而北，曲折过兜率寺。

菩提庵，位于瓣香东北，圣贤庵东南的半山间，背北面南，三间规则，唯存残基。山门西向，北有一松甚壮。北倚绝壁，前临深壑，举目南瞩，百步云梯在云雾苍茫间，峰岭相峙如墙，目之尽处如雄关。

药师殿，位于瓣香庵东南，已圯。自瓣香庵而东向南攀升，便达药师殿。药师殿坐东面西，山门内有影墙一道，殿3间，南北配殿各3间。尚存四周围墙、正殿山墙及后墙、南北配殿殿基。药师殿内原奉有药师琉璃佛，院内有辽代的铜钟铜磬各一件。北面隔壑是菩提庵，临药师殿西俯。瓣香庵殿顶、院落历历在目。

延寿庵，东临涧与瓣香庵于东北相望。已圯，遗址仅存。

上方山有东西二涧，东涧源于兜率寺东法华庵，西涧源于望海庵北。东涧由一斗泉、甘泉、圣泉汇流而成分别自法华庵西侧、南侧流过至法华庵西南交

汇南下，至红桥庵，过红桥与西涧汇。西涧自望海庵北，南下，经净业庵，至观音殿西，转而东，经观音殿前，又南下经兴隆庵前过听梵桥，经西方、弥勒、地藏诸庵转而东，又经永亨、福吉、福德、因果诸庵，再过十方院转经红桥庵西南于红桥庵前与北涧汇。两涧汇而南下左有瓣香庵，右为兜率寺塔院。再南经延寿庵东，南下，直达云梯，飞瀑而下。

贤圣庵，居于瓣香庵后之高处，雄居瓣香、红桥二庵之上。占地 3 亩许，古称竹子园，原有竹甚茂。而今只余荒草残基。北、东、南三面青峰高耸，东有东朝阳庵等二庵悬于半山绝壁，北有法华庵，西有红桥庵、塔院，南俯瓣香庵。平面呈长方形，背北面南，前后有草地各亩许。正殿 3 间，东配殿 3 间，西配殿 2 间，均倾圮。正殿存山墙和后墙。山门南向，保存完好，与山门相连的南墙亦完好。

出贤圣庵，东南半山间有东朝阳庵。背北面南，山门南向，残存。前有古柏一株。正殿 3 间，已圮。西俯圣贤庵，南下有瓣香庵，南偏东隔涧有药师殿。孤山口普济寺开山圆银和尚初居于此。

红桥庵，在贤圣庵西。两庵隔相峙，有便桥横跨涧，这就是上方山诸桥之一的红桥。过红桥便是红桥庵山门。红桥庵背北面南，正殿 3 间，山门东向，正对红桥。

后有下佛殿居北崖之上，前有涧流曲折而南，西南与十方院隔涧相望。庵后有便路向西南通塔院。

红桥庵处于上方山东西二涧西汇处。东涧自北来经庵东而南，西涧自西来经庵西南，与东涧汇。过红桥庵北行攀上石级，路左有下佛殿、堂子庵。

下佛殿、堂子庵在同一院落。为兜率寺东南第一庵寺。位于红桥庵北，兜率寺东南脚下。下佛殿背北面南，山门居殿之左，北向，进山门有西殿 1 间，这便是堂子庵，过堂子庵而西，在北殿 5 间，这是下佛庵。

顺下佛殿、堂子庵山门前小径西北而上，便上兜率寺。下佛殿西有小径曲折而下可达十方院。下佛殿院内发现有唐代及辽金时期的沟纹砖。

### 兜率寺西南诸庵

华严祖师洞，在上方山之西岭。洞东向，临崖依洞，北侧 3 间，南侧一间。砖土结构，一门二窗，门窗呈券形。额题：“华严祖师洞”，洞前有小殿 2 间，坐北向南。

送子庵，在华严祖师洞北，已圯。背南面北，三间規制，山路南自华严洞来，回环北去，东隔涧树与青龙峰相望。

昙花庵，临送子庵，在送子庵北偏西。已圯。背西面东，山门北向。正殿3间，南配殿3间。北配殿2间，内供佛像，残墙存佛龕一处。山门两侧庵墙尚存。山门前有地亩许。庵前路由华严洞来经送子庵侧，过昙花庵前北去塔院。

十方院，在塔院北侧，兜率寺西南。自下佛殿西有小路可过。院背南面北，西涧西来经院前而东。有便桥跨涧通院，过桥临涧有影壁一道，影壁南为山门。进山门，正殿3间，东西配殿各3间。院内有古松两株。十方院居于幽壑，背倚塔院，覆苍林，面灵溪，仰兜率，佳境独成。十方院，有金正隆元年（1156）度公幢。

自十方院西行而南为因果庵。在十方院西偏南，已圯。背南面北，呈南北向长方形，规模略大于十方院，正殿3间，山门及前墙残存。早年因果庵内牡丹甚众，相映成势。因果庵东、南为塔院，西为福德庵。

福德庵，位于因果庵西偏南，已圯。背西面东，院落呈南北狭长状，略大于十方院、因果庵。正殿3间，南北配殿各2间。古柏苍林环于四周。福德庵内有积德庵。北隔溪有胡公庵，今遗址仅存。东有浩如泉公和尚觉灵塔，遗址庵西侧一壁陡起，永亨庵居其上。

永亨庵，在福德庵西，占地五六亩。已圯。背南面北，两进规模。一进正殿3间，东西配殿各3间。正殿前有二明碑。二进正殿3间，背苍岭面青峰，古松成林，绿荫蔽日。庵前及庵东的平地甚广。永亨庵北有一桥横涧，过涧有福吉庵。

福吉庵，与永亨庵隔涧相峙，西北有大悲庵。背北面南，正殿3间。东西配殿各3间。福吉庵西尚有寺庵遗址一处，无考。

大悲庵，在福吉庵西北。北临断崖，遗址仅存，规模无考。北崖上为出兜率寺西行路，路右有毗卢殿高居岭腰。大悲庵东北为上方诸寺之首兜率寺。

地藏殿，是上方山诸寺中规模宏敞的庵寺之一。位于永亨庵西，寺基高耸，悬绝如削，虽已圯毁，残垣断墙，已十分可观。出永亨庵西望，一寺甚雄，碧瓦红墙，赫然在望，这就是地藏殿。拾级而上，山门北向。进山门，为一长方形空场，中有巨松一株，围2.66米，高20余米，老干拙枝苍古卓异。寺背西面东。寺门1间，两侧有角门，殿3间，两侧有了夹殿，南北配殿各3间。两配殿东端，各衔夹殿1间。有跨居其北，有北殿3间。地藏殿东南的山场甚广，古松成林，极为壮观。边沿有环垣，临垣俯瞰，砌壁如削。

地藏殿在兜率寺西南诸庵中是最为宏伟的一座，绝非其它茅庵草寺可比。临寺东望，十方院、因果、福德、亨诸庵淹没于苍林翠影之中，而兜率寺雄居于诸寺之上。早年地藏殿所奉为地藏菩萨，并藏有大量经卷。该寺毁于 70 年代。

弥勒庵，已圯，山门仅存。背西面东，山门东向。正殿 3 间，院北为碾房，尚存一碾盘和碾砣。南墙有小门一洞，与地藏庵跨院通。

西方庵，南临弥勒庵，已圯。背西面东，山门东向，内有影壁一道，正殿 3 间，两侧有夹殿，东西配殿各 3 间。

兴隆庵，南临弥勒庵，北与观音殿隔涧对峙，已圯。庵基高耸，背西面东，山门东向，正殿 3 间，南北配殿各 3 间。小径自兜率寺来过听梵跃涧，经庵东、北，西上。庵前有槐树王，高 27 米，直径 1.35 米，树龄千余年。

### 兜率寺西北诸庵

观音殿，在兴隆庵北，规模如地藏殿。出兴隆庵，过槐树王，拾级而西，登上一平台，山场平广，二松并峙，其北一桥跨涧，过桥，迎面为山门，青砖石券，券额镌一“佛”字，门楣嵌一条石，题：“观音殿”。绝涧喧于寺前，苍岭卧于西南，举目西瞩，林麓苍茫，为诸寺中又一佳致。当年，观音殿内奉观音菩萨。有清顺治二年（1145）知房山县福唐张应召《上方山三圣庵置田供众碑》，院内有钟，钟上有“天启癸亥上方山三圣庵悬挂”的铭文，可见观音殿本名三圣庵。观音殿门外原来有石拱桥一座、石板桥一座，一上一下，均可通行。门前有古松两棵，高耸入云，为山中罕见。原有腊梅一丛，这在北方是很少见的。门前曾立有清光绪十七年（1891）碑一方，记载了修云水洞等路径的经过。门旁的墙壁上，原有山水画一幅，为南宋著名画家龚开所画，足见此殿之古。龚开绘画师于二米，惟独用金碧勾勒有人李将军遗风。观音庵的背后为紫云崖。

观音殿为西北诸寺之首，其后有朝阳庵、净业庵、吕祖阁、最北为望海庵，依次列于山谷左侧的密林中，错落而上，有仙家风。其中朝阳庵、吕祖阁、甚为可观。

出观音殿而北，拾级而上凡 7 升，向东登上一高台，台上有净业庵。坐东朝西，已圯。规制极草，略逊于观音、朝阳、诸庵。正殿 3 间，南北配殿各 3 间。山门和院落墙保存完好，山石磊砌，灰泥抹面。

朝阳庵，在观音殿北，净业庵东。坐北朝南，山门南向。山门院墙基本完好，正殿3间，东西配殿各3间，殿顶由于漏雨落架，殿墙完好，尚存大观。配殿山门一侧各有夹殿1间。院内原有一口古钟，钟上有“万历乙酉净土庵悬挂”的铭文，可知朝阳庵原名净土庵。院内曾立康熙二十二年（1683）立经幢一座，庵外还有修竹数丛。庵前有地颇宽绰，可游可望。翠谷在前，青峰在后，石径隐于林间。偶闻人语，不见行迹。

从朝阳庵后寻石级回环而上，到达吕祖阁。院落十分宽敞，院内有柏树王，高28米，直径1.54米。树龄1500年左右。正殿7间，中间1间为单间2层楼阁，原供吕祖。左右配殿3间，配殿靠山门一侧各有夹殿1间。吕祖阁是诸庵中保存较为完好的寺庵之一。山门院墙完好，左右配殿亦完好正殿中楼阁基本完好，其余6间正殿殿顶落，殿墙均完好。

望海庵，在西北诸寺的最北端。背北面南，山门和院墙尚存，在西北诸寺中规制最草。正殿3间，正殿西侧有夹殿1间。山门和院墙均山石和土磊砌，与净业庵相比尚逊。正殿尚存，严重后倾，西山和前脸已残。望海庵居西涧之源，为山谷尽头，倚峰面壑。临庵南望，翠谷如烟，苍林如海。故名“望海庵”。

### 兜率寺西诸庵

兜率寺西有佛寺一所，名舍利殿。殿南向，正殿内奉一尊高大的木雕佛像。另外还奉有小佛像，释迦佛及二侍者，毗卢佛，观音菩萨，观音左右分别为善财童子及龙女。右壁悬古画一幅，旁边有达摩像。正殿两侧有东西配殿各三间。院中原有光绪七年（1881）石碑一方，光绪二十五年（1899）所铸香炉一尊。正殿对面有游廊接东西配殿。游廊东端为此院之门，额题“庄严色相”。门前有小径临崖西去。

毗卢殿，在兜率寺之舍利殿西，为兜率寺西第一庵寺。这是上方山十二峰之一。峰上有石径穿林而上，寻径而攀，山门在望，一寺悬二峰腰。毗卢殿背北面南，正殿3间，东西配殿各3间，正殿、山门保存完好，配殿已圯。毗卢殿临径高居，十分幽静，背寺远观，兜率在望，林壑在前，似不可测，塔院和西南诸寺淹没其间。过毗卢峰西行，路右侧峰岭内凹。

苹果园，在毗卢殿西。东临毗卢殿，西监大藏殿。背北面南。正殿3间，已圯。早年，庵内在苹果两株，故名。苹果园是上方山诸寺的一处秀雅之地，

当年园内有苹果树两株，入秋果熟，红晕累累。《妙法莲花经》说，妙庄王如来唇色赤好如苹果，可谓善于喻物。当年，园内还有竹树及牡丹数十株。如今，苹果、竹丛和牡丹都不复存在，只有山树尚存。

大藏殿，在苹果园西，倾圮已久，已无任何痕迹。背北面南，正殿3间，东西配殿各3间。原来大藏殿寺址颇大，内奉地藏菩萨，由山门而入，一进殿内奉弥勒佛和韦陀。殿北侧有跨院，为寺内佃户所居。

文殊殿，坐北向南，沿石级而上，寺外在便墙一道，东侧有一门，进门是一空场，有菩提树一株甚古，老干凸兀。北侧有垣墙，开二门，西为文殊殿，东为松棚庵。文殊殿为明万历末惜薪司太监李志义重建。此殿山门甚雄，青砖结构，内嵌石卷，额嵌一条石，题：“大悲观世音禅林”。二进规模。一进正殿3间，左右配殿3间；当年正殿内有增塑观音三十二应像，殿后有两幅绢本画，均为绢本，一幅画为水墨达摩立像，出自著名画家周荃之手，另一幅是人物画，乃是明万历末惜薪司太监李志义的肖像画。二进正殿3间，名观音阁，为两重楼阁，左右配殿各3间。观音阁内原有减塑观音三十二应像和窑变观音一尊。立于寺内，骆驼峰映于殿角，仿佛与来客同息。后院原有花园，花木杂处，随处可见，花开时节，色香袭远，风韵绝佳。有垂杨拂拂出松柏间，绿阴下覆观音阁。阁下原有山泉，汨汨涓涓，终岁不竭。文殊殿东侧有跨院，院南设一便门，内有北殿3间。名松棚庵，为文殊殿僧习静之处。

听梵桥为清乾隆元年（1736）宛平人查礼所起，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来上方山观光的查礼坐在文殊殿外横跨西涧的石桥边，此刻松风习习，斜照未敛，倦鸟竞还，山寺诸庵，梵声四起，南钟北磬，前后递响。次日游山归来，再憩文殊殿外石桥，寺僧达闻设茶果相待，当时桥未有名，达闻请求查礼为石桥起名，于是查礼提毫在手，题“听梵桥”三字，意思是日暮在此听梵声最佳。

弥勒佛殿，座北朝南，一间，保存基本完好，只是门窗已失。殿左右林麓如织，颇为幽静，过殿右行，攀上摘星坨上有势至庵，又称峻极殿。

势至庵，三间規制，内奉大势至，以石为瓦，额书“峻极”，为显亲王题，庵前有巨木架于石上，看去仿佛栈阁一般。民国以后倾圮。

自橡树林西北行，可达云水洞，中途有山神庙一所，坐东朝西，一间规模。

云水洞前有朝阳庵原名大悲庵，坐北朝南。有殿两重，前三间，奉千手千眼观音一尊，西侧有跨院，住着为寺院耕种的佃农，后殿三间，连云水洞口。后殿左右配殿各三间。向阳庵民国未倾圮，近年重建，后殿没有恢复。

## 兜率寺东诸庵

出兜率寺东，北为龙虎峪藏经阁，南为法华庵、退居庵。

藏经阁，原名广慈庵，民国重修后以为今名。院内一松甚巨，名松树王，院内还有《大金中都涿州范阳洪家庄院比丘尼坟塔记》石幢一截，铭文记载：此尼姓杜，固安县赵家务人。又有《大金中都报先寺尼德净坟塔记》石一截，为大定二十五（1185）无物庵僧裕贤刊刻。无物庵、洪家庄院、报先寺均无考。藏经阁右后方有泉，名甘露泉，掬而饮之，极清冽，毛骨为爽。阁内原有住僧，每逢客至住僧便汲泉泡茶，招待客人，用此泉泡出来的茶味独香醇，甘冽可口。

法华庵，位于兜率寺东的一直台地上，背东面西，正殿3间，北配殿2间，庵内原有金贞元三年《金山院比丘尼了性幢》。山门南向，占地亩余，四周有古松、山树10余株。东倚青峰，西面、南面绝涧相环。西仰兜率寺，北临退居庵，西南与下佛殿隔涧西望。入兜率寺山门过瓣香庵，翠影红墙，遥可望及。

退居庵，在兜率寺东咫尺之处，保存完好。后有藏经阁高居岩上，前为法华庵。背北面南，山门南向。止殿6间，东西配殿各3间，配殿临山门侧各有一门夹殿。

圣泉庵，内有清泉三眼，所以叫圣泉庵。依北山崖而建，坐北面南，北殿4间，一明两暗。中堂2间，中设佛龕供佛；左右各1间，为僧居之处。圣泉庵居于峪口，观感别致，但由山石磊砌无砖瓦，半为山寺半为崖，为诸寺中最草一类。

斗泉庵，坐落于山峪尽头，上有斗泉岩，下为一斗泉。斗泉庵背北面南，凹于绝崖之内，正殿1间，中有龕，内奉观音菩萨跨神兽抱膝而坐，现已遗失，东西两壁绘华严开山与毒龙斗法的故事。后壁绘怪石，左为玉净瓶插柳枝，右绘《在法华妙莲经》1部。正殿各有夹殿1间。东西配殿各2间。置身庵院，举目而望，丹崖覆顶，钟浮赭黄，附崖怪垂。这是著名的斗泉岩，岩高数十仞，广倍之，怪崖前突数丈，空洞受天光，斗泉庵覆其下，即使震风凌雨，也不受到侵沥。苍松怪柏，倚岩而生，老根盘垂，仿佛瘦虬舞于天际。岩壁钟乳琳琅，有的如灵芝，有的如箨笋，有的若朵莲，有的若蜂房燕垒，千姿百态，不可名状。每逢盛夏，山雨时至，水集崖头一下注，如水晶帘，微风扬之，作笙竽巢和之音。所以斗泉岩又名水帘洞。

斗泉庵东配殿内侧一间为穿堂门，于此进庵。西配殿内侧一间亦为过门，

西出过门，顺石阶转于庵前基下，庵基为山石磊砌，中开一洞方门，入为一斗泉，泉深三尺许，方二尺，可汲可饮，经年不竭。一斗泉和华严洞、旱龙潭一样，被上方僧人视为华严祖师开山的圣迹。相传华严祖师开山时，毒龙携水而去，华严追龙索水，飞锡击其尾，仅得水一斗笠泻此成泉。所以叫一斗泉。

尊圣庵，为茅庵草寺，一间规制坐东朝西，内开一龛，供给孤独尊者，泥塑，已残。山门北向。背岭依峰，临崖面谷，极尽雄险之势。殿后有巨石如砥，后有巨石，颇似虎斤的千人石，可容数十人，游人坐在上边，欢声笑语会从对面的山岩上应和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山鸣峪应，此石因此叫“应声石”。这是因为庵前为斗泉岩，岩虚受声，所以有造成了“空谷传响”的灵异。游人至此，可置酒小酌，远望前山，历历在目，甚至可以看到旱龙潭。山风拂面而爽，时见白云起于峰顶。

普贤庵，自圣泉庵南行，攀青龙峰，居于半途。庵背东面西，山门南向，山门及庵墙残存。内奉普贤菩萨骑象神像一尊，已失。普贤庵为诸庵中又一佳致，远岭在上，幽谷收于眼底，俯瞰西北，兜率寺居于绵秀峰下。古树环蔽，山鸟时鸣。殿前原有道光十二年（1886）铸大铁钟，高约两米。

普兴庵，已圯，遗址无存。钟楼尚存。钟楼为凉亭状，内悬一铁钟，高180.3公分，直径106.5公分。钟为铁铸而成，龙钮，钟身上端饰莲花纹，下饰法轮垂流苏。镌：“发心人屈福成、沙门普英、善敬：善人爱贤、刘福海”落款：“宣德乙卯年五月吉日铸匠周福清造”钟楼内原本为一口铜钟，高约两米半，铭文为“民国十六年四月八日造”，“江夏傅狱芬敬署”。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日军民捣碎，制造了军火。后来，才换了现在的这口钟。普兴庵钟楼记录下民族抗战的沧桑经历。

#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云居寺与石经山

吴元真

北京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因塔及石经而闻名，因其年代久远，文物历史价值显赫，故 1961 年即被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着千余年历史的云居寺与石经山在抗日战争时期曾遭到侵华日军的轰炸、焚烧，被夷为废墟。战争的创伤以及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在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留给人们的也只有伤痕累累的几座唐、辽时期的佛塔，以及散仆在遗址上各个历史时期的石刻文物和石经山上藏经洞内的石经了。

1985 年成立云居寺修复委员会，决定重建云居寺。我参加了云居寺重建一期工程的工作，承担云居寺山门殿的复原设计。重建前的云居寺院仅有山门殿的前门石门券还竖在遗址上，其余殿宇厅堂房屋建筑荡然无存。设计前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地上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档案中我曾见到战火前的云居寺山门殿和一进院牌楼的旧照片。这无疑为复原设计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使其山门殿的修复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这已是 17 年前的事情了。2002 年是云居寺辽金石经出土 45 周年，8 月我参加了由房山石经研究会举办的第二届石经文化研讨会，又引起我对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文物保护工作的关注。会后我回到国家图书馆，在善本部舆图组同志的帮助下，见到了一本邓之诚先生旧藏的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云居寺与石经山照片册，十分珍贵，有极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该影集为棕色片，凡 42 张，现依原顺序列表如下：

序号	尺寸 (单位厘米)	照片上原有的说明方字
1	11×15.5	四大部经成就碑记
2	19×13	石经堂西壁经版
3	19×13	石经堂东壁经版
4	19×13	千佛殿即石经堂在云居寺东峰就洞为殿四柱造像旁刻佛号四壁嵌石刻经版计妙法莲花诸经十二种一百四十八版此殿之中部

序号	尺寸 (单位厘米)	照片上原有的说明方字
5	15.5×11	藏经第一第二洞在石经堂南下
6	15.5×11	第二洞石门缺楞内窥经版之影
7	15.5×11	藏经第三第四洞在石经堂之东崖
8	15.5×11	藏经第五洞在石经堂东院
9	11×15.5	藏经第六洞在石经堂东院有董其昌宝藏石额
10	11×15.5	藏经第七八两洞在石经堂之西崖唐僧洞之东西
11	11×15.5	第七洞石门缺楞内窥经版之影
12	11×15.5	小西天千佛殿西崖及绝顶石浮屠
13	11×15.5	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石幢八棱在寺南塔北俗名压经塔即藏经塔也此为辽大安九年以后通理通慧圆照续刻经目天庆八年志才撰文（一）
14	11×15.5	续秘藏石经塔记（二）
15	11×15.5	续秘藏石经塔记（三）
16	11×15.5	云居寺南藏经塔及石幢东望之景（照片上中部有墨书6行）丁酉七月十二日于塔下掘出辽道宗造石经百十八片辽僧通理大师所造四千十八片土人呼塔为鸭经塔盖压经之讹
17	15.5×11	云居寺之南二里下庄村为入山所必经诸山之水汇为溪流柳杏成林清泉白石景极秀逸
18	15.5×11	西域云居禅林唐静琬创始清溟波重修有乾隆八年碑志
19	15.5×11	云居寺门前石桥
20	15.5×11	云居寺前溪流
21	15.5×11	云居寺西南多柏树
22	15.5×11	云居寺全景北为罗汉塔南为藏经塔
23	15.5×11	云居寺南藏经塔
24	15.5×11	云居寺大殿牌坊
25	15.5×11	云居寺客堂
26	11×15.5	云居寺弥陀殿嘉庆御笔瞻礼诗原有亭今圯
27	11×15.5	嘉庆癸酉重游御笔
28	11×15.5	云居寺古松虬枝纷拏象龙形

序号	尺寸 (单位厘米)	照片上原有的说明方字
29	11×15.5	云居寺殿凡五层乾隆初多罗郡王允禧施助修建今祀为护法在弥陀殿南诸佛塑像极庄严皆乾嘉时良工手笔也此为二十四诸天象（一）
30	11×15.5	二十四诸天象（二）
31	15.5×11	香树庵在寺北静琬于贞观五年刻大涅槃成山吼一夕生香树五十余本
32	15.5×11	云居寺北诸山及曝经台
33	15.5×11	水头村在寺北村人多务农先皆寺中给事
34	15.5×11	水头村在寺北为山泉导流处就岩下凿为窠泉流汇注由此分流绕寺而出取源头活水之意因以为名
35	15.5×11	琬公塔院（在寺北）
36	15.5×11	云居寺多果木此寺北桃杏诸果林也
37	15.5×11	水头全景
38	15.5×11	小西天在寺西北五里千佛殿藏经洞皆在此
39	14×11	小西天之西山多石壁古柏
40	15.5×11	小西天五台山形如台者凡五
41	15.5×11	小西天之东石壁千仞其下有井
42	11×15.5	云居绝顶有开元二十八年王守泰山顶浮屠记

这本相册是邓之诚先生的旧藏影集。邓之诚，江苏南京人，字文如，号明斋，又号五石斋。1887年11月29日生于成都，1960年1月6日卒于北京，享年73岁。邓先生早年曾任“滇报”编辑，1917年任教育部国史编纂处民国史纂辑，1921年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并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教授。1930年起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生导师。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著有《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等。

这本影集的拍摄时间上限不会超过1912年。因为在石经山千佛殿上（雷音洞）内正面照片中，供桌上摆着有宣统壬子年四月敬献小西天的香炉鼎。宣统壬子年四月即1912年4月。下限不会晚于抗日战争爆发。因为云居寺南塔及寺院内的殿宇建筑全部毁于抗日战火。所以这本影集拍摄时间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照片中的人物穿戴及树叶凋落的景色可以判断当时已是深秋

初冬季节，人们已穿上厚厚的棉袍。这时邓先生正在北京各大学任教，照片应是先生考察云居寺与石经山时而摄。

这本影集的史料价值在于它留下了云居寺与石经山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貌，这无疑丰富了关于云居寺与石经山的图片文献，为我们考证云居寺与石经山原有建筑布局和单体建筑形式提供了直观可信的证据，可以更好地开展云居寺和石经山的文物保护工作。

阅读这本相册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启示。

## 一、关于云居寺南塔即藏经塔

相册中有三张照片可见南塔之影。其一，在“云居寺全景”中可见南塔之远景，与依山而建的云居寺北塔（罗汉塔）遥遥相对（图一）。其二，有一张“云居寺南藏经塔”全景照（从南向北望）（图二）。其三，在“云居寺南藏经塔及石幢东望之景”中可见南塔的部分塔座和塔身下部的局部（图三）（从西北向东南望）。

根据“沙门志才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所述，南塔应是在辽天庆七年（1117）将道宗、通理大师所刻石经皆藏瘞地穴之内，然后上筑台砌砖塔一座。从照片中所见此塔为八角十一层密檐式砖塔。塔四周有矮墙围绕成方形塔院，塔基为八角形砖台，塔座为须弥座，有斗拱勾栏的平座和三层仰莲瓣座。塔身中空，四正向辟门，四斜向砖砌破子棱假窗。一层塔檐下补间铺作为双翘五铺作斗拱，以上各层塔檐下补间铺作为单翘四铺作斗拱。塔檐逐层向里收，外轮廓形成一条优美的弧线，这是辽塔的特征。一层塔檐下仿木结构有砖雕椽头，椽下系风铃，二至十一层出檐用叠涩手法跳出，仅角梁下系风铃。从照片上看南北两塔的高度相当。

## 二、关于云居寺院的建筑

照片反映的情况虽然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貌，但就建筑规模和建筑形式而言可以说是基本上反映了清初康熙年间溟波重修云居寺后的面貌。云居寺在清初由于是清帝祭扫西陵时的必经之路，故寺院内建有行宫为帝王提供驻蹕之所。因此清初的云居寺建筑规模是十分壮观的。清末以后进入民国以来云居寺逐渐萧条，不可能再对寺院添砖增瓦重现辉煌。照片中反映的画面其建筑

也多是年久失修的样子。

在“云居寺全景”照中可以看到，云居寺北路建筑屋面的变化形式是多样的，有大式硬山调大脊、有圆山式单檐歇山顶、有硬山卷棚顶，还有民间常用的棋盘心顶等等。如在“云居寺客堂”照片中可见圆山式单檐歇山卷棚顶带四周回廊的厅堂建筑（图四），其山面为方格眼的壁窗通达檩下皮。面阔七间的大客堂，门为四扇五抹方格眼隔扇门，窗为四扇三抹方格眼隔扇窗。这一切都保留了明末清初的建筑风格。相册中还有弥陀殿内二十四诸天塑像（图五、图六），邓先生认为此“塑像极庄严皆乾嘉时良工手笔也”。两张照片只可见十二诸天，尚缺一半实在可惜，但可以提示我们在弥陀殿内山墙及后檐墙前原有二十四诸天塑像，可为复原弥陀殿室内布置时参考。

### 三、关于小西天

影集内有 16 张照片可以追溯石经山小西天的旧貌，看到藏经洞前原有的建筑。有寺门、有院墙、有房屋、有水井、有凉亭，还有悬挂铜钟的钟房（图七、图八）。这一切今天站在雷音洞前能一眼撞入眼帘的只有那凉亭的七根半石柱依然挺立在原地，其余都不见踪影。照片中的寺门尖山式硬山顶筒瓦屋面，两扇板门。院墙为碎石垒砌，墙体不高。房屋均为尖山式硬山顶，有的是起脊筒瓦屋面，有的是用青石板叠，十分简陋。凉亭为石柱八角单檐攒尖顶。挂钟的小房在雷音洞东踏步旁南侧，券门南向，三面圆券露窗，硬山卷棚顶筒瓦屋面底瓦为青石板，屋内悬挂一钟，从圆窗中可窥其钟。

小西天干佛殿即石经堂又称雷音洞，就洞为殿，洞门是两扇木栅栏门向外开启。有正面、西壁经版、东壁经版三张照片可见洞内石经版、千佛柱和洞内供奉众多的佛像，面向洞的四面，大大小小近 50 尊（图九、图十、图十一）。洞前有一单坡顶的门厅，前檐为四根石方柱承接檐檩，无窗无门，西山墙有一小门，东山与台阶上西院门的单坡筒瓦顶相接。门厅显得很简陋，顶也是青石板叠。这肯定不是原状，可能是财力不足无力恢复原建从简而已。雷音洞的西边，在七、八两个藏经洞间还有一个唐僧洞（图十二），照片可见唐僧洞的券门及东壁。（按：图十二照片中的藏经洞编号与现实编号不符，藏经七、八两洞应是三、四两洞。）这一切都可以为恢复小西天旧貌时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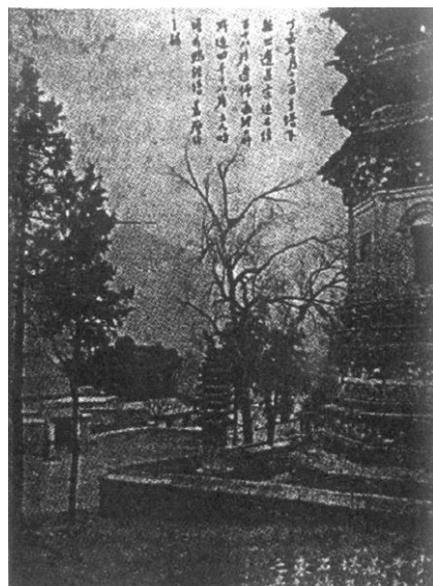
总之，邓之诚先生的这本影集是笔者见到有关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的老照片数量最多的一种，为我们考证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的历史建筑提供了依据，

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照片中那位身穿皮袍头戴礼帽，戴着眼镜，时而在碑前俯身指点，时而伫立在碑前手抄笔录的学者似是先生本人。在“云居寺南藏经塔及石幢东望之景”的照片上的题字应是先生 1957 年 70 岁时所书，可见在抗战前这次对云居寺与石经山的考察给老人家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我们在翻阅这本七八十年前的旧影集时，一方面为能获得这么多的珍贵图片史料而兴奋，同时也深深地怀念这位才学渊博的史学家——邓之诚先生。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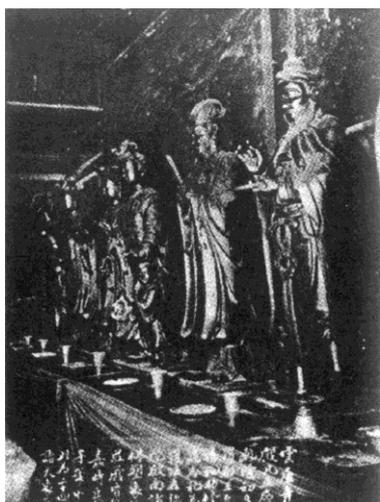
图三



图二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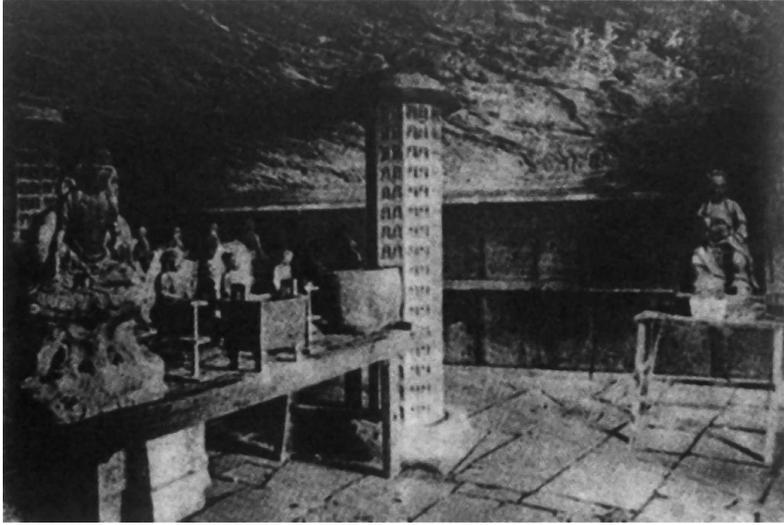
图八



图九



图十



图十一



图十二

# 云居寺雷音洞千佛柱考

徐自强 岳宗文

雷音洞位于云居寺白带山顶部，俗称“小西天”，海拔 450 公尺。其洞天然生成，经北齐和隋代改造后，始成现代形制。洞内文物，可概括为三类：穴藏佛舍利、壁嵌刻经碑、千佛柱雕刻。

穴藏佛舍利，1981 年 11 月在保护文物清理雷音洞内遗址时，于原佛座后面石板下出土埋藏的舍利函。函大小相迭，由外至内共有五层。质地分别为石、鍍金银质等。明以前藏舍利三粒，后经明代重置，现存舍利二粒、珍珠二粒。一层汉白玉石函上有明代刻文 262 字，记载明万历二十年在石经山发现三颗佛舍利的情况。二层青石函盖上，有隋代刻铭，文曰：“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以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

壁嵌刻经碑，由幽州智泉寺僧静琬主持刻就。计有：《维摩诘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胜曼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贤劫千佛经》、《佛说般涅槃略说教戒经》、《大王观世音经》、《无量义经》、《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等十二种，146 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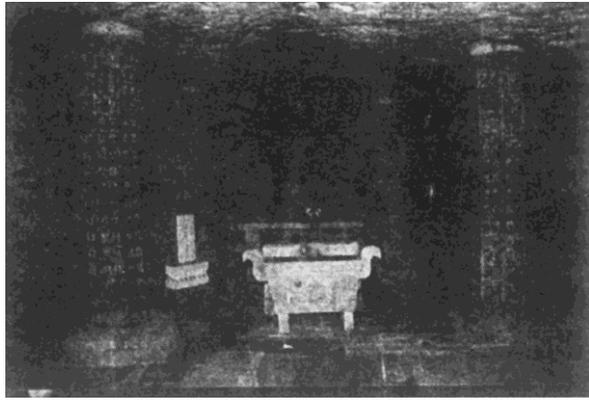
千佛柱，共计石柱四根，刻各式佛像 1056 尊。

三类文物中，一、二两类时代明确，便于研究考释。三类之石柱雕像，年代尚有争议，未取得共识，影响了对雷音洞性质、作用等的综合研究。多年以来，我们在考察、保护研究该洞文物时，对千佛柱的雕刻，萌生了一些想法，现集中起来，略加考证，公诸于世。一方面，算是我们对千佛柱雕刻年代研究的一家之言，同时也是为了便于广泛征询意见，求得方家时贤的教正。

—

雷音洞内的四根石柱，形制相似（见图一）。每柱柱身皆呈八棱形，柱上部有比柱身粗的板状八棱顶盖；柱下为覆盆式圆形柱础。它们竖于洞的中央石柱因是立于天然的洞中，故其高度随洞内空间的差异而略有区别。

门内第一排北柱（下称“一柱”）通高 255 厘米，其中柱高 227 厘米，柱顶板高（即厚）6 厘米，柱础高 22 厘米。柱身八棱每面宽 22 厘米左右，柱顶板八棱每面宽 33 至 35 厘米。柱身八面每面刻佛像二行，每行 16 尊，八面十六行共镌 256 尊。其顺序：正面（东面）左行为第一行，右行为第二行。依次为东南面、南面、西南面、西面、西北面、北面、东北面，再回到东面。东北面左为第十五行，右为十六行。每尊各辟小龕，龕顶呈微弧形，余各边为直线。龕高 11.7 厘米，宽 8 厘米。每龕内置佛像一尊、龕旁刻佛名。四柱皆同。各佛像首部皆高肉髻，尖拱型背光，身披对开大衣，袒胸，结跏趺座。唯手部印式有别，似定印者有 243 尊，似施无畏印者有 13 尊。



图一

门前第一排南柱（下称“二柱”），通高 269 厘米，其中柱身高 236 厘米，柱顶板高（即厚）6 厘米，柱础高 27 厘米，柱身八棱每面宽 22 厘米，柱顶板八棱每面宽 34 至 35 厘米。柱身八面每面刻佛像二行，每行 17 尊，八面十六行共镌 272 尊。其顺序：正面（东面）始，至南、西、北（详见一柱）。佛像端座于龕内，形制、尺寸见一柱。佛像特征，亦皆首部高肉髻，尖拱形背光，身披大衣，袒胸，结跏趺座。手式似定印者 226 尊（其中一尊稍异），似施无畏印者 4 尊（其中 3 尊有异），似触地印者 2 尊（其中 1 尊稍异）。

后排南柱（下称“三柱”），通高 283 厘米。其中柱高 252 厘米，柱顶板高（即厚）6 厘米，柱础高 25 厘米。柱身八棱每面宽 22 厘米，柱顶板八棱，每面宽 34 至 39 厘米。柱身每面刻像二行，每行 17 尊，八面十六行共刻 272 尊。其顺序同一柱。每佛端座于龕内，形制尺寸，亦与一柱同。佛像形制除手式外，同一柱。手式中似定印者 264 尊，似施无畏印者 4 尊，似触地印者 3 尊，似说法印（或无垢净光印）者 1 尊。

后排北柱（下称“四柱”），通高 261 厘米，其中柱身高 232 厘米，柱顶板高 6 厘米，柱础高 23 厘米。柱身八棱，每面宽 22.5 厘米，柱顶板八棱，每面宽 34 至 38 厘米。柱身每面刻像二行，每行 16 尊，八面十六行共刻 256 尊。其中属贤劫千佛名者 200 尊，属五十三佛名者 53 尊，属菩萨者 3 尊。其顺序为北面始，经东面、南面至西北面左行中都为千佛，接刻五十三佛名，至西面右行结尾后，续刻菩萨 3 尊。佛端座于龕内，龕制与佛像形制，除手式部分外均同一柱。手式中似定印者 252 尊，似施无畏印者 2 尊，似说法印（或无垢净光印）者 2 尊。

综上所述，四柱 32 面共镌佛像 1056 尊，其中似定印式佛 1025 尊（稍异者 4 尊）（见图二），似施无畏印佛 23 尊（稍异者 6 尊），似触地印者 23 尊（稍异者 2 尊），似说法印（或无垢净光印）者 3 尊。属贤劫中佛 1000 尊，另为五十三佛和名称为菩萨者 3 尊。



图二

## 二

根据上述基本事实，我们对千佛柱佛像雕刻年代的考定，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对比分析，以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

关于千佛柱雕像旁所刻佛名称谓的根据（即版本）问题

千佛柱雕像旁所刻佛名称谓，对照诸佛名经比较结果，乃系《贤劫千佛经》的佛名称谓。例如嵌于雷音洞南壁的《五十三佛经》云：“尔时。释迦牟尼佛告大言，我曾往（或住）昔无数劫时。于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学道。闻是五十

三佛名。闻已合掌。心生欢喜。复教他人令得闻持。他人闻已。展转相教。乃至三千人异口同音。称诸佛名。一心敬礼。以是敬礼诸佛。因缘功德力故。即得超越无数亿劫生死之罪。初千人者。花光佛为首。下至毗舍佛。于庄严劫中得佛道。即过去千佛是也。中千人者。拘留孙佛为首。下至楼至如来。于此贤劫中次第成佛。即此贤劫中千佛是也。后千人者。日光如来为首。下至须弥相。于星宿劫中次第成佛。即未来千佛是也”。由此可知，千佛柱上所刻佛名称谓，乃系《贤劫千佛经》中之佛名。

贤劫千佛之佛名称谓，在多种《贤劫经》中有记载。如：

1、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贤劫经》八卷二十品。其中《第六卷·千佛名号品第二十》中，就列有以拘留孙为首，楼至佛为尾之贤劫千佛名 1000 尊（见《大正藏》14 册 46 页）。

2、“阙译人名今附梁录”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亦名《集诸佛大功德山》）中，亦列出有以拘那提佛（即拘留孙佛之异译）为上首至楼至佛之千佛名称（见《大正藏》14 册 376 页）。

3、“开元拾遗附梁录”《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中，也列有以拘留孙佛为首至楼至佛之一千佛名（见《大正藏》14 册，384 页）。

4、云居寺雷音洞西壁嵌的《贤劫千佛经》中，亦刻有拘留孙佛为首至楼至佛之千佛名称（见《房山石经》第 1 册 1 页）。

5、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即 17 洞）中所出诸写本经中，有多种《贤劫经》（其中个别、少数为足本，多数残本），均列有拘留孙佛至楼至佛在内的千佛名称（见《敦煌宝藏》14 册）。

上述各种不同版本的贤劫千佛名经，虽然内容都是现在劫（即贤劫）中所列名称，但仍各有特色，互有异同。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千佛名之称谓有不同者；二、千佛排列次序有差异；三、刻写时使用文字，写法有异。据此，经过详细比较，可将上述各种《贤劫千佛名经》归纳为三个系统：

1、《大正藏》所载月氏三藏《贤劫经》（六卷本）为一系统。

2、《大正藏》所载“附梁录”之两个版本基本上可归纳为一个系统。其中佛名称谓全相同，千佛排序虽有一位至多位之异，但可能系抄写之误。其佛名排序差异情况，现以 1 至 200 位比较如下，就可见一斑。

1—49 位，两者全同；

50—63 位，两者中有 6 佛互差一位，1 佛错多位；

64—116 位，两者中只有 2 佛错一位，余者全相同；

117—142 位，两者中只有 3 佛错多位，余全同；

143—200 位，两者中少数同位，多数错 1 位，少数错多位。在各自统计的 200 位中，《今附梁录》还多出一佛。两本所用文字因系铅字从新排印，非各版本原用字体，无法比较。

3、雷音洞西壁嵌之《贤劫千佛经》和千佛柱佛像旁刻千佛名称以及敦煌各写本：北 845 号（霜 74）《贤劫千佛名经》；北 846 号（致 49）《贤劫千佛名经》；北 848（称 65）《贤劫千佛名经》；北 848（背面）《佛说贤劫千佛名经·卷下》；北 849（冬 73）《贤劫千佛名经》；北 851（阙 29）《贤劫千佛名经》。几种版本中，所记之千佛名称、排列次序、使用文字的字体，均基本相同，可视为一种版本在多处使用。

上述三类版本，相互之间差异较大，可视为一种经之不同版本。各本差别的原因，可能是，一、因译者不同，故名称和排序不同；二、流行的时代有异，故用字出现差别。

#### 关于千佛柱佛像的艺术特征问题

根据对千佛柱所刻佛像艺术特征的观察与统计，在 1056 尊佛像中，从佛名区分，包括了《贤劫千佛》、《五十三佛》、《三菩萨》三部分。从其雕刻形象、艺术特征归纳：即首部为高肉髻，背光尖拱型，身披对开大衣，袒胸，手部皆有印式，结跏趺座等论定，都可以称为佛。但手部印式，按其形制细分又有区别<sup>①</sup>，基本可概括为四类：

- 1、手部似定印式者（参见图二），有 1025 尊，占总数 1056 尊之 97% 强；
- 2、手部似施无畏印式者，有 23 尊，占总数 2%；
- 3、手部似触地印式者，有 6 尊，不到总数之 0.6%；
- 4、手部似说法印式（或无垢净光式）者，有 3 尊，不及总数之 0.3%。

与此相似之千佛造像，云居寺北塔院内还有《贤劫千佛之碑》可资比较研究。该碑原在房山区窦店村出土，20 世纪 70 年代移入云居寺内。其碑首与座均佚，仅存碑身。碑身现高 236 厘米，宽 123 厘米，厚 35 厘米。碑阳上部从左至右横刻“贤劫千佛之碑”六字，篆书。碑阳镌佛龕 13 行，每行 29 龕，共刻 377 龕。龕顶部呈弧形，余为直边。龕高 7.9 厘米，宽 5 厘米。每龕内端座一尊像。像的基本特征是：首部高肉髻，背光尖拱型，身披对开大衣袒胸，手部为印式，结跏趺座。据此，完全可论定是佛之形象。又据其手部印式之别异，可概括为两类：一、似定印式者，有 322 尊（其中 2 尊稍异）；二、似触地印式者，有 15 尊。另有 1 尊为跪姿式像，39 尊残泐不能辨。

碑阴中部刻“题记”，其“记”高48厘米，宽52厘米。其余阴面刻龕13行。其中六行每行雕29龕，七行每行23龕，共为335龕。龕形制和刻佛特征除手式有异外，余同碑阳。碑阴龕中刻佛共为335尊，其中手式似定印者有297尊（中1尊稍异），似触地印式者6尊，残泐不能辨识者32尊。

碑侧雕龕5行，行29龕，共为十行290龕。龕顶部呈弧形，余为直边，龕高6厘米、宽5厘米。每龕中端座一佛，共为290尊佛。佛基本特征同碑阳，手式中似定印式者，有263尊（其中稍异者5尊），似触地印式者6尊，残泐不能辨识者21尊。

贤劫千佛之碑，共刻佛像1009尊。佛基本形象全同，手式中似定印式者889尊，占总数88.1%强；似触地印式者27尊占总数2.7%；残泐者92尊，占总数9.1%；似立佛者1尊，占0.1%弱。据碑阴“题记”称，其年代为：“唐武德四年岁次辛巳正月己未朔十五日癸酉”即公元621年春二月或三月内。

#### 关于千佛柱形制问题

雷音洞千佛柱柱身、柱顶板均为典型的八棱形，八棱每面宽度相同或基本一样。这种形制的石柱，在唐朝密教盛行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之风大盛的形势下，是所刻经幢的基本形制。但这种形制肇始何时，则值得研究。

根据我国石刻演变的规律，先多是利用天然石面或摩崖石面，后则为方形或长方形石，再后则为八棱柱面或其他特制。在我国石刻发展的第一高峰期——两汉时代，无论是碑或是画像石等，皆为方形或长方形，三国两晋时期亦然。时至南北朝时期，则开始变化，虽方形、长方形仍是主流，但已有不规则的八棱柱出现，典型代表则是《义慈惠石柱》。

《义慈惠石柱》，又名《北齐石柱》，全称《标义乡义慈惠石柱》。位于河北省定兴县城西10公里的石柱村。石柱原为木质，建于北魏孝庄帝永安年间（公元528—530年）。北齐武成帝太宁二年（公元562年）四月十七日，皇帝降旨由官府改建，并刻“颂文”于柱身，现保存完好。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石柱通高665厘米，由柱础、柱身和柱顶石屋三部分构成。柱础为一块大型方石，上部有覆莲形装饰。柱身上部为方形，下部为不等边之八棱形，其做法是将四方体之四角切去，刹出一个小的平面。如此，其柱则由原来之东、南、西、北四面，变为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之八棱形。但其棱面则大小不一，原体之四棱面宽，新刹出之四棱面窄，表现其为刚出现之初期状态。柱顶之小石屋仍为四方形。

柱身刻有“标义乡义慈惠石柱”的大字隶书题额，题额下方有“大齐太宁

二年四月十七日省符下标”题记。柱身四面刻长篇“颂文”，约三千余言。

《义慈惠石柱》，最初是当地民众为怀念杜洛周、葛荣领导下的起义军而建的纪念碑，形制简陋，只有一个木质标志，后由皇帝改建，则成现状，“颂文”虽已变质，但字里行间，仍留下了“义军”的痕迹。

柱身下部不均等的八棱面，表明这种形制始自北朝，而盛行于隋唐。

### 三

根据上述诸方面的分析比较，关于雷音洞石柱的制作和佛像雕刻的年代可作如下结论。

首先，千佛柱佛旁所刻佛名，与雷音洞壁嵌之《贤劫千佛名经》比较，佛名称谓、佛名排列次序、所用文字字体均基本相同或完全一样，尤其是所用文字字体。因此千佛柱佛像旁刻佛名的时代应与壁嵌之《贤劫千佛名经》同时。现在雷音洞壁所有嵌经，据有关题记证明均为隋代后期或唐代初期。故千佛柱雕像旁刻佛名亦应为隋末或唐初。

与此同时，敦煌莫高窟 17 洞所出之各版本《贤劫千佛名经》，其缮写年代也多为隋唐时期。它们的佛名称谓、佛名排序、所用文字字体亦多与千佛柱佛像旁刻佛像名称谓相同，亦可佐证其年代为隋唐之际。

其次，千佛柱雕像之艺术特征，与云居寺所存之《贤劫千佛之碑》所刻佛像相较，其艺术特点也相似。两者的基本特征是：首部高肉髻，尖拱形背光，身披袒胸对开之大衣，结跏趺座，手部皆为印式。其印式虽有差别，但以似定印式者为主。如千佛柱佛像似定印式者有 1025 尊，占总数 1056 尊之 97% 强，《贤劫千佛之碑》佛像似定印式者有 889 尊，占辨名总数 917 尊之 97 强。故此两者的时代应同时或相近。

《贤劫千佛之碑》的雕刻年代，据其碑阴题记为“唐武德四年正月”，则千佛柱之雕像亦应为唐初。

第三，千佛柱之形制虽均为八棱柱，但也有差别。千佛柱八棱之每一面，基本相同，而《义慈惠石柱》之八棱，则分为两类型，原体之四面宽，斜角切出之四棱面窄，显然带有初期特点，应比千佛柱八棱面之时代早。

《义慈惠石柱》时代为北齐，其晚之千佛柱为隋代或唐初，正符合其演变规律。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比较，它们均在隋末唐初。故此三者应是同时之作，其

年代为隋末或唐初为宜。由此也可证明雷音洞内穴藏舍利、壁嵌刻经、千佛柱三大部分，均为配合雷音洞创建，一次完成之作，皆为其相得益彰之有机组成部分。由于静琬在创建雷音洞时，有此总体设想，就更能体现雷音洞既是藏经洞，又是礼佛之所的法堂性质。

注①：手式划分根据，见李鼎霞编《佛教造像手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 发现周口店田园洞记事

赵婷

编者按：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做为我区一处世界级文化遗址，一直受到中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2001年春在周口店田园洞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又一次让世人对这里予以瞩目。为使人们详细了解这一考古大事，特转载2003年7月《北京日报》发表的记者赵婷的一篇专题报道，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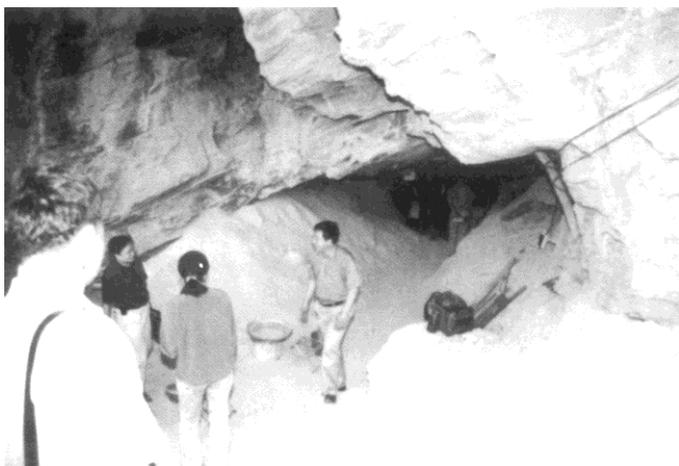
## 找水源意外找到古化石

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

2001年春季，周口店遗址西南约5公里的黄山店村，田园林场的工作人员正在寻找水源。他们发现了一个山洞（地理坐标北纬39°39'31"，东经115°52'19"），洞口不大，只能容一个人勉强爬进，但挺潮湿，于是他们决定挖挖看。

在工程开发过程中，他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

这个洞，应该说并不是第一次被人发现，因为现场清理时，发现有核桃皮、烟头……但林场经理田秀梅女士是个有心人。她琢磨，这里离周口店遗址不过五六公里，发现的动物化石，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林场特聘法律顾问董同源先生也对着这些骨头认真分析了一番：有几块边缘挺锋利，会不会是古人类打磨过留下的痕迹？



周口店遗址第27地点田园洞发掘现场之一（杨海峰提供）

当年7月10日，田秀梅和董同源用大纸盒子装着部分动物碎骨，抱着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请求科学鉴定。

在这些破碎的材料中，科研人员发现有鹿、猕猴、豪猪等哺乳动物种类。董同源原以为是古人类工具的骨头，其实是豪猪的化石。

其后，古人类所派出同号文博士等研究人员，在田秀梅的带领下前往出土化石的“田园洞”考察。“田园洞”位于半山腰间，距山下河床高度约150米。尽管部分堆积已被近现代人类活动破坏，但在混乱层中，科考人员还是又发现了少量零散的动物化石材料。

为探明田园洞的科学资源和学术价值，尤其是探清残存洞穴内有无第四纪原生堆积和是否包含更多的动物化石和人类遗存，在北京市文物局及房山区文委的大力支持下，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于2002年底向国家文物局提出正式发掘申请；并于2003年5月获得发掘执照。

## 26种动物化石，2.5万年前的“他”

2003年6月初，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组成了包括古脊椎动物学、地质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四方面专业人员的发掘队，以同号文研究员为领队，于6月16日开赴洞穴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工作得到田园林场的大力支持，田秀梅等林场工作人员参与了发掘。

更多的化石出现了。考古队在扰乱层之下由角砾和粘土构成的原生堆积中，发掘出土了大量动物化石。目前已鉴定出哺乳动物化石26种，其中以鹿类化石为主，并有大量的豪猪化石。这些发现，对探讨在本地区的哺乳动物演替及古环境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该地点的哺乳动物群，与周口店遗址第27地点田园洞发掘现场之二（杨海峰提供）周口店山顶洞的相当一致，有63%的种群曾出现于山顶洞动物群中；田园洞中出现的猕猴、猪獾、原麝等是山顶洞动物群中所缺乏的。少量化石上有黑褐色斑块，疑为火烧所致。

尤为重要的是，在地层中出土了人类的遗骸。这些遗骸多处于破碎的状态，骨块彼此多不连接，有一定的石化，似属于一个男性成年个体。目前所发现人类化石解剖部位包括：下颌骨（附多枚牙齿）、锁骨、肱骨、桡骨、脊椎骨、股骨、腓骨、跟骨、趾骨。此外还有几枚零散的牙齿，似属另外个体。

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院士等专家初步鉴定，上述人类化石在形态上属解剖学上现代的智人。伴生动物群指向晚更新世；用多枚鹿牙所测定的铀系年代为距今 2.5 万年左右，可为人类化石年代的参照数据。

### 北京地区山顶洞人时期仅存的人类化石实证

根据已有资料并结合周口店遗址的古人类和旧石器发现，科研人员认为，这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其一，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周口店遗址共发现和发掘 26 个具有学术价值的地点；而“田园洞”是新中国建立后在周口店遗址周边地区发现的一个新的古人类化石地点，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和国际知名的重要的古人类研究基地——周口店遗址增加了第 27 个研究发掘地点。

其二，同位素初步测年结果表明，该人类化石的时代约与周口店山顶洞人同期。由于山顶洞人化石在抗战时期全部丢失，新中国建立后虽经多次调查、发掘，也未在周口店发现同期人类化石，所以此次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山顶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新发现的材料，成为北京地区山顶洞人时期仅存的人类化石实证。

一个巧合是，有关此次重大发现的新闻发布会恰恰在 7 月 7 日——抗日战争爆发纪念日召开。这一时间上的巧合，让人们再次回首那段历史，也再次引起我们对“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思考与追寻。

其三，距今 2 万至 10 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弥足珍贵。这一阶段是现代人类、尤其是东亚现代人类演化的重要时期，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研究与争论的热点。该处遗址及其古人类遗存的发现，对东亚地区现代人演化研究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中科院副院长陈宜瑜推测，将来重大的研究发明也将在这个领域产生。

陈宜瑜还特别强调，当年的发掘，由于条件所限，许多珍贵的资料没能留下来。这次，该遗址的发现将为研究晚更新世晚期周口店乃至华北地区的古环境提供重要的新资料。新的发掘和研究将采用最新的方法和手段，以提取更全面、更精确的古环境、古生态资料。

## “市院共建”启动后首个重大发现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中科院副院长陈宜瑜和北京市副市长张茅一起轻轻揭起覆盖在古人类化石上的红布。这轻轻一揭，预示着周口店遗址的建设与保护，中科院和北京市之间的良好合作将更上一层楼。

2002年8月，根据周口店遗址的功能定位与发展需要，为了更好地发挥周口店遗址在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弘扬科学精神，经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市充分协商，签署了周口店遗址市院共建协议。由北京市负责遗址及建设控制带的保护、建设、管理及科普教育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负责遗址的发掘、研究、标本保管以及为遗址保护与科普工作提供科学指导。按照协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遗址区设立“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其工作重点是继续开展周口店已有材料整理研究和在遗址周边开展新的调查。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和周口店遗址市院共建工作的推动下，遗址的保护、管理以及研究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

而此次发现，是周口店遗址市院共建工作启动后的第一个重大新发现。它将对我国古人类学研究起到推动作用，为周口店遗址的研究、管理、保护、科学普及和旅游诸项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 周口店仍有巨大潜力

近几年，在人们心中，周口店遗址似乎已成为一个旅游景点的代名词，其科研价值逐渐被淡忘了。而此次新化石的发现，则提醒我们：周口店遗址仍然蕴藏着丰富的科学资源和继续发掘的巨大潜力。

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高星博士介绍，近二十年间，在周口店地区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但小规模试掘、对剖面的清理与取样测试以及年代学、古环境学、沉积学、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一直没有间断。

周口店地区地处西山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地带，洞穴、裂隙发育，更新世堆积丰富，地下仍埋藏着未被发现的科学资源。即使是已发现和发掘过的地点，在第一地点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堆积原地矗立；其它诸多重要地点的发掘多是浅尝辄止。199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法国电力公司的资助下，中法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对龙骨山进行物理勘探，发现五处“异常地带”，证实在石

灰岩山体内的诸多洞穴和裂隙中存在着丰富的土状堆积，表明遗址核心区仍然蕴藏着丰厚的科学资源和继续发掘的巨大潜力。周口店遗址至今仍是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的一处最重要的研究基地。

我们相信，周口店不仅有着辉煌的历史，还将有灿烂的未来。

### 发掘仍在进行，化石有望近期展出

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遗址并未被全部揭露，洞穴的延伸范围、全部地层的厚度等诸多方面还不清楚；出土化石数量有限；未有石器出土，疑似“烧骨”的性质有待化验；人类化石及其层位的年龄尚需进一步的测试。下一步，一个最重要的测验将是从小化石上取样进行同位素测定。

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田园洞考古队将按照原发掘计划，继续开展该洞穴遗址的发掘工作，以获取更多和更完整的科学资料，尤其致力于寻找古人类生存与行为信息。同时，将采集沉积学、环境学和年代学样品，进行一系列关于遗址年代、生态环境、沉积动力、埋藏条件的分析和测试。

目前该遗址的发掘面积估计占露出部分的二分之一，仍有相当大的发掘和研究潜力。中国科学院表示，在完成发掘后将会将遗址移交北京市，安排适当单位进行保护和管理，开展科普和旅游活动。发掘出土的标本，将按需要不定期地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展出，以扩大周口店遗址的社会影响，弘扬人文精神。

# 上方名山佛国净土

杨亦武

上方山位于北京西南郊房山区境内，距市区约 70 公里。山下有个小山村叫圣水峪，自圣水峪西北行，进入一道狭长的山峪，行程一公里，一道依崖贴壁从天而降的云梯，把你引上一处远隔尘嚣的世外净土——这就是上方山。

上方山为千古名山，这里森林茂密，山峰奇秀，洞穴深奥，环境幽雅，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在这里你可观赏松柏、银杏、古槐、树中之王等珍奇古树，千年古刹、石雕佛经、前朝壁画、摩崖石刻，无不闪耀着岁月沧桑的辉煌。云水古洞，多姿多态的石花、石幔、栩栩如生的石象，令人目不暇接，高达 38 米的石笋，居亚洲第一，还能听到石琴、石鼓、石锣演奏出悦耳动听的乐曲。

“南有苏杭，北有上方”，历代文人把上方山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杭相提并论，在世人的心目中，上方山是北方的一处人间天堂。

—

天下名山僧占尽。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东魏时期，上方山就有高僧结庵而居。一千多年来，上方山更替了一幕幕繁华，成为北京西南著名的佛教名山。

上方山传说中的开山祖师，为华严慧晟。明确记载华严祖师佛于上方山开山立寺的，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的《重修上方山兜率寺塔记》。上方山塔院庵有一座古塔，习惯称为华严祖师塔，相传华严慧晟就葬于塔下。嘉靖十二年（1533），明庭官员刘鉴捐银五十两、米一百石，修缮此塔。同年，立《重修上方山兜率寺塔记》于此塔的南侧。碑文提到华严祖师来上方山开山，死后建塔葬于此地：“盖闻上方古刹，形胜之地也！在邦之百里之中，东连沧海，西抵紫荆，北援居庸，南控涿鹿，乃华严祖师由天开寺至此所立也。祖师已逝时，又立浮图，以为藏骨之区，欲使后人瞻仰不忘。”

其实，塔院庵内的古塔并非东汉的华严祖师塔，而是辽代的忏悔上人塔，塔身嵌有《六聘山天开寺住持忏悔上人坟塔记》铭文为证。看来明碑的记载是

根据俗传而来，以讹传讹，不足为凭。

到了清乾隆年间，华严祖师开始有了慧晟的法号，传为中印度梵僧，有关记载甚至载明了此僧来中土的时间和到上方山开山的时间，华严祖师开山的神话传说也因此产生。

乾隆早期，上方山黄龙庵住持水月禅师声称，修缮塔基时掘得石幢。按照此僧所述的幢身铭文的记载，华严慧晟是中印度梵僧。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34），随西域诸大菩萨入理圣人来到东土，建武二十六年（50）春至上方山。后来，所谓“水月禅师发现华严塔幢事”载入乾隆本《上方山志》，被视作为华严开山的铁证。民国十九年（1930）溥儒重纂《上方山志》时，已经辨正其谬：“本朝水师修塔筑基掘得石幢，载云：‘维开山第一代华严慧晟禅师者，系中印土之梵僧也。东汉光武十年岁在甲午，西域诸大菩萨入理圣人，庚戌春驾莅斯山，因驱龙索水。此上方开轍之源也云云。’因录之以证博。览其幢，乃《百咏南禅师道行之记》。”由此可见，水月禅师所说的石幢，根本不是华严慧晟的，而是《百咏南禅师道行之记》，而百咏南禅师另有其人，于是华严开山的记载不攻自破。

熟悉佛教史的人知道，我国佛教的华严宗是公元五、六世纪才出现的。那么早于公元一世纪，在华严宗尚未出现前，华严宗僧人慧晟来上方山开山是不成立的。可见，上方山的开山祖师不是华严慧晟，上方山的开山史也就不会始于东汉。

上方山开山祖师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百咏南禅师。

东魏孝武帝天平二年（535），百咏南禅师来上方山结庵清居，这是上方山建寺之始。由此推算，上方山建寺的历史距今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了。《上方山志》载有北齐后主隆化元年（577）范阳人张昆所撰《百咏南禅师塔记》，此记详实记载了百咏南禅师的生平和来上方山开山建寺的史实。百咏南禅师（498—576），原名赵广度，字指南，邺水人（今河北省大名县人）。百咏南禅师为东魏、北齐时期的名僧，由于他来山禅栖，上方山在北齐时期就很有影响。

隋唐时期，上方山佛寺已经初具规模。文献记载，上方山诸寺之首的兜率寺就始创于隋唐时期。另外，兜率寺西南的地藏殿，兜率寺南的下佛殿，兜率寺东南象王峰脚的普贤殿，在唐代已有寺庵建筑存在。上方山塔院，在唐代也已起用。唐代，上方山有一位僧人号拙崖蓝和尚（675—763），此僧籍贯姓氏不详，唐睿宗景云元年（710）五月来到上方山，向当寺住持求一片容膝之地。住持答应了他，于是他在莲花峰右的山崖下结茅居住下来。诵经之余，采条编

筐以磨性情，放于路边，任人取用，所以人们称他为拙崖蓝和尚。

说到上方山辽代的历史，不能不提到天开寺。天开寺，全称六聘山天开寺。因为辽代上方山寺院是天开寺住持居住的地方，是天开寺的上方寺。上方山现存辽天庆五年（1115）《六聘上方逐月朔望常供记》，六聘，是六聘山天开寺的简称；上方，即指上方山寺。

天开寺位于上方山东南五公里处的六聘山。六聘山，因晋代大教育家霍原隐居此山讲学而得名。据元代碑刻记载，天开寺始建于东汉时期，但是天开寺有确切证据的历史则启于隋唐。辽代天开寺形成三院，一是六聘山下天开村内的天开寺，一处是作为天开寺住持居住的上方山上方寺，一处是天开寺与上方寺之间的中院寺。

辽代，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曹守常（1010—1070）住在上方山的兜率寺主天开寺法务。上方山是因为山上的佛寺为天开寺住持所居而得名。佛寺住持居住之处称为方丈，又称上方，因此六聘山天开寺住持居住之寺就叫上方寺，上方寺所在之山便称上方山。可见，上方山是因为上方寺而得名，而上方山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辽代。曹守常圆寂后就葬于上方山塔院，现在他的坟塔尚存，名为“忏悔上人塔”，这是上方山现存的最早的一座古塔。塔身原嵌有辽代的《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因此有人误称上方山古称六聘山，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错误。

在辽代，上方山不仅和天开寺有不解的渊源，和佛教圣地云居寺也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辽天祚帝乾统六年（1106）云居寺刻经僧人善锐曾到上方山的云水洞造佛像一尊，刻雕佛像的吴世和为云居寺刻经工匠之一，《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铭文的雕刻石匠也是当年云居寺的刻经工匠。这说明，上方山与天开寺、云居寺属于房山西部的同一个佛教文化圈，它们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是相互关联的。

金代“上方山”名已经见于石刻，当年的上方山寺仍是天开寺的上方寺，金代石刻称为“天开寺上方”。

金代是上方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果说隋唐时期上方山寺初具规模，那么，金代则迎来了上方山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上方山不仅著名于中都地区，而且产生了几位在全国有巨大影响的高僧。辽金交替，上方山似未受什么影响。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金兵功陷燕京（今北京），翌年也就是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北宋以每年一百万贯代税的代值，从金人手中换得了燕京的管辖权，设立燕山府。是年辽代

高僧六十四岁的空寂大师（1059—1166）就来到上方山住锡。二十多年后的金天德年间（1149—1153），八十多岁高龄的空寂应金帝海陵王之诏到金朝的国都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开坛讲经，金王朝对他礼遇优厚，特在内宫供养他，金帝海陵王还拜他为师。他在上京逗留三个月，返回燕京上方山，海陵王赐他遐龄益寿禅师的封号，并赋诗相赞。空寂圆寂于上方山，海陵赐银遣使葬之。

金代上方山，有两位房山本土的僧人。一位是度公，一位是崇公。

度公（1031—1155），今房山窦店人。名陈思度，晚空寂大师两年来上方山。是与空寂大师同期的上方山僧人，他自天会三年（1125）来山，贞元三年（1155）圆寂。

崇公（1116—1184），名田善崇，今房山南韩继村人。皇统二年（1142）登进士第，厌于官场，翌年受具戒。正隆元年（1156）上方山空寂大师圆寂，二年（1157）崇公来上方山，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1184）圆寂。他是继空寂大师后的上方山僧人。

金代还有一位高僧值得一提，这就是靖公禅师（1172—1213）。靖公早年曾修静于上方山，后来到了金中都，成为中都名刹竹林寺的第十六代住持。靖公处金代期末，当年蒙古人军屡攻中都，中都已是风雨飘摇，大安二年（1211）九月到十二月，蒙军连续四个月攻打中都，在中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蒙军久攻不下，被迫撤退，中都暂得保全。在长达四个月的中都保卫战中，靖公率领竹林寺僧人投身抗敌，受到了金帝卫绍王的褒奖。崇庆元年（1212），卫绍王下旨，赐钱钞二百贯，麦四百石，粟一百袋，盐一百袋。靖公厌于世乱，同年退竹林寺住持位，归隐上方山，翌年二月辞世。

上方山寺为金代为中都名刹，加之山老林幽，清净绝尘，又有名僧住持，许多僧人都来此山修静退老，如上文说过的靖公。不仅如此，一些其他寺院的僧人和民间信女死后也多择上方山为神栖之所。

金代晚期，社会动荡，影响到上方山。《奉先县禁斫截林木榜》反映了这一史实。奉先县，就是上方山所在地今天的房山区西部。该文记载，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周围的村民在“东至望海岩、南至神仙峪、西至紫云岭神仙洞、北至龙虎峪”寺院所属的山林内大肆砍伐树木。住持僧善惠向寺院所在的中都万宁县（房山区西部境）告状。因六聘山是“自古名山”，而朝廷有法令“名山大川，禁其樵采”。而且上方山与大房山相邻，大房山是金皇陵所在，早在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就册封大房山神为保陵公，严禁在山内樵

采打猎。为此，万宁县令发布公告，严禁村民在寺院所属山林内乱砍乱采。

时隔二十一年，金卫绍王崇庆元年（1212），附近山民哄伐上方山森木的事件再次发生。不得已，善辛大师再次到奉先县告状，奉先县为此义重中明吕二年的禁令，并且给以文据作为凭证。善辛大师因而立下碑以明示众人。

金元之际上方山下的天开寺及所属的观音院、龙王寺、中院寺均毁于兵燹，上方山也遭到一定破坏。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年（1273）应公禅师任六聘山天开寺住持，重建天开寺、天开寺的龙王寺、观音院、中院寺，以及栗园寺、设济寺。当年上方山寺仍隶天开寺，为大开寺上方。所以，应公禅师同时也是上方山住持，当年应公修缮了上方山钟楼、山门等建筑。应公，今河北省涿州市张村人，俗名赵普应。他住持天开寺期间，一直清居上方山。至元二十七年（1290），世机忽必烈特赐圣旨护持天开寺（其中也包括上方山）。应公圆寂后，葬于天开寺西北的六聘山下。现在其寿塔尚存，名“应公长老寿塔”。应公圆寂后，其弟子赵显仁继之宗主天开、中院、设济、上方诸寺。

元代是上方寺的恢复发展期，为明代上方山寺的鼎盛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进入明代，天开寺日益败落，上方山寺却迎来了历史上的空前繁荣，形成自立山门之势。因此，上方山寺不再是天开寺的属寺，而是独立于天开寺的寺院。当年上方山寺庵发展到一百二十座，全盛时住僧二百有余。

由于明庭太监的参与，上方山寺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创造了上方山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局面。早在明初的成祖永乐年间（1368—1398），内官临太监向福善就资助上方山僧人然义修缮了上方山云梯，并在云梯之上创建了接引弥陀殿，也就是云梯庵。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兜率寺住持常文、僧人昌义、信士陈普寿等募化重修云梯庵。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正月，御用监太监王瑞奉旨到房山云居寺、上方山等寺院布施。见到上方山“天梯”（即“云梯”）崎岖陡峻，攀行艰难，联络宫中太监募化重砌，四月初开工，十一月初告竣。这是明代第二次修缮上方山上山要途云梯。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司礼监太监李中轩修缮上方山主寺兜率寺，在寺中增建了天王殿、伽蓝祖师殿、弥勒阁。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明庭权宦总督东厂官校办事提督两司房掌司礼监御用监印提督礼仪房太监冯保施财，第三次修缮云梯。同时还修缮了云梯庵、静夜堂、创建了永亨庵，并于上方山下的孤山口村创建了规模宏大的普济寺。翌年（1577），冯保又于兜率寺主殿雕刻《四十二章经》嵌于后壁。万历末，惜薪司太监李志义重建文殊殿。

明代太监除出巨资在上方山修缮、创建寺庵外，还曾两次奉明版《大藏经》于上方山：嘉靖三十五年（1566），司礼监太监李中轩在修缮兜率寺，增建弥勒阁的同时，奉佛经四柜藏于弥勒阁中，这是明代太监第一次向上方山赠官修《大藏经》；第二次是万历四年（1576），司礼监太监冯保，创建永亨庵，奉《大藏经》一藏，计五千零四十八函，全部经函用蓝绢包裹，共安置八个经柜，分别藏于永亨庵正殿、两夹殿，以及专设的经殿中。可见，当年创建永亨庵，就是为了奉藏《大藏经》。明太监两次奉藏了上方山的《大藏经》分别为明代的《南藏》和《北藏》。《南藏》为永乐时期（1403—1424）南京印本，《北藏》为正统五年（1440）印本。文革时期，这两部大藏经被送到北京国子监保藏，后来辗转流于房山云居寺。现在这些《大藏经》仍存于云居寺内。

明代上方山有一位颇有影响的禅宗大师，这就是天香禅师（1506—1579）。天香禅师，名宗连，字天香，今河北省武清县人。其塔记称赞他：“勤参苦究，洞晓真宗，京师人民悉蒙教益。”足见天香禅师当年在明都北京颇具影响。天香禅师晚年来到上方山，居于朝职洞面壁、参经，万历七年（1579）圆寂于朝阳洞。

孤山禅师是明代另一位有作为的上方山僧人。孤山禅师原名李进寿，今河北省武清县人。与天香为同乡。早年供职内庭银作局，后来于少林寺出家，法号圆银。几年以后，来到上方山，万历四年（1576），得到冯保的资助在孤山口创建了普济寺，后来普济寺成为一方名刹。

明清交替，社会动荡，上方山开始走向衰败。一方面，战乱直接对上方山守庵造成破坏；另一方面，缺乏安定繁荣的社会环境，导致寺院建筑年久失修，所以清初，上方山寺庵倾圮过半，到了清王朝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上方山寺庵不过恢复到七十二座。康熙三十一年（1692），消人费密游止方山时，上方山寺庵便是七十二座，他在《游上方山》中写道：“禅院七十二所，悉种牡丹”。其实，当年所说的七十二庵是将延寿洞、九环洞、白牛洞、西方洞、背阴洞、观音洞、金刚洞等七洞算在其中的，除去七洞，上方山寺庵实际上仅存六十五座。

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太监未涉足上方山事物。在清代，上方山得到皇帝和亲王们的光顾。其中三位皇帝为文殊殿御书匾额：顺治皇帝为文殊殿首题“别有天地”，雍正帝继题“福”字，乾隆帝再题“慧海慈航”。果王、宁王、肃王、显王、宝王、懿王等王公朝贵也分别为兜率寺、文殊殿、观音阁、兴隆庵、摘星峰、观音殿等寺庵题匾书联。恭亲王和肃亲王还在舍利殿的画廊亲自

为云水洞洞景重新题名。

民间的施助活动，构成了上方山清代佛教发展史的重要内容。上方山现存清代有关施助活动的碑刻十三方，分别记载了自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至光绪二十年（1894）一百七十二年间社会各阶层施地舍财的史实。

清代有案可查的，上方山所得施地一千五百八十三亩，有些施地缺乏数量记载，没有计算其中，如果算上这些没有数量记载的施地，上方山所得施地总数应在两千亩以上。这些施地几乎遍及当时房、良两县（今房山区）各地。因此清代上方山的香火地分布颇广，东达永定河畔的窑上一带，西南达长沟、南尚乐、秧房等村。房山城东的饶乐府，城南的坨头、次洛等村，以及上方山附近的上、下中院、孤山口等村，都有上方山的香火地分布。上方山的香火地在外县也有分布，如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的杨胡屯，直隶大城县（今河北省大城县）的北辛张村，顺义县（今北京市顺义区）的南廊冢等地。

清代广泛的施助活动，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状况，还反映了清代上方山僧人的生活状态。当年，上方山僧众主要靠社会施助的香火地地租维持生活和宗教活动。

但是总的来说，清代上方山僧人生活非常困难。即便在清王朝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也不例外。据碑刻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上方山僧人收入不足，不得不以募缘为生计。乾隆末年，北方一带闹灾荒，上方山僧众无以为生，落到要下山逃荒的地步，情非得已，寺院住持将本山香火地典当以度灾年。由于生计艰难，直到嘉庆初，也无力赎回典当地亩。迫于生计，上方山住僧日减，道光二十五年（1845）完颜麟庆游上方山时，住僧仅存八十。

晚清时期，上方山僧人出于生计考虑，改变了单纯以香火地维持生活的状况，开始涉足商业，在四周的商业重镇开设商号，当年长沟镇的“天泰成”商号，就是上方山僧人经营的。

民国伊始，旅游畅兴，上方山僧人开始旅游接待和经营，上方山兜率寺成为房山历史上最早旅游经营单位，上方山僧人成为最早旅游经营者。

民国以后，上方山进一步败落。到民国八年（1919）蒋维乔游上方山时，由于口粮入不敷出，住僧仅剩三十几个。当年各庵僧众每年都要向兜率寺领口粮，每人铜子二十吊，米一石二斗。年景日艰，僧人不得不被迫将香火地典当。

民国十年（1921）吴其轅游上方山时，上方山香火地仅存数顷，每年收入地租不过二百余石。上方山诸寺分为八家七十二茅庵，均在兜率寺统辖之下，无私产，僧人们每年到兜率寺领口粮。八家僧每人每年小米三石六斗，银币八

元。茅庵僧仅能领到小米一石二斗，银币八元。口粮不足，僧人们还要自己劳作，艰难的糊口。

所谓七十二茅庵是沿袭清代的说法，当年七十二庵已圯废近半，山腰岩壑，往往见颓垣败瓦，而保存完好的只有十几处了。后来虽经修复，也不足三十座。

七七事变以后，日寇侵占房、良地区，地方武装蜂起，当年最有影响的一支为“抗日救国同盟军”，号称十路大军，其中的“三路”胡振海部就驻防上方山，山寺惊扰，僧人四散。新中国成立后，仅存于接待庵两三位僧人或老死，或入村谋生去了。

历年来，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对上方山寺庵进行了修复。

1985年，修复了兜率寺大雄宝殿、藏经阁、钟楼等。1993年，修复了兜率寺山门、瓣香庵、云梯庵。2001年修复了红桥庵、舍利殿、毗卢殿，2002年，进行了兜率寺大雄宝殿抢险工程。

而今，上方山保存基本完好的寺庵有：云梯庵、兜率寺山门、瓣香庵、红桥庵、兜率寺大雄宝殿及弥勒阁（大钟楼）及配殿、舍利殿、毗卢殿、向阳庵（大悲庵）、华严庵、法华庵、藏经阁、退居庵、斗泉庵、钟楼。

## 二

作为一座历史名山，上方山旅游观光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旅游萌发于明代。明代最早来上方山旅游观光的是大画家徐渭，这位绝世巨匠，不得志于官场，“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间来到了素有“幽燕奥室”之称的上方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上方山记》，在游记中他以画家的视角这样描述上方山：“庵寺复精绝，莳花修竹，如江南人家别墅。”由此衍生出上方山“南有苏杭，北有上方”的美誉。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代诗文家曹学佺全游历上方山，写下了《游房山记》，明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游历上方山，他们把游历见闻收入所著的《帝京景物略》中。

清代，揭开了上方山近代旅游的序幕，康熙三十一年（1692）、乾隆元年（1736）、乾隆八年（1743）、道光二十五年（1845），都有游客游山的记载。另外，王公大臣、士大夫游山屡屡有之，王公如果王、宁王、显王、宝王、懿王、肃王、恭王，士大夫如朱彝尊、姜宸英、徐元文等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方山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外国游客，这就是平汉铁路局法籍工程师普意雅（G.Bouillard），这可视为房山境内接待外国游客之端。

上方山地处北京西南远郊的深山区，交通不便。早年，从北京城到上方山旅游的交通工具是马车或骑乘，条件次一些的只能骑驴，在这样落后的交通工具下，六十公里的路程算是遥途了，而自瓦井入山至上方山下的接待庵的十几里的山路更是崎岖难行。关于这段山路，清明文献多有记述：

所过村落曰瓦井，曰天光，曰孤山口，皆与山势为升降……过（孤山口），则崇山如环，幽溪如带，时时涉溪，沿壁践苔，扞萝，乃至山麓。（明·曹学俭《游房山记》）

循孤山口而西，峰横涧束，涧上侧径如古墙边趾，人如行弄中……十二三里到下接待庵。（明·刘侗、于奕正《上方山》）

至孤山口微雨，石路欹侧，车为之摧。同人皆舍车或步或骑，村舍络绎，旁夹两山，十里至接待庵，马病矣。（清·查礼《上方游记》）

驱车至孤山口，舍车而骑。绝数涧，马蹄锵乱石中。山势忽陡矗，若路几绝，接待庵在焉。（清·谢振定《游上方山记》）

由于路途的艰难，直到清代晚期，有条件来上方山旅游的人并不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京汉铁路的落成，改变了上方山旅游行路难的状况，京汉铁路通车后，横穿上方山所在的房山东境而过，在境内设良乡、窦店、琉璃河三站，境内的琉璃河支线，从琉璃河达周口店，人们到上方山旅游，从北京乘火车可方便快捷的到达琉璃河站，或转支线到达周口店，然后再转程到上方山，这比原来百里的车驰马驱就方便多了。

交通的改善，为上方山旅游开辟了空前的前景，民国建立，上方山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上方山的旅游接待历来是由上方山僧人承担的，明清时候，上方山僧人不过是作为东道主招待前来观光的游客，进入民国，僧人们开始把这种接待变为旅游经营，利用寺院接待游人食宿，为旅游提供往来交通和上山导游等服务，而僧人们从中获得可观的收入。当年，素有上方山第一庵之称的山下接待庵，承担起旅游经营接待的任务。民国初，上方山游人还不算太多，每年不过接待三五次游客，每年的游客总数，不足二十人

民国十年以后，上方山的旅游接待渐成规模。当年，来上方山的旅游路线有三条，主要交通工具是驴和四人轿：第一条，由北京前门乘京汉路火车到琉璃河站下车，或乘坐汽车到琉璃河，然后骑驴或乘坐四人轿、或步行二十公里到达上方山。第二条，由北京前门乘京汉路火车到琉璃河站下车，再换乘琉璃河至周口店的火车，行十六公里至周口店站，再从周口店骑驴或步行十几公里至上方山。第三条，由北京前门外香厂坐长途公共汽车，到房山县城，再骑驴

或步行约三十公里到上方山。这三条路线，以第一条路为主。当年的来上方山的游客可提前与上方山预定，预定方式是把信寄到上方山在长沟镇经营的商号“天泰成”，告知来上方山旅游的日期，所达车站及到站时间，向上方山接待庵预约乘驴或四人轿。“天泰成”及时把信转上方山接待庵，接待庵如约安排驴、轿到达指定的琉璃河、周口店或房山县城接游客。可见，这和当今的旅游公司接待旅游团别无二致。除上方山前来接应的驴、轿外，各站点还有些散户经营驴、轿生意。不过价钱要比从上方山预约的要贵得多。比如，从琉璃河到上方山二十公里的路，事先从上方山预约，四人轿每乘二元，驴每头五角，如果在车站自己雇，就贵多了，四人轿每乘五元，驴每头要八九角。

民国二十五年（1936），通往上方山的最后一段坎坷山路变成了坦途，瓦井至上方山下的圣水峪间的汽车路开通。捐资修路的是在周口店开矿的商人王毓霖，而首倡修路的则是王毓霖的挚友傅增湘。

傅增湘，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他平生好游，自称“生平雅嗜山游，三十年来南北名胜，攀陟殆遍，而燕京近郊山水，登览尤频。”民国七年（1918）春天，北洋军阀政府决定安置在华的德奥两国的侨民于房山县的云居寺，为此傅增湘来房山县实地考察。考察期间傅增湘来到了上方山，为上方山悠久的佛教文化和神奇的自然风光所倾倒。此后，上方山成了他的屡游之地，每逢春秋佳日，必策杖登临。

傅增湘的好友王毓霖在房山县的周口店经营矿业。这里距上方山不过十几公里的路程，王毓霖也喜欢上方山，经常到上方山观光，因此深以路途险阻为忧。一天王毓霖到傅增湘的藏园造访，傅增湘和他谈及修路的设想。王毓霖经营实业，颇有些钱财，在傅增湘的鼓动下，王毓霖决定出资修建通往上方山的公路。王毓霖亲自勘察所经路线，亲自主持规划设计。王毓霖热心公益，得到了房山县政府和县路局以及当地驻军的支持，当年修路工程十分艰巨，遇山需劈开山体，逢涧要迭砌石桥，经过艰苦的施工，在七七事变的前一年即民国二十五年（1936）冬，开通了自瓦井至上方山的汽车路，游人可以乘汽车直达上方山下。上方山旅游进一步兴旺起来，上方山游人大增，汽车路开通的当年，仅旅游旺季的四五月份，上方山接待游人数就达二百余人，这在当年已经十分可观。

在汽车路修通的同时，上方山的第一部旅游读物也应运而生，这就是《房山游记汇编》。倡编这部旅游读物的还是傅增湘和王毓霖。当年，傅增湘嘱托王毓霖汇集明清以来有关上方山和房山其它名胜的游记结集出版，定名《房山

游记汇编》，傅增湘亲自为书作序，于抗日战争爆发的 1937 年 7 月出版。全书共收录有关房山名胜的游记 22 篇，这 22 篇中有关上方山游记多达 16 篇，此外的一些篇目则涉及了房山的云居寺、红螺险等名胜。这些游记不乏周忱、徐渭、袁宏道等一些大家的手笔。游记作家中，还有法国人普意雅和日本人太田喜久雄。《房山旅游记汇编》出版后，分别在北平东安市场内中华商场的中原书店、北平王府井大街同生照相馆、北平王府井大街五兴照相材料行、北平王府井大街东方照相馆、北平东长安街十五号中内饭店寄售。这是上方山的第一部旅游读物，也是房山区历史上的第一部旅游读物。

###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上方山结束了由僧人兼营旅游的局面，人民政府加强上方山管理，成立专门的机色，正式开放上方山旅游，投入资金进行交通和旅游环境建设，上方山成为北京旅游的重要景区。

建国初期，上方山资产和庙址收归国有，人民政府在上方山设立森林经营所，在接待庵办公。1958 年，房山县将全部山林和庙产移交北京市公安局造林队，1965 年通往上方山的交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自岳各庄通往上方山下圣水峪的 13.55 公里的“岳圣路”修通，这段路在民国时期汽车路的基础上，修成了简易柏油路。1970 年，上方山为房山县农林局接管，成立上方山护林队。1980 年 2 月，移交房山县文化科，成立上方山管理处，在文物保护的同时，开放上方山旅游，这标志着上方山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旅游经营单位。翌年，上方山管理处又划归房山县林业局。1982 年，为改善上方山旅游交通，将“岳圣路”4.3 公里的路段改建为三级柏油路。1984 年，上方山诸寺及云水洞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 年，投资 50 万元开辟西路云梯。1992 年 11 月，经国家林业部门批准，建立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1998 年，房山区政府成立房山区旅游集团公司，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归属区旅游集团公司。2000 年，投资 750 万元，建设了东西两路登山索道，东路长 210 米，西路长 836 米。2001 年 10 月，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归口房山区旅游局管理。

上方山作为一座历史名山，其旅游潜力很大。随着上方山诸寺的逐步恢复，上方山将成为人们回归自然、感受灿烂的佛教历史文化的观光和休闲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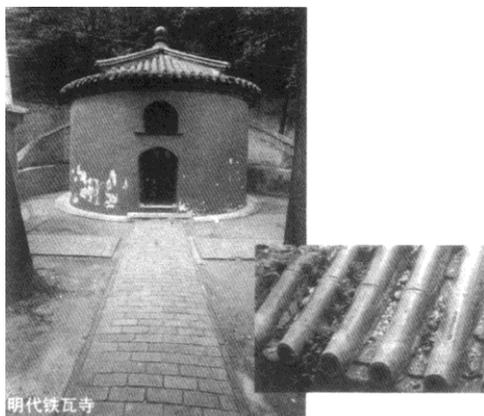
# 铁瓦殿

张玉泉

在房山区河北镇政府后院内，有座古老的寺院，从前院后面拾阶而上，未有百步便可达造型奇特的明代建筑——铁瓦殿。殿因顶铺铁瓦而得名。

铁瓦殿背倚山岩，前临大石河，从殿后面的石壁间涌出的清泉，沿暗沟而下，又从前面的石窦中潺潺流出，汇入大石河。

殿坐北朝南，由正殿、配殿和山门组成，自成格局。山门的额楣上嵌有匾额，楷书砖刻“铁瓦禅林”。进山门，两旁各建配殿两间，均为单檐、清水脊。正殿是罕见的铁瓦建筑——铁瓦殿。铁瓦殿平面圆形，高6米，直径5.8米。殿表原为灰墙，身上粉刷铁红色。发券的门窗，与大殿的圆柱体非常和谐。殿顶采用攒尖做法。殿



位于河北镇的明代建筑铁瓦寺（张玉泉 提供）尖由宝珠收拢。上有六条脊，自上朝下向六个方向延伸，把顶分成六个扇面。每扇13行，共计78行。顶上铺满铁瓦，计有458块。瓦长0.31米，径向0.13米。瓦表有十余种铸字，共十六类，如“菩萨顶正德十年（1515年）造”、“五台山菩萨顶铁瓦寺”、“天字号五台山万寿寺铁殿一所，信官姜信舍瓦一个，正德三年（1508年）吉日造”。还有“清龙宫银作局太监李锁”、“尚衣监右监杨贵”、“仁寿宫弩温王刺”、“信女林氏妙智”等12人舍瓦铸文。通过瓦上的铭文，可知道铁瓦寺与五台山铁瓦寺的关系。

五台山铁瓦寺位于显通寺的北端，距寺五里的山坡上，明正德八年（1513年）重修时一律改成铁瓦铺顶，故名铁瓦寺，原名叫法祥寺，创建于元代。

河北镇的铁瓦殿不仅瓦是铁的，就连殿脊和厦也是铁制的，用铁数量惊人。每块按4公斤计算，瓦的总重量为1882公斤。再加上脊、厦的用铁，用铁总量估计有3000公斤之多。

铁瓦殿内原供有汉白玉质的观世音菩萨像，坐在莲花托上，雕刻精细，栩栩如生，通高 90 厘米。刻有铭文：“南王府推官刘素，长男德恒、次男德愉、次男乡贡进士德协，次男乡贡尚书学究德恪，孙留见、次孙奈哥、次孙净德奉，为閤宅长幼无灾，遂占日月，光佛伏愿，成此功德，愿同生兜率。”此文说明佛像是私人发愿，求菩萨保佑全家平安而雕刻的。

铁瓦殿的山门外左侧林荫下，立有一通白石碑，为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秋重修该殿时立的。碑通高约 1.70 米，宽约 0.85 米，厚约 0.4 米。碑额雕刻“万古流芳”字样，四边为云朵图案。碑阳刻着“自庚申岁。坤舆震荡，而殿宇不无圻裂……渐就剥蚀，鸠众修治”等修建经过的文字。碑阴刻有募捐者的姓名。

此碑虽经三百多年的风雨侵蚀，锈迹斑斑，但字迹尚清晰可辨，为研究铁瓦殿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铁瓦建筑寺庙在北京地区是罕见的，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已于近年被北京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 附：重修铁瓦殿记

予乡胜泉庵后有佛殿一楹，以铁为瓦，而殿因以名焉。内布佛尊像。有流泉经其下，乡之人漱润灌溉莫不取资于是。倘所谓杨枝甘露之遗者耶。第殿之名，乡之父老习闻已久，而贞珉无考，不知经始于何年，使后之人徒袭其铁瓦之名，未得其创建之意，良可叹惜。虽然，余尝闻夫金之为物也，至坚，而历年也最久。作者以之意以有终古不敝之乎。自庚申岁，坤舆震荡，而殿宇不无圻裂之患，吾乡父老虑其渐就剥蚀，鸠众修治其缝，补其罅，瓦以合，而殿以新焉。呜呼！昔人成此亦纂劳，所惜记载无传，是以奕世，而后湮没而弗彰。然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厥工告竣，爰志诸珉，以诏来者。庶昔人之意与斯殿之存，得以终古而不敝矣，是为记。

时康熙二十年岁次辛酉月谷旦邑后学弟子赵明奎熏沐拜乎题。

# 国家地质公园石花洞

朱仕学

石花洞位于京西房山区河北镇境内，洞中的石灰类化学沉积物类型齐全，极具科学性和观赏性，是北京西山最大碳酸盐岩溶蚀岩溶洞。石花洞洞体分为上下7层，1至5层洞道长约2500米，6至7层为地下暗河。洞内的岩溶沉积物自然景观密集丛生，种类齐全，1987年对外开放，为中国四大名洞之一，被地质专家称之为“中国北方岩溶洞穴的典型代表”。

石花洞地区地质历史演化历史漫长，是中国乃至世界地质学家研究地质变化的场所之一。早在明正统年间，就有云游僧人圆广法师在此修庙、礼佛，此后这里更有众多文人骚客驻足，使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

根据地质专家测定，以石花洞为代表的洞群处在华北地区中部——燕山沉降西段，此地区南高北低，西高东低，最高峰连泉顶海拔1180米。京西大石河在石花洞北部，北部大石河谷，海拔高度100至150米，此地区呈现中低山地构造的剥蚀地貌。石花洞周围方圆35平方公里范围内地质构造为中国



石花洞一角（朱仕学提供）

北方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属于北岭向斜北翼，地质有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等，地质构造的形成，在距今大约四亿年前。在四亿年前，北京地区曾是海洋，在海底沉积了大量的碳酸盐类物质，由于地壳运动变迁，海底上升为陆地。在大约距今七千万年前，受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山运动的影响，华北发生了造山运动，北京地区沿京西八宝山——高石营一线，不断下沉演化成平原。在上升的碳酸盐被溶蚀成一系列的岩溶洞中，石花洞是其中之一。

石花洞是发育在7000万年前的中奥陶系马家沟组石岩中的成长中洞穴，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这一地区山体内岩溶洞穴纵横交错，类型多样，按自

然形态分类为水旱两栖洞。

石花洞已探知洞道长 5000 多米的洞道中，岩溶化学沉积物的各种类型目不暇接，分布广泛，有 5 种沉积类型，33 种形态，分别为：滴水沉积型、流水沉积型、飞溅水沉积类型、渗透水沉积类型、停滞水沉积类型。33 种形态分别为石笋、石钟乳、石柱、石塔、石帘、石幔、石瀑布、石梯田、石珍珠、石井、石龙、石饼、石花、石枝、石毛、石菊、石灯、石莲、石瘤、鹅管、钙板、卷曲石、多层石花、石钟乳悬吊岩、石旗、石盾、穴珠、壁流石、边石坝、边石晶花、月奶石、石珊瑚。5 种类型和 33 种沉积形态几乎囊括了中国洞穴中沉积物的所有类型，最为典型的有柱状景观“洞天三柱”，我国国内洞穴中最大的石幔群。称之为国宝的“月奶石”。还有洞壁石花墙，典型景观为“火树银花”，石花分布面积达到 360 平方米，沉积厚度 0.8 米至 1.3 米，堪称洞花之冠；有晶花钙板沉积层，宽 8 米至 1.3 米，长度 130 米，估算沉积量为 180 吨左右，堪称世界洞穴晶花宝库。

石花洞漫长的地质演化成奇特的喀斯特地貌，齐全的地质沉积物类型景观，吸引了地质专家的关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地质学者的研究场所。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卢耀如曾称赞石花洞中美景为“石花美景扬天下，天下美景在石花”的佳句，可见石花洞地质形态的可研究性和观赏性的价值。

石花洞景区内实物记载和遗存的古迹历史悠久。石刻、题字和诗文记载着石花洞的发展历史。

石花洞原名“潜真洞”，又名石佛洞，此记载发现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距今已有 550 多年的历史。

现今石花洞口处有汉白玉石佛一尊，石佛宝座为记载历史的证物，石佛座为能分开的两部分组成，偶然的的机会人们发现了底座中的文字记载，原文为：

佛比丘圆广，发（愿）修造十王，地藏一堂，于正统十一年四月，云游到此，切见古刹地一所，东至石河，南至石沟水，西至王兴（？）北至……，四至分明，我到便开。石匠：任永祥，周敬。

由此可见，佛比丘圆广是石花洞中佛像和洞口对面 50 米处石崖上十王“地藏”佛像的修造者，时间为明正统十一年（1446 年）。从刻文中的四至场所和现今地理分布实际相符，其中所提王兴为石花洞自然村南车营王姓的祖上。

石花洞一名“潜真洞”，亦有据可证。至今在洞口上方十余米处有“潜真洞”题字，但无题字者的落款，字有道家之气蕴。石花洞又名“石佛洞”，据考证，明景泰七年（1456）三月，圆广法师又请石匠任永祥、周敬镌刻“地

藏王菩萨”石佛，安放在洞进口处，供人拜奉，故洞名改称“石佛洞”。

许多文人还在石花洞留下了歌咏的诗词，例如清朝嘉庆年间的奕绘贝勒和其侧室夫人顾太清。

奕绘（1799-1838年），字子章，道号太素，又号园居士，为清高宗乾隆帝第五子永琪之孙。奕绘贝勒生前对石花洞不仅游览过，而且观察的相当细致。其文集《明善堂文集》中有《探潜真洞》诗一首，诗为：

斯山洞凡入，潜真最幽寂。  
柳色绿参差，杏林红羃历。  
绝壑临涧阴，石柱之仙宅。  
悬宅垂钟乳，森森似剑戟。  
内门不可入，野老贪所获。  
虫行入自穴，云有千间辟。  
为我采石髓，干润如玉液。  
乃知古人书，往往多实迹。  
归途望南岭，冰雪千尺积。  
平生亦何幸，得遂山水癖。

奕绘生前在现在的坨里地区的大南峪修建了园寝，至今遗迹尚存。

顾太清（1799-1877年），满洲镶蓝旗人，名春，字子春，道号为太清，晚号为云槎外史。善诗词，工书画，著有《天游阁诗集》，才貌双全，嫁与奕绘为侧室。

顾太清曾与奕绘贝勒一同探访石花洞，并留有诗文。如《访潜真洞》：

入谷探幽邃，春光正及时。  
山溪流水慢，老杏作花迟。  
一自仙人去，千年钟乳垂。  
浮生容易过，行乐且题诗。

还如《潜真洞》：

传有真人乘鹤去，空余老杏亲手栽。  
至今深洞悬钟乳，终古阴崖长碧苔。  
大道无为且游戏，谷神不死或归来。  
秋风落日仙坛静，涧草岩花到处开。

在游览归途中，顾太清还作了一首《游潜真洞晚归梅口岭口占》：

夕阳西下乱山围，缥渺遥村暮蔼霏。

游兴最嫌秋日短，马头明月照人归。

从这两首诗看，顾太清不止一次随奕绘来潜真洞游历。

在石花洞的入口的洞壁上，有清同治举人杨儒的题记。题记内容为“御用监左监丞杨儒到此”。

杨儒，汉军正红旗人，字子通。清同治举人，光绪十四年（1888）后，历任常镇道、温处道、徽宁池太道。光绪十八年出任驻美公使，兼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光绪二十二年，转任住俄、奥、荷三国公使。光绪二十六年，俄军侵占中国东三省，次年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俄交涉收回东三省问题。交涉逾年，俄国以草约十二款逼其画押，他不顾强敌威胁利诱，拒绝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卒于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任所。

石花洞地区的岩溶洞穴地质形态记载着地球演化漫长历史的一个缩影，给人类留下了研究地质形成历史的一个空间。此地区悠久的人文历史留下的题字、诗文、磨崖石刻佛像，记录了前人在此地探寻大自然的奥秘的一段佳话。地质演化历史和人文历史共同记载了石花洞的发展历史。

# 半壁店行宫乾隆诗碑考

赵思敬

半壁店行宫，因坐落于南正村附近，又称南正行宫。行宫建于清朝乾隆十三年（1748），是乾隆皇帝为展谒西陵，从京师到西陵沿途修建的四座行宫之一。行宫毁于二十世纪初，所存乾隆自书诗碑，于六十多年前被砌入西长沟村小学教室，得以保存至今。诗碑计 27 块，其中 24 块嵌于内壁，3 块嵌于外壁，因外墙置屋，诗碑内容不详。内壁计有乾隆自书诗 25 首，内容为作者自卢沟桥至西陵途中见闻。诗碑规格约为横 166 公分，高 100 公分，其中有两块石碑规格减半。诗碑厚度不明，写作年代为乾隆五年（1740）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现将诗碑按创作年代排列如下：

乾隆五年，庚申（1740）：日暮一律；古寺疏钟一首；涑水道上。

乾隆七年，壬戌（1742）：二月六日作。

乾隆九年，甲子（1744）：轻阴一首；对月二首；虎帐一首。

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秋夜闻雁绝句；瓶菊二首。

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秋麦一律；凉一首。

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夜一首，射一首。

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西北风一首；水碾一首；官柳一首。

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易州道中作（二首）；夕一首。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春冰（题句）；微雨一首。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过卢沟桥一首；感行即事四首。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长沟三首。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菜花香一首；麦色一首。

众所周知，乾隆（爱新觉罗·弘历）是清朝的第四代皇帝，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也是一位创作丰富的诗人，现存《御制诗》五集四万一千八百首，他的诗，历史价值超过艺术价值。通过乾隆的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窥见历史的原貌，达到以诗证史的目的。例如：乾隆五年（1740）孟冬上瀚作于“涑水道上”的长诗，便是有感而发，触景生情，关心弱者生活的作品：

驱车来水道，野旷风萧萧。日出岚雾敛，村木森寒条。  
 冻雀三五群，依依栖霞朝。晚穗收获足，饥寒苦无聊。  
 啾唧如鸣悲，春阳愁正遥。野鹤翔高空，清唳响云韶。  
 霜翎耐严冬，稻梁不可招。或时敛融下，千尺长松梢。  
 俯视众寒雀，嗟哉尔徒劳。

我们可以想见，作者在十月的季节里，行走于旷野之中，透过车帘，听到路边寒雀在树枝上下翻飞时发出的悲鸣，由此猜想，因为粮食已被勤劳的农民“收获”完了。旷野中那些善于觅食的寒雀，只有无奈的悲鸣。面对此情此景，飞翔在高空的野鹤也发出了“清唳”的鸣叫。寒雀三五成群，在漫长的“春阳”里，要发出多少徒劳的啾唧。作者驱车的目的是到西陵祭奠其父雍正，一路心情沉重，关心“寒雀”这些弱者的命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然，旅途中也有心轻如雁的感觉，请看乾隆七年（1742）仲春月“二月六日作”：

二月六日涑水滨，马蹄踏雪无风尘。  
 瓦神社鼓尽随俗，柳叶杏花俱待春。  
 山色一鞭如送客，鸟声数口弄解迎人。  
 蕨芽菜甲满畦绿，景物却羨山家新。

在立春时节，人们奏乐欢歌，迎接新的一年。此时远山如黛，犹如一缕长鞭，在鸟儿的鸣叫声中欢送着过往的客人。诗中还透露一个信息，那就是早在二百多年前，人们已经把野生的蕨菜种植于园中了，畦畦绿色的蕨菜，呈现出“山家”新春的气象，好一幅新春踏雪图。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乾隆十四年（1749）春，大将岳钟琦受命平定了大金川和小金川（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等地的“武装割据”。这一战事，历时五年，耗费白银七千万两，官兵死伤数以万计，史称“大小金川之役”。就在战争取得胜利后，乾隆来到了半壁店行宫，在春宵之夜批阅奏章之后，于“万窍声息”的夜晚，环视行宫内外，想起了一个月前的“大小金川之役”，想起了与群臣“集事”，研讨兵机的场面，道出了“居安益兢兢”的心绪，诗题为《夜一首》：

行宫潇洒地，春宵偶栖迟。轩阁静以佳，起居适所宜。  
 万窍声既息，封章亦罢披。宝鸭兰烟炷，银檠莲焰垂。  
 回忆一月前，频问羽檄时。夫岂硕佳兵，曾闻诘戎师。  
 集事赖贤臣，革心徠远夷。居安益兢兢，永言念在兹。

“羽檄”，即调动部队的文书，插上羽毛表示紧急，这种文书始于汉代。

乾隆帝“频问”“檄书”来否，不仅说明了对“大小金川”战事的关切，而且追问“戎师”的行动踪迹，因为，战场瞬息万变，胜负难料。如今想来，情景如昨，挥毫成诗，以示居安思危，永言不忘。

在半壁店行宫，乾隆还与群臣在校场练习射箭，留下《射一律》诗，记述了他与群臣在“离宫停辔多余暇，每集亲臣射广场”的热闹场面，体现了“德可视兮因以习，武虽偃兮未宜忘”的治国方略。

从北京到西陵近三百多里的官道两旁，种了许多柳树，乾隆在半壁店行宫写有《官柳》一首：

官柳纷纷翠影笼，两三叶乍落西风。  
自从始种今乔木，十五年光想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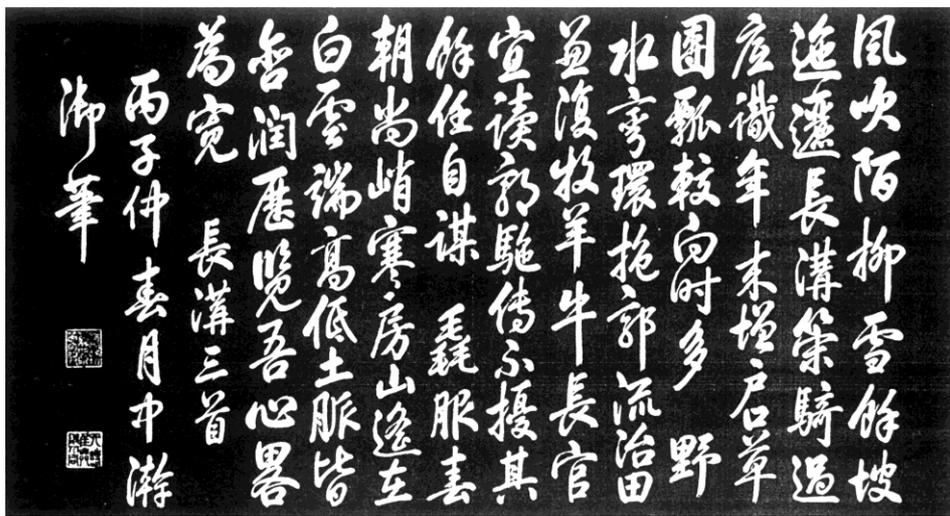
这首诗写于乾隆十五年（1750），以此向前推十五年，正是雍正十三年（1730）。这一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死于圆明园，九月三日，弘历即皇帝位，布告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也就是从乾隆元年春开始，官道上才遍种柳树。柳树在古人眼里有挽留、停留、留恋之意。唐人即有“折柳送客”的风俗。官道亦称“京易御路”，这条路的走向是从京师西行：跨过卢沟桥，南转长辛店、南岗洼，进入良乡县的黄官屯，经哑叭河，到达“黄辛庄行宫”。再南经鱼儿沟、杨井、固村、关道口、墩台、于庄、从芦村西北过大石河，再从吉羊和二站之间，向西南经韩村河、太和庄、南正到达“半壁店行宫”。再西经南尚乐、柴饭铺，过拒马河，经镇江营，西南进入涞水县境，到达“秋兰行宫”。再西进入易县境内的“梁各庄行宫”，便进入了西陵区，御路总长一百二十多公里，路宽十二米。乾隆的这首《官柳》，为我们了解“京易御路”的绿化情况提供了新的史料。

在“绿水弯环似水乡”的长沟，乾隆皇帝每每感叹这里“绿萋萋”的麦色和暮春里飘来的缕缕“菜花”之香，同时，他还留下了直接描写长沟风景的诗作：

风吹陌柳雪余坡，迤迤长沟策骑过。  
应识年来增户口，草团飘较向时多。

野水弯环抱郭流，冶田兼复牧羊牛。  
长官宜读郭陀传，不扰其余任自谋。

毳服春朝尚峭寒，房山遥在白云端。  
高低土脉皆含润，历览吾心略为宽。



乾隆诗碑《长沟三首》（赵思敬 提供）

诗题为《长沟三首》，写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仲春。第一首犹如走马观花，在“风吹陌柳雪余坡”的日子里，沿着曲折连绵的御路策马而过，感到一年以来，长沟应该增添了许多人口和家庭，要不然，闪现在路两旁的“草团”即茅屋怎么比去年增加了许多呢？如果说这首诗是白描的写法，第二首诗应是伫足的观感了。在“野水弯环”的水乡长沟，不仅有江南一样的稻田，还有放牧的牛羊。乾隆认为治理长沟的官吏们应该好好地读读唐人柳宗元的《种树郭陀传》，不要动不动就扰乱人民的生活，应任其自由耕种放牧。第三首诗是对长沟碧水蓝天的感叹。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沟一直为天然的富足之乡，燕国时荆轲向秦始皇所献的督亢地图，即包括长沟地区，这里所产稻米品质优良，色白如玉，在历史上一直享有盛誉。因为钟情这一方“含润”的“土脉”，乾隆难免驻足时间过长，虽然春寒料峭，但心情是宽怀的。可见，远在“白云端”的长沟，是乾隆一往情深的好地方。虽然时间过去了二百多年，读到这几首诗时，我们仍可以感到乾隆皇帝吟诵时的欣喜之情。

乾隆在半壁店行宫留下的诗碑，多为行书，间有草字，体势清爽，行笔流畅，堪称佳作。每块诗碑上，都有印章，印文除“乾隆御笔”“乾隆定翰”、“乾”、“隆”外，多为古文吉语或前人诗句，总计用印四十六方（含重钤印）印文可识者有“所宝惟贤”、“万有同春”、“落纸云烟”、“烟云舒卷”、“池藻印春”、“幽风无逸念民依”、“万国农桑寤寐中”、“和福宜民”、“飞越天机适”、“琴书趣生”、“有孚惠心”、“惟精惟一”、“勤学好问”、“味道之眼”、“政在牧民”、“朝日辉”、“谦好好”、“春花春雨”、“漱芳润”、“盱食宵衣”、“心清闻妙日”、“天根月窟”、

“陶冶赖诗篇”、“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契理亦忘言”、“精研固得趣”、“陶冶性灵”、“存诚主敬”等。这些印章有的不见于上海博物馆 1987 年所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乾隆御笔”印从这方面说，诗碑丰富了乾隆书法用印的实物资料，很有详细介绍的必要，容当另文考订，这里暂不赘述。



“乾隆御笔”印

关于半壁店行宫的记载不多，从北京文物事业管理局编辑的《北京名胜古迹词典》中，知道行宫坐北朝南，靠山面水，景色宜人，占地三十余亩。行宫前有汉白玉石桥，南泉河水自西向东在桥下缓缓流过，桥后为小广场，广场上有水井一眼，至今犹存。广场两旁各建有月台一座，其后为行宫主要建筑，中轴线有两座殿堂，前殿面阔五间，进深五间，重檐抚殿顶，顶铺灰筒瓦黄琉璃剪边。殿前有宽阔月台，大殿两翼各有厢房五间，前出一步廊与两侧回廊相连。乾隆的题诗碑，就镶嵌在东西长廊的墙壁上。第二层大殿面阔九间，亦前出一步廊，重檐调大脊，顶铺灰瓦亦为黄琉璃剪边。行宫后院为御花园，有北太湖石堆砌假山和松柏花草，假山后石岗有玲珑八角亭一座，修建精巧，费时一年。半壁店行宫毁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今已荡然无存。

# 房山城八景

王梦麟

房山县始建于金，历代县治均为房山城。房山地区曾有“旧八景”之说：“大房耸翠、金陵佳致、张良玉洞、文靖书院、西天胜概、龙潭灵雨、孔水仙舟、贾岛遗庵”。至明清时，房山又有“新八景”：“大房耸翠、西天胜概、上方山寺、云水奇观、红螺三险、孔水仙舟、金山香水、白水异浆”。

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房山城，自清以来也有“八景”之说。其八景是：“铁城金汤、沙河春柳、魁星朝霞、留台夕照、年集盛市、上元灯火、城隍古刹、文庙古柏”。“八景”曾名显一时，但后来除“留台夕照”外，其余七景鲜为人知。下面简略作一介绍：

**铁城金汤：**自明代隆庆年修建石城，在原土城的基础上扩建增高，土城加黄土、白灰、沙子后夯实，城外面用歇息岗、迎风坡的花岗石砌成。内用周口店的石灰石和大石河的河卵石砌成，用糯米、大灰灌浆、异常坚固，素有铁城之称。就是炮弹落到城墙花岗石上，只留下一个白印，毫无损坏。城墙周长四华里，可以骑马在城墙上行走。城垣很小，但固若金汤。

**沙河春柳：**房山城四面环绕沙河。东、北、西三面至今仍然可见，唯有南沙河遗址不存，南沙河是西沙河往南后的一条支流，西起永安西里，经城关南里，穿京周公路，向东南到肖庄子、北市，流入顾册村东牛口峪河，沙河四周岸柳成行，每逢春季（三月惊蛰节）沿河柳树一片葱绿，河水环城流过，绿柳、蓝天、河水、白沙和花岗岩城墙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魁星朝霞：**明代修建石城后，城东南角建一座两层楼高约八米的楼阁，楼的东北角跨空用阶条石与城墙相连，楼阁是灰色重檐尖顶，重檐之间西北方向有匾额“魁星楼”。六角楼下层有木板屏风，中间有六边形透风孔，能瞭望远方，上层六根明柱视线宽阔，是旧房山城的最高点，房山县城内外尽收眼底，魁星楼成为房山的标志，远在十几里以外石楼、大董村一带都能望见，夏、秋季节，早晨朝霞如火，城内看魁星楼在朝霞的映衬下，有“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

留台夕照：城西不远有一座山，山顶上有一座古庙，两层殿，座西朝东，学名曰“三官庙”（三元庙），俗名“山顶庙”，房山县志记载有“留台尖”一名，整个庙宇建在一个山顶上，其建筑风格可与山东济南的千佛山媲美。山门两侧是钟鼓楼，前殿为释迦牟尼铜像，泥塑的四大天王脚踩八大怪。后殿是“天、地、水”三官。每当春、夏之交，夕阳西下，便把这山上林木百草、殿宇碑楼笼罩一片金光。树影斑驳，百鸟合鸣，景色迷人。

年集盛事：每年的腊月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二十九日，距城一百多里地的深山百姓都起五更来房山城里赶年集、卖山货，买年货，城内四条大街买卖兴隆，鞭炮声、叫卖声连成一片，可谓终日繁华。

上元灯火：就是正月十五的花灯和花会焰火，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六，官方一百三十六盏纱灯，八盏大宫灯，绘以山水博古图案；六十四盏六面宫灯，六十四盏四面灯，绘以“四大奇书”内容：南街宫灯以《三国演义》为主、东街宫灯以《水浒传》为主、北街宫灯以《红楼梦》为主、西街宫灯以《西游记》为主。衙门口和四个城楼挂二十四盏大红灯，衙门口挂八盏。各店铺、临街住宅门前都有各种各样灯笼，全城张灯节彩。十五晚上有焰火晚会，各种花炮、盒子（灯笼和焰花的合称）共有四节或八节，用纸糊成各种造型，每节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火树银花不夜城廓。白天有各种民间花会表演，各种民间小吃同时上市。

城隍古刹：城西北角的城隍庙牌楼、山门、戏楼、三层大殿连为一体，城隍爷为金世宗皇帝敕封显伯侯，三进院落古木参天，前殿供城隍爷，中殿是城隍爷、城隍奶奶的寝殿，后殿是城隍爷藤胎塑像，可以背出来上轿，每逢城隍出巡，都抬此像。东西房七十二司的塑像，整个庙宇阴森，庄严肃穆，是房山城内最大最完整的道教庙宇。

文庙古柏：文庙（孔庙）在城东南有正门（仪门）、东西戟门，是三楼四柱的牌坊，往北是泮池，南弧北直，三路石桥，中间隆起，桥体匀称壮观，形式坡度圆缓流畅。桥长八米，池深一米，其形式超过良乡、涿洲孔庙的规格。往北是棂星门，两柱一楼牌坊门前和整个文庙，石碑林立，古柏参天，古柏是建庙时移来的，当时每一辆车只拉一棵树，树龄有七八百年，二人合围有余。古柏葱郁苍劲，蔚为壮观。棂星门后是大成门，正殿是大成殿，供孔子坐像，颜回、曾参、子思、孟轲立像和七十二贤人以及程颐、朱熹牌位。其它府州、县文庙，只供牌位，没有塑像。大成殿庄严，殿顶正中，有一米多高的大脊，绿琉璃瓦，阴阳透砌，两端螭吻，更是高大，上树铁制三股叉，这是其它地方

文庙罕见的。大成殿前有 10 米长、8 米宽、1.3 米高的月台，东西两边九级台阶，南面因房山没有出过状元，没有资格直接祭孔，所以没台阶。如果出状元，南面就有九级台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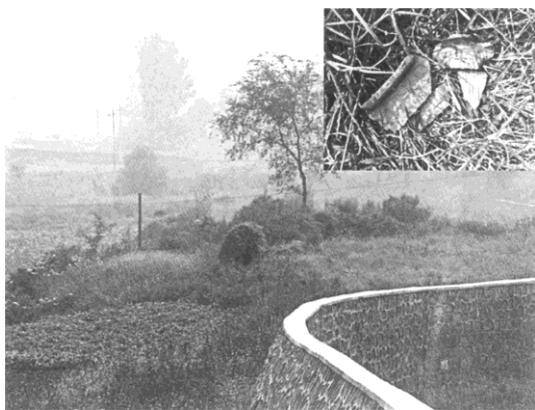
房山城八景，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体现了房山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 丁家洼陶窑遗址

赵思敬

在房山区境内，有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石窝的镇江营遗址、琉璃河的刘李店遗址和房山城关西北的丁家洼遗址。这里，主要介绍丁家洼遗址。

镇江营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商周时代，填补了北京史研究的考古空白。刘李店遗址以红陶为主，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丁家洼遗址的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早期。遗址位于房山城关东北 3 公里，即现在丁



丁家洼陶窑遗址（赵思敬 提供）

家洼水库南侧，大坝泄水渠东北面的土坡下，这里现在已是杂树丛生，荒草满坡，漫步其间，随处即可发现带有绳纹图案的陶片。村中人说，在丁家洼一带，早年曾有人挖出过完整的陶罐，只是以为这些都是死人用过的东西，大部分都被打碎了。据北京社会科学院 1991 年出版的《今日北京·历史卷》介绍，1960 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这里清理出 6 座陶窑遗址。其中有 5 座仅存底部，一座保存较为完整。窑址平面为椭圆形，长 2 米、宽 1.7 米。西北侧有一拱形火门通往火膛，火膛上部有窑算，窑算有九孔，窑算以上不复存在。我们知道，陶器的质地比较粗，有很强的吸水性，并且是不透明的粘土制品，它是人类在用火烧烤食物时偶然发明并经过漫长积累创造的一种新的物质器皿。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和研究，陶器的发明和使用，已有近万年的历史。

陶器的原料是黏土，黏土随处可取，不受地理条件限制。陶器的烧制温度比较低，一般是 800 摄氏度，陶器的前身是陶胎。新石器时代的陶窑有横式和竖式两种，丁家洼陶窑属于横式窑，横式窑是由火口、火膛、火道、窑室和窑算组成。这种窑后来发展成圆形，底下是窑算，算上有许多小孔，由火膛进来的火焰，经火道和火孔到达窑室，竖式窑的窑室在火膛上火膛口小底大，火

道垂直通向窑室。在丁家洼陶窑遗址附近，考古工作者清理出陶环、网坠、石杵和灰陶豆、加蚌屑红陶鬲、釜等残片。丁家洼遗址紧邻大石河，即古圣水，在新石器时代，这里也可能是圣水的一部分，人们居住在河边，结网打鱼便成为一件“正式工作”，所以，网坠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如果说，陶环是美化生活的“奢侈品”，那么，陶豆、陶鬲、陶釜便是生活的“必需品”了。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从丁家洼村往东，一直到焦庄一带，几十年来常有发现。1985年4月，燕化公司在焦庄村西取土，用以回填东风地区的街头公园和燕山公园低洼地带。许多人在土堆里捡到了带有绳纹的黑、红、黄色陶片，陶片大的直径5公分，小的也有3公分，燕山文物管理所在取土地的地方还回收到一个夹砂红陶四景罐，那个地方当时残存封土有13米高，长约200米，土层从底至上分别为黑沙、白沙、黄土，以黄土层最厚。村人说，1958年大跃进和1968年平整土地时，分别从这里取走6至7米的土层。这说明，丁家洼这一带背山面水，是原始人居住的理想场所，这一时期的陶器之所以呈现出灰色或红色，主要原因是制陶的原料中含有呈色原素和烧窑时火焰大小所致。从丁家洼陶窑遗址看，原始的“房山人”已经掌握了在调温下严密封窑的技术，这种调温操作技术，为金属的冶炼打下了基础。经考古学家钻探得知，丁家洼文化层3米有余，原始人生活的许多秘密，还有待考古发现。

# 鳌头寨

张玉泉

鳌头寨又叫般洲山。位于房山区大石窝镇古刹云居寺东南侧一里许。该山四周山势斗绝，山顶平坦。东南北三面悬崖千仞。唯西侧有条崎岖山路可攀援而上。因山势险要，又处南北相控、山地与平川交界处，属咽喉之地，自古是兵家和盗匪必争之地。

据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载：“山上有井有碑，”其井深看不见底，井口直径一米有余。干旱时也从不断水。其碑立于井的前侧，高约 1.5 米，宽约 0.4 米，厚约 0.07 米，为青石质。碑阳阴刻：“明崇祯年间北郑村廩生张汝器因闯贼之乱，□□联络涿房两县五十余村（人）筑寨于此”。井和碑解放前约有附近村民见过，现已无存。

山顶周围的豁口处还有少量城墙遗址。墙基宽约 2 米，用当地青片石所垒。山城寨为当时的防御设施，十分坚固。

《房山县志》还记载鳌头寨“群盗未平时，盘结其中，不时窃发按（案）。”据当地老人讲，当年窦尔敦曾在此寨安营扎寨，占山为王，当地官府组织兵力几攻不破。窦尔敦为清代河间府人，是当时危害一方的大盗匪，他长期驻扎寨上，不时率部下山骚扰官府，抢劫富商。在清末民初这一带民间广泛流传的“黄三太镖打窦尔敦”等故事，以及“盗御马”的戏曲，几乎家喻户晓。

据县志记载，鳌头寨“三角城在北，关上城在中，般洲山寨在南，皆大山前后形胜之地。”三角城系大房山的西北霞云岭境内王家台村西侧，东西北三面山峰鼎立，唯东南端较缓可攀，山顶平坦四周有城墙遗址。由此下山经霞云岭至佛子庄，往南过安子岭，可直达到张坊镇西北端二十里处的东关上古城。东关上古城建在两高山峡谷之上，是可控南北山路要隘。出东关上古城往东行，十余华里即达黑牛水，向东爬过山梁即是云居寺，寺的东南侧即是鳌头寨。旧志称这三处古迹为唐末遗址。据清咸丰八年《房山志料》载：“三角城、关上城在东（实为西北），般洲山在南皆大山前后形胜之地……乃刘仁恭山后八军也（屯兵之处）”

刘仁恭何许人？他为唐代末年卢龙第度使（今河北献县人）曾在大安山西侧的西苑建筑“大安馆”，选燕美女充其中，又与道士炼丹药，用泥土铸钱币，后被其后刘守光囚禁。

刘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曾以大安山为中心，向山外修筑不少交通要道。如出红煤厂顺大石河而下至坨里；顺班各庄山谷南行，经南窖、蔡树庵翻越大南岭到黄山店；再由山谷向西南行可直达山涧雄关东关上城；从东关上古城翻越黑牛水又达鳌头寨。

关于“刘仁恭山后八军”问题，杨亦武先生著的《房山文物研究》中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书中所述“卢龙即幽州”山谷，即指幽州西北部山区，卢龙所属的有四个州，即：妫、檀、新、武四州，统称山谷。妫州，即今河北怀来、北京延庆一部分；檀州，即今密云及怀柔一部分；新州，即今涿鹿以北宣化境内。足见‘山谷’并非大房山谷。刘仁恭所统的八军以防契丹人入侵。八军布防在妫、檀、新、武四州统称“山后劲旅”。鳌头寨、东关上城及三角城三古址虽非山后八军屯兵遗址，但也是刘仁恭镇守幽州西南的要隘。鳌头寨是其通向平原的咽喉，是出山进山的隘口，必派兵把守。解放初上山砍柴人曾拾到一些铁铸箭头，被有关部门鉴定为唐代产物，便是一例证。

#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北京段文物保护工程

张治强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北京段总干渠工程在北京房山区北拒马河中支南进入北京境内，穿房山山前丘陵区，房山区西、北关，过大石河、小清河、永定河，在岳各庄桥向北沿西四环路下北上，直至终点团城湖，全长 80 公里。工种涉及的文物主要分布于房山和丰台两个地区。

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一直得到中央领导和相关部委领导的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委员陈至立等中央领导亲自对南水北调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先后两次到北京段调研文物状况，指示“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先行”。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也多次批示要协调做好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作。

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作，被列为北京市文物局 2005 年和 2006 年重点工作目标。2005 年 7 月北京市文物局责成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成立南水北调考古工作队，专门负责南水北调北京段的文物保护工作。为规范南水北调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制定了《南水北调考古工作队队内管理制度》、《工地管理制度》、《南水北调文物



南水北调工程房山段主干渠图

安全责任》等制度。为保证文物勘探工作质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还制定了《文物勘探技术规范》，勘探时做到每孔必记，发现现象立即重点勘探，确保不漏探，发现的文物遗迹现象结合重点勘探予以确认。为保证考古发掘质量，依据《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制定了：《探方发掘记录要点》、《灰坑发掘记录要点》、《窑址发掘记录要点》、《墓葬发掘记录要点》等技术规范。确保了南水北调工程北京段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考古发掘基本上做到对遗址和墓葬分布较密集的墓葬区，进行探方发掘，由上至下由晚到早的方法，科学地揭露文物遗迹。采用彩色正片和负片、数码摄录像的形式留取发掘成果。对每个遗迹和墓葬取土样进行浮选研究，对人骨全部清理鉴定。完成了每处文物遗迹点的记录档案。

2005年7月以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南水北调考古队在拒马河至大宁水库段，先后勘探272万平方米，发掘了8处文物集中埋藏区。分别是岩上墓葬区、南正遗址墓葬区、坟庄和六间房遗址墓葬区、皇后台遗址区、顺承郡王家族墓葬区、丁家洼遗址区、前后朱各庄村墓葬区、果各庄（大苑村、小苑上等）遗址区。发掘总面积为16360平方米，墓葬（126座）、窑址（15座）、灶（5座）、灰坑（173个）等，其年代从春秋时期延续至明清。出土了近2000余件可复原或较为珍贵的文物，包括石器、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玉器等，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

丁家洼遗址、南正遗址墓葬区和岩上墓葬区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重点，出土了重要的文物。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当地古代人群的生产、生活等状况提供了大量宝贵而丰富的信息和实物资料。

### （一）岩上墓葬区

岩上墓葬区位于房山区长沟镇南正村西北，处在一地势东高西低的缓坡上。发掘总面积为3250平方米。发现各种类型的墓葬70座，可分为瓮棺葬、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三大类。根据墓葬的开口层位、相互打破关系、墓葬的形制及随葬器物等，初步分成三个时期：战国时期、东汉至北魏时期、清代。战国时期共44座墓葬，其中瓮棺葬14座、竖穴土坑墓30座。

### （二）南正遗址、墓葬区

南正遗址位于房山区长沟镇南正村北。该遗址为南水北调工程文物勘探工作中新发现的文物地点。发掘面



六间房1号青花瓷罐

积 6660 平方米。

根据输水管线的分布情况及遗址的地形特点，将发掘区自西向东分为三个大区，分别以 I 区、II 区、III 区表示。I - III 区共清理灰坑 41 座、墓葬 26 座、陶窑 6 座、灰沟 6 条、灶 5 个。出土陶器、石器、铜器、铁器等大量遗物，能复原文物 1000 余件。

南正遗址的出土文物，是解决北京地区战国晚期至汉代考古学文化编年的重要资料，从而将文化谱系的研究导向深入。清理的东汉砖室墓不仅反映了拒马河流域在两汉时期的丧葬习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地区汉代居民的文化风格和经济状况。将对研究这一地区乃至北京南部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所清理之陶窑，对了解汉代的制陶工艺、生业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三）坟庄和六间房遗址墓葬区

坟庄和六间房遗址墓葬区位于房山区长沟镇北郑村和六间房村东。坟庄遗址位于北郑村，六间房墓葬区位于六间房村。发掘面积 1000 平方米。其中六间房墓葬区发掘 350 平方米；坟庄遗址发掘 650 平方米。

六间房墓葬区发掘的 10 座墓葬。坟庄遗址为一处汉代时期的陶料制造场所。

### （四）皇后台遗址

皇后台遗址位于韩村河镇天开村东。发掘区分为东区和西区，发掘面积总计为 500 平方米。

清理墓葬 2 座、陶窑 1 座。皇后台遗址所在地天开村，辽代即建有天开寺，寺庙规模宏大，本地区较为知名。此次考古发掘，证实了辽代时期这一地区确有大量的居民。考古发掘也为研究辽代葬俗、习俗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 （五）顺承郡王家族墓葬区

顺承郡王家族墓葬区范围较大，在前期的调查和规划中列入文物保护区，经过我们全面勘探。在该墓葬区的范围内发现的文物以古代窑址、清代墓葬为主。其中在周口村、西周各庄和瓦井村发掘窑址，在新街和辛庄村发掘清代墓葬。发掘面积 600 平方米。共计发掘窑址 4 座、清代墓葬 13 座。出土金器、铜钱和陶器等文物约 100 多件。

### （六）丁家洼遗址

丁家洼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城关镇丁家洼村西南，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管线穿过遗址中心地带。经勘探，遗址总埋藏面积约 60000 平方米，其中南水北调管线发掘面积 2850 平方米。丁家洼遗址内涵丰富，发掘区内共发

现灰坑 127 个、灰沟 4 条，时代介于春秋早中期至春秋战国之际（部分器物进入西周晚期），是一处居住生活区遗址。根据出土器物形制及其层位关系，丁家洼遗址发现的遗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各期时代分别相当于春秋早中期、春秋晚期、春秋战国之际，其中春秋早中期发现遗存较少，而春秋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的遗存发现较多，无疑为该遗址较为繁荣的时期。



丁家洼遗址

丁家洼遗址是北京地区首次系统发掘的春秋时期燕文化居住生活遗址，填补了东周燕文化既往考古发现所遗留下来的空白。遗址内涵丰富，为东周燕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详实具体的资料，也必然使学界对于东周燕文化面貌的认识更加深入。

#### （七）前后朱各庄墓群

前后朱各庄墓群行政区划隶属房山区城关镇，包括丁家洼村东南墓群和羊头岗村墓群两个区。

共发现 3 座唐代墓葬和 1 座辽金墓、3 处窑址，出土文物 20 件。

前后朱各庄遗址在丁家洼村东南发现的三座陶窑，为研究东周及辽金时期燕山南麓地区的制陶工艺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对研究陶窑形态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价值。在 Y2 火塘内侧发现的小瓮和白瓷碗，应和祭窑有关。这类遗迹和遗物，在燕山南麓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 （八）果各庄遗址区

果各庄遗址位于房山区青龙湖镇大苑上和小苑村。发掘 500 平方米，其中小苑村发掘辽金元时期的灰坑 2 座，灰坑内堆积较为纯净。大苑上村发掘清代砖窑 1 座。

# 琉璃河遗址与北京建城

沈书权

大量研究成果证实：琉璃河遗址即为西周燕国都城遗址，同时他又是 3000 多年前的最早的北京城。对于关系首都北京历史地位的大事来讲，首都市民是十分关切和感兴趣的。前些年不断有人有向我询问：琉璃河遗址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最早的北京城了呢？北京建成 3000 多年是如何研究出来的？……。做为一名曾多年从事文物的工作者，答疑解惑与普及这方面的知识理应责无旁贷。为此，笔者就琉璃河遗址与北京建城的关系进行探讨，以供读者参阅。

1979 年 8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于将琉璃河遗址列为北京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名称为“琉璃河商周遗址”；国务院 1988 年公布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琉璃河遗址榜上有名，即“琉璃河遗址”。

探讨琉璃河遗址与北京建城的关系，首先需要了解琉璃河遗址的状况。该遗址的范围包括琉璃河北侧的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村，整个遗址东西长 3.5 公里南北宽 1.5 公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始，在这处遗址做过多次发掘，发现了古城址，居住址及墓葬区。

一、古城址。位于董家林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该遗址北城墙有的地段，在地面上尚可见到 1 米多高的城墙。后因平整土地，这些残墙被夷为平地。据考古实测，北墙东西长 829 米。城南部因临近大石河；经几千年汛期冲刷已有痕迹，南北方向的东西两侧城墙仅存 300 米左右。1976 年、1984 年、1995 年均曾对城墙进行过发掘，发现有河卵石砌成的排水沟。城墙基部厚达 2.6 米，夯层厚 5 厘米。城墙外还有护墙壕沟，深约 2 米。

关于此城的营造年代，由于城墙内侧的护挡，被商末周初墓葬以及属于西周时期的灰坑、房基所打破，证明这座古城的始建年代不应晚于西周初年。结合史载可以确定，这里是周初燕的封地所在，是燕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

二、居住址。包括城内外。按照惯例，做为都城应建成有宫殿及衙署，但目前尚无考古发现，这可能与破坏严重，或者面积小尚未找到有关。但在

发掘过程中也发现了多处居住址，有当时人们居住过的房基、用过的窖穴、陶窖，并发现一些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其中有陶器、陶灶、石器、蚌器和骨角器等。1973年春，在刘李店进行遗址发掘时，在西周时代地层中，还发现了经钻凿的小骨。居住址的地层堆积，厚薄不一，最厚的按年代可以分为四层，第四层和第三层为商末周初的堆积层；第二层为辽、金至明、清堆积层；第一层为现代耕土层。1995年至199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此发掘时，曾发现祭祀坑，出土整牛骨骼，并发现龟甲骨一片，上刻“成周”二字。

三、墓葬区。主要分布在黄土坡村一带。黄土坡村在董家林村东南约500米。这里是一片高敞的黄土台地。从1973年秋开始，在此探测发掘，均发现大批西周墓葬与车马坑。经过1974—1978年和1981—1986年的发掘，共发掘、清理墓葬300余座，车马坑30余座。按墓葬规模，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

大型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一般带有一条墓道，有的带有两条墓道，特殊大墓有的从墓室四角向外斜伸出四条墓道。凡属大型墓，墓室都深在7米以上，有的深达11米。大型墓共挖出10余座，从已发掘的数座看，均已被盗，随葬器物所剩无几。死者尸骨多已无存，个别的只见零星碎骨。中型墓的形制，也是长方形竖穴土坑，规格一般长3米，宽2米左右。墓由填土经过夯打，土色呈红褐色，并夹杂有生土块。葬具一般为一棺一槨，也有一棺二槨者。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葬。随葬物或放在墓主人的头前的棺槨间，或棺内，或二层台上，其种类有：青铜礼器数、兵器、车马器、铜工具、陶器、玉石器、原始青瓷器、漆器、骨角器及货贝等。小型墓量约占墓葬总数的3/4，一般规格是长2米，宽1.5米左右。葬具一般为一棺一槨，无棺或用席裹尸者，人骨保存相对较好。随葬品多为陶器，1—10件不等。

这里特别一提的是，1986年发掘编写为1993号墓，此墓是学术界公认的一代燕侯的墓葬。该墓出土了举世震惊的青铜器克盃、克罍，这两件器物都有相同的43字铭文，这43字铭文史料价值极其珍贵。

有人要问，琉璃河遗址已经发掘数量这么多的墓葬，还有可供挖掘的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墓葬区的绝大部分是被黄土坡村压在地下，目前还没有办法对其钻探式发掘。已经发掘的墓葬，只局限于该村边缘没有民房建筑的地块上。可以肯定地讲，待黄土坡搬迁后，还需要发掘的古墓葬数量一定是惊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将来的发掘，一定会有更加惊喜的重要发现。

克盃，克罍面世为北京建城研究敲响定音槌。

1986年在琉璃河遗址发掘了编号1193号墓，出土了以克盃，克罍为标志的西周青铜量器，其器物上的铭文为北京建城研究提供了关键文字记录。发现的盃、罍二器，是因墓主人的名字叫“克”，所以考古界称之为“克盃、克罍”。

克盃，通高28.6厘米，鼓腹、略分裆，裆底近平，下有四条圆柱足，有盖，盖内侧有43字铭文。克盃是酒器，是古代温酒的器具。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克盃

克罍，通高32.7厘米，肩部有兽首状环形的双耳衔环，下腹部有一兽首形环鼻，有盖，盖内侧有与克盃内容完全相同的铭文。克罍亦为酒器，是用来盛酒的器具。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出土的克罍

二器铭文均为象形字，为甲骨文。其铭文内容曾用现代汉字刊载于1995年4月14日从《北京日报》第四版上：“王曰：‘太保，佳（唯）乃明（盟）乃，（享）于乃辟……’。”在克盃、克罍面世之前，西周燕国都城即始封地问题，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案。司马迁《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虽有记载；但自汉代以来，对燕的封地在什么地方，[[HK]]一些史学家各执一词，不能定论。自上世七十年代以来，琉璃河遗址的发现，特别是克盃、克罍二件量器的发现，为燕始封地争论划上句号。其铭文证实燕召公为武王册封，其长子“克”为燕侯，即琉璃河为燕国始封地（西周燕都）。因此可证，北京城至迟始建于西周初年，也就是北京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古都。



克盃、克罍盖内及器沿内

史载：“周武王十一年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周武王十一年，到底是公元前哪一年？只有破解了这个难题，才能推算出“封召公于北燕”的准确年代。那么这一难题又是如何破解的呢？考古史学家根据史料记载；武王伐纣时有哈雷慧星出现，按哈雷慧76年出现一次的规律推算，确认武王11年即公元前

1045 年，也是分封燕蓟之年，也是北京地区的两座古城，燕都古城，蓟都城的始建这年，以此推至 1995 年，则是北京建城第 3040 年。北京建城 3040 年的定论，将此前北京建城建八百多年，千年之久之说向前推了两千多年，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北京建城史的前推，对于提高首都北京的知名度与国际地位，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公主坟村古迹追踪

张玉泉

北京有许多叫公主坟的地方，在京西南房山区府西侧 6 公里处，也有一处同名的村子。它地处原子能研究院东侧，隶属房山区阎村镇。

在该村的西北侧一公里处，有一个黄土台。东西两侧是两条平缓的小山丘。南面平坦开阔，此地显得清幽灵秀，这就是永安公主的坟墓。墓地座北朝南，占地 10 余亩，四周松柏长青，南侧坟前是享地，享地前原有高大的享殿和牌楼，早已无存。坟墓高约 15 米，底部直径约 40 米。地下建有地宫，宫前有约 20 多米长的拱券隧道，是通向地宫的通道，地宫四壁由青砖垒起，由花岗岩条石盖顶，地宫面积约 60 余平方米。石盖上铺厚厚的一层由石灰、黄土、糯米浆液活成的粘土。粘土上方堆积的黄土成坟状。

墓主永安公主名叫朱玉英，明成祖朱棣长女。《明史》载：“永乐十五年正月公主薨……皇帝辍朝四日殯祭，命有司治其丧。”朱玉英的丈夫袁容，为督都袁洪之子。初称燕仪宾。在靖难之役中立有战功，明成祖即位后进封驸马。死后赠沂国公，与公主合葬。

碑文载：“公主讳玉英仁孝皇帝之长女，生于洪武十年六月十五日，天资淑慧静端庄恪，故于永乐十五年正月初九日，是年二十七日葬于北京顺天府涿洲房山县永安乡佛仙山……”

“文革”初，曾出土了墓碑、供桌、香炉、长明灯（釉花缸 2 个），均存完好。尚残存尸骨、棺槨等黑色粉末。汉白玉墓碑，碑首和碑身分为两块。碑首刻楷书《永安公主之墓》，原立在通道口。碑身刻有《公主讳玉英》小楷体。全文共 210 个字。碑头与碑身的尺寸相同，高 90 公分，宽 60 公分，厚 15 公分。碑身立在棺槨前，掘坟时发现。公主坟处在东西两道山丘间，形成厚厚的黄土层。被移为平地后，坟前被村民挖成一深深的官土炕，坟址上种了果树。

在公主坟村西南端一里许的高地上，有座将军墓，座北朝南，占地五亩。西北有丘陵环绕。东南是一条小河流淌，墓地依山傍水，环境幽静。将军墓原是个高大的宝顶。前面曾有牌楼、石兽以及石供桌、香炉、墓碑。两侧有高耸

的石柱望天吼，四周是青砖打墙，墙内有郁郁葱葱的松柏林。

该墓主是清顺治年间开国将领——镇海将军王国光。王国光先世本满州，姓完颜氏。汉军旗制定，隶属正红旗。其父王一屏在天聪八年（1634）授为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1644）王国光由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升为都统。顺治六年（1649）从英亲王阿济格讨伐叛将姜琅，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顺治十年（1653年）从定远大将军屯齐征湖广。十二年（1655）再从宁海大将军伊勒德援浙江。十三年（1656）二月任两广总督，加太子太保。两年后因疾解任。康熙帝即位后，授镇海将军，驻广东潮州。康熙三年（1664）与平南王尚可喜讨伐叛将苏利。康熙五年（1666）返京，仍任本旗都统，康熙九年（1670）卒。

王国光之子永誉，官至广东将军、都统，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乾隆十八年（1753），命其族改隶满洲正红、镶白旗。

“文革”初，该墓被彻底破坏。夷为平地后曾改做生产队场院，后由村民承包耕种。以后又全部用做煤场。墓前依稀可见的望天吼石柱已被推倒垒进院墙里。院里仅存吼柱基石和驮龙碑底座。宝顶被平后，盖上了排子房。石碑和五供桌已做了基石。如果没有这些残存的遗物，人们很难确认这是将军王国光墓的遗址。

据《房山区地名志》载，公主坟“明代成村，因永乐帝长女永安公主葬此，故改名公主坟村。”此前，“又因风水好，别名金水洼”。为何叫金水洼？因初建村时在村中心有个大水泉，泉水丰盛，水质清冽甘甜。经阳光照射，便闪着金光，成为一片金水洼。人们喜欢依水而居，在泉边落脚的人逐渐多了，便形成村落，故以公主坟为名。

后来有僧人在水泉遗址上盖起了三座大庙。在庙的西侧挖了一眼大口井，在井口砌上一块长条大青石，供人们安全提水。该井的井口和井底下两头小，中间大，成为罐子状。水源十分丰富，水质甘甜清凉。成为远近闻名的甜水井。附近百姓都到这儿提水吃。因汲水人多，时间又长，便把大青石上磨出了九道绳痕。后来人们又把该村叫做“九道渠”。

以后，村人在井口扣上个大石盖。石盖的四角分别凿了四个眼，可供四个人同时汲水用，中间又凿了一个小眼放公用水桶用。由此人们又把该村称作“五眼井”。从金水洼到九道渠，再到五眼井都成为公主坟村历史上的曾用名。这名称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直到明永乐十五年后建起公主坟，才以坟名为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 奕赓冬游孔水洞

潘惠楼

## 奕赓其人与家世

奕赓，姓爱新觉罗氏，清代和硕庄襄亲王绵课之子，庄恪亲王允禄之曾孙。庄亲王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世袭罔替。首封庄亲王为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第五子硕塞，一袭庄亲王为博果铎。博果铎晚年病重，康熙前去看望这位堂兄弟，知其膝下无子，遂将十六阿哥允禄过继给博果铎，既解决了庄亲王无后之忧，又使庄亲王这顶铁帽子回到了自己门下。由此可知，奕赓乃清圣祖康熙皇帝之玄孙。

奕赓，别号爱莲居士、墨香斋主人、鹤侣主人，曾自称“天下第一废物东西”。其生足年月不详，约生活在嘉庆、道光两朝，曾官充侍卫六年。清道光八年，东陵宝华峪地宫入水，时其父绵课负责地宫建设，皇帝追论罪责，株连绵课子嗣，奕赓也被革去顶戴。至道光十八年，恢复绵课爵位，奕赓改授为三等侍卫。

奕赓兄弟十三人，其弟奕劻承袭庄亲王爵。限于满清皇规，满人为官，不能考取，只能听封。奕赓在《佳梦轩丛著》中记载，其弟奕劻承袭庄亲王后，因“入庙饮酒、吸鸦片烟”被朝廷革爵。“奕劻所遗王爵，不准其亲兄弟承继”。这也就使奕赓彻底断绝了仕途升迁的道路。奕赓虽博学多才，心高气盛，然终不能出将入相，一生最高职务也就是充当侍卫，只得寄情琴书，自谥为“废物东西”，聊以自慰。

奕赓的著述，迄今发现笔记十二种计二十一卷。1933年，燕京大学图书馆从旧家购得奕赓著述，点校后于1935年合为一册刊刻成书，以书中有“佳梦轩”之名而命书名为《佳梦轩丛著》。

## 游览孔水洞

奕赓游览孔水洞，在《佳梦轩丛著》书中有详细记载。时为辛卯年冬季，

也就是道光八年（1831）。然笔者认为奕赓游览孔水洞，当不止一次。因奕赓此次游览是“谒墓事竣”之后，且抄录了大量碑文，是有备而来。

奕赓所谒之墓，乃是位于磁家务村的庄亲王坟。此是奕赓家族墓地，与孔水洞当时同属一村境域。庄亲王坟与孔水洞隔大石河相望，只相距二华里。奕赓之父绵课以上历代庄亲王均葬于此，因此奕赓谒墓当属平常之事。奕赓乃饱读诗书、探幽索隐之人，对庄亲王墓近在咫尺的孔水洞名胜岂能等闲视之。在《佳梦轩丛著》中，奕赓摘录有《广舆记》、《日下旧闻》、《帝京景物略》、《北游纪方》等书中关于孔水洞的多处记载，可以看出奕赓对孔水洞还是进行了深入研究的。

辛卯年冬季，奕赓“谒墓事竣，携阿笔政厚斋游于大房山孔水洞，见其石刻鳞立，字多不辩识，剔藓剥苔，仅得数石，请厚斋走笔录之。是日甚寒，笔冻不能书。岩左有龙泉寺者，僧人假以炭炉，呵冻从事，亦甚乐事也”。此处记载，说清了奕赓游览孔水洞的时间、过程、体会。既有游览的艰辛，又有游览的乐趣，也反映出奕赓有文人的豁达、嗜好。

奕赓此次游览孔水洞，共计抄录碑文五方。其一为《唐开元石刻一方》，其二为《无年代石刻一方》，其三为《明万历年重修万佛禅林碑文》，其四为《明石刻一方》，其五为《本朝顺治间重修寺院碑文》。当时孔水洞“石刻鳞立”，奕赓为何只抄录这五方碑刻，不得而知。这五方碑刻，历经 200 多年的世事沧桑，有的早已不知何处；有的碑文在至今研究、记载孔水洞著述中还不曾见到。然奕赓抄录的石刻文字，却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 抄录的碑石情况

一是《唐开元石刻一方》，碑文为：

开元二十七年，岁在己卯春三月，府城西南有大房山孔水。其水也，地僻幽闲，石石华丽。云峰攒岭，宛度千龄，清泉引流，势将万古。耿介拔俗之士，度白云以方临，潇洒出尘之贤，干青天而直上，信知山水之灵矣。伏惟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纂承洪业，自开元率土晏清，廿七年矣。去开元廿三年，内供奉（缺四字）慎盈奉敕于在水投龙璧。暨廿四载，（缺五字）又奉敕于此投龙璧焉，于时有御史大夫南阳张公讳守圭为府主矣，监官功曹参军段玮，法师（缺五字）使（缺一字）坐李义远、平步风、向味虚、庞味道、杜（缺二字）、崇西升（缺一字）崇童子、（缺一字）延忠等三日三夜，登坛投告（缺一字）。夫陵谷推移，

百龄讵几？仆遂斐然书美，封山刊焉。词曰：

舟岭嵯峨，双峰迢迢。淥水涓涓，清泉滋滋。  
兰蕙凄凄，和风靡靡。百草开葩，众花吐蕊。  
刊龙璧之有功，度千龄兮无毁。

（缺三字）威仪张堪词

此碑为孔水洞早期石刻，记载了唐开元年间奉朝廷之命，往孔水洞中投金龙、玉璧求雨之事。此碑石在奕虞抄录碑文之后不久，被清道光年间的奕绘贝勒花十两银子买走。奕绘也为爱新觉罗氏皇家后裔，也有探幽索隐、吟诗作赋的雅兴。时奕绘在距孔水洞东八华里的大南峪营造地宫和别墅，曾多次到孔水洞游览访古，见到孔水洞的众多碑刻，爱不释怀，遂买通孔水洞万佛堂的僧人，将此碑买走，先运到大南峪，后又运回京城家中。

1981年，清理孔水洞水源，将洞中之水抽出部分后进行挖掘，曾出土七条金龙，被送往首都博物馆保存。对出土金龙考证结果，正是唐代开元年间求雨时投入的金龙。但至今没有挖掘出玉璧。

二是《无年代石刻一方》，碑文为：

乙酉闰月，雪后游房山龙泉寺，观水帘洞。  
晨兴北走三十里，小舆格磔石齿齿。  
昨来房山五月雪，万磧千峰玉争倚。  
樵苏未出狐兔潜，斫路行行我伊始。  
闭门耻学袁氏卧，蹶冰已补王生履。  
沙溪诘屈窍忽通，石梁凌兢仄且移。  
鸳鸯惊飞属玉避，颇惟前驱载弧矢。  
招提寂历唐时寺，大历残碑尚能纪。  
山椒离立见浮图，山下伏流出孔水。  
水帘古洞深莫测，雷电闻有蛟龙起。  
洞口奇书莫能辩，又言曾栖鬼谷子。  
海田岸谷知几迁，房山苍苍只如此。  
雪中之游勿勿嗤，明发驻车又城市。  
吴郡卢襄题，县丞任璋命工勒石。

此碑石落款为吴郡卢襄题。奕虞抄得此碑之后，对此碑年代进行了多次研究，从碑文开始的“乙酉年闰月雪后”开始进行考证，终于弄清了此碑为明代碑刻，并在《佳梦轩丛著》中记下了考证过程。“考之《钦定万年历》，顺治

二年乙酉闰六月，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闰四月，乾隆三十年乙酉闰二月，俱不应有雪。按《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明万历十三年乙酉，未言闰月。石星碑文言万历丁亥年乃十五年，去 酉仅二年。又嘉靖四年乙酉，闰十二月朔，日食。总之，此石为明刻无疑，且在万历丁亥重修以前。”由此可见奕虞的求学精神之强。

可惜的是，奕绘贝勒在买走《唐开元石刻》时，也一并将此碑买走，并运至京城家中。奕绘对此二碑偏爱有加，与其侧福晋、女诗人顾太清在买碑、运碑、把玩此二碑的过程中，多次赋诗作词。虽然此二碑现已不知身在何处，但在 1998 年 12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张璋先生编纂的《奕绘、顾太清诗词合集》“天游阁诗集卷三”和“明善堂文集卷十一”中，收入了奕绘、顾太清夫妇二人吟咏此二碑的诗词。

其一：《廿四，同太清联骑游石堂、孔水，得开元残碣一、吴郡卢襄诗碣一载归，而大历残碑已不复观矣，赋诗二首》。作者，奕绘。

南谷西盘低复低，梨花万树接幽溪。  
寒泉古洞飞仙鼠，大历残碑没壤泥。  
久坐浑忘身是客，再来安得路能迷。  
参差荇藻游人影，水碓声中白日西。  
渡水穿云连骑归，鸳鸯属玉背人飞。  
晚风十里梨花雨，快马同过独石矶。  
故旧渐看前辈少，登临肯使寸心违。  
卢襄诗与开元碣，许我相携出翠微。

其二：《廿四，同夫子联骑渡慈溪，游万佛堂，观孔水，得开元刻石一、吴郡卢襄刻诗一，遂以十金易于山僧载归，而大历碑已不复观矣》。作者，顾太清。

风雨杏花稀，残英没马蹄。  
裹粮探古迹，联辔渡慈溪。  
阴洞投龙璧，高碑失旧题。  
归途逐流水，荇藻碧萋萋。

此二首诗题目中的“廿四”，乃清道光十六年（公元 1836 年）二月二十四日。时奕绘、顾太清夫妇二人联骑从大南峪至孔水洞游览。

其三：《游孔水用吴郡卢襄石刻诗韵》。作者，顾太清。

溪去山楼凡七里，平坦不烦折屐齿。

下有泉源上石堂，万佛妙相参差倚。  
青苔亘古不见日，森森浓绿疑无始。  
龙泉古壁何年失，虎尾春冰岂可履。  
夕阳水鸟上渔梁，倒映山谷碧滩移。  
人生行乐须及时，花外光阴如去矢。  
开元残碑嵌绝壁，幸得卢襄刻诗纪。  
出山一路又看山，二水合流成漫水。  
马耳东风拂面香，鸳鸯属玉惊人起，  
归途借问今何时，梨花桃花才结子。  
渺渺春波万古闲，悠悠天地长如此。  
偕隐何辞挽鹿车，云水遨游胜朝市。  
其四：《唐碑用卢襄韵》。作者，奕绘。  
南谷之西约十里，两水相依若唇齿。  
就中孔水源更清，唐碣诗碑高下倚。  
开元已称古石堂，壁刻万佛迷所始。  
寒泉汨汨阴洞深，仙草灵芝谁敢履。  
却看彼岸不逾丈，略 危仄渔梁移。  
东风白日鸣丹蝠，正字千年画金矢。  
大历残碑落何处，于今但见卢襄纪。  
儿女何时毕婚嫁，瓢笠真堪老山水。  
东风晓日映晨妆，南谷仙人从定起。  
从好吾将去仲尼，斋物安能效庄子。  
孔水之游已一再，孔水之歌歌若此。  
家人好事买碑还，百里毡包入城市。

以上二诗，均以卢襄石碣中的诗韵而作，可看出奕绘、顾太清曾多次游览孔水洞，体现出二人深厚的文字素养，以及对孔水洞古迹的偏爱、对卢襄诗碣的偏爱。并且说明了开元碑与卢襄碣被带到京城。

三是《明万历间重修万佛禅林碑文》，碑文为：

重修云蒙山大历古迹万佛龙泉宝殿碑铭。

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工部尚书侍经筵东明石星撰。

万历丁亥冬，余承乏工曹，叨董寿官役，乃偕少司空曾公见台、李公进台，乞总理工程内官监东岗张公，往循大峪至房山云蒙岩，抵攻石之工地，献鐔环

秀，应接不穷。苍荡紫霏，互袭衣裾。冷泉萦回，声戛鸣球而击云林之奥。水帘、梅仙诸洞，隐映松栝，杳条森沉，悠然会心，真胜境也。观一废寺于岩之畔，衰榭多摧，庑宇芜没，诸善逝菩提垂之像，庄严特妙，类非世工所为。旁索断碑，志大历岁月，因知轍于唐也。寺之左有厂，盖侍仆而供举重者，张公暂憩驻其中，以余三人至，出壶榼相慰劳，因顾余而叹曰：昔能仁始至恒星之瑞，征于周鲁二庄。及白法东流，像设之饰亦胜于汉晋二明，古今异之。此寺昉于唐大历，今我皇明万历，若吾辈复之也，是亦唐明二历绍隆之也，不尤异哉！自唐迄今千异矣，而诸像者烽燧不能侵，霜露不能蚀，字发轮齿，俨然若新。涉世之久，鲜与为丽。吾辈咸以寿宫事至此而遇焉，爰图复之，以为圣天子万年祝，不亦善乎？余三人各捐俸若干金，张公复为请大司礼敬斋张公公是之，为大捐俸若干金佐其费。兴所已颓，树所未立，越岁工讫，竟成精蓝。自余三人行檀外，其费悉出司礼，不涉少府与七众秋豪，既落成，命余镌名贞石。夫释氏之教，世恒以异端斥焉。而自昔名儒大贤，往往笃好，彪炳载籍，不可胜纪，何也？余固未能悉曙其说，乃闻五时所陈小始其浅者也。然臻其浅之说，则因果历然，行虑起不敢不慎，切于书，称惠迪从逆之训也。臻其始之说，则我执自空，媿接万变，明觉不昧，同夫易称寂感之妙也。嗟乎！依仗妄作，由迷果于因，征迷之源，则源于我。是非之征，我之未涉，愚者浩然。及其既涉，智者颠冥，是故我厚而用六昧，我空而万德备。能空我者，立人之道其庶几乎！臻于小始，其效如是，况进于终、进于圆、进于最上一乘乎？使户进于是，尚有利于国哉！子诏谓有助吉儒，不诬也，奚独祝厘！司礼公洁廉慈爱，我所几空，殆有符于大雄氏之行；而东岗张公辈，类能宜其懿度，为内外倡。盖即寿宫诸役蒙德诸费从省，培国家无疆之祚，而今诸曹得籍乎以报成功，知者谓有所自于佛乘云。然则兹举也，讵直为观美哉！铭曰： 乃有林林，沉沦昏衢。能仁极之，五行是敷。

慈室斯崇，惠门斯辟。鸾音冀安，龙步生色。

树演苦空，鸟谈般若。有臻此域，畴非觉者。

昌我生道，永我寿龄。免仰寂光，何云杳冥？

此碑为明万历年间工部尚书石星撰文，记载自己在为皇家建筑办理石料时，来到孔水洞附近的石料工地，见孔水洞的古迹胜境“衰榭多摧、庑宇芜没”很是可惜，于是请宫中太监等捐资修缮。此次修缮，是孔水洞历史上的一次较大工程。今日孔水洞的规模和形制，正是此次修缮的基础。此碑文还说明当时的孔水洞附近，曾是皇家的重要石料工场。

明万历以后，孔水洞的古迹也有多次建设，清嘉庆年间，在洞前建造了两进院落的关帝庙，约有房屋 20 余间。日本侵华期间，在孔水洞之旁、关帝庙后殿墙边开凿了万盛煤矿井口。新中国成立后，京西矿务局在此建立了房山煤矿，孔水洞之水成了房山煤矿的生活、生产用水源，关帝庙成了职工食堂和办公地。不知何时，这方《明万历年重修万佛禅林碑文》刻石，已然失踪。值得庆幸的是，1988 年，房山煤矿扩建职工浴室，施工中挖出了这方石碑，并将其安设在关帝庙后院的西厢房廊下，重新立起。

四是《明石刻一方》，碑文为：

万佛堂随喜兼游孔水洞。

时人言有仙舟，冬见桃花流出，故云联结。

万佛堂空景甚幽，两山环翠即丹邱。

洞门不锁云常在，涧道无人水自流。

浪说仙舟时出没，却来人世度沉浮。

不知何处桃源胜，蚤向西风点渡头。

万历己未孟夏八日，邑尉携李宗希诚勒石，以识一时之胜，倘诸君子赐览，望为俯原。

此碑文中“冬见桃花流出”，在孔水洞的众多碑刻中多有记载，当地人还传说孔水洞内别有洞天，是世外桃源。表达了古今之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吸引了许多人进入孔水洞中探秘。笔者曾于七十年代一次天气大旱之时，进入洞内探险。洞为喀斯特溶洞，洞中有众多深潭，未见其底。

五是《本朝顺治年间重修寺院碑文》，碑文为：

### 重修万佛堂记

房邑之北二十里许有孔水洞，其流涓涓不息，其源深邃不可测。考邑志（缺一字），永和中有人秉火浮舟探之，隐隐闻作乐声，惧而返。冬月忽见桃花浮出水面，（缺一字）知其为世外仙境也。洞之上构殿三楹，名为万佛堂，规模虽非弘厂，然背山面水，古树郁秀，亦一胜迹也。奈历时既久，兵焚之余，不无芜圯。有善士冯君讳进科者，京都人也，发重修之愿，慨然捐资百余金以为善缘领袖，一时闻风响慕者各矢善念，共襄厥事，遂往往戊戌岁仲春兴工，孟夏告成。其佛像庄严，金碧灿烂。视昔为尤盛焉。予受命兹土，公余得一游览，因谬为数语以记其事，凡以使后之游斯地者知重修之功不减于创始云。

大清顺治岁在己亥孟夏吉日，知房山县事（缺一字）配坤撰。

此碑现嵌于孔水洞的万佛堂后崖壁。奕赓之《佳梦轩丛著》书中，不知是当时抄录粗心，还是后人编校此书时失误，缺少碑文中一行文字，即“洞之上构殿三楹，名为万佛堂，规模虽非弘厂，然背山面水，古树郁秀，亦一胜迹也。”作者曾将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孔水洞抄录的此碑文与《佳梦轩丛著》书中的此碑文多次校对，又再次到孔水洞实地考察，才不揣昌昧，将此段话补入《本朝顺治年间重修孔水洞碑文》。

### 奕赓对房山其他景物的记述

奕赓的《佳梦轩丛著》一书，不但抄录有孔水洞的碑刻，还有对房山其他景物的记载。如对明末刘侗、于奕正编著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中关于云水洞的错误记载提出意见。《帝京景物略》一书将上方山的云水洞与孔水洞混为一谈，认为是同一洞穴。奕赓在《佳梦轩丛著》中澄清为，“余先祖考园寝皆在孔水洞之北二里许，余亲游古迹故敢析刘侗之误”。又如，“《日下旧闻》曰，良乡县南四十里有琉璃河，自房山县龙泉峪流至霸州入拒马河。又胡良河，自房山经涿州入。此河旧有桥，长数十丈，桥畔倚一铁杆，长数十尺，盖镇压之物。俗谓王彦章所遗铁篙，谬也云云。此龙泉峪即孔水洞也，刘侗未尝见此”。

奕赓的记载，注重亲身经历，没有去过的地方，在记载上十分谨慎。如记房山县的黑龙关，“其刘侗所游之云水洞，乃黑龙潭之古迹，在孔水洞西南，相距十余里，土人屡言之。余未尝身到，故不敢言，恐蹈刘侗之前辙也”。

奕赓《佳梦轩丛著》中的文字运用既老辣而又生动恢谐。如在读《北游纪方》中的按语为，“房山古迹甚多，如朝阳洞、背阴洞等俱属附会耳。闻可也，脱一目见，未有不发笑者。”又如游王禅洞时，听到有人将穿清朝服装的神像说成是“王敖老爷”时，“闻之不觉大笑，几乎坠崖”。“坠崖”二字，既有笑的成分，还会让人思索王禅洞的地势险峻、旅游的艰辛。都体现了奕赓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文字功力和作为文人的不羁与操守。

# 云蒙山下王禅洞

潘惠楼

云蒙山为大房山分支，位于河北镇大石河南岸的北半壁店村后，与磁家务村隔河相望。云蒙山海拔高度 700 米，山虽不太高，但从平原进入大石河谷，此山巍然而起，气势相当雄混。加之山上经常云缭雾绕，更增加神秘气氛。云蒙山北麓，为奥陶纪石灰岩地貌，分布有众多喀斯特溶洞，王禅洞即为其中之一。

王禅洞在北半壁店村东一华里的山崖处，是一组座东朝西的岩洞群，岩洞约有十余个，散落于百米长的山崖中间。洞最深者约 20 余米，最高者约 5 米，最宽者约 6 米。其中有三个洞面积均可达五六十平方米，最小的洞穴仅容一人。由于王禅洞面积较大，洞前曾有庙宇，所以将王禅洞作为主洞，此岩洞群以王禅洞命名。

王禅洞又名王仙洞，当地传说战国时期的军事家鬼谷子王禅在此修行，传道授业，培养出苏秦、张仪、孙臧、庞涓、毛遂、尉繚等一批军事家、纵横家，在战国时期风云际会。又传说孙臧、庞涓二人学成出师之后，在此斗法，并到房山区北部的马安山上修炼，马安山上还存有孙臧、庞涓修炼的洞穴。尽管这些传说在大石河地区广为流传，但史书记载王禅的修行之地是在河南省淇县的云蒙山，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也对孙臧、庞涓在马安山修行的传说进行了否定。

王禅洞前有庙宇，名为庆寿庵。据洞前耸立的清嘉庆九年（1804）《王仙洞新建庆寿庵记》石碑所载，王禅洞、庆寿庵之名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已有之。此碑为汉白玉石质，碑额雕盘龙，碑座及碑身计高 2.5 米，碑身宽 0.8 米，碑身厚 0.3 米，碑文为清嘉庆年房山县知事黎德符所撰，记载了重新修建王禅洞庆寿庵的经过。碑文中有：嘉庆五年（公元 1800 年），黎德符到磁家务巡检司办公，听说“署南三里许有王仙洞，邑乘所谓王禅阴居之地也。旧有庙宇，风雨倾颓，无有过而问者。岁三日余，梦一道人，仪容端严。问其姓氏，王仙也，醒而异之。厥明乘往视，积雪渐消，流泉鸣唱，□藤而□，得一洞内有仙象（像），如梦所见。复登极顶，得大钟，审视知万历间僧人所铸，题曰“庆寿庵。”于是，慨

然有兴起之思，组织当地民众、村庄、煤窑、商号“圮者起之，坏者修之，阙者补之，咸不日而就。”并“勒石以记其缘起”。此次新建，在“洞之前建殿，以奉关圣帝，于□左右为僧徒栖止之所。其东北数武复有二洞，以奉大士及诸神。建亭殿前，以悬旧钟，即以庆寿名其庵，存古迹也”。正是黎德符之倡修，碑文之宣传，王禅在此修炼之说越传越广，庆寿庵的修建规模越来越大。至民国初年，王禅洞和庆寿庵已成为大石河河套沟一处颇有影响的道教圣地。

王禅洞的神台上塑有鬼谷子王禅仙像。洞前为庆寿庵正院。正殿三间，供奉关公。两厢为禅房。院中植有刺玫瑰和高大的银杏树。山门西开，门外是数丈高的石墙，有石阶铺砌的曲折山路通往崖下。在南厢房与正殿的夹道上，有一个门楼为便门，门外是一跨院，院中有一石碾，有一房间。房间为供奉八仙之一吕洞宾的吕祖庙。庙后有一洞名为吕祖洞。在庆寿庵正院院外北部稍下，亦有一洞，称韦驮洞，洞前房屋内供奉韦驮塑像。从正院往南上108级台阶，有一大洞，洞内供奉送子娘娘。在正院周围的其他几个洞中，有的也供有神像。由于庆寿庵建在山崖中间的隙地上，前临深谷，远看十分壮观。

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是王禅洞的庙会日，进香朝拜的，祈神求医的，求子还愿的，游乐观光的，人头攒动。因王禅洞与万佛堂、孔水洞相距不足二华里，许多到万佛堂、孔水洞朝拜游览的人也就近去王禅洞，许多去王禅洞赶庙会的人也去万佛堂、孔水洞朝拜游览。故四月十八日王禅洞庙会之时，通往王禅洞的山路上，人流络绎，非常热闹。两地之间邻近王禅洞的山路，开在崖壁之上，曾屡屡因人多拥挤发生摔伤游人事件，庆寿庵还派出僧人维持交通秩序。

民国年间，王禅洞道士的生活除靠施舍外，还耕种庙前山沟中的土地。半壁店、磁家务两村的过河桥梁和部分道路也由王禅洞的道士维护并收取过桥费、过路费。旧时，磁家务是大石河河套沟的运煤孔道，故僧人们从过桥的运煤驮队中收费相当可观。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平西后，人民流离失所，百业凋零，延续多年的庙会也戛然而止，王禅洞的道士只好四散谋生。悬挂在王禅洞的万历年大钟，也被军队取走，运往山里兵工厂，做了炸弹。临近解放时，在此出家的道士还只有磁家务村的刘顺一人。

王禅洞及其附近，风景很美。洞后山崖上，古松柏在石壁上盘根错节，虬枝横陈，四季常青。崖顶有平地，相当宽敞，当地人称之为学艺台。传说是当年王禅教孙膑和庞涓学艺的地方，至今当地也有很多居民爱到此处锻炼身体。王禅洞之西南的山沟中，有一处清泉，是僧人们取水之源。此泉四时不绝，远观如白练飞下。清嘉、道年间的宫廷侍卫、康熙皇帝之曾孙奕赓有《佳梦轩丛

著》一书存世，记载了其到磁家务的庄亲王墓地谒祖归来，曾到王禅洞游览的过程。形容此泉及王禅洞，“自万佛堂左转而上至山巅有泉焉，土筑为井，其水常溢，远观之，瀑布一条如白练，亦奇观也。井之旁下，半山之坳有石窠，可容数人，土人因窠构屋筑像，以道士守之，名曰王禅洞。屋檐下侍立一像，长二尺许，本朝冠服，红缨暖帽，蓝袍青褂，白面微须，令人不解何神。询及土人，则曰‘王敖老爷’，闻之不觉大笑，几乎坠崖”。奕赓记载诙谐幽默，不但否认了王禅洞之神像并非王禅，而且记载了神像为清朝人装束。可惜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破除迷信，王禅洞无人管理，房倒屋塌，逐渐成为残垣断壁。山上的清泉，水量也大为减少，平时已不能溢出，只有到了雨季，才偶而溢出成白练流下。清道光年间，奕绘贝勒在王禅洞东约九华里的大南峪营造了地宫和别墅，奕绘与其侧福晋、当时的著名女诗词作者顾太清均曾来此游览。在1998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奕绘、顾太清诗词合集》中，还收有他们夫妇二人吟咏王禅洞及其泉水的诗两首。其中，顾太清的诗名为《登王禅洞望宝泉》，诗为：

传有神仙窟，清晨特一游。  
桃花迷洞口，雪瀑挂山头。  
磴道生春草，高峰豁远眸。  
疏钟风外送，心为白云留。

奕绘的诗名为《探王仙洞望宝泉》，诗为：

龙泉已至清，宝泉更清冽。  
玲珑三洞口，上有太古雪。  
道人九十余，了无长生诀。  
但饮此泉水，满面桃花色。  
下望桃杏林，红霞半空列。  
春风吹宾丝，此乐超言说。

“文革”时期，半壁店村的一位生产队长，命人将王禅洞前的百年古银杏树放倒，准备运回村里使用，被人告知有关部门，受到批评，被免了队长职务。这棵被放倒的树约有两成人粗细、几丈长度，没人敢处理，一直在王禅洞前的草丛中躺了近二十年，后不知去向。

上世纪80年代，半壁店村民在王禅洞附近开山采石烧灰，将王禅洞西部山崖上的几个洞和建筑遗址清除，王禅洞前的《王仙洞新修庆寿庵记》石碑也被放炮震倒。2001年，半壁店村重新清理了王禅洞遗址，将石碑重新立起加

固。

值得庆幸的是，《王仙洞新修庆寿庵记》碑石字迹清楚，基本完好。碑石中还记载了大石河河套沟及其附近的众多村庄、民众、商号、煤窑为新建王禅洞庆寿庵的捐资数额，为研究清嘉庆年间当地的经济发展、姓氏分布、村庄名称等情况提供了信息。其中，当时的煤窑就记有官窑及地方开办的风口槽窑、和顺窑、通盛窑、桃树窑、三合槽窑、碾子窑、白岭窑、杏树窑、天成窑、桃树窑（第二个）、大槽窑、吉庆窑、核桃树窑、子儿窑、天顺窑、煤垆峪窑等十余个。碑文的撰写者房山知事黎德符，在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房山区志》中“元、明、清房山县县尹、知县序列沿革表”内无载，碑可补此志书之不足。碑石中记载为修庙捐资的人名、厂名、店名之多，在河套沟可谓少见。

# 高鹤年游上方山和云居寺

赵思敬

民国以来，蒋维乔、李书华、陈兴亚、普意雅、尹赞勋等人探询上方山和云居寺的游记，令人大开眼界。其实，还有一位居士不但游览了上方山云水洞，而且游览了石经山云居寺，这个人就是高鹤年。

高鹤年，名恒松，号云溪，江苏兴化大丰市刘庄镇人。清同治十一年（1872）生，1962年病逝于苏州，享年91岁。其骨灰葬于穹窿山西南方山中。为近代佛教居士，佛教学者。1956年，高鹤年所著《名山游访记》增订本出版，章太炎夫人汤国黎为之作序。

《名山游访记》共七卷，加“增补”部分计52篇。是高鹤年行脚的真实纪录。这些参访记录于1912年首先在上海《佛学丛报》发表，其引言说：“鹤年居士，早岁发心，频年参访，足迹遍天下，兹以云水所经，著为游访之记。”其中卷四有《北京上方山涿州白带山各游记》，为保存史料，现全录如下：

民三甲寅春，抵北京，旧地重游。寓砖塔胡同关帝庙青一上人处。青老云：近来学者，朝则信而行，暮则懈而止，如是行道，安能有成？世人不知无常老病，不与人期。石火电光，刹那变灭，光阴迅速，转息即是来生。泉路茫茫，三途易堕，竟不赶紧修持。可叹已极。

三月初六日，往上方山，正阳门外乘车，四十里琉璃河下车，十五里上方山。房山县属，孤山口五里，中院村五里。接待庵当家引导上山，五里峪口，风景极佳。云梯庵左有飞瀑挂壁。至兜率寺，住持遍如师谈及山中道风衰落，不胜感慨。

初七日，二师同往云水洞，洞边有庵。用火把引进，洞门甚小，入内复大。洞中有百零八景，天下奇观也。有卧虎山、芍药花儿山、枣儿栗子山、菊花山、石鼓、石钟、石观音菩萨坐莲台、石塔、十八罗汉像、八仙过海像。第三重关，翻身入内，空穴极大。上看



高鹤年像

半阴半晴，八宝莲池等景，种种奇观。内有小洞，深不可测，阴气难受，即出洞，饭毕回寺。

初八日，下午往华严洞，即开山华严祖师。唐宋时高人最多，今住一僧，名一山。师谈及世态无常，若在梦中，利藪名场，埋没俊杰，爱河苦海，丧尽英雄。谁能学铁汉炼金钢，看破虚花梦一场。一师道念坚固，戒律精严，老道友也。

初九日，往一斗泉，住羽师二人。经旱龙潭游吕祖阁，天井有翠柏一株，围近丈许，高插云表。昔日住此月余，今阒无人矣。古有七十二庵，今圯塌大半，皆无人住。山中柏树满谷，上列奇峰，若飞若走，必须微细观看，方见其妙。

廿四日，下山，仍出孤山口，沿麓南行，十八里西域寺，涿州属。云居禅林，四面山场，周约二十余里，形同象王驮宝，气象伟大。古柏夹道，苍翠无际。进天王殿，两大白皮松，外有翠竹香柏等。再上为毗卢殿、大雄殿、枯木堂、般若堂、药师殿、弥陀殿、五观堂、念佛堂、大悲坛、藏经阁、说法台、旃檀殿。有赖公爷护法像，中有黄金条树，蟠成坐椅，御碑亭左右，亦有树根蟠椅。院后上行里许，开山琬师塔院，里许水头，有泉不大，汹汹涌出，故名曰：水头村。

廿六早，寺前过河，五里上山，小西天，经古接待庵，荒地一片，有明碑数块。再上有水井，响声淙淙，幽入云表。祖师殿有二石洞，洞内大藏经石板满洞，洞门石窗隔断，可见不可入。又上静室三间，在家道人居。西去石洞二处，亦是藏经石板，并有董其昌书“宝藏”二字。左有石刻《金刚经》，右有大洞，洞中供菩萨像。四石柱，每柱八面刻千佛像。四壁石刻《法华经》板，西有唐僧洞，再西又有二石洞，洞中藏有经板，上有古大殿基，今则瓦石茂草而已。殿后有石窟，据云深不可测，每有好事者下去不复返云云。右有九层石浮屠，上有功德僧惠权幽州府智等字迹，大半模糊矣。西南有字曰云居石经，旁有石碑一块，不见一字，不知何代建立。山顶石浮屠后，有大唐开元十八年，金仙某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馀卷，充幽州府范阳县为石经本。下有碑一块，字亦不明。后有游人诗，元和四年，是后补刻。洞前古碑林立，考自隋静琬禅师，创刊石经，至元至正时，有高丽僧名慧月，朝五台，来游。见板块萧条，经文残缺，坚志发愿，募缘续刊。明《憨山梦游集》云：隋大业中，幽州智泉寺，沙门净琬尊者，恐三灾坏劫，虑大法湮没，欲令佛种不断，乃创刻石藏经板，封于涿州之西白带山。山有七洞，洞洞皆满。由大业至唐贞观十三年，愿未满而化。门人导公继焉，后仪公、暹公、法公继焉，而经亦未

完。历唐及宋，代不乏人。至有元至正间，高丽沙门慧月，尚未卒业，其事具载云居各碑。按自石晋割燕云十六州归契丹，此地迄未入宋之版图，故另有碑记云：契丹圣宗，留心释典，乃委瑜伽大师可玄，补刊释经，迨及兴宗重熙间，续携《大般若经》。自圣宗太平七年，至兴宗清宁三年，《大宝积经》告成云云，足见古之法师卫道之心，历久不磨。传至今日，为文化中最堪宝贵者。

廿九日，午后下山，原路经东塔院，立于群山之中，万松之间，院上五塔雄伟气壮，院外众塔林立。

十月一日，由青龙桥直上压经塔七级浮图，上书辽幽州府天庆七年，穿地为穴，道宗皇帝刊经板八十余块，通理法师刻四千余小板，藏入其中。由寺一匝而东，适实然师瑞慈上人迎来，同往舍利塔。四角四小石塔，乃大唐太极元年、景云二年，又开元十五年。又东园内有元至元二年碑，山门西大碑字迹不明，复入方丈院、千佛殿，有铜佛千尊，各处复游，昔日与妙师来游，未及详考，今则了然矣。

记有作缀，故此日未著某月。

高鹤年游房山的时间是民国三年，即1914年，三月初六为4月1日，至5月11日考察压经塔，前后在房山寻访了41天之久。作者从前门乘火车到琉璃河下车，然后应该改换马车到接待庵。第二天，即初七日便在二位师父的陪同下入云水洞参观。所说“洞边有庵”即指云水洞洞口有供奉佛像的建筑。从1915年拍摄的云水洞洞口照片看，洞口为拱形，上覆花瓦墙装饰，很像一个农家小院，花盆、条凳、简易桌子、晾晒衣物的绳子，还有一些石板，杂乱地堆放在院子里。加上院内栽种的竹子等杂树，把这个庵弄得乱七八糟。洞内种种奇观，一一览尽。唯有一小洞，深不可测，且“阴气难受”。此洞在何处，现已不知。

初八日高鹤年游华严洞，与此时在洞中居住的一山大师谈及世态，两人感慨尤深。初九日到一斗泉，《上方山志》说：“一斗泉，在象王峰腰右，华严开山驱龙索水，仅得一斗笠，泻而成泉，故曰一斗。”据说，此泉自唐代以来，一直未干，但在2000年时，已无水。从实地勘察并参照1905年拍摄的一斗泉照片，高鹤年到达时，一斗泉寺院还有僧人居住。并在自己“昔日住此月余”的吕祖阁盘桓。这里的“昔日”，指1913年4月，查《名山游访记》卷二《天津北京游访略记》，起首有“癸卯四月”，文后为“游戒台诸寺、小西天、上方山云水洞”记载，同行者有“法舟”和“大禅”二师。在吕祖阁住14日，游记断档，想来日间或许又依次与旧友相聚，免不了细细品游七十二庵，可惜只

留下“古有七十二庵，今圯塌大半，皆无人住”的感叹语。接下来“山中柏树满谷，上列奇峰，若飞若走，必须微细观看，方见其妙”这几行字，说明高鹤年的确饱览了大自然美景，奔走于幽峰奇谷之间，领略上方山的自然造化。直到24日下山，高鹤年在上方山只有3天日记。

从4月24日到5月11日，高鹤年开始游览云居寺，未进寺院，已见“古柏夹道，苍翠无际”。进天王殿后，又见“两大白皮松，外有翠竹香柏等”。这些记载与现存照片对照，更有利于对云居寺植被的了解。在石经山考察4天，高鹤年于29日午饭后下山，登舍利塔，即今之北塔，并考四角唐塔建造年代。又观赏千佛殿“铜佛千尊”。因“昔日与妙师来游，未及详考”，所以才有今日详查后，一目了然的欣喜之情。

从高鹤年文后“记有作缀，故此日未著某月”的提示看，作者因为贪于游览，才疏于笔墨记录。不过，使我们得见房山风物的百年旧貌，高鹤年已经无愧于后人了。除《名山游访记》，高鹤年还有《救灾征信录》、《印光大师六十年苦行记》、《中山归来记》等著作行世。

# 话说磁家务

潘惠楼

磁家务村，位于房山区河北镇最东面，是河北镇人口最多、耕地面积最多的村庄，距镇政府约有 5 公里。东与青龙湖镇相邻，南与万佛堂村、北半壁店村接壤。村前，大石河汨汨流淌，两条柏油公路夹河而上。村后，磁家务至陈家坟的运煤铁路时时有火车通过。

## 村名由来

磁家务村村名之“磁”，来源于瓷器之“瓷”，而非磁石之“磁”。“磁”与“瓷”，是两种不同的物体。古时，“瓷”字与“磁”字，有时通用。《辞海》中的“磁”字词条中记有“同瓷。如瓷器，亦写作‘磁器’”。北京市城区有地名曰磁器口，据考证，是旧时出卖瓷器的市场。磁家务村在历史上从未产磁石，而考古挖掘、调查却证实，该村曾是瓷器的生产工场。

磁家务村的瓷器生产工场，地点应在村西北，半壁山下的东南。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村民们在此地种地，曾发现烧制瓷器用的坩锅。1965 年，京西矿务局修建磁家务至陈家坟的运煤铁路，在开挖磁家务村后的铁路路基中，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又发现有烧瓷用的窑具、坩锅。还有很多坩锅被当做石块垒墙。

1981 年，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组织人员在磁家务村调查，村里的老人讲，村子后面有块地方，叫撬密场，古代曾在此冶炼金银，附近存在大量的轱辘石。轱辘石长约 30 厘米，粗约近 10 厘米，当地人称其为轱辘钱儿。村里人还带领考察人员到村后的撬密场，发现地边确实存有坩锅，有的坩锅中还装有釉料。通过从村中收集到的瓷片和瓷器分析，认为磁家务村的撬密场所在地，应是一处古代烧制陶瓷的工场，轱辘钱儿应是烧制瓷器时用的支钉，磁窑遗址的面积近两千平方米。再将磁家务村收集的瓷片、窑具、釉料等器物与门头沟区龙泉雾辽代磁窑器物对比，与其他地区出土的有关瓷器等物品

对比，又进一步认为，磁家务村的瓷窑烧造可追溯至辽金时期，烧造时间应为辽、金、元三个朝代。2001年，村民在撬窑场所在地建房，挖地基时，还发现有窑坑等遗迹。

门头沟区的龙泉雾地区蕴藏有较丰富的瓷土（坩子土，也称高岭土），有比较丰富的煤炭等燃料资源，永定河从村边流过，其地形与磁家务极其相似，其物产也基本与磁家务相同，都具备烧制瓷器的物质基础。两地都在京西，且相距不远，烧制瓷器的选址和技术势必进行交流和相互影响，两地都是北京地区发现较早、规模较大的烧制瓷器遗址。

磁家务村村名之“务”，有多种说法。可解释为瓷器的制作，或从事瓷器的工作。《辞海》中还有一种释义为“宋代官设贸易机关和场所。如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根据这种释义，磁家务，又可以引申为制作磁器的场所。还有人认为，务，是古代的收税机构，今日被称为“税务”。又有人认为，务，是古代的一种管理机构。如石炭务，是元代管理煤炭的机构；河务，是管理水上运输的机构。据此，磁家务可以解释为，朝廷或官家在此地设立的收税机构，或设立的管理烧制瓷器的工作机构。

有意思的是，与磁家务同时代烧瓷的门头沟区龙泉雾村，在明代万历年间成书的《宛署杂记》中，被称为务里村。只是到了清代，该村不再烧瓷之后，才改名为龙泉雾村名。务里村之“务”，也存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是烧瓷的工作，有的认为烧瓷的场所，有的认为是瓷器贸易过程中的收税机构，有的认为是烧制瓷器的管理机构。

还有人大胆提出一种意见，门头沟地区的务里村，旁邻永定河；房山区的磁家务，旁邻大石河。古时，这两条河的水量都很大，都曾有过行船。务里村和磁家务村，都应有码头，设有船坞，以船运输当地生产的大量瓷器。务里之务，磁家务之务，是否与船坞有关，是否船坞之坞的演变，也未可知。

虽是对“务”的释义众说纷纭，并提出船坞之坞的说法，但大家一致的看法是，无论是门头沟区的龙泉雾村，还是房山区的磁家务村，村名由来，都与烧瓷有关，都得名于烧瓷。在磁家务村当地，很多人在讲到磁家务时，并不说磁家务，而是说成磁器务或磁务。以“家”字命名的村庄，一般前边都冠以姓氏，如张家庄、陈家台等。当地历史至今，并没有发现以磁为姓者。应是磁器务之传播过程中的文字走样，久之，约定俗成，成为磁家务。磁家务地区，辽金时期已有烧瓷，那磁家务之村，至少应有上千年历史了。

## 磁家务村的巡检司

磁家务村地处大石河的出山口，为通往房山北部山区的咽喉要隘。

清咸丰年高骧云撰修的《房山志料》载，磁家务为西山运煤孔道。旧时，村中设有巡检司。巡检司，是县衙的派出机构，始设于元代。《元史·百官志》记：“东关厢巡检司秩从九品，巡检三品，司吏一员，掌捕盗贼奸宄事，至元二十一年（1284）置。”由此可知，巡检司是在县衙下设置的负责缉捕盗贼、处理奸宄之事的九品小官。明清，巡检司沿续设置。《明史·职官》记：“巡检司、巡检、副巡检，俱从九品，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凡在外各府州县关津要害处俱设，俾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清史稿·官职》记：“巡检司巡检，从九品，掌捕盗贼，诘奸宄，凡州县关津险要则置。”

磁家务的巡检司何时设置的呢？应为明代。据民国十七年（1928）《房山县志》，元代以前没有巡检的记载，明代职官中始设有巡检。在书中的“明代巡检表”栏中，记有巡检8人，分别为孙修业、张治、侯封、蔡孝先、王润、杨锐、姜梦兆、王梦贤。书中还有“清代官吏中，设有巡检书吏一”。

“清代巡检表”中，记有巡检37人，分别为侯凤鸣、刘名世、全正纲、陈言、孙复美、陆兰、郑维、戴百合、马霖、李尚有、岳金龄、邹观文、葛庆霖、初效骞、窦浩然、沈士彬、洪恩福、潘永惠、汪铨江、张大受、邹毓坪、王煜申、杜友仁、谢顺保、沈德昌、马维霖、韩成栋、王佑、赵康、王锦章、张庶豫、薛连城、史桂淋、郑汝霖、邹鸿熙、孙寿昌、王仔清。其中孙寿昌上任时为宣统三年闰六月七日，王仔清上任时间为民国二年正月二日，任职时间已进入民国时期。明清时期，还曾根据需要，多次裁革、增加巡检司人员。清康熙三年《房山县志》记：“顺治十八年，裁革磁家务巡检员。”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廷实施新政，磁家务巡检司改为警察分所，民国十六年，磁家务警察分所撤销。

清代，磁家务的巡检司司址设在村中十字街西部路北，为两进院落，座北朝南。临街建有大门楼，石头门墩。门口阔约3米，两扇大门上绘有门神。门外两侧院墙呈“八”字形。大门外设石砌影壁，长约6米，高约2.5米。第一进院落内正中是大堂3间，大堂东西各有耳房1间，大堂左右各有东西厢房3间。大堂中间为通往后院的过庭。过庭北亦有影壁，长约2米，高约2.3米。后院有北房5间，北房前东西各有房屋1间，设有关押人员的班房。中华民国成立后，房山设五区，其中四区驻地在磁家务村，辖坨里、北车营、漫水河、檀木港、河南、杏园等32村，办公地点设在巡检司的院内。1928年，院内设立贫民学堂。

1947年土地改革时，原巡检司的前院分给孙、宋、云姓人家，后院分给王姓人家。

原巡检司院内还存有审讯人犯用的“杖石”一块。石为八角形汉白玉石，中凸边落，直径0.6米，高约0.5米。审讯人犯时，迫其趴在石上，以板杖臀，或迫其坐于石上，以板击手。

巡检司大门临街处，有一通卧地石碑，碑身、碑座俱在。碑身長2米，宽0.8米。碑额厚0.22米，雕海水江牙，篆书“德政碑记”。碑文题目为《房山县磁家务巡司厅马公德政碑记》，碑文已漫患不清，断续记有文字：

马公讳锦，字.....文者，河南开封道.....华族，不乏名.....国学者，授批判即用引见，命往直隶试用。.....上宪以公为人谨慎，办事.....，补房山邑巡司职。乾隆庚申年七月初到任，迄今四载。秉心.....，.....革除陋规，洁清自募，为国则夙夜匪懈，为民则朝夕不遑。.....上谕十六条，并宣讲律，务期文老.....，帅重自爱，.....地.....修，.....劝其善，惩其恶，欲奸匪屏息，百姓.....，.....未断，不惑于尔，.....不淆于是非.....。民之被德感颂，宜于流芳后世，.....于是数十村.....公谦，凿山取石，勒文志美。大清乾隆捌年癸亥年冬月。

这是一篇记载清乾隆年间磁家务巡检马锦的德政碑记，然从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清代巡检表”中，并未记载巡检马锦之名，此碑文可补《县志》记载不足。

磁家务的巡检司，主要职责是维持房山县西北部70余个村庄的地方治安。作为县衙的派出机构，巡检司对地方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有时也代表官府参与其中。如磁家务地区的几次庙宇修建或重修活动，巡检司都积极参加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清嘉庆九年，磁家务地区新建王禅洞的庆寿庵，就由当时的房山县知县黎德符撰写碑文，由磁家务巡检司巡检李芳书丹。其中，捐资最多的是黎德符和李芳，黎德符捐资三十两，李芳捐资五两，而其他上百个商号、店铺、村庄、个人，捐资没有超过一两的。《王仙洞新建庆寿庵碑记》中，镌有巡检李芳姓名与职务，而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清代巡检表”中，也无记载，此碑文也可补《县志》记载不足。

巡检司的巡检，长驻县衙之外，人手不多，经费有限，而事务纷繁，非常辛苦。知县有时检查巡检司工作，对巡检们也多以鼓励。在乾隆四十一年《大房记略》书中，记有当时的房山知县张世法来磁家务巡检司时写的诗，就有对磁家务巡检的鼓励与开导。诗题目为《赠别署磁务司郭子元璐叠依来韵二首》：

参军岂叹出无车，醉倚松哦且自如。  
鸟聚石窝编户处，驼鸣山下放衙初。  
风尘久溷宁辞粟，习气难除尚爱书。  
未尽上林枝可借，近郊鸾凤有巢居。

我亦行春置窗车，官情民意两相知。  
山窑事业成豳俗，石板人家似太初。  
岂必莺花逃拙史，何尝刀笔碍名书，  
西曹习簿今辞去，静听槐音闭阁居。

此诗记载了磁家务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行业。可以看出，当时的采掘山窑挖煤和开凿石板业在此地已成规模。

巡检司的巡检，由官府委任。封建社会做官，一般不允许在本籍，磁家务的巡检，籍贯也都不在本地。长期在外为官，有的巡检就把家属接来，一起生活。清代同治年间磁家务巡检窦浩然，在女儿去世之后，窦浩然将其埋葬在磁家务的村后。

### 村中庙宇

历史上的磁家务村地域很大，东可至漫水河村界，南可至羊耳峪村、南观村、半壁店村的村界，西可至河东村、东庄子村的村界，北可至北车营村界。民国以前，万佛堂村、三福村等地曾是磁家务村所辖的自然村。在隔大石河相望的万佛堂附近，有遐迩闻名的孔水洞、万佛堂、关帝庙及王禅洞、庆寿庵、百家寺等古迹。在三福村的干河附近，有水月庵和上、下朝阳洞及其庙宇。在三福村的煤岭附近，有东庵、西庵、南庵、北庵、海庵等庙宇。在现在的磁家务村中还有龙王庙、娘娘庙、关帝庙、五道庙，在磁家务的半壁山附近，还有背阴洞及其庙宇、正觉洞及其庙宇、石佛庵等古迹。

龙王庙，座落于半壁山下的大石河边，因位于村西，也被称为西庙，为一个三合院落。正殿三间，左右各有耳房一间，东西各有厢房三间。庙中曾供奉龙王、雷公、电母、青苗等神像，是旧时村中天旱求雨的场所。求雨时，村民头戴柳条帽，到庙中进香，然后抬着龙王神像，上罩柳枝，穿街而过，民众以水泼龙王。上世纪中期，用龙王庙的房屋，先后办过养猪厂、兽医站、饲养房。1999年龙王庙被烧毁，2001年村庄改造时，将庙拆除。

娘娘庙，位于磁家务村东街北。座北朝南，为四合院落，占地 100 多平方米。正中为过庭式双层门楼，内通道左右为一丈余高的哼、哈二将塑像。院内有大殿三间及耳房、禅房等。殿前建正方形月台，置青石贡桌。殿内供奉娘娘。清代，娘娘庙是村后庄亲王坟墓守墓人和后人祭祖的服务场所。也有人说，娘娘庙是用建第二位庄亲王博果铎坟墓后的石料建成的。

民国初年，村中在此设立女子小学。1946 年，国民政府房山县保安队拆除庄亲王坟莹石料，在娘娘庙建岗楼。当年 7 月，解放军攻打岗楼，在战斗中，娘娘庙受损，后部分建筑被拆。新中国成立后，利用娘娘庙遗址和留存建筑，建立了小学校。

关帝庙，也在磁家务村东街北。座北朝南，与娘娘庙紧邻，也为四合院式建筑。庙内有火道与娘娘庙相通。关帝庙临街处为汉白玉拱券式门口，院落内正殿三间，左右为东西禅房各三间。正殿内供关帝神像，关帝两侧，分别为关平和周仓塑像，还塑有关公的赤兔马和关平的白龙驹。民国初年，此庙曾开义学，后改为初等小学校。1946 年，解放军攻打庙内的国民政府房山县保安队的岗楼，大殿被烧毁。新中国成立后，此庙先后当做学校和生产队队部、库房。80 年代中期，扩建小学校，将关帝庙和娘娘庙所遗房屋拆除。

背阴洞及其庙宇，座落在半壁山北的半山腰。洞口北开，洞内终年不见阳光，故名背阴洞。洞口约宽 5 米，高 2.5 米。洞内宽约 6 米，最高约 5 米。洞内还有小洞，计洞深约 30 多米。洞口上方镶嵌汉白玉石匾，上阴刻楷书“背阴洞”三个大字，落款小字“大清乾隆八年（1743）”。洞前台地，建有庙宇。地基墙和院墙连在一起，拔地而上，巍然高耸，十分壮观。墙高约 20 米，环绕逶迤 40 余米，连接半壁山的峭壁，使庙宇的院落十分严谨。

院北为三间大殿，曾供奉关帝。大殿左右，有东西禅房。殿西为钟楼，曾悬有一口高约 1.5 米的铁钟。洞口西侧一龛，供奉土地神像。洞内正中，供释迦牟尼佛，像高约 2.5 米。佛祖左右，塑有十八罗汉像。院中一株紫丁香，径粗 2 寸，花香袭人；一株榧子树，果如核桃，砸开浸泡，如同肥皂，可洗衣被；烧后可食，味如板栗。一株银杏，树干直径约 0.6 米，高有 20 多米，浓荫遮天，万叶浮游，生机盎然，为挂牌一级古树。山门东开，门口置一石碾。庙下沟内，有一水井，深约两丈，水质甘醇。山沟内有庙中墓地，栽有众多柏树，郁郁葱葱。

上世纪 50 年代初，有磁家务村人刘顺在背阴洞出家。50 年代中期，背阴洞庙中的铁钟被毁。至 60 年代，庙中神像被毁。70 年代，庙中建筑被拆除。1983 年，磁家务村在背阴洞庙后建水泥厂，沟内水井和和部分墓地被占用。

背阴洞及其庙宇，在旧时即是文人墨客的游览之地。道光十六年八月，清代文人奕绘、顾太清夫妇曾联骑游览背阴洞，顾太清还率子女游览背阴洞，二人均有吟咏背阴洞庭湖的诗句。

《二十日访背阴洞道士他出留题壁上》

顾太清

山穷忽有路，骑马入天台。仙犬迎人吠，幽花背日开。  
风吹双翠袖，雾冷古苍苔。不见玄都客，留题拟再来。

《背阴洞》

奕绘

磴道缘绝壁，洞门朝太阴。黄花与赤枣，得地同萧森。  
炷灯入高险，连臂控幽深。却出叩石鼓，铿铿闻妙音。  
悬崖太古雪，何年留至今。苍苔蚀仙篆，寂寞古人心。

正觉洞及其庙宇，座落于背阴洞以东约 1 公里的半山腰处。洞口朝南，高约 6 米。洞内高约 4 米多，宽约 20 余米，深约 15 米。庙依洞建，大殿位于洞口崖下，殿左右建有库房和禅房。大殿长约 10 米，宽约 5 米。殿内正中供释迦牟尼佛，两侧为十八罗汉。殿内的后墙及山墙上，设有 12 级台座，台座上放有千尊小佛像。大殿门上高悬青色石额，阳刻楷书“正觉洞”。门口两侧嵌有残留的石刻楹联，文字右为“……界，”左为“…在玉壶”。殿后洞中，有一凿刻泉池，池长约 1 米，高约 1 米多。旧时，当地人说，此池中水，用之不绝。今日视之，已滴水皆无，只是池底略湿。庙东台地，置有石碾，设有打粮之场以及压场用之石碌碡。

民国年间，正觉洞有尼姑在此出家。至上世纪 60 年代初，正觉洞的大殿和佛像还基本完好。70 年代后，殿宇被拆除。90 年代末，庙中佛像已荡然无存。

千年沧桑，磁家务的自然环境、社会人文已发生重大变化。得天时与地利之便，几百年来，磁家务发挥着当地中心村落的作用。隋唐之际，村旁的孔水洞、万佛堂已是北方重要的佛教胜地。辽金元时期，此地磁器烧造炉火通红。及至明清，附近的采煤业、石灰业规模庞大。磁家务设立的巡检司，自明至民国初年，一直是房山北部地区的重要的管理机构，被当地称之为衙门。民国九年，房山县境改为九区辖 256 村，其中四区驻地为磁家务，管辖 32 村。新中

国成立后，磁家务村归属河北镇。

# 良乡寿因寺及遗碑

李瑞祥

## 遗址位置及现状

寿因寺位于良乡城东北三里多的塔湾村，建于明万历中期，曾名三教寺、十方院，清康熙时重修改名寿因寺。民国时期，塔湾村因其紧邻梅花庄，村又过小，所以并入梅花庄为一个行政村。

寿因寺遗址位于梅花庄原村址西北角，村委会原办公楼北侧。2002年，村里在遗址位置建起了温泉游泳馆，馆前广场上原地竖立两块古碑，寺庙踪迹全无。古碑周围地面上，散落着一些建游泳馆时为保护古碑而雕制的仿古石栏板碎块。广场大门外是原梅花庄村里一条南北向的水泥路，自北向南沿着遗址曾经有过的东院墙，到东南角向西拐了一个小弯，经过大门口又折向南去，直奔昊天塔西侧。据村里老人讲，这条水泥路就是覆压在古代京城通往南方的“九省御道”上修建的。查清光绪十五年（1889）《良乡县志》，有古良乡县辖区地图。图中寿因寺紧邻“京师大道”西侧，东侧是塔湾村，位置在昊天塔北略偏东；而当时的梅花庄位于昊天塔东，现该地是梅花庄村耕地，已无民居。清光绪《良乡县志》印行仅八年，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我国已开始分段并举修建京汉（北京至湖北汉口）铁路，两年后即1899年1月良乡火车站建成运营。车站建在遗址西侧，现车站内共铺轨10股，经实测，最东侧钢轨距遗址内最西侧古碑仅42米。想来当年铁路是从寿因寺院墙外擦肩而过。

两块古碑坐北朝南，一东一西。

东面的碑螭首方座，碑身两面的四周浮雕有十条小龙和火球围成的长方形边框纹饰，碑座上也浮雕有龙。碑首高118厘米，宽118厘米，厚45厘米；碑身高223厘米，宽108厘米，厚40厘米（碑侧平面厚38厘米，加浮雕凸出部分厚40厘米）；碑座高30厘米，宽165厘米，厚90厘米。据村委会干部说，碑座原本更高，修建游泳馆广场时，地面垫高加上铺砖，所以碑座被埋入土中一部分。此碑为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夏落成的“寿因寺碑”，距今

已 286 年，一直在此竖立。但风化明显，碑文有模糊不清之处。碑阴几乎看不出文字。

西面的碑也是螭首方座，但碑身四周没有浮雕龙形边框，且明显比东面的碑矮小一些。碑首高 100 厘米，宽 100 厘米，厚 40 厘米；碑身高 196 厘米，宽 94 厘米，厚 32 厘米；碑座高 30 厘米，宽 138 厘米，厚 76 厘米。碑座因上述同样原因，降低了不少。此碑为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5 月落成的“三教寺碑”，距今已 397 年，比东面的清康熙碑早了 111 年。但碑文字迹清晰，没有模糊风化的地方。原来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此碑被推倒埋入地下。村里修建游泳馆时，挖出来按古碑原来位置重新竖起。除碑身底部插入碑座的石榫部分已损坏外，余皆完好。看来埋入地下这三十六年反而因祸得福，得以保留完整清晰的碑文内容。

除这两块碑外，在游泳馆广场西南角民居墙外，良乡火车站铁路工区院内曲折的夹道里，还有一块古碑，即前面提到的遗址内最西侧古碑。此碑也是坐北朝南，面对村里一家开饭店的民居后墙的西北角，碑与墙间距离仅 152 厘米。碑身周围横七竖八地堆满了旧砖瓦和钢轨配件，地方逼仄。紧挨着古碑，蓬勃生长着一棵椿树，在本就阴潮的小夹道里，为古碑挡风遮雨，与古碑相依为伴。这块古碑也是螭首方座，碑首高 102 厘米，宽 102 厘米，厚 35 厘米；碑身高 170 厘米，宽 92 厘米，厚 28 厘米；碑座被碎砖瓦覆盖，仅露出轮廓。此碑为寺僧墓碑，因风化严重，文字模糊并多有缺失，不能确定准确的年代。

## 碑文

**明万历“三教寺碑”** 碑额篆书：“三教寺碑”。碑身楷书，全文如下（碑文断句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 良乡三教寺十方院碑记

赐进士第通议大夫经筵日讲官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教习庶吉士掌院士西京王图篆

赐进士吏部考功清吏司员外郎袁宏道撰

赐进士第广东道监察御史前中书舍人苏惟霖书

庚子八月，余以使事过良乡，迟三弟中道不至，寄居东关外。偶同客步小

石冈，过塔湾，村店四十余家，墟烟尽处，碧瓦参差，路人曰：三教寺也。遂扣扉良久，履声则则，从内出一僧，面癯而黝，发寸余不剪，对客语甚健。问之，曰：“江夏僧体空也。”余因谓：“荒街绝侣，飞埃蔽道，马驴丁丁之声，穷昼夜不绝，喧嚣荒恶，奈何庵此？”僧曰：“余本行脚老头陀，自入燕来，昼则挟册讲肆，夜则墙间树下，剪爪无工，何暇圆室？忆往岁，曾与数开士道出此乡，饥渴困乏，风霰交至，乃至求一孟饭不得，求一椽暂止亦不得，饥疮内逼，寒鬼外虐，酸苦之际，此愿勃发。僧自是乞得一笠地，编茶棚半间，以待十方衲子。七八年间，赖诸侍中大檀之力，遂成精蓝。北参南询之侣，至者如归；官邮之使，络绎于门；汤茶之供无宁晷，辘轳之声，从鸣鸡达丙夜不休。此山僧藉手诸檀信之惠，以了行脚一念者也，地之喧寂不暇计也！”余周视殿庑禅室僧廊，备体而微，凡丛林中所宜有者无不具。因叹曰：贤哉僧也！使天下之为僧者皆如汝，天下之为儒与道士者皆如汝，郡邑之中，刹宇相望，贮廩以待饥，空室以伺往来，仁让相先，贫富相助，何至使凶年有沟壑之民，有司持筹展转不及也？今道士之纤啬不足论，余儒者也，一钱不与，文曰俭德，但惧伤惠，不恤伤忍。怀市井锥刀之心，背先圣立人之教，沟中之瘠，宁复挂念？嗟乎！余之愧汝多矣。

体空名真圆，檀信名例书碑阴不具载。

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吉旦。

碑阴是建寺时的施主名单，包括钦差守备涿州都指挥使、锦衣卫指挥使、济州卫等多人，本文不录。

**清康熙“寿因寺碑”碑** 额篆书：“敕建寿因寺碑”。碑身楷书，全文如下：

#### 重修寿因寺碑记

国家久道，化成河海清晏。

皇帝于万几余闲时巡

畿甸，所以修武事，省耕敛，所无逸也。道路经过，遇招提洞府，间亦流览憩息；或命修造锡名悬额，以为民祈福，凡大小丛林得邀。

宸翰则万众观瞻，远近辐辏，坛场香火为之益胜。良乡县北古十方院，肇自明时，历有年所，栋宇倾颓，丹青漫漶。庚子春随驾过此，捐资重修。为皇帝祝厘，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三月朔落成。蒙

赐御书匾额，殿曰：“花台止水”，大悲坛曰：“大悲慈航”，易院为寺曰：

“寿因”。

天章璀璨，凤舞龙飞。佛曰：增辉宗风，丕振于以。祝  
皇图之巩固绵。

圣历于万年，广祗树之福因，登斯民于仁寿者，庶其有助。欤！是为记。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夏六月朔日。

皇十六子允禄奉

敕谨书（钤印两方）

碑阴风化严重，文字几不可识，能辨认出来的只有少量楷书汉字，没有一点满文的痕迹。

**寺僧墓碑** 碑额篆书：“公碑铭”。碑身文字为行书，因风化严重，多模糊不清和整片文字缺失，本文不录。碑阴无字。

### 从碑文内容看寿因寺

“良乡三教寺十方院碑记”系袁宏道所作。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人称“三袁”，为“公安派”领袖，有《袁中郎全集》传世。此篇碑文收入全集的“游记”部分。

文中记叙了袁宏道于庚子八月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秋，因事经过良乡，来到塔湾村，发现了碧瓦参差的三教寺。寺僧体空是湖北武汉人，长得又黑又瘦，头发一寸多长了也不剪，但很健谈。袁宏道奇怪为什么将寺庙建在这样喧嚣荒恶的路边，体空说自己原是行脚僧，来到燕地，经常饥饿困乏，吃住无着。因此发愿，先支起个小茶棚，招待云游僧人和旅途中人歇脚喝水。经过七八年努力，依靠多位为官施主的力量，建起了三教寺。从此南来北往的旅人和官邮之使多了一处休息的好地方，寺里每天烧热水供茶饭忙得没有歇息的时间；井旁摇辘轳打水的声音，从早晨鸡叫一直到深夜响个不停。袁宏道见寺里的殿室僧廊等应有尽有，建造得幽深精妙，完备得体，他不禁感慨：如果天下的僧、儒、道都像体空一样，每个寺庙都贮备粮食以备饥荒，空出房舍以待过往的人，互相谦让，贫富相助，怎么会使灾年死那么多人，使官吏们救灾的事忙不过来呢？

碑文记述了三教寺的创建过程，以及寺僧体空在倍受磨难后，不分三教九流，广济十方旅途劳顿之人的慈悲胸怀，这一点从寺名上也已反映出来。

下面有几点值得注意：

袁宏道游历三教寺是明万历二十八年，当时寺庙建设已很完备。也就是说，该寺建成至今已有410年历史。

袁宏道此文应是游历三教寺后不久写成，而刊刻立碑是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此时袁已去世一年，距袁游历该寺已过去十一年。

三教寺客人中“官邮之使，络绎于门”的热闹景象，除寺僧体空周到的服务让“至者如归”外，该寺所处的地理位置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古代自汉朝始，每隔三十里设驿站，良乡距京城中心约七十里路，距广安门约六十里。古人远行以畜力为主，牲口跑累了也需饮水喂料，良乡正是出入京都一日路程该歇宿的地点，有名的“固节驿”就在良乡城内。而三教寺建在京师大道旁，无疑更为方便。

另外，自隋至清，驿站一直隶属于兵部。三教寺的大施主多是掌握一方军政大权的都指挥使和锦衣卫指挥使，也就不奇怪了。

以古碑实刻文字为准，对比《袁中郎全集》中该文，不计开头撰文和楷体篆体书写者名录，以及末尾立碑年月，正文共有五处不同，即换字、添字、错字、颠倒字位等，总体意思基本无大碍。

“重修寿因寺碑记”系康熙皇帝的第十六子允禄奉命所作，并以楷体书写，文末郑重钤印两方。

文中记叙了康熙皇帝于日理万机之余到京郊巡视，庚子春即康熙五十九年（1720）春，允禄曾随同康熙帝到十方院来过。当时寺庙的房屋失修，佛像和壁画的彩绘已经褪色脱落，决定捐资重修。竣工后康熙帝为寺庙亲笔题写了匾额，并将原“十方院”改名为“寿因寺”。

这篇碑文可以和清光绪《良乡县志》中关于寿因寺的记载一起看。县志中“寿因寺”条全文如下：

在县北三里许塔湾村，明万历中僧人达空募建。原名十方院，国朝（笔者注：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版《良乡县志》中，此二字改为“前清”）康熙庚子庄亲王随驾过此，捐资重修易今名。颁赐御书匾额二，正殿曰“花台止水”，大悲殿曰“大悲慈航”。寺内院宇幽深，花木繁盛，往来星使多驻节于此。

根据碑文和县志的记载，下面几点值得注意：

庚子春康熙帝来良乡路过十方院，入内“流览憩息”，此时距袁宏道庚子八月游历该寺，已过去整一百二十年。这时寺里“栋宇倾颓，丹青漫漶”，所以决定重修。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来良乡十方院时已是老人，两年后即去世。

寿因寺重修后，“寺内院宇幽深，花木繁盛”，环境更加优美。“往来星使多驻节于此”，说明重修后寿因寺已升格为接待朝廷使者的寺院。

明万历“三教寺碑”和《袁中郎全集》中，募建三教寺的僧人都记为“体空”，而清光绪《良乡县志》中却记为“达空”（民国《良乡县志》照载）。“体”字和“达”字的繁体字形（體、達）并不相近，“体”字也与清代各皇帝的名字年号没有相同的字而需避讳，不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关键的错误？

为了更准确严谨，笔者又查阅了《光绪顺天府志》，其中关于良乡寿因寺的记载全文如下：

寿因寺在县北三里许塔湾村，明万历中僧人体空建，原名十方院。国朝康熙五十一年，庄亲王随驾过此，重修，乃易今名。有碑在寺内。院宇清幽，花木繁盛，往来使者多驻节于此。

看来，是《良乡县志》将寿因寺的创建人记错了。

但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光绪顺天府志》将康熙帝来寿因寺记为五十一年（1712），而“寿因寺碑”和《良乡县志》都记为“庚子”，即五十九年（1720）。笔者认为应以碑记为准，因为碑文中不仅说到康熙帝是庚子年春来的，还记载了重修工程两年后竣工的年月，以及书写碑记的年月。

两部《良乡县志》都全文收录了“重修寿因寺碑记”，与古碑实刻文字对照，有丢字、添字、换字、错字和个别词字的顺序变换等十几处不同，但总体意思基本无大碍。

## 记忆中的寿因寺

笔者自2008年3月至7月数次去梅花庄寿因寺遗址，除测量、照相、抄录碑文外，还访问了村委会负责人和两位老人：纪士忠（男，82岁）和李淑琴（女，63岁）。

综合两位老人的回忆，民国时期的寿因寺有三进殿宇，深灰色砖墙，房顶覆以深蓝色琉璃瓦（袁宏道文：“碧瓦参差”），寺院的围墙是灰砖黄瓦。前殿大门东侧有一株老槐树，正殿大门西侧是一株高大的柏树。寺院内有一口大铜钟，声音宏亮，方圆十里远的地方都能听到钟声。寺院的匾额都是石刻的，佛像都是铜的。正殿的如来佛铜像为坐姿，一只手掌心向上，向前平伸出来，整个铜像高约两米多，端坐在约一米高的汉白玉石雕莲花台座上。佛像两边各立一尊童子像。另外，老人们听祖辈说，前殿有十八罗汉像，后殿有观音菩萨像，

但从他们记事时就没有了。寺院的西南角是僧人墓地，墓地中间有一座祭祀用的小庙龕，大小不一的墓塔排列有序，大多是砖砌的，南端最高的墓塔两边立着两块古碑。寿因寺大门紧邻京师大道，门外不断有拉骆驼的、赶马车驴车的（袁宏道文：“马驴丁丁之声，穷昼夜不绝”）和挑担步行的人经过。

寿因寺里原来驻有部队，炮八旅、国民党二十九军都驻过。当时寺庙建筑是完整的，门窗都不缺，庙门有时关着，也有时开着。后来日本鬼子打过来，二十九军撤走后，庙里的门窗、佛像就开始逐渐丢失。抗日战争后期，日本人打算把大铜佛运走，已经把铜佛弄下莲花座准备装车了，为此铜佛的脖子后边还被他们刮开一条大口子，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好多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铜佛就是搬不上车。日本人无奈，最后只能放弃。当日本人仓皇走后，村民们把被丢在地上的铜佛抬上莲花座归位时，感觉很容易，没费多大力气。这时大家都很惊异，认为是佛祖显灵，不让日本人掠走。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青年军打着修建铁路沿线碉堡炮楼的幌子，公然把寿因寺拆了。寿因寺遗址的一片瓦砾中，只剩下四块古碑和莲花座上孤零零的铜佛，以及几株高大粗壮的古树。至此，有着三百五十年历史的寿因寺遭到毁灭性破坏。

解放初期，大铜钟被政府运到良乡西门外，供良乡县人民法院使用。后来转归良乡某街大队，文革中被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破四旧”高潮。秋天村里正准备割芝麻时，良乡某技校的红卫兵把铜佛和白玉石雕莲花座砸碎，“三教寺碑”被推倒。推倒的“三教寺碑”就地挖坑埋入地下；西南角的两块寺僧墓碑，东边的由于村民常在碑旁割草，致使地面松软塌陷，古碑倒地摔断，也被埋入地下，位置应在现铁路工区院内。建设铁路工区时，寺僧墓塔被拆平。还有一个寺里喂牲口饮水用的大石槽，现埋在游泳馆广场地下。后来村里又把古树锯了，整个遗址只剩下孤零零的古碑，没有一点原来寺庙的痕迹了。

据两位老人回忆，文革之前，村里的小孩经常在寿因寺遗址处玩耍，淘气的小孩捉迷藏，总是四、五个人一块儿挤进铜佛肚子里。夏天乘凉，小孩们总喜欢爬到铜佛平伸出的一只手上坐着玩。这都说明铜佛的体量高大和铸造的精致坚固。

寿因寺最后一位住持僧人叫康芝，民国时期在京城去世，后来把尸骨运回寺里安葬。

朝廷的使者往来不入县城驿馆住宿，不惊动打扰地方政府，除了方便、安

全、保密等原因外，良乡县很贫困，老百姓税赋、徭役负担过重也是一个原因。明代蒋一葵著《长安客话》中说：

良乡疆域甚狭，复有军屯者三，官勋子粒十二，山水冲没者七，起科地不满三千顷，而民无后占者仅六百丁，其实不及大县一里。乃当天朝贡首冲，差使浩繁，供亿甚夥，民不堪命矣。

朝廷使者住在大道旁的寺庙里，方便固然方便了，但安全怎能跟住在良乡城里比呢？其实不然。上面《长安客话》引文里提到良乡县有三处屯军之地，从古良乡县辖区地图中可以看出，塔湾村北就有一处兵营，其余几处位于良乡城南的大南关到十三里一线路西。这就是说，紧邻寿因寺东北就有军队驻防，这无疑是最重要的安全保障。

最后，根据两位老人对寺僧墓地形制的回忆，笔者以为，位于铁路工区夹道内的墓碑，毫无疑问应是体空的墓碑，那么年代也应是明万历年间或以后。袁宏道游三教寺见体空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当时体空“面癯而黝，发寸余不剪，对客语甚健”，甚至“纤啬”，即有些琐屑、怪吝。这些话除了反映出体空的性格特征外，也透露出那时体空至少已是中年人了。万历帝在位 48 年，之后是泰昌和天启治理 7 年，直至崇祯。不知三教寺的创建者体空活到了哪一年？如果被埋入地下的墓碑能够出土的话，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

# 徐文长的房山情结

赵思敬

徐文长是明代文学家，名渭，号天池。晚号青藤。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才能兴趣极广，诗文书画，音乐戏曲，无不擅长。在他 72 年的生涯中，曾 4 次来到北京，或作幕僚或来旅行，房山的山水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很深的情结。

万历八年（1580），60 岁的徐文长应辽东抗倭名将李成良长子李如松的邀请，带着 19 岁的二儿徐枳从老家第四次北上。几个月后，即万历九年赶到北京时，李如松已由游击将军升任长城马水口关参将。查《畿辅通志》：“马水口在（涞水）县西北二百三十里，……其地山势雄壮，岩岫相连，旧称京师右辅。”李如松在



徐文长像（据《明越中三不朽图赞》）

武将中颇为儒雅，喜交文友，且富收藏，所藏书画，曾请徐文长鉴赏题跋，两人交情深厚。不久，李如松约其前往，徐文长马上写了《答李参戎书》，要求他派人骑来接，说自己“裹足可至”。

很快，李如松派来军士，接徐文长父子前行。他们走的山前古路，这条路自古以来多用于军事行动。路线是从京城往西到今天门头沟的大寒岭，向南经房山的河北、坨里、周口店一带，然后直奔涞水。走这条路，必然经过名胜上方山。徐文长是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对这座“幽燕奥室”早有耳闻。这次，父子同游，又有军士带路，焉有不游之理。今天，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上方山记》中读到游览的兴奋之情：

“自欢喜台拾级而升，凡九折，尽三百余级，始登毗庐顶。顶上为寺一百二十，丹碧错落，嵌入岩际，庵寺复精绝，蒔花种竹，如江南人家别墅。时牡丹正开，院院红馥，沾薰游裙。寺僧设供，山肴野菜，新摘便煮，芳香脆美。独不解饮茶，点黄苓芽代，气韵亦佳。”

从简练的文字叙述中得知，徐文长父子来上方山应在五月，否则不会看到

“牡丹正开”，毗卢顶是毗卢舍那佛的省称。这里以佛名代山名，让人感到对方上山的推崇，也是“庵寺精绝”的最好注脚。“丹碧”，形容山寺雕梁画栋，各种色彩交错缤纷。建筑是这样精美，自然环境呢，移栽的花草与翠竹点缀其间，使这位浙江人感觉如在“江南人家别墅”，这说明在徐文长的眼里，上方山这座佛教名山，佛教的色彩已经淹没在平凡的生活之中，山寺与南方的村舍一般无二。游人至此，香熏衣袖，大有“赏花归去马蹄香”之感。山中野餐，都是时令蔬菜，感觉芳香脆美。徐文长最不理解的是山僧为何以“黄芩芽”为茶待客。殊不知这件事说来话长，始于五代刘仁恭，当年他占据大安山，自立为王。又因南北贸易中断，便采黄芩芽代茶。黄芩芽是草本植物，为上方山盛产，作为中药，有性寒去热的功能。饮过茶，感觉“气韵亦佳”，应在情理之中。徐文长没有料到，采黄芩芽代茶这个风俗延续至今。

在奔赴马水口的途中，虽然山路崎岖，亦不乏名山秀水，在徐文长的脑海中仍然回荡在上方山的峰峦中，住在马水口附近的名胜烟麓陀寺，他又写了《往马水口宿烟麓陀寺》一诗，记述游览上方山的情景：

昔从良涿行，兹山在云际，昨夕宿兹山，云乃出衣袖。  
四徒夹一舆，两膝拳至鼻，一里转百盘，锯牙不得直。  
结苇以为庐，削木冒金髻，夜钟但超悬，晨鸡聊一嗜。  
巉岩既高骞，巘岈复孤厉，回想燕赵时，筑城遏胡骑。  
安得尽如斯，脱甲开户寐。

开篇两句，可知徐文长前三次从涿州、良乡往返于京城时，对方上山的慕名已久。住在山上，行走在小路上，衣袖间都飘着一缕缕白云。前面读《上方山记》时，使人不免发生疑问，这就是61岁的徐文长是怎样游览上方山的，读到“四徒夹一舆”，才恍然大悟。原来，先生是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上，省却了许多力气，不仅得以从容观看山景，当然更能看见轿夫低头前行，膝盖都碰到鼻子的情景了。山路盘旋狭窄，一里百转，景随步移。触目眼帘的有山僧结苇成屋，以削木支撑。这些当是临时建筑，或者供游人休憩之用。偌大的上方山，徐文长一天是游不完的，看过夜钟晨鸡两句，可知他们在山上至少住了一宿。看到孤傲的山岩，不免想起当年燕赵筑城拒敌的历史往事，想到这时的边关，不是一样吃紧吗。如果没有战争，哪还用得上跑这么远的路来见面。如果国家能赢得这样的环境，把守长城的士兵们就可以脱掉铠甲开门大睡了。身在边关，想到上方山，两相对比，环境反差之大，怎不让人对方上流连忘返。

从《徐渭集》收入的诗文内容看，这是徐文长关于上方山仅有的两篇记载。

但在此之前，徐文长还写有一篇《万佛寺记》，这可以追溯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秋，那时他受礼部尚书李春芳年奉六十两白银之聘，入京为其门客。工作任务是长期关在宅中代笔起草文稿或写青词，为保密起见，工作往往在夜间进行，为此，徐文长心中十分苦闷、孤独。于是他写了《入燕三首》，我们看第一首，从唐代的董邵南怀抱大志，有翅不能伸展的结局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两人隔代，境遇却十分相似。他慷慨长吟：“董生抱利器，郁郁走燕赵。贱子亦何能，飘然来远道。行止本无常，譬比云中鸟，朝饮西园池，暮宿北林杪。感事复怀人，生年苦不早，欲吊望诸君，迹陈知者少，垂首默无言，春风秀芳草。”从这首诗可知徐文长是读了韩愈的名篇《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才打听起战国名将乐毅坟墓在良乡的所在。可惜知者甚少，未能吊祭。当年董邵南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来到河北。自己呢，六岁读书，九岁为文，也是屡考不中，徐文长与董邵南的心是相通的。

为了多挣些银两，徐文长还代写各种文章。有位姓朱的内监同乡，当时在内廷武英殿负责文事，需要文长代笔为文，派人送来银子。文长答书有“纸裹朱提，重不胜举”之语（《答朱少鉴》）。朱提，即白银之代称。为权贵者代写礼书、聘书，为某庵代写募文，成为徐文长生活的一部分。文长所得稿酬较高。昔日作《镇海楼记》一文即得二百二十两，在京代人作文虽然没有这么大的数目，但也足以维持温饱。据知，文长写过《刑部题名记》，刑部要他作文想必是好友沈襄的推荐，因为沈在刑部供职；为寺庙作《万佛寺记》，可能是朋友的介绍。京师太监们于嘉靖三十年（1551）至万历七年（1579）在房山大南峪建成万佛寺，请徐文长为记。这篇文章使我们了解了清代奕绘修建佳城的最初原貌。《万佛寺记》如下：

去京师六十里所，邑曰房山，山曰大南峪。有地一顷，初结庵一区以居僧能贵。其后中人某某辈以南地颇广且胜，又邑界也，暑雨冰霜，往来者众，背倭肩頰，而无憩止，思有以扩之。乃稍醵金其党，旁及募者，以属贵。起嘉靖辛亥，迄万历己卯而寺成。寺有殿三楹，东西翼倍之，厨沐之楹，视其殿。计将以声众也，置巨钟一。以饮众也，为井一。以表众也，为浮屠一。而佛之数则盈万，遂名曰万佛。至是工竣矣，乃来请记。今夫主人之召客也，无弗敬者也。然客三数则暇，十则警，百则惶惶然惟恐其或失矣。夫敬一也，而有暇与惕之分，则以客多少之故也。此何以异於合瓦泥金碧以成佛，而以纳之其庐，其人之骤而望之也，一则寥寥然，十百则总总然，至千且万，则奕奕然，接之且不懈，况得而易之乎？然此犹以敬言也，至其畏也，亦靡不然。设幽都狱具



徐文长像（据明刻《徐文长逸稿》）

而以怖夫不类，其始观夫一署也，矍然，至三五则愀然，至十则毛竖而却走矣。夫上智者，不待敬且畏而自善，下愚者畏之而后善，若夫敬而成善者，多中以上之人也。人之稟，上与下者少，而中者多，则设起敬之具以成其善者，多者胜而少者不胜。佛而至万，敬之居多矣。吾故以是某某辈喜，而辄为之记。然吾闻贵有戒行，是庶几於敬者。以故今得从万佛迁主御建慈寿寺中。

这篇文章透露的信息翔实。首先，我们知道了最初在大南峪结庵的僧人叫能贵，庵较小，后来“中人”，即宦官见山场广阔，往来者甚多，便募集资金，历经 28 年时间，能贵才建成万佛寺。寺正殿三间，左右六

间。同时，铸一钟，凿一井，建一塔。对于寺中待客，塑万佛以供之，徐文长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利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说有觉悟的人，并不是因为敬重佛祖惧怕地狱才做好事，只有觉悟低的人才是对佛祖和地狱产生敬畏之后才与善良结缘。大多数人是敬佛的善良人。说起人的禀性，优秀的和愚笨的较少，平常的人是大多数。从这一点来说，建造佛寺还是越多越好。这样从善的人就会多起来。因为这个缘故，我为他们建造万佛寺而高兴，应他们的要求写了这篇碑记。我还听说能贵和尚戒行严谨，希望大家尊重他。碑文的最后一句尤为重要，说万佛附近有慈寿寺，是万历皇帝为其母慈圣李太后所建，为此将所造佛像尽数移进寺中。这座寺在清代还曾叫天台寺。清人奕绘有《游南峪天台寺二首》其一说：“大南峪里天台寺，楼阁参差云雾重。野鸟山峰皆法象，苍松古柏宛游龙。大圆宝镜舒千手，尺五青天压乱峰。立马东冈新雨后，西南高插紫芙蓉。”诗后有注说：寺为明慈圣李太后所建。还说寺有大圆镜，铸千眼观音像。这些可为我们了解寺庙增添了新内容。徐文长写的这通碑，在《房山县志》失记。

徐文长的著述，散失的很多。在清代乾隆皇帝编修《四库全书》时，还被列为禁书，他与房山的文字情结，竟然完好地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令我们惊喜的事情。

参考书目：

《徐渭集》

中华书局

《徐文长》

上海人民出版社

《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房山游记汇编》

民国王毓霖 编

# 漫话良乡胡同

李桂清

在高楼林立的城镇间，一条条看似不起眼的胡同，曾是我们主要的居住场所，是城乡的脉络、交通的衢道。按有记载的胡同开始算，胡同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里所说的胡同是广义上的胡同，含有街、巷在内，是一种通称。《北京胡同志》载，胡同，是由两侧排开的四合院的墙体和门楼连成的两线建筑物构成的。胡同，即巷子。巷子里的民居基本单元是宅院。“胡同”在蒙古语中为“水井”的意思。按照流行的说法，“胡同”当是有水井的宅居巷子。蒙古人是从草原来的骑马民族，习惯于牛羊成群，择水而居：进入大都市以后，在居宅之旁凿井取水或者寻找有水井的地方居住，并以居所通行的巷道为“胡同”应是蒙古语与汉语“衡巷通”的结合。《北京的胡同》（瓮立著）一书介绍，在《北京胡同丛谈》里，胡同的名称最早见于元曲，如关汉卿的《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的词句。总之，胡同曾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居所，并逐渐成为一个专用名称。

据光绪十五年（1889）《良乡县志》记载：（良乡）城池，一千三百丈计六里三分，分四门，东曰迎曦，西曰宝城，南曰就日，北曰拱辰，顶宽二丈，底宽四丈，高三丈。城内，南大街，史家胡同，仓房胡同，共 31 个。城外，北大街，乔家胡同等，共 19 个。

《房山区地名志》记载：良乡地区有 4 条主干街道，呈“十”字形，共 17 条主要胡同（包括街巷，下同），辖境西北宽，东南窄。目前，良乡地区包括已拆迁的有 20 多条胡同，以胡同冠名的有 10 多条。胡同的名称有的以遗留的历史古迹或民间文化为背景而命，如文化路、饮马井、罗府街、城隍庙街等；有的以胡同地理位置或胡同走向命名，如南城根、北关东路、北后街、北斜街、西城根等；有的以胡同中或附近的古树命名，如楸树街、国槐街；有的以胡同中独特的设施命名，如澡堂胡同、后井胡同；有的以姓氏命名，如乔家胡同、路家胡同、史家胡同等；有的以胡同形状而名，如箭杆胡同。这些胡同的名称简单易记，一直流传至今。

以遗留的历史古迹为背景而命名的位于良乡城西南部的罗府街，传隋末唐

初，镇守幽州（今北京前身）的名将罗艺曾建府第花园于此，五代时赵德钧修筑盐沟城（今良乡镇）时，将其包入城内，形成街巷，因名罗府街。罗府街东起良乡拱辰南大街（南大街）中部，西至饮马井，长 200 米，宽 5 至 9 米。1949 年 1 月 6 日，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原市委干部训练班在罗府街成立。干部训练班在市委学委的具体指导下，成立了学委分会，由王鹤峰、宋乃耕、彭宝山、石羽、王峰五人组成。2 月 5 日，干部训练班从良乡进驻北平。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即在市委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建立。这条街与良乡中学相对，现正改建为现代化的罗府小区。

因良乡西南有城隍庙而得名的城隍庙街，南起良乡中路，北止北关西路，南北走向，长 500 米，宽 3 至 5 米。原良乡县的城隍庙位于西大街北侧，因“有事下庙者，均感不便”和“栋宇倾颓”，于明朝重修。据传，良乡的庙会以此最为繁华热闹，摊位约千余个，经营项目和种类达万种以上。城圈内庙宇林立，有关帝庙、天王寺、文昌祠等 10 个，最古老的要属孔庙和城隍庙，从西门外迁进来的。城隍庙坐北朝南，层次分明，庄严肃穆。最南端为戏楼，坐南面北，正对大庙山门，四柱八梁，歇山顶，前出檐，顶盖锡片，戏台高出地面五尺，戏台北有一片露天广场，人们通常是站着看戏。戏楼北约百米处，有一座高约一丈五尺四空牌楼，牌匾的题额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正楷大字。再往北约二十米，是一座汉白玉罗锅式玉带桥，高出地面 3 米，桥宽 2 米，长 4 米。此庙几经战火洗劫，1948 年拆毁，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为平地，今城隍庙街内连接着乔家胡同、后井胡同、路家胡同等街巷，有多家店铺、住户，也是良乡地区比较繁华的街道。

以历史文化背景命名的胡同，或是寓意美好，或是流传着一个生动传神的故事。如位于良乡东北部的文化路，因有良乡文化站，故名。记得 30 多年前，即唐山大地震那年，我住进这条胡同，当时为平房居民区，良乡电影院、良乡汽刹车配件厂等曾在此。记得小时候经常在此看露天电影，大人、小孩每人拿着小板凳，有说有笑，热闹极了。1984 年，这里开始建社区，1993 年竣工，整齐明亮的楼群代替了原来简陋的平房。2004 年，文化路进行了综合改造，长 500 米的街道，由 6 米宽拓展为 10 米，看起来更加整齐和宽敞。现有房 LhZ 文化艺术学校（原文化站）、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和多家店铺，良乡地区很多学校的学生都在此参加各类辅导班和特长班，尤其是上下课时间，接学生的车辆排成长队，加之乐业市场和多家店铺，成为良乡地区最拥堵和繁华的街道之一。1990 年，良乡文化路被文化部授予全国先进文化站称号，使文化路真

正成了“文化”街道的象征。

而位于良乡城西南部的饮马井（即“固节驿”），因曾有古代驿站和流传着贞节烈女的故事而闻名。饮马井南起罗府街，北至良乡中路（西大街）中部，长 400 米，宽 4 米。相传此街是古代驿站，据《光绪顺天府志》载，在京师署南的良乡设站曰固节驿（以县得名），当时为京师第一驿站，是供传递公文信件的人中途更换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也是接待来往使节和过往官员的地方。设在原县衙门东紧挨巡捕房右侧，院内有大桑树遮荫，树荫下周围以栅栏隔开拴着一排排的马匹，街巷有一水井，专供在此饲养的马匹饮用，原有马 221 匹，到光绪年间，还有 162 匹，车 20 辆。院内设房舍、水井和饮马用的石水槽，故初名马号街，后改名饮马井。在这看似普通的一条小巷内，还流传着一个贞节烈女的故事。元朝济南府尹完颜雍的妻子乌林答氏，就缢死在良乡驿站。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海陵王完颜亮，杀死兄长金熙宗完颜直，夺取皇位，称帝改元天德。他为了巩固政权，曾将太祖子嗣和功臣及其后代百余人杀掉，并将宗室葛王完颜雍排挤出朝庭，出任济南府尹。完颜亮还为了控制完颜雍，下旨将完颜雍的妻子乌林答氏送到京城做人质，同时成为非正式妃子。乌林答氏曰：“妾不行，上怒必杀王，我当自裁，不以相累。”行至良乡驿，乌林答氏问何名，左右以固节对。乌林答氏曰：“吾得死所矣。”遂自杀。明《长安客话》和清杨嗣奇修的《良乡县志》，均记载了乌林答氏的故事。

关中李嘉宾有诗：

狂金跨中原，南渡转炎精。  
海陵灭三纲，丑类禽兽行。  
杀夫纳其妇，节义渐以倾。  
贤哉葛王妃，挺挺女中英。  
被召欲不往，夫祸与之并。  
辞王随使去，庶使全王生。  
行矣死传舍，而不坠初盟。  
乌禄得再世，众推帝东京。  
江上毙凶逆，境内乐升平。  
人称小尧舜，实延完氏枋。  
燕山有佳色，燕水有余清。  
山青节不朽，水远流芳声。  
乾坤气磊落，驿名永以旌。

今驿站不在，贞节烈女的时代也已过去，在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今天，倒是应该百倍地珍爱生命，广大妇女同胞也正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投入到各项事业的建设中。

以姓氏命名的胡同在胡同中占很大比重。如位于良乡西南部的史家胡同，东起拱辰南大街（南大街），西至饮马井。长200米，宽3至5米，呈“丁”字形，现不通行，住户不多，且住的房子是简单整修的平房。我们特意到住户家中探访胡同的历史，在说明来意后，胡同中的十几户人家都很热情，好似我们是稀客一样，争先恐后地讲述他们听说的故事。这里的住户有的并不姓史，有的人家倒是姓史，并介绍：史家原籍是山西洪洞县，可追溯到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史可法是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字宪之，号道邻，崇祯元年进士，累官至明南京兵部尚书，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史可法以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扬州。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史可法率扬州军民与围城清兵展开浴血奋战，终因众寡悬殊，城破被俘，不屈被杀。据传，史家最早投资建史家大院，主要做买卖，曾经有煤球铺、帽子铺等。故史家胡同之名。在《北京市房山区志》中记载：明惠帝建文四年（1402）移山西都司官兵与北平设卫，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附近州县。这里并未记述史可法。而史可法的祠墓在江苏省扬州市广储门外街。至于这里的史家是不是史可法的后代已无从考证，也不重要了。因为，我们被胡同里浓浓的和谐、温馨的氛围所感染，他们的简易平房，朴素的衣着，风趣的语言，古朴优雅的小院，奇异怪状的树木，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自然。我想，无论有关这条史家胡同的传说是真是假，也无论他们是否都还姓史，他们留给我们的真诚和对美好未来的企盼都是最珍贵的。

以胡同形状命名的箭杆胡同，现名为东秀街一巷。箭杆胡同很直，两侧为旧城墙，典型的古城风貌。不太长的100多米路，因为窄，最窄处仅1米，因而显得格外细长。与箭杆胡同相通的是东秀街，在良乡南门东侧向东城门的南侧斜插，曾名为东斜街，长500米，宽3至4.5米，呈“一”形。此街历史悠久。西口处为良乡中学。良乡中学的前身是良乡初级中学，1945年建立，最初校址在罗府街，一年后，迁址到东斜街孔庙（今东秀街）。这里有著名的区级保护古迹——孔庙，亦称圣人殿。孔庙创建于明隆庆五年（1571），清乾隆十九年（1754）和道光五年（1825）重修，座北朝南，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原有大成门、棂星门、三通殿，现存大成殿与部分配殿。2002年重修圣人殿，现名为“文苑广场”。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城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胡同也逐渐被高楼大厦所代替，慢慢地退出城市舞台，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胡同虽被拆迁，但胡同中散发出的浓郁的地方文化元素却流传下来，烙下了人们生活的印记，记下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传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我们建设文明的新房山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色。

# 古往今来良乡城

张广明

房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被世人称作“龙的故乡”。而作为区府所在地的良乡，更有着悠久的历史。

酈道元所著《水经注·圣水》记载：“圣水南流历县西转又南经良乡县故城西。王莽之广阳也。”圣水即今大石河，引文所记“良乡县故城”即今窦店村西的窦店土城。据专家考证，良乡县故城分内外两层，呈长方形，内城为夯土打造，外郭为堆积的土围，内城东西长 1100 米，南北宽 860 米，外郭东西长 1200 米，南北宽 960 米城与郭之间约 20 米。城内靠西墙有子城一座，城址地基稍高于四周地表，子城又高于城内地表。窦店土城的建筑年代为战国末期到西汉。属于燕国中都，这应当是良乡城的开元。

燕召王二十九年（公元前 283），燕设置上古、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北京地区历史上的郡县制自此开始。

战国实行郡县制，设置广阳郡，良乡县。

三国曹魏时期，设置范阳郡。当时领 8 个县，其中有一县在北京地区，就是良乡。到了晋朝，良乡县隶属幽州范阳。

隋唐五代时期，良乡和其周边地区发生巨大变化。隋开皇三年（583）设幽州总管府，良乡归总管府属下。唐武德元年（618）幽州总管府统领八州，其中幽州领蓟、良乡八县。幽州总管为唐名将罗艺，唐王李渊封他为燕郡王，赐姓李。良乡南大街小角（十字路口）往西有一条胡同，叫罗府街，就是因罗艺镇守幽州在此地建府第花园而得名。

真正和良乡有关的人物是赵德钧。赵德钧，五代时期蓟城人，原名行实，后唐庄宗时赐名李绍斌。镇守幽州十余载，抵御契丹骚扰，任职期间，甚有善政，官至中书令，封北平王。为了保证从芦台水路运往幽州的食盐，从涿州水路运往蓟城的粮饷的安全，他选择在盐沟河（刺猬河）以东的燎石岗屯兵，这就是“盐沟城”——良乡城的前身。

辽开泰元年以后，良乡隶属南京道析津府。此时期辽南京城“大内壮丽，

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在这一时期，良乡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

从年代上看，昊天塔和良乡城，昊天塔隋建唐修，在先。良乡城属后唐长兴三年（932）建，在后。但只过了6年，到辽会同元年五代晋天福三年（938），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与辽，良乡属辽幽州都府。

至金，良乡县更名为固节县，后又恢复了良乡县名称。

历史上，良乡确实有一座古驿站。地点在良乡西门内路南，旧县公署东侧，不隔路，只隔墙。县署南有一条街，叫“署前街”；驿站南有一条街，叫“饮马井”。据说官员往来住的驿馆，在署前街南头一所宅门内。民国二十八年（1939），一场洪水，破西城而入，县署与驿站遗址，全部被冲毁。

明初，良乡属北平府，永乐元年后，直属京师顺天府。此时的良乡城随着京城建设的展开，得到了重点地修整。明景泰二年（1451）良乡新筑城垣，南北长1公里，东西宽0.5公里。1570年，明隆庆中知县安尚达又将城墙增高至3.2丈，并设瓮城。1630年，再度动工，对里面土城修补增宽，外面砖层加固。城墙底宽4丈，高3丈2尺，门顶宽2丈，设有四门：东为“迎曦”，西为“宝城”，南为“就日”，北为“拱辰”。城门由硬木大造，上面镶满菊花钉。

1664年5月，清定都北京，多沿用旧制，良乡属直隶顺天府。

康熙十年（1671）良乡县知县李庆祖“博闻硕识，通敏精明”，任职期间，“曾建魁楼以兴文，除荒田以免累”。在良乡建“魁星楼”，以鼓励学子上进。

良乡城以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人物俱良”的人文特质，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被称为京城西南之门户，东南数省进京之咽喉。

鸦片战争以后，良乡因处北京咽喉门户，成为京汉铁路必经之地。义和团运动时期，良乡城内成了义和团活动的主要地点。清政府派兵把良乡城围住，义和团首领李必武、孟金堂等与清军展开了一场闻名京城的血战。在清政府镇压下，良乡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失败。

民国以后，由于京汉铁路这条大动脉经良乡、窦店、琉璃河贯通南北，以及良坨支线的开通，良乡至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公路状况的改善，促进了工矿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各地商旅云集，纷纷到良乡办厂开店。当时良乡城内以十字街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有座商139户。由于良乡交通便利，四通八达，逐渐形成物资集散地。蜚声中外的良乡栗子，就是那个时代创出的

名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共产党领导下，平西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联合政府。良乡成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东南前哨。为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了解敌占区人民生活情况和敌伪军动态，党的地下工作者时常装扮成商人或老百姓模样，或挑担或背篓，从山区深入到良乡城内，联络群众，搜集情报。良乡十字街西北角有一家“聋子面馆”，就是八路军地下交通站。

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人们还没松下一口气，国民党接收了伪政权，他们捞官霸产，中饱私囊，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搞得民不聊生。良乡街头巷尾有人在传言说，西边的八路要下来了。还有人讲，解放军要打北平。人们在不安中期待着。1948年12月14日，良乡解放。

“良乡解放了，北京还不快吗？”这是良乡人对北京解放的共识与心声。1949年1月16日，傅作义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京问题的协议。叶剑英在良乡负责进京接管的准备工作。他和市委书记彭真分别驻在良乡的乔家胡同和楸树街，干部培训班设在罗府街。

新中国成立后，良乡隶属河北省通县专区。1958年，良乡和房山划入北京市，成立周口店区。区政府在房山城关，良乡为一个镇。1960年撤销周口店区，设房山县。1987年，建房山区。1998年11月18日，区政府由房山城关东移到良乡。

自周武王封召公于燕以来，良乡古城经三千年繁华更替至今，一座现代化卫星城拔地而起，向人们展示她无限的潜力和美好的前景，必将给房山和首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辉煌的前景。

# 顾太清与大南峪

张玉泉

大南峪位于青龙湖镇东南端上万村村西，四山环抱，景色宜人，它原是清代皇家的一座别墅，后改为园寝。如今里面的建筑基本完好，在那里长眠着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和她丈夫奕绘。

顾太清，清嘉庆四年（1799）生于北京西郊香山。光绪三年（1877）卒于大佛寺北岔府邸，享年 79 岁。姓西林觉罗氏，名春，字梅仙，号太清，一号云槎外史。满洲镶蓝旗人。太清本名应写作西林春。是乾隆年间受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文字狱牵连而被赐自尽的甘肃巡抚鄂昌之孙女。

道光四年（1824），顾太清与清乾隆帝曾孙奕绘成婚，成为奕绘侧夫人。奕绘也是有名的文学家，他们相爱甚笃，并骑郊游，诗酒酬唱，至奕绘四十岁病逝度过了十四年的幸福生活。

在北京郊区游览名胜时，奕绘、太清曾到过北京西南现在的房山地区，游览过石经山及东峪寺、西峪寺。并作诗为记。

道光年间，有一天他们游览到永定河之西、大房山之东、地名叫大南峪的天台寺。天台寺是明朝万历年间，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为宝珠禅师王能贵营建的一座庙宇。

奕绘、太清见大南峪系太行山之余脉蜿蜒而至，四面回环，中函隙地。天台寺在山圈内北端，坐北朝南。西有大悲阁，阁旁即宝珠禅师之塔，后山山畔即宝珠修炼之洞，俗称“豆儿佛洞”。大南峪之东有影壁山横亘，峪之出口在景壁山之南。地势天然自成一景。当时的天台寺已残破，然而风景甚好，西侧有银杏树 6 株，深林野鸟，小阁晴蜂，春草满山，桃花洞口，若加以人工修整整顿，不但是一个极好的山区别墅，也可作为未来的园寝吉地。二人看中了这一天然环境优美的地区。商之寺僧，寺僧欣然同意，条件是另在别处以土地交换，奕绘遂命府中护卫阿禅泰、鄂克陀司办其事，用府中在大兴彩育地两千亩换之，这两千亩地不但是良田，而且多于大南峪山地三倍以上。同时向户部借俸，蒙恩许支禄 10 年，银 27000 两，合时价官钱 3300 万，分 20 年由年俸

中扣还户部。

道光十四年（1834），阿禅泰、鄂克陀为监督，开始修建大南峪别墅。其房屋大小共 64 间。大南峪内，共有十景，每景均由奕绘和顾太清配诗。

**杨树关** 在大南峪东方峪口建关门一座，门上嵌有奕绘自题“杨树关”三字石额。上有望楼，楼前后有格扇门。左、右为墙，墙上各有圆窗扇。关四周杨树成林，故名。关坐西朝东，关北连接影壁山。奕绘有题《杨树关》诗：

萧萧白杨树，寂寂青松关。  
生前一杯酒，无语对苍山。

影壁山上列白石幢，左右各 11 幢，连下重台座共高 1 丈 1 尺，台队 16 级。上刻《易地券》诗：

东阜建碑亭，大书刻我诗。  
我诗胜契券，契券多假为。  
一为圣恩重，使我子孙知。  
一为寺僧弱，恐我子孙欺。  
一为土豪横，虑我子孙痴。  
南谷界已定，万世不可移。  
采育田已舍，万世不可追。  
此诗之墨草，法源实藏之。  
藏之若符契，文句同吾碑。

**第一桥** 进杨树关西行，先到第一桥。桥有石栏跨于涧上。俯视涧底，深 1 丈 8 尺。奕绘有诗咏第一桥：

跨涧石为梁，寒花满涧香。  
干林果已摘，红叶足秋光。

**山堂** 自杨树关进大南峪，过第一桥，稍西北行 2 百 10 步，即到别墅大门。门内即山堂，黄泥为壁，玲珑户牖，为供遗像、神主的飨殿。有诗曰：

细润黄泥壁，玲珑明月窗。  
他年供遗像，野鸟上诗幢。

**霏云馆** 山堂两侧有马道。山堂后即垂花门，门内游廊穿山随山势斜上。廊壁缕窗，窗形不一，或如葵花，或如方胜，或如蝙蝠，或如扇面。院中正室五楹，檐下悬奕绘篆书“霏云馆”额（木框纸心）。左右有南北厢房各三楹。两厢房西侧游廊上各有一门通院外。霏云馆前有月台，台上左侧轩石制日晷一。有诗曰：

一面花墙里，长廊拥四围。

凭高望东海，目极片云飞。

**清风阁** 霏云馆后，左右又有马道通清风阁。阁二层，上下各五楹，阁上南套间为“栖神宇”，北套间为“延年行馆”。清风阁檐下有奕绘篆书大字“清风阁”额（木框纸心）。阁下左左各有鹿顶小室一间。清风阁后预为圻，四布围以石栏，前有石阶。诗曰：

圻前起高阁，阁南密严室。

每来辄此宿，焚香夜岑寂。

圻后即后山，山腰即豆儿佛洞。豆儿佛之塔即在山下。

自大门，经山堂入霏云馆正院，再至清风阁，成为一套主建筑。自大门至清风阁后之圻共 96 步，有台阶 123 级，自大门至杨树关之距离为 210 步。

**红叶庵** 共 3 间，门上有额匾，在大门外迤南半山上。后用为仓，收贮峪中之百谷、山果及供药用之花卉。题诗曰：

百谷分囤贮，百果按时收。

百花供药品，百草牧羊牛。

**大槐宫** 在大南峪中之北谷，有大槐 1 株，两人合抱，槐下建室 3 楹，额题“大槐宫”，令一道士居之，祠奉吕仙。诗曰：

北谷大槐宫，中有一道士。

依我求长生，有饭且不死。

**东坡小石城** 在峪中东北，为防川之用。在两山间建一城墙，虽有雉堞，然不甚高，人马皆可逾越。诗曰：

东城小石城，人马皆可逾。

防川理如是，折柳狂夫踣。

**牛羊砦** 大南峪近山无虎狼之患，在峪内南端修筑“牛羊砦”，为养峪内牛、羊之所，只有栅、砦及司守者之住室，亦算一景。诗曰：

近山稀虎狼，宜耕且宜牧。

南坡服犁者，春日亲生犊。

**菜圃** 也在峪内南端，以榆树为棘，四面围之为菜圃，以种菘等日用之蔬菜，也是一景。诗曰：

逾坡南而东，榆棘藩小圃。

露降晚菘肥，青虫飞不去。

奕绘、太清夫妇登临之后，各赋《高山流水》词一阙。奕绘词题为《南谷

《清风阁落成》：

山楼四面敞清风。俯深林、户牖玲珑。雨后一凭栏，直望尽海云东。栏干外，影接垂虹。夕阳转、满壑松涛浩浩，花露濛濛。拥邨侯书架，老我此楼中。从容。启云窗高朗，微凉夜秋纬横空。襟袖拂星河，鸡三唱晓日通红。同志者二三良友，侍立青童。问茫茫宇宙屈指几英雄。

太清词题为《次夫子清风阁落成韵》：

群山万壑引长风。透林皋、晓日玲珑。楼外绿阴深，凭栏指点偏东。浑河水，一线如虹。清凉极，满谷幽禽啼啸，冷雾溟溟。任海天寥阔，飞跃此生中。云容。看白衣苍狗，无心者、变化虚空。细草络危岩，岩花秀媚日承红。清风阁，高凌霄汉，列岫如童。待何年归去，谈笑各争雄。

清风阁落成后，太清曾作诗题壁：

两度来南谷，佳城碧树环。  
鸟声惊梦醒，云彩共人间。  
高阁延朝日，晨妆对远山。  
新烟出村落，花木认般般。

奕绘有和诗，透露日后预以大南峪为百年后之园寝：

高高清风阁，寂寂万古春。  
他年埋我地，枯木无悲辛。

清风阁后山西北方有高峰，当地人称之为“大寨”。离阁甚近但无法攀援。欲登其顶，必须绕至南面新开口村方有上山之径。奕绘、太清夫妇曾带近侍数人寻径攀登“大寨”之顶，又命侍童段八沿途彩山花。太清有诗记之：

步上最高峰，巉岩小径通。  
阴崖飞异鸟，绝壁走憨童。  
山豁东南阔，花光西北丰。  
登临渺下界。目断四天空。

又登东城，回看新落成的清风阁，这时大南峪已初步建成一府天然风景更加上人工塑造的幽美境界。太清曾赋诗纪之：

昨日经过处，登高望渺茫。  
梨花干树雪，春草满山香。  
画栋新妆阁，荒台旧法堂。  
欣欣幽谷里，百鸟奏笙簧。

大南峪附近有许多名胜古迹，如石堂与出孔水便是著名的两处。石堂在

大房山东北，上有悬崖千尺，下有石窟，阔二丈许，泉水由石中流出，深不可测，称之为石堂。孔水，指孔水洞，在磁家务村西南。唐朝开元年间，为了祈雨，曾命吕慎勇三次投龙璧于孔水渊中，奕绘、太清住大南峪清风阁日，因慕孔水古迹之名，曾联骑往游。在孔水发现了《开玩残碣》，即唐朝投龙璧时所刻之碣。还有明朝卢襄的《诗碣》（卢襄是明朝吴县人，嘉靖进士，累官兵部郎中）

两位诗人用十两银子向当地庙中山僧买回两块石碣。归途过慈溪，当时称慈溪口。这里山崖有清溪，溪中彩色野鸭无数。太清即兴赋《浪淘沙》词曰：

花木自成蹊，春与人宜。清流苕藻荡参差，小鸟避人栖不定，飞上杨枝。归脚踏香泥，山影沉西。鸳鸯冲破碧烟飞。三十六双花亲好，同浴清溪。

道光十七年（1837），大南峪别墅基本完工。唯阁、庵、堂尚未彩饰。奕绘派二等护卫鄂克陀夫妇住此管理山田事务、屯垦植树。大南峪古木甚多，品种有松、柏、榆、椿、杏、桃、柿、栗、梨、胡桃、银杏、黑枣、合欢、白柏、海棠、玉兰、木瓜等 614 株。太清夫妇消闲在泉石林木间，赋诗唱和，享受鸟语花香的幽境乐趣。这年正月十六，奕绘四十寿辰时太清曾作诗一首：

八十平分赋好春，化灯寿斝又更新。  
万方诗句垂千古，一气洪濛合大钧。  
鹤算长天开绛帐，《鹿鸣》《小雅》宴嘉宾。  
为屏乐善无余事，且放笙歌醉月轮。

道光十八年，奕绘去世。次年，顾太清到大南峪园寝致丧，以诗哭之。成七律二首：

阴阴山影下斜阳，惨惨风吹缟袂凉。  
绕墓诸雏啼血泪，断肠寡妇奠椒浆。  
期年已改先人道，妆阁权为选佛场。  
未必九泉无见识，料应回首也悲伤。

平安精舍大槐宫，碎瓦零砖满目中。  
将犊牛羊行典径，成群骡马践芳丛。  
流传剩有当年句，治造徒劳五载工。  
此景此情言不尽，寒蝉老树哭西风。

暮年的太清因病多次住进大南峪阳宅中养病。因不胜孤独寂寞之感，曾有诗云：

是非休告诉，烦恼莫相寻。

远避人间世，深山自养心。

光绪元年（1875），太清忽感目痛，请医诊治无效。初觉矇眊，后渐失明。为便于医治、疗养，遂于是年归城中。

光绪三年，79岁的顾太清病逝。与奕绘贝勒、妙华夫人合葬于大南峪清风阁后之圻中。

参考资料：

《顾太清与海淀》

北京出版社

《明善堂文集校笺》

天津古籍出版社

# 富察敦崇秋游梨儿峪

潘惠楼

1987年9月，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史掌故》一书。其中载有雷梦水先生撰写的《富察敦崇及其游梨儿峪》一文，收录了富察敦崇游览房山梨儿峪后写的一篇文章《游梨儿峪记》。

富察敦崇，别号铁狮道人。清康熙朝大学士马齐之后，二等敦惠伯承志之次子。承志姓富察氏，道光二十八年（1848），娶奕绘贝勒和侧室顾太清所生之次女以文为妻。生有二子，长子宗佑，字佐臣；次子敦崇，字礼臣。敦崇喜署名富察敦崇。

富察敦崇生于咸丰五年（1855），自幼聪慧，然多次应试，均以族人回避，不得进入考场。只好援例纳官，曾任东三省道员。宣统三年（1911）七月，因病请假就医，回到北京，革命军兴，便居家不出。富察敦崇生平喜文事，著述颇丰。留有《燕京岁时记》、《紫藤馆诗草》、《芸窗琐记》、《庚子都门纪变》、《皇室见闻》、《画虎集文钞》等多种著作。作者尤熟习北京掌故和风土人情，所作《燕京岁时记》，以时间为序，从正月至十二月，依次记述北京的风土、名胜、物产和技艺，并将定期游览胜地一一予以介绍。内容丰富，且多是作者所见所闻，翔实可信，是研究北京岁时风物、社会生活颇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被誉为近代研究北京掌故的杰作。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印后，立即风行市上。1961年，北京出版社根据原刻本标点排印一册，与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合为一书出版。

富察敦崇的《游梨儿峪记》，是一篇记实性散文。梨儿峪，当地人称梨峪沟，又称之或写之为李儿峪沟、柳叶沟、冷月沟、鲤鱼沟。位于房山晓幼营村北。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卷二“地理·山脉”中记有“李儿峪沟，长十余里，西北至高桥寺”。从晓幼营村往北，进入山沟，沿古道可去门头沟区与房山区交界处的高桥寺，再往北可去潭柘寺。沿古道往西过谷积山，可至北车营村后的灵鹫禅寺。

梨儿峪，沟内风景优美，因有明代古刹环秀禅寺，当地人还称其为庙儿沟。

自古以来，就吸引京师的文人墨客来此游览。《游梨儿峪记》记载了富察敦崇游览梨儿峪的过程。

全文如下：

年来时事变迁，芒无归宿，叫嚣隳突，触目惊心。欲求一避世之地而不得，惟时取桃花源记，倚枕读之，终惜其为寓言也。癸丑秋九月，费君瑞龄，招游西山。初八日壬辰，携一僮一仆及孙尔寿，戴星而出，登东西行。过卢沟，逾良乡，北转至坨里，则费君已遣小舆相迎矣。而去山犹甚远也，迤迳前进，凡经村镇三，曰石梯，曰水月，曰上万。过上万三里许，行步渐高，已入乐寿山庄之南界。乐寿山庄者，费君等四氏之别业也。地本僧寺遗址，山名积谷，寺曰环秀，俗呼曰梨儿峪沟，有大明景泰、成化、宏治碑碣，明以上无考焉。昇甫及门，费君僧服出迎，左执蝇拂，右拄铁杖，合掌问讯。俨然大刹，善知识，呜呼！君非昔日树旗旌乘五马南面称太守之人耶，何不幸至于斯也；君非昔日奔走公卿蒙犯霜露嗷嗷其口热中于心者之人耶，何淡泊一至于斯也。俯仰大笑，拾级登堂，游侣毕集。曰瑞丰字裕如者，费君之贵介弟也，曰致初、曰致泽者，费君之子若侄也。皆前日至。奎君聚五，亦前日至，与费君同为主人。齐君、赵君、敬叟、润叟，皆同日至。山肴野蔌，罗列满前，饮酒未终，已颓然入梦矣。癸巳，重阳也。登东山之麓，割肉而食，夕阳欲下。循山而西，有观音殿焉。墙壁倾圯，荒榛满目。再行一二里，遥闻犬吠声，人家二三结宇断崖上。门前昏柿林，霜叶微红，实垂至地。崖下有泉一泓，清冷澄澈，停蓄不流。客有携茶具者，汲而烹之，殊甘美也。泉东数步，又有一小泉由石隙中出，曲折萦回，入地而没，惜无人疏凿耳。甲午晨起，登北山至文殊院，院久废，无一椽之遗，而形势殊胜，真龙盘虎踞之地也。是日晚，大雨彻夜，至明未息坐看山头云起，弥漫半空，想身已在云雾中矣。丙申晓晴，云消雾散，遥见东北绝顶处有红叶数丛。询之土人，曰平台山，往返十余里。勉力而往，行将及半，遇耕者王清源，曰平台山望之甚近，行之甚艰，怪石巉岩，艰容跬步，恐非翁之所能及也。予亦以筋力既疲，废然而返。东山月上，又复快然，敬叟世五，携有短笛，倚窗作梅花三弄，余音嘹亮，响彻重霄，真不知身在人世矣。次日，辞主人归，半日抵家，觉庭宇湫隘，烦杂不堪，深悔多此一返，他日，携家而往，愿授百亩而为之耕，红树青山，处处可志，谅不至如武陵渔人欲重访桃源而不得也。上万，阿显臣，高尚士也，与费、齐、奎三氏，同为庄主人。敬叟名昌，姓博尔济吉特，乃费君之妇翁。项氏润芳，字澍田，亦费君之姻娅。费君字鹤庄，本复姓费莫，因从简，去莫存费，亦世之有心人也。己亥雨窗铁狮

道人富察敦崇记。

全文用笔简练优美。在千余字的文章里，时间、地点、人物、游览过程，写得非常清楚。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跃然纸上。

根据文中所记，富察敦崇游梨儿峪的时间在癸丑年，应为民国二年（1913），正值重阳节期间。连来带去，总共五天，住在梨儿峪的乐寿山庄。同去者四人，自己和“一僮一仆及孙乐寿”，是应“费君瑞龄，招游西山。”在五天的行程中，第一天，是重阳节之前一天，从京城经卢沟桥，过良乡，走坨里、上万，来到梨儿峪的乐寿山庄。第二天是重阳节，到东山登高，又游览了附近的观音殿和农家。第三天，游览北山的文殊院遗址。第四天，准备游览平台山，因路远未成行返回。第五天，从乐寿山庄回京家中。

文中记载的乐寿山庄，“地本僧寺遗址，山名积谷，寺曰环秀。俗呼梨儿峪沟，有大明景泰、成化、宏治碑碣”。可证乐寿山庄应是梨儿峪中的环秀禅寺所在地。环秀禅寺，创建于明代，遗址尚存，为房山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从晓幼营村进入梨儿峪沟，沿运石灰和石料的土路前行五六里，登上路南的三十余层台阶即是环秀禅寺。山门和配殿均已不存，正殿三间，基本完好。正殿为无梁殿建筑，全部为砖瓦灰石砌就。青砖砌墙，殿四角外包条石。歇山顶，铺灰瓦。门窗以白玉石发券，券脸浮雕花卉、飞天、麒麟、人物等。建筑式样与房山区孔水洞前的明“大历万佛龙泉宝殿”基本相同，此种建筑形式在北京市并不多见。正殿面阔约12米，殿内穹窿顶高约7米。殿内后墙有佛龕三个，下面的须弥座相连。座和佛龕都是汉白玉石垒砌。座高约1米，长约6米。佛龕各高1.6米，进深1.2米。可惜的是，2004年，佛龕上的部分石雕件被人拆毁，有的已被摔成碎块。在正殿前有月台，长8.5米，宽2.3米。月台前的院落及配殿残址荒芜不堪。院中有一矗立石碑和两块倒地石碑，立碑为明成化年。“敕建环秀禅寺碑记”碑文已严重风化，字迹不清。

乐寿山庄，富察敦崇游记中为“费君四氏之别业也”。“上万，阿显臣，高尚士也。与费、齐、奎三氏，同为庄主人”。由此可知，环秀禅寺所在地，在富察敦崇游览时，已成为乐寿山庄之界，为阿、费齐、奎四家共有之别墅。

文中记载的观音殿，距环秀禅寺约有三华里，当时已“墙壁倾圯，荒榛满目”。今遗址中还存有殿堂三间，也是歇山顶无梁殿形式。殿硕部亦有精美石雕藻井。院中遗有一碑，殿后遗有一塔。碑铭记为敕赐广智禅寺，广智禅寺即是高桥寺，因寺前山沟上建有高大石拱桥，桥上有塔，亦被称之高桥寺。观音殿距广智禅寺尚有二三华里。由于此碑铭的文字记载，致使许多人误以观音殿

为高桥寺。观音殿前山沟中原有水井两眼，现只一眼井中有水。其水甘甜，山中有牧羊人长驻，常年饮用此井之水。

从富察敦崇的生平来看，应对梨儿峪一带比较熟悉。因其外祖父奕绘、外祖母顾太清均葬于距此不远的上万村大南峪。顾太清晚年曾长住大南峪养病，至光绪三年（1877）顾太清逝世之时，富察敦崇已然 22 岁，富察敦崇之母以文在未出阁前曾多次去大南峪，富察敦崇对大南峪的外祖父、外祖母坟茔也应该来过或比较熟悉，况富察敦崇每每自称其文学修养系承外祖父家之遗续。那么，与大南峪近在咫尺的梨儿峪风景，富察敦崇也应早有耳闻、心向往之。

经过不足百年时间，梨儿峪中的乐寿山庄已杳无踪迹，环秀禅寺已成断壁残垣，然山中古迹犹存。环秀禅寺的基础还在，正殿基本完好；环秀禅寺东的明太监墓地，还存有高大的石牌坊；观音殿还有三间殿堂。如若将梨儿峪沟中的古道进行开发，青山绿树、野草闲花，与沟内古道上的高桥寺和谷积山的灵鹫禅寺连为一体，还是一处非常难得的风名胜地。

# 天开塔出土佛舍利的经过

沈书权

1990年6月3日，天开塔地宫内出土了“释迦佛舍利”和一批珍贵的佛教文物。

## 发掘经过与出土文物

天开塔，座落在房山区岳各庄乡天开村东南黑龙潭北岸。它历经唐至清代，有着悠久的历史。清末以前，塔周围有众多古迹及宏伟的建筑群：北有古刹天开寺，西有碧瓦生辉的娘娘庙，南是碧波荡漾的黑龙潭、元宝山以及脚下的龙王庙、观音庙等。

当年，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文人墨客，云集至此，虔诚僧侣，进香拜佛，人群熙攘，络绎不绝。的确是一个别有情趣的好去处。民国以后，该塔破坏严重，已失去昔日秀美挺拔之姿态。然而，其残存部分仍不减其古朴壮观，巍峨凝重之神韵。

由于塔的破残，就为发现地宫提供了方便条件。1990年6月1日，天开村三名青年人无意中发现了裸露出地宫天井的封堵方砖。怀着好奇之心，他们拆开砖，下到地宫……。6月3日，市文物研究所与房山区文物管理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地宫距地表约0.6米。券门南向，高1.3米，宽0.8米。地宫呈八角形，高2.55米，每面宽1.04米。檐部饰以砖斗拱。穹隆顶满布花草壁画。中央位置竖立高1.9米砖石结构的小塔一座。塔座两层，均为八角形。下为单层方砖，磨制成弧线形；上为白玉石的须弥座。须弥底座前侧刻有捐资人姓名“梁辛、刘兴仁，……”等。中腰的八面刻有“大辽燕京良乡县金山乡乐深村西约一里地有古严陵洞……”。塔中间是由半圆形石雕莲瓣座承托的石函。盖与函四面均刻楷书铭文。盖上铭文是“请到放戒，内更有释迦佛舍利壹拾颗……。”函上刻文是“严陵洞再建舍利匣序……”。石函内套方形铜函、再内套方形金函，最里

层的函是塔状的水晶瓶，内装有舍利 5 颗。石函往上均是砖构件组成，自下而上顺序为；方须弥座、龕门、单层方檐、双层方莲瓣檐、九重相轮、莲瓣顶、宝珠刹。

小塔前摆放做工极精致的木质椅子和条桌。桌上陈设着高足碗、银钵、铜盆等供具。因为器物在发掘前期被下去的群众移动过，所以文物摆放的原位置不清楚。

经过发掘整理，此次出土文物有：木器；椅子、桌子、檀香木佛各一件，铜器有：函、香薰、盆、净水瓶各一件，铜镜四、铜饰件四、铜币若干，银器有，钵，勺各一件，银筷一双，余者有；金函一、水晶瓶一、瓷碗二，舍利五，共计近 30 件。

上述器物无疑都是珍品，但真正价值高的莫过于完整无缺的辽代木桌椅。这是现存的北京地区最早的木器家具。特别是木桌，出土之前世上不见实物，其制作形制只见于辽金时期墓葬的壁画上。它的问世，给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这一举世无双的稀世珍品在炎黄艺术馆开幕式上层陈过，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和游客的赞誉。

### 天开塔创建于何时

无论从文献考证，还是专家的鉴定结论，以前一致认为天开塔是辽代创建的。但其辽代确切纪年谁也说不清楚，因为无从考证。建于辽代之说是依据天开塔现状来判断的，这无疑是正确的认识。但实际上并非为辽代创建，而是唐代。关于这一点，地宫小塔上的铭文记叙的再清楚不过了。

石函铭文记载“……良乡护世寺僧法询、法艺等建办此塔。至大唐贞观十三年（639 年）三月十三日，其僧法询春秋七十有五迁化，遗嘱下门资令耙僧尼四众等同办。至龙朔三年（653 年）三月二十八日，九级塔成”。由此而知，天开塔是从唐贞观十三年创建的，由良乡护世寺僧人法询、法艺主持兴工。形制为九级密檐式。落成于唐龙朔三年。从贞观十三年至龙朔三年历时 24 年，塔才落成。如此长时间的建设工程，从中不难想见当时条件的简陋，更可想见昔日的九级密檐宝塔雄伟壮丽之景况。再从“法询……遗嘱下门……僧尼四众等同办（此塔）”分析，天开塔在法询生前就已经动工了。所以，该塔建设工程还不只 24 年，时间还要长。

建成的塔时隔 81 年，也就是唐“开元七季”，进行了一次“修补”。以后

时深岁远，历经风雨剥蚀，到了辽“乾统九年”塔倒塌了，所能见到的只有“旷野唯痕”了。

天开塔复建是辽代。由于在塔的遗址上发现了佛舍利，严陵洞家僧及四众一致推举五侯村刘孝贞为头领，主持复建天开塔工程。至“大辽乾统九年（1109年）岁次己丑七月甲辰朔七日”落成。也就是现存的两层楼阁式（原状三层）的天开残塔。

地宫内铭文的考证，改写了天开塔是辽代创建之说，推前到了唐代。天开塔据今已有 1300 余年的历史，成为北京地区最古老的宝塔之一。

### 佛舍利之谜

遍览石函和小塔须弥座上的刻文，会发现几处舍利的颗数不一，前后矛盾的记载：

石函盖上记为“内更有释迦佛舍利壹拾颗”；

石函侧面记为“九级塔成，内有舍利一十五粒”；

须弥座刻文“获得应化舍利一粒。自后，于所盛着舍利水晶瓶内，即渐增胤颗粒，约一月内，却到一十三粒；

在 1990 年舍利出土时，仅发现五粒。

舍利数字不一，令人费解，的确是个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们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石函刻文有关唐代舍利“壹拾颗”、“一十五粒”两个数字。按照常规而言，两处的数字应该是一致的，因为是为同一批舍利而同时在一个石函上刻造的铭文。那么又为何数字不一？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错误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从须弥座的刻文去找答案。上有“大辽乾统九年……（良乡）知县郭比部便来洞内顶戴烧香毕，开觑舍利一十五粒存在。……郭比部亲自送舍利一十五粒赴朝廷”的记载。郭知县当时发现的舍利是一十五粒，送往朝廷的也是一十五粒。这十五粒舍利正是石函记载的唐九级塔建成时埋入的。事实证明，石函上刻文“一十五粒”舍利是准确的。而“壹拾颗”舍利的刻文，很可能发生在刻工的笔误上。

其次谈谈“一粒”“一十三粒”的问题。自一十五粒舍利送朝廷后，“自后不过十日内，有当村孙文质、杨诠并同家僧却于塔遗址处因口土获得应化舍利一粒，自后，于所盛着舍利水晶瓶内，即渐增胤颗粒。约一月内却增到“一十

三粒”。通过这些记叙发现，“一十三粒”是“一粒”应佛教众生之机缘而化生出来的舍利。换言之，是“一粒”变化成了“一十三粒”。至于能否从少变多，只能从佛教的角度去解释。

随之而来的还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十五粒舍利”送朝廷后，又怎么会从根本没有可能再有舍利的地方竟奇迹般地拣拾到舍利了呢？

只要仔细看铭文，就会发现上面已经讲到了，那就是“又获得应化舍利一粒”。既然“一粒”可变化为“十三粒”，那为什么“一十五粒”在送朝廷之前就不能再变化生出一粒呢？这是肯定的。也就是说，“一粒”是由“一十五粒”变化出来的。待“一十五粒”送朝廷后，早就变化生出一粒遗留下来，被后人发现了。因此，才出现后来的一粒变成一十三粒舍利的局面。

再次谈谈发掘的五颗舍利。从上面阐述可知，辽代复建时放入天开塔内的舍利是“一十三粒”。为什么发掘只有五粒？事情的经过是：发掘之前，曾有几个村民下至地宫取出水晶瓶。因不知内有何物，出地宫掏出水晶瓶往手心倒，虽感觉掌内有物，但因天黑看不清，又将掌中之物装入瓶内。问题就出现在这一装一倒上面。舍利在装倒中，有的溅落地上，只是当时不知。发掘时，根据这几个人提供的线索进行认真查找，遗憾的是因地面全是杂草与渣土碎砖，最终未能找回。所以，只剩下五粒舍利。这也算作天开塔舍利的谜中之谜吧。

# 中国最大的园林置石青芝岫

赵思敬

中国的造园艺术起源于先秦，兴胜于唐宋，极盛于明清。历代造园艺术，都离不开以太湖石装点景致。太湖石体态秀润，奇趣天成，历来受到造园艺术家的青睐。纵观南北园林景致，有四块太湖石最为著名，它们分别是：苏州留园的“冠云峰”；杭州西湖的“皱云峰”；上海豫园的“玉玲珑”；北京颐和园的“青芝岫”。前三块都是南太湖石，只有“青芝岫”是北太湖石。这块被称为四大名石之首的大青石，三百多年前发现于房山，现陈设在乐寿堂前，从明朝到清朝关于这块奇石的故事众说纷纭，流传至今。

“青芝岫”石长八米，宽二米，高四米，重二十多吨，具有玲珑剔透，重峦迭障之姿。远远望去，酷似一颗青色的灵芝，横卧在颐和园乐寿堂前一个刻着海浪的环形汉白玉石座上，在它的左右各有一棵作为衬景的松树，松树旁还有两块秀丽多姿的南太湖石，无论站在哪个方位观看，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由于这个院子面临昆明湖，背倚万寿山，东达仁寿殿，西接长廊，是园内位置最好的居住和游乐的地方，所以，游人参观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导游员对大青石的来历讲得也比较仔细。游人在观赏奇石的同时，对它神奇的经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纷纷在此留影。“青芝岫”这块大青石是怎么来到颐和园的呢，说来话长了。



位于颐和园的青芝岫

为了给母亲孝圣皇太后做六十大寿，从乾隆十五年（1750）开始，乾隆皇帝就调动大批人力物力修建清漪园，这就是颐和园的前身。修建宫苑当然需要搜罗奇石异草用以点缀。大青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皇家园林的。据说，有一天，乾隆皇帝南巡，住在良乡黄辛庄行宫，听说在良乡昊天塔下的官道旁，有一块明朝遗留的大青石，博雅好古的

乾隆令人带路观看。大青石存放在一间土墙破败的茅草屋里，它的表面有许多蜂窝一样大小不等的孔洞。孔洞中生出花草和树木。乾隆以手扣之，大石清脆有声。精于赏石的乾隆皇帝大喜过望，决定以国家之力把它运到乐寿堂，于是传下一道圣旨，限期运到清漪园。运送大青石需要多少白银，无从知晓。但有一个参考系数，明代从房山石窝运了一块两百多吨重的汉白玉到紫禁城。就是现在故宫保和殿北面最大的那块云龙石雕，从房山运到北京五十多公里，两万多民夫用旱船拉运，走了28天，耗银11万两。“青芝岫”运送的路途比它长，安全要求系数要求高，运费恐怕也有5万两白银以上的开支。

大青石为什么被放在荒郊野外？这还得从明朝万历年间说起。当时，有一位祖籍安化（今属陕西）人米万钟（1570—1628），字仲诏，号友石。他出生于隆庆四年，是宋朝米芾的后裔，徙居顺天后把家安在宛平（今丰台，包括海淀一带）。万历二十三年（1595）25岁的米万钟参加科考中进士，被授予江宁令尹，不久升任江西按察使，转任山东参政。米万钟为政清廉，关心民众疾苦。注重文化教育，所到之处颇有政绩。民众称颂。米万钟的父亲叫米玉，字昆泉，他有三子，米万钟排行第二，其兄米万春，为隆庆九年考中武进士，任通州参将；其弟米万方，在锦衣卫任武官。米万钟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尤深，颇有学问。书画俱佳，与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米”之誉。米万钟有一子米寿都，孙子米汉雯、米汉倬两人。邓拓先生所撰《米氏三园》考证，他们居住地是三处园林，分别为漫园、湛园、勺园。三园旧址在今海淀区内。从前燕京大学图书馆编印的《勺园图录考》上收有米万钟画的《勺园修契图》，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米万钟山水画的精美艺术，而且可以看出当年勺园的全貌。米万钟的原意，就想把大青石安放在勺园。发现这块大青石的时间，当为米万钟在北京任太仆寺少卿之前，太仆寺掌管国家马政，少卿为副长官，正四品。其时，他经常穿行在房山的深山峡谷中，领略大自然的钟灵毓秀。为什么钟情京西南的山光水色，这要从他的远祖米芾说起，米芾开创了雨意山水的朦胧画派，到了元代，房山画家高克恭发展并完善了米家山水。无疑，在高房山的画作中，有京西南秀丽山水的影子。虽然相隔异代，但画理相通。在房山的群山之中，米万钟既可外师造化，又可中得心源。正因



“青芝岫”刻石

为经常奔走于群山万壑之间，才有机会发现钟爱的奇秀灵石。

大青石在房山什么地方发现的，是怎么发现的？细节无从考证。只知它发现于“大房山”深山。从目前情况看，在房山区，从坨里到长沟一带四十多里的丘陵地带，都挖出过许多北太湖石。石质为石灰岩，具有涡、沟、环、洞的变化。扣之无共鸣声，多密集的小孔穴而少有大洞，体态嶙峋透露，质地坚硬，一般用作叠石假山。房山太湖石大部分埋在土层里，这种石质的前身是钟乳石，经一百万年的风雨侵蚀，才能生成北太湖石。大青石发现的范围，当在周口店一带，理由是米万钟雇佣千余人和四十匹马拉着大青石走了七天才出山，又用五天才来到良乡塔下的塔洼村。周口店一带因长年开采石灰石，肯定有山路可行，如从这里奔琉璃河走五天，再走七天官道，每天五里路程应当符合当时的运输能力。如何运输这个庞然大物。自然要采取用旱船运汉白玉石料的办法。时间必须是冬天，沿路每一里掘一水井，以供淘水泼冰，便于大青石滑行。关于米万钟运大青石，民间有一首民谣，说的是运大青石的路线：“彰仪门，修得高，大井、小井，卢沟桥；卢沟桥，长又长，过了长辛店是良乡；良乡塔、漫山坡，过了窦店是琉璃河。”由此可见这说的是官道，目的是彰仪门，即现在的广安门，琉璃河是官道运石的起点。民谣可作大青石运输的一条佐证。

为防止大青石在运输中损坏，要先将石的孔洞用泥土填满，然后用草绳把大石缠绕起来，同时在石下放上数百滚杠排成道路，四十匹马和千余人连推带拉拥着大石缓缓而行。全体人员听从统一指挥，走几步就得把滚杠倒好位置，不能出一点差错。就这样在高高低低的道路上走走停停用了 12 天才来到良乡官道旁的塔洼村。在这里米万钟停止了运输的脚步。是什么原因？说法很多，主要有三个：一是大青石引起轰动，京城许多官员竞相前来观看，都说此石灵秀超过皇宫规格，米万钟怕有僭越之名而放弃运输；二是米万钟不满大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平时多有微词，怕有人借机谗言陷害；三是大青石运输到这里，家中经济遇到困难而败了家。最后的这个说法广为流传，以致乾隆都把它称之为“败家石”。纵观三种说法，各有偏颇。其实，熟悉良乡地理的人都知道，从塔洼村到长阳大约 5 里的路程中，横着一条哑巴河和一条小清河支流，两河又分出六条支流，河上有小桥六座，桥的承受力有限，不管花多少钱，谁也没有把握把大青石安全运过河去。这种地理状况一直延续了几百年。我们查阅光绪十年（1884）编修的《良乡县志》，上面有一幅地形图，明确标注运石道路、塔洼村和水道的情况。很难相信，已经为官三十多年的米万钟，连运一块大青石得费用都算不出来。尽管非常喜爱大青石，面对现实米万钟万般无奈，只好

忍痛把大石暂时放在道旁。并盖了一间草房以遮风避雨。为表达对大青石的依恋之情，他写了一首《大石歌》，表达自己的心情。歌前略序片言说：

米太仆于大房山得异石，欲致之园中。乃束牲载书告之曰：惟予之于公也，素性敦好，气质攸同。原求于山，乃幸见公。唯公之于予也，自启云关，不靳一斑。原兹披尘，得睹道颜。予既于公为夙契，公宜为予而出山。云何屡恳，不即慨然？既闻即次，复且迟延。岂谓小园之无地，异空山之有天？予则有平原茂树，草蒨花嫣。良辰胜日，佳客名贤。或袍笏之肃拜，或韵事之联翩，或笑歌之嘤就，或樽俎之流连。视尔山中，孰全孰偏？又岂恶石工之佻巧，畏用大之不情？予则有酒伴笙侣，云屋松幃。自然导窾，百态岐嶷。且物有用而功宏，道有用而名成。不炼晦磨崖之绩。不携晦磨崖之英，视尔山中，孰重孰轻？石乎石乎，何濡滞而不行！

开篇：“惟余之于公也，素性敦好，气质攸同。爰求于山，乃幸见公。”表达了米万钟自认和大青石气质相同，与山中相见时的兴奋之情。接着叹了口气说：“予既于公为夙契，公宜为我而出山。云何屡恳，不即慨然。既闻即次，复且迟延？岂谓小园之无地，异空山之有天。”很显然，这是抱怨大青石，说咱们俩既然平时有神交，你也应该早早为我出山，为什么你答应得这么不痛快，而且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难道担心我的勺园没有你的位置，依然留恋房山的那片天空。为了坚定信心，米万钟夸耀自己的勺园说，我有“平原茂树，草蒨花嫣。良辰丽日，佳客明贤”。最后撂下话说：“视尔山中，孰重孰轻？石乎石乎，何濡滞而不行？”大青石啊，回头看看山里的处境，再比比我家的景致，你为什么还不肯走呢？你看，米万钟此时的心情多么迫切。只可惜费尽移山心力，也只能将大青石搁置在荒野之中了。更倒霉的是放弃了大青石之后，米万钟本人还是被罢了官。魏忠贤死党被罢官五年之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即崇祯上台，他迅速诛除魏忠贤一党，朝廷开始重新启用被魏忠贤死党陷害的官员。崇祯元年（1628）米万钟被复职起用，任太仆寺少卿，负责管理国家马匹的调配使用。

大青石虽然处在荒野之中，但它一直人们议论的话题。甬东（今镇江定海）有一位东林党领袖薛冈，对大青石感慨万端，他突发奇想，以大青石的口气，写了一篇《石隐报米万钟歌》（题目为作者所加）。其文神采飞扬，足可传世。标点分段，全文如下：

仆山中顽民，赋质坚贞，不能言动，意有所契，仅知点头。孤眠独立，托处房山，以为我地莫尊，我计莫得，我心莫静，我体莫宁。千岩万岫闲，确乎

其不可转矣。

顷者山灵失职，不守藩篱，俾我支机，漫遭汉使。遂承足下安车蒲轮，从者数百，厚币卑辞，远辱召命。天壤可敞，知己难逢。昔秦皇帝欲通三山，遗仆入海，尝靳带厉，虐以鞭笞。仆义不受辰，身可流血，足必不移。

今当足下拜使即行，几不俟驾。大夫之命重于王者，何则？知与不知也。拘挛之夫，寡闻浅见，见仆出山，以为希事，物议蜂起，毁言日滋。行虽半途，畏不可涉，踌躇四顾，无复敢前矣。嗟乎足下，实负雅怀，略陈固陋。仆生长幽处，风蔓雨芜，陶然适也。烟花台榭，作陷阱观，窍若玲珑而器本窒碍，圭角纤峭，不学磨棱，原非世纲之具，又岂磬折之姿？足下不察，谬尝为奇。称仆以支持乾象，尊守坤维，广大圆通，卓哉国宝。闻似过情，美颇溢实。恭聆斯语，惟有主臣。

仆累累族齿，未琢未雕，散居名山，不可数计。其在灵璧者，家声尤重，莫不镌镂祖训，怀宝怀刑，往有不类，不师至人，后身持己，为天下先，技逞一长，法罹三尺，以惊人服射刑，以补天服炼刑，以砥中流服淹刑，殆哉岌岌乎，殷鉴不远。足下爱仆甚，知不令补天砥流，此祸无患。然使仆正墙面而立，备弄臣之员，贻之以安，似非重征仆之初意，仆不屑也。

使仆展厥生平，监峻任钜，不少贬岩岩之度，足下能保人不惊乎！惊斯疑，疑斯畏，畏必有以中之。淹练可逃，饮羽不免。足下仁慈莅众，蒲不滥施，何忍一介之士为知己者死耶？里有乔松甘泉者，松慕高而高奔，泉慕深而深注。仆犹然笑之，不解我衷，亦若有慕。窃恐今后松泉得及之矣。仆闻人情胥尚，惟位与金，多金高位，自昔重之。足下擅陈思之敏才，兼司空之博物，文人慧性，众揣不如。独奈何当官则计拙，与仆则情投？人藉位而营金，足下捐金而瞻仆。仆诚何奇，好酷至此？大非人情，愚不可及。

仆以足下永附廉吏之称，足下以仆及蒙愚公之谯。非所以答清贶而安予心也。且足下家傍琼林之中，则十面仙郎为政，自号玄衣客卿，既态既韵，亦见亦隐，五岳让其秀耸，八音争其铿锵，奇气逼人，不可一世，拥肿之与游，我形觉秽，何以施面目于此君之前哉？仆尚有虞焉。足下与客卿游有年矣，馆之以白玉之宫，升之于紫霞之座，窥彼所宜，曲合其意，行拟偕行，止拟偕止，而使聃在道，无计相将，躬质邱园，貌登缣素，邀人赞跋，对客摩挲，梦里玄衣，卷中斑管，鸟啼吏散，悠悠我思。假令仆严然而至，足下不胜之喜，必袍笏迎拜，晨夕与俱，异日君位渐高，君途渐远，携之不去，思之不来，有如今日，何以为怀？仆之累足下不浅矣。

语云：一贵一贱，交情始见。先人壁立公，一卷处士，虽与君家海岳老人定方外交，晨星俱殒，世远泽亡。足下拖紫纒青，不挟其贵，怜我子姓，少即负奇，或居侍从，或掌图书，济济布列，充满下陈，更惜老成，复迎耆长，世讲隆情，古今绝少。况今售惟贗品，鉴鲜真知，物价长于宋人，人群久无卞氏。足下画龙弗好，旁溪采山，务求迈种，以仆磴磴，均蒙推谷，启母若来，可追十乱，人之非常，举之违众，指示纷纭，良有以也。

仆非不知吐握再兴，闻风奔走，而憎兹多口，世有同情。伏惟垂原，勿加斧戮。幸甚。足下卖骨高名，遍彻崖谷，龙门崇重，人又愿登。一种不羁之子，不顾一世之非，求价急沽，未必不有。倘能留意，自入彀中。望夫干时，挂瓢辟世，所志不一，存乎其人。故山可归，吾完吾璧。嗟乎，足下，夫复何言！

初游尘界。来路已迷。导之使还，顾借力士。古称金铜仙人辞汉，铅水霏襟，仆既乏羊足，亦鲜燕翎，欲归未能，泪作时雨，惟足下念之。若足下膏肓有癖，嗜果在痲，请毕钟鼎之才，薄建山林之业，地无虎豹，乡颇安恬，俗子不来，恶声不入，煮之则我即粮，偃之则我即枕，待君结邻，同吾不老。足下计不出此耶？

作者以大青石的口气答复米万钟说：“仆山中顽民，赋质坚贞，意有所契，仅知点头。”话很明白，我本来是山里的老住户，赋性坚贞，遇到情投意合的朋友，仅仅知道点头同意。接着自言自语“孤眠独立，托处房山。”以为此生身处于“千岩万岫间，确乎其不可转矣。”本来以为可以长久地住在房山的千岩万壑之中，没想到遇见了爱石成癖的米大夫。一向奉行“大夫之命重于王者”的我，只能“远辱召命”，谁知刚一出山，就遭到“物议蜂起，毁言日滋”。所以走到良乡塔洼村这个地方就不想动了。为什么？虽然“行虽半途”，但因“畏不可涉，踌躇四顾”，才表达出“无复敢前矣”的感叹。尽管米大夫的勺园花团锦绣。想到大家的议论，左思右想，谁还敢往前走呢。石生秀雅自古多灾，你看，貌似猛虎的石头遭到李广的箭射；蕴含五色的石头被女娲炼以补天；生长巨大的石头置于水中身负激流。这些教训真得好好借鉴。后来，听说米大夫又做了高官，可是，对于我来说已经“君途渐远，携之不去，思之不来，有如今日，何以为怀？”可见，我与米大夫是“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回想来，米万钟大夫为了我费尽心力，真是“累足下不浅矣”。如能归见山林，远离恶声，与君结邻，和我一样同天共老多好啊。米大夫，你为什么不做这样的打算呢？两篇文章的主题是大石，一问一答，写得文采飞扬，传诵一时。

良乡是交通要道，大青石闲置道旁，成为远近闻名的一景。沿着大青石线

索追寻，在《日下旧闻考·京畿》条目，还收录有明代葛一龙所作《次良乡观米仲诏宪长所移奇石歌》：

塔洼村北野草荒，草间突兀孤云苍。  
欲行不行气若郁，将雨未雨天无光。  
云是米家凿山出，百步千人移数日。  
到此踌躇不肯前，秦鞭无力楚力拙。  
大木纵横到一林，相为枕藉岁年深。  
或需天手妙神用，或眷山祇萌故心。  
我与之言叱之起，几时得渡浑河水。  
崕呀空洞宿阴霆，鲸脊鳌簪立奇鬼。  
主人好礼尊石公，神物亦岂甘牢笼？  
不如就此树高阁，居处日对飞来峰。

葛一龙(1567—1640)，字震甫、震父，号愚园居士，吴县东山(今江苏苏州吴中区东山镇)人。善于诗画，性好交游。据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所载，葛一龙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赴京援例谒选，后由贡生选授云南布政司理问，摄弥勒州事。虽廉洁为民，却难酬其志，未几归罢。此诗应写于赴京之时，其时葛一龙 42 岁，由南至北进京，良乡为必经之路。诗作虽短，信息丰富。首先，我们准确知道了大青石放在了塔洼村北，这个地方就是现在良乡火车站过街桥东边一带。何以见得？因为这里有一座三教寺，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写过一篇《良乡三教寺记》，文中说：“庚子八月，予以使事过良乡，迟三弟中道不至，寄居东关外。偶同客步小石冈，过塔洼村，店四十余家。垆烟尽处，碧瓦参差。路人曰：‘三教寺也’。”三教寺的位置，在火车站过街桥北一里左右，袁宏道写的《良乡三教寺记》三教寺已毁，但石碑仍竖立在此。民国十三年（1924）编修的《良乡县志·城池》条目记载：城外东北“塔洼村，距城三里”。解放后，塔洼村梅花庄合并。此处近年正在拆迁，村人多移入楼房。大青石由千人用 12 日才移至于此。作者看到运石滚木纵横堆放在一起，多得竟有“树林”之感。站在石前，作者不由大喝：“你几时才能渡过浑河之水呢？”浑河就是卢沟河，言下之意，眼前的小沟都过不去，渡卢沟河更是难上加难。与其这样，我看不如在此树起高阁，使人如对飞来之峰。

米万钟上任后不到一年，就卧病在床，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梦魂牵绕的大青石运到勺园就抱恨而去，终年只有 58 岁。这一年是崇祯元年（1628）。朝代更易，云卷云舒。大青石一任风雨飘摇。又过了一百余年后，清朝乾隆十五年

(1750)，乾隆皇帝以国家之力，从良乡把大青石运到清漪园乐寿堂，比起当年的米万钟来真是“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大青石运来了，又一道难题出现了。乐寿堂的门太窄。大青石身大体重难以进院。乾隆皇帝下令把刚修好的宫墙和大门拆除，把大青石运进院子后再把门墙修好。石头是运进来了，孝圣皇太后听说拆门墙运石这件事可生气了。她了解了“败家石”的故事后，大为不悦地说：此石“先败米家，又破我门，其石不祥。”面对皇太后的态度，再把大青石运出去是不可能了，但又不能违拗母亲。于是，乾隆皇帝仔细欣赏起石头来。根据大青石的形状和润色，考虑到他母亲的忌讳。取意大石突兀如青芝出岫，给它起名“青芝岫”，并挥笔题写将“青芝岫”三个字刻在石头上。同时把所写《青芝岫》一诗写于门楣，诗曰：

我闻莫厘飘渺，乃在洞庭中。湖山秀气之所钟，爰生奇石窍玲珑。石宜实也而函虚，此理诚难穷。谁云南北物性殊燥湿？此亦有之殆或过之无不及。君不见房山巨石磊豗豗，万钟勺圆初筑茸。旁蒐皱瘦森笏立，缒幽得此苦艰涩。致之中止卧道旁，覆以葭屋繚以墙，年深屋颓牆亦废，至今窍中生树拱把强。天地无弃物，而况山谷良？居然屏我乐寿堂。青芝之岫含云苍，崔巍刻削裒直方。应在因提疏乞以前辟元黄。无斧凿痕剖吴刚，雨留飞瀑月留光。锡明提什翰墨香。老米皇山之石穴九九，未闻一一穴中金幢玉节纷紫纠。友石不能致而此致之，力有不同事有偶。知者乐兮仁者寿，皇山洞庭夫何有？

均成和成钢于1985年编写的《颐和园楹联镌刻浅释》中有这首诗的意译，对于理解这首诗有所启发，现抄录如下：“我听说莫厘山缥缈峰皆在太湖洞庭山中。天所赋予的湖山秀气，生出玲珑剔透的奇石。这些奇石既实又虚，其中奥妙难以尽言。谁说南方北方的物性有燥湿的不同？我看不能一概而论。君不见房山巨石巍峨挺拔，正当米万钟勺园初建之时。各处收罗的奇石如森笏般挺立，取自深山幽谷何等艰难。这块山石半途而废弃之路旁，只好复以草棚，绕以围墙。年深日久，草棚、围墙均已颓废，现在孔隙中生长的树木已有一握之粗。但天地之间并无弃物，何况此石质地如此之佳，得以屏放在我的乐寿堂前。如青芝般的山岫云雾苍苍，如鬼斧神工般的雕琢直且方。此石形成应是开天辟地之时。石如吴刚伐桂无斧凿之痕，经过飞瀑的冲刷，月光的照射。如今我赐以名，题以字，使翰墨留香。米芾的皇山之石有孔隙八十一个，也没有听说其石穴中有此奇观。米万钟不能得到此石，而我能得到，事虽相同而力不同。此石能使智者乐使仁者寿，皇山洞庭还能有什么好的山石呢？”乾隆把“青芝岫”奉为群石之首，认为以出产南太湖石著称的洞庭湖，也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灵秀

奇石。作者所说的莫厘山，在江苏省吴县西南太湖中，此山盛产太湖石。写此作为赞颂大青石的铺垫，话锋一转，感叹地说“君不见房山巨石磊岌”，读此使人眼前一亮，得知大青石之身世。遥想米万钟将石“致之中止卧道旁”，使得石上孔洞“生树”有一握之粗。没想到闲置在大道旁的百年“弃物”，今天“居然屏我乐寿堂”。你看，它“青芝之岫含云苍，崔嵬刻削哀直方。”巨石形成于开天辟地之时，细看“无斧凿痕剖吴刚，雨流飞瀑月留光。”面对“青芝岫”，“知者乐兮仁者寿，黄山洞庭夫何有？”赏石能使智者快乐仁者长寿，有了“青芝岫”，黄山洞庭还能有什么比它更好的石头呢？乾隆的评价发自内心，值得品味，从此，房山的北太湖石名满天下。

“青芝岫”从发现到落脚乐寿堂的一百多年间，只有乾隆皇帝高度评价了“青芝岫”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大石的东侧刻“莲秀”，意为莲中之秀；西侧刻“玉英”，意为玉中之英。两处字迹可辨，“青芝岫”三个字由于多年的风化，“青”字因石质崩裂而脱落，只剩下边“月”字的竖勾隐约可见，“芝岫”二字仍然清晰。此石“昂首而俯，跂而敛。濯之色而青，叩之声而悦。”每到春秋时节，爬山虎环石生长，苔藓浓密苍翠，青芝岫洞孔生辉，基石上海浪翻动。两旁海棠盛开，顿生超然之感。”清人李灯中撰《良斋笔记》亦将明清两朝运石之事记述在卷。

乐寿堂是颐和园居住生活区中的主建筑，原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咸丰十年（1860）被毁，光绪十三年（1887）重建。“青芝岫”的位置却一直没动。光绪皇帝为“青芝岫”这块灵石，在乐寿堂门楣上题写四匾相配：“仁以山悦”、“洞壁怀山”、“景福来屏”、“舒华布实”，说明光绪皇帝对“青芝岫”的赞美。

《日下旧闻考·国朝苑囿》载：乐寿堂有大石如屏，恭镌御题“青芝岫”三字，东曰“玉英”，西曰“莲秀”。门楣上御题乐寿堂诗，前轩御题额曰“水木自亲”乾隆六十年御制“青芝岫”诗。诗前序为：“米万钟大石记云：房山有石，长三丈，广七尺，色青而润，欲致之勺园，仅达良乡，工力竭而止。今命移置万寿山之乐寿堂，名之曰‘青芝岫’，而系以诗”。其实，和乾隆皇帝题诗相呼应，许多大臣也奉命题诗石上。大臣汪由敦写有《青芝岫一律》，现残存数行：“……口口凝玄彩，珠口润兼纹。运势森兰秀，高标树五云。松筠同献寿，瑞气共氤氲。”

民间传说，由于“青芝岫”经历了两个朝代的风雨，致使米万钟因此兴家又败家，最后进入皇家宫苑的经历，触发了一个作家的创作灵感，与现实生活

和自家的遭遇相结合，构思创作了旷世名著《石头记》，后因此石名气太大，怕招惹文字狱，才披阅十载删削五次，复以曲笔，更名《红楼梦》。可见，房山大青石在人间游历的传奇曲折动人，由此诞生了一部旷世之作。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主编的《红楼梦的传说》中有“青芝岫与《红楼梦》”一文，文中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到了“青芝岫”这块石头，他写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但不知起于何时，落于何方？”“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降株草一株。那时这个石头，因娲黄未用，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它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居住，就称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我以为，这里的“娲黄未用”和薛冈文中的“以补天服炼刑”如出一辙。曹雪芹把乾隆在大青石上题写的“神瑛”，点化成“神瑛侍者”，把乐寿堂前的“青芝岫”幻化成了贾宝玉所佩带的“通灵宝玉”，这宝玉最后成为贾家的“丧家石”。

站在乐寿堂前，关于“青芝岫”，人们获取的信息源于说明牌，上面写道：“青芝岫，俗称‘败家石’，据史料记载，明朝官僚米万钟于北京的房山发现了这块色青而润，状若灵芝的巨石。在运往米氏勺园的途中，由于财力不支，不得不弃于郊野。后被乾隆皇帝耗巨资放置于此，取名‘青芝岫’，是中国最大的园林置石。”

# 百花山瑞云寺

杨亦武

百花山瑞云寺位于史家营乡曹家房村北。始建于北周武帝时期，北周武帝时期曾发生法难，而在这处山西、河北、北京交界的深山却逆时而动，有佛教寺院兴建，的确是北方佛教发展史上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隋文帝开皇年间重修，当年的石刻寺额一直保存到明代。据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瑞云寺的第二次重修是在唐代的玄宗时期。五代时期，瑞云寺属于后唐的势力范围，受到后唐皇室的青睐。瑞云寺没有留下辽代的碑刻，后世碑刻对辽代的记载缺史，所以我们对瑞云寺辽代的情况一无所知。

说到瑞云寺，不能不提到金元之际的高僧行懿，他曾三住瑞云寺，又主持修缮了被战争摧毁的寺院。

行懿俗姓刘，金海陵王贞元三年（1155）出生，德兴府矾山县缘矾里（今河北省怀来县境内）人。七岁志乐出家，初礼宣德州（今河北省宣化市）天宫寺长老道常为授业师，法名行懿，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三十岁的行懿受具足戒，他深得道常的赏识，此后随道常离开大明寺游历于河朔地区的各大寺院，金章宗时期，道常退居中都西山的瑞云寺，就是今天房山区史家营乡曹家房村的瑞云寺，行懿追随道常来到瑞云寺，这是行懿第一次来瑞云寺。不久，行懿随道常离开瑞云寺前往盘山。章宗降旨，令道常住持香山，行懿于是也到了中都香山。道常行化后，行懿后成了道常的衣钵传人，返回阔别已久的瑞云



瑞云禅寺二进殿

寺。百花山下的瑞云寺是一处难得的形胜之地，北冠大寒岭，南带龙泉河，松桧阴森，果栗荣茂，千变万状，纵萃目前，山路崎岖，人迹稀少，的确是僧家修静的宝地。行懿主持瑞云寺后，山寺日益兴旺，十年时间，僧众达到二百人。瑞云寺洞风远播，四方檀信施斋送供，踊跃前来。

乌绍王至宁元年（1213），行懿六十四

岁，卫绍王敕赐他紫袍一袭。时值金末，在蒙古大军的攻势下，大金国已是风雨飘摇。这年八月，权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与进攻中都的蒙古军激战兵败，发动政变，弑卫绍王。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蒙古大军又进逼中都。贞祐二年（1214）三月，金宣宗遣使向蒙古厚贿求和，蒙古暂时退兵，中都解围，五月宣宗放弃中都逃往南京（今河南开封）。贞祐三年（1215），早已逃到南京的宣宗在局势动荡的时候，尚赐远在中都西山的行懿紫衣，并敕赐“通圆大师”之号。

贞祐三年（1215）五月，蒙古军攻克中都，并兵袭南京（今河南开封），至此金朝全境大部分陷于战火之中。沦为蒙古人统治的中都地区横尸遍野、百姓流离、耕桑久废、饥馑交加，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地处深山的瑞云寺，僧人四散，惟独行懿留下来，栖身于瑞云寺附近的圣莲山的岩穴中，吃松叶喝泉水度日，行懿隐于圣莲山的石穴中两年多，一天，乱兵抓到七个山民，两个男人，五个女人，要把他们放在锅里煮着吃。行懿挺身而出，劝乱兵不要伤害他们，乱兵被行懿的真诚感动了，竟然放了这七个人。

元太祖十一年（1216）十一月，矾山（今京西妙峰山）安水寺行僧德全、达曹使三千三等四人，来到行懿所在的圣莲山，衔命请行懿出山。行懿先后到过清安寺、武川（今内蒙武川县）十方院、椒峪（今山西省陵川县梁泉村）龙岩寺、灃阳宝宁寺（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境）。翌年，武川摩诃院大开坛，行懿又应邀前往主坛。

行懿回龙岩寺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就在行懿在龙岩寺清隐的时候，矾山寺高宣差路过百花山瑞云寺，目睹瑞云寺殿宇倾圮，禅刹荒凉，彷徨不忍离去。于是请出驻扎在矾山以北的实力人物刘、聂二帅商议，迎请德高望重的行懿回瑞云寺主持寺务，以重振瑞云寺。行懿回到瑞云寺，见到殿塔摧毁，荒废不堪，伤感地叹道：“已经不是我原来居住的寺院了！”于是主持重修旧刹，光复山门。李宣差等创建外库房塔，二郎、曾四、高监军创建山神堂，斋堂、清水等村创建神堂，参与修建工程的人都自备工匠役人和口粮，不久瑞云寺山门一新。行懿自受印以来，度僧二千许，尼八百余，富贵者七百人，俗家弟子十万之众。

元太宗四年（1232）七月间，行懿的弟子德道、德行见行懿年事已高，先期为行懿建造寿塔，元太宗五年（1233）年五月告成。当年六月，行懿让位于通公主持瑞云寺，退西庵闲居。至七月初二日，行懿病重，自己离开座位，沐浴净身，换上衣服，盖上被单，向众弟子留下临终遗言，谈笑而化。终年七十八岁。

行懿可谓金元之际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事迹，真实反映了在金元交替的社会背景下瑞云寺的一段历史。

元初，行懿的弟子通公主持寺事，通公主持瑞云寺的年代约在太宗到世祖中统初，之后有一两代僧众事迹缺失，此后便是玉溪渊公，此公约生活在世祖未以后的一段时间。武宗元至大至泰定帝泰定年间，瑞云寺有三位住持，即从公、信公、照公。民国时期，这三位高僧的灵塔尚存，共塔铭也完整的保存下来，所以我们今天能知道他们的事迹。

从公，名信从，号照寂，福建品平人。俗性刘，十五出家，拜玉溪渊公为师，先后师从于仰山琏公、风穴定公、潭柘顺公、香山口公，屡蒙印可，几经参历之后，从公回到了玉渊公身边。渊公问他说：“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从公回答说：“这本来面目描不成，画不就！”渊公知道从公已经开悟，于是就让他做了衣钵传人。从公灵塔立于至治三年（1323）。

信公，名义信，号巡峰，宛平人，瑞云寺第十二代住持。至大四年（1310）拜玉溪渊公为师，参学十年，乃得付法。至治元年（1321）八月十二日圆寂。三年（1323）夏立塔。

照公，名从照，宁远方城人。出家于慈氏院，拜首座行公为师，潜心佛典，对《圆觉经》《严楞经》等佛教经典，均能深通义趣。塔立于泰定二年（1325）。

留下事迹的另一位元代瑞云寺高僧乃是信忠。对于信忠生平我们知道得不详，仅据元顺帝至正十年（1340）大都竹林寺高僧法帧所撰《大安山瑞云寺修造功德碑记》我们知道，信忠是在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年）住持瑞云寺的，其间曾对瑞云寺进行了修缮，他将瑞云寺的殿宇修建得更加高大宏伟，重绘了祖师堂的壁画，重塑了四大天王和地藏菩萨的神像。还增建了僧房，关帝祠和龙王祠也修缮一新。为了增加瑞云寺的人气，信忠还令画工在瑞云寺大殿内彩绘二十四孝图，来迎合世俗的心理。

另一方元代碑刻《长明灯记》则记载了顺帝至正十二年（1342）从秘书卿朴卜华奏请顺帝赐钱两千五百缗作瑞云寺大殿长明灯供的史事。以上便是我们知道的元代瑞云寺之大概。

据碑刻考证，明代对瑞云寺进行过三次修缮。第一次在正统年间（1436-1449），第二次在嘉靖八年（1529），第三次在万历年间（1573-1620）。嘉靖八年（1529），增建了迦蓝祖师殿和钟鼓楼。万历年间（1573-1620）由住持性常募化重修，得到张安等朝臣的资助，万历生母慈圣太后也发内帑助修。根据瑞云寺现存建筑风格看，清代初曾对瑞云寺进行过修缮，只是没有留下碑

刻记载。

至民国时期，瑞云寺历四百余年已是面目皆非。民国十八年（1928）周兆祥、傅增湘等人到百花山区考察时，瑞云寺山门大殿都已经破败不堪，原本庄严的道场，院内却用来种菜，持僧长明率徒孙住在东院，寺内有小殿三间，佛像都集中在那里存放，殿内的经书上落满的灰尘，这些都是明代大藏经《南藏》，乃明嘉靖三年（1524）存入瑞云寺的。民国晚期曾对瑞云寺进行过局部修缮。《宛署杂记》曾记载，瑞云寺今后周时期创建，历代重修 38 次。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详情。寺庙最后两代住持名长明、乐山。

如今瑞云寺大至保存着旧观，现存建筑为清代重建。寺院坐北朝南，两进院，前院长方形，青砖墁路呈田字形；后院正方形，青砖墁路呈米字形。整个寺庙中轴对称，肃穆古朴，威严而错落有致。主要建筑有山门、一进殿、二进殿及配殿等。山门为单间无梁殿，高 10 米，面阔 5.2 米，进深 2.9 米，石券门，歇山顶装饰绿琉璃吻兽。门额原嵌汉白玉匾“瑞云丛林”，为北洋军阀曹錕题书，“文革”期间被拆除，不知去向。寺前有 4 株古油松挺拔苍劲。一进面阔 3 间 9.8 米，进深 3 间，前后出一步廊，大式硬山挑大脊，灰筒瓦覆顶，苏式彩绘，明间 4 扇隔扇门，次间隔扇窗。两侧配殿各 3 间。二进院门额题“小西天”，正殿面阔 3 间 9.85 米，进深 3 间，前出一步廊，殿基高 2 米，台阶级，苏式彩画，菱花隔扇门窗。殿内大梁上悬挂一个斗，斗的四角、四边各悬挂一个升，称为“一斗托八升”。大式硬山挑大脊，顶部覆绿琉璃瓦，下部分覆石板，两侧各有耳房 3 间、配殿 5 间。院内残存碑 2 通，一通为元碑，掩埋地下；另一碑为明代碑刻，由于风化剥蚀严重难以辨认。寺后曾有塔院，今已无存。寺院东北保存一通金元之际的碑刻，为《故大行禅师通圆懿公德碑并序》，碑高 2.72 米，宽 1.46 米，螭首龟趺，碑文约 2600 字。

早年，与瑞云寺相邻的护国显光禅寺、圣莲山胜泉寺均为瑞云寺的属寺，瑞云寺为方丈住持的上院，普光寺为中院，胜泉寺为下院。民国时期，瑞云寺衰落，圣莲山易僧为道，兴盛起来，反客为主，瑞云寺反而从属于圣莲山蔡义先主持的道观，因此一度改换门庭成为道观。抗日战争时期，瑞云寺曾成为八路军的兵工厂，制造子弹、手榴弹等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以后，瑞云寺改建成史家营地区的第一所中学。上世纪 80 年代，中学搬迁后，寺荒芜。

# 古代良乡八景

张玉泉

宋代大画家宋迪将长沙的名胜绘成八幅风景画，并以四字命名，总称“潇湘八景”，令当时的画家、诗人人为之倾倒。南宋皇帝赵扩闻知，为潇湘八景逐景配诗，于是朝野轰动。此后，各地风景以取八景之数为多。一时成为时尚。

良乡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很深，至少在明朝以前就确定了“八景”。“八景”中有的已不复存在，有的至今仍存遗迹。其内容如下：

**燎岗古塔** “古塔”即昊天塔，位于良乡东关外的红土丘陵上。该塔始建于唐，重修于辽，民国二十四年又修葺。该塔呈八角形，结构精巧，造型优美。塔高 36 米，是北京唯一的五级阁楼式砖塔，已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塔内空心，可登高远望。历史上曾有许多文人墨客吟咏过昊天塔。云南举人樊巍的诗作《良乡行》便概括了良乡燕古一塔的风貌。诗中写道：“金台西南七十里，一塔寥寥纪燎岗。襟喉南北当燕古，水似琉璃波似光。”相传宋辽大战中杨家将主帅杨继业战死后，其尸骨就藏在古塔下的洪阳洞中，由此引发孟良盗骨的故事。

如今昊天塔四周一片生机盎然，树木葱绿、花草飘香。周边的良乡卫星城高楼林立，道路纵横如带，车水马龙，一派兴盛景象，已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昊天古塔

**城脚鸡鸣** 相传原来在良乡城东门的门楼上藏有一只金鸡，只要过城门楼时有声音震动，城门楼顶子便发出的类似雄鸡的鸣叫声，只听其声不见其形，成为良乡一道独特的景致。

**盐沟雪浪** 盐沟，即现在良乡西门外的刺猬河，每逢冬雪之后，盐河沟内形成一起一伏的雪浪。远望是银装素裹，在红日高照下，层层雪浪闪着银光道道，景色十分迷人。曾有诗记载过当时的意境：“西来白水日潺潺，流入盐沟不纪年。急浪翻时疑涌雪，微波漾处欲摇天。”

园荷点点跳新雨，弱柳依依带晚烟，偶步城南间眺望，堤边尚少钓鱼船。”

今日的盐沟河（刺猬河）两岸良乡段已修建成一座美丽的公园——“塞纳河公园”，是一处人文景观浓厚的场所。

**广阳遗城** 在窦店镇的西侧，潺潺流水的大石河左岸，有几条断断续续的土岗，岗上有的被改成园田，有的修成通道，只有在西北角，有几处凹凸不平的残墙藏在杂草丛生中，这便是近两千年前的良乡县古城。

良乡城始建汉高祖六年，东汉时曾改为广阳城。民国十七年《良乡县志》载：“广阳故城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旧店（今窦店）西一里许。”良乡县汉属广阳国，后汉属广阳郡，直到后唐长兴三年（932）迁至现址。废弃的旧城城围长不足5公里，后经多次修葺，呈长方形，城垣有内外两层。内层夯土，外层是堆积的土圉。城内靠西侧建有小城一座，为子城。史载：“武德元年，窦建德帅大军两次攻幽州，曾在此囤兵。”此后便成为一景，曾有古诗记道：“城池经劫火，旷野望茫茫。代远残碑在，时移古径荒。晓烟啼鸟雀，落日战牛羊。满目风沙蔽，萧骚忆广阳”。此古城遗址已被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燕古长桥** 即今琉璃河大石桥。石桥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九月修成，汉白玉石质，全长134米，宽11米，高5.57米，下有拱形孔洞11个。桥面用280块条石衔接砌筑，两面立有86根石柱。站在下游望去如一条莽莽玉带穿其间。桥头两边分别矗立四块多孔太湖石，每逢有风吹来，便发出嗡嗡的响声。此景称作“四大鸣山”，常吸引路人驻足欣赏。



琉璃河石桥

琉璃河大桥是华北地区十分盛名的古桥之一，历来有许多文人骚客歌颂该桥。如文天祥于德祐五年（1279）冬被押至琉璃河大桥时写下了《雪后过琉璃桥》一诗：“小桥度雪度琉璃，更有清霜滑马蹄，游子衣裳和铁冷，残星荒店乱鸣鸡。”明代文学家袁中道也曾留下了《琉璃桥》一诗：“飞沙千里障燕关，身自奔驰意自闲。日暮邮亭还散步，琉璃桥上看青山。”

**梁公芳沼** 该景位于良乡县南35里的琉璃河镇立教村村西。大石河下游分流处，俗名称立教洼。金代良乡人梁斗南在此种莲六顷，成为良乡县南一片荷花塘，是独特的一景。曾有诗：“人往风流在，亲情酷爱花。荒村留胜迹，秋水湛清华。析绿余垂柳，残红落片霞。梁园名最古，此沼可同夸。”梁斗南，

一生爱莲，曾登元代进士第一名，官至河南都运。后告老还乡，死后葬于立教村，今墓早已无存。

**望诸君墓** 此墓即乐毅墓。乐毅，战国时期燕国名将。昭王二十八年（前284），他统率燕军破齐，连攻下七十多座城，使战国诸雄为之震惊。燕惠王继位，乐毅出奔赵国，号望诸君。墓位于良乡县南三里的富庄村，墓地约十亩。古往今来，乐毅墓深为世人所敬仰，据史载，柳宗元、韩愈、汤显祖等均曾撰文凭吊。

**贺云夕照** 良乡北端六里许有贺照云村（原属良乡县辖）。此村村北为青山环抱。村东、西各有古墓一座，坟内古树参天。每当夕阳西斜，全村便笼罩在金色的晚霞里，田野、村落、房屋、树木都涂上一层粉红，宛如一幅美丽的油画。

# 圣莲山长星观与长生观

杨亦武

圣莲山位于史家营乡柳林水村，青峰挺秀，碧岫生云，有洞天福地之称。圣莲山上有两座道观，一南一北，俗称南庙和北庙。南庙叫长星观，北庙叫长生观。两观隔“南天门”相峙。

圣莲山原是一座佛教名山，南庙长星观原为胜泉寺，该寺始建于金末的贞祐三年（1215），开山鼻祖为金代晚期高僧行懿。因行懿曾在武川摩诃院开坛讲经，世称摩诃禅师。

行懿俗姓刘，金海陵王贞元三年（1155）出生，德兴府矾山县缘矾里（今河北省怀来县境内）人。七岁志乐出家，初礼宣德州（今河北省宣化市）天宫寺长老道常为授业师，法名行懿，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受具足戒，后为史家营乡曹家房瑞云寺住持。卫绍王至宁元年（1213），行懿六十四岁，卫绍王敕赐他紫袍一袭。贞祐三年（1215），早已逃到南京的宣宗在局势动荡的时候，尚赐远在中都西山的行懿紫衣，并敕赐“通圆大师”之号。蒙古军攻克中都，并兵袭南京，至此金朝全境大部分陷于战火之中，地处深山的瑞云寺，僧人四散，惟独行懿留下来，栖身于瑞云寺附近的圣莲山的岩穴中，吃松叶喝泉水度日，后来便在此创建佛寺，这就是后来的胜泉寺。

历元至明，胜泉寺薪火相继。当年，灵宝和尚以白银一百七十六两买得圣莲山山场作为庙产，至明嘉靖中，胜泉寺成为大房山连泉寺的下院，印宗大师的再传弟子月天和尚来到胜泉寺主持寺务，在胜泉寺中率领僧众念佛修行。当年胜泉寺殿堂房舍相当完好，殿中佛像齐全。月天将胜泉寺发扬光大，嘉靖二十七年（1548）三月九日，他募化众缘，起造释迦、弥陀、观音势至三大菩萨三尊石佛，胜泉寺香火愈加旺盛。圣莲山险境“阎王鼻子”原有山神庙三间，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六日，月天募化善人栗仲成、信女赵令秀铸铁钟一口，悬于山神庙旁的一棵山树上。明末的天启年间，真祥和尚募造大铁钟一口悬于胜泉寺的钟楼内。

明清交替，胜泉寺败落，顺治二年（1645），住持僧有王来水，矢志苦修，

得到北京阜城门董瑞隆的捐助，对胜泉寺进行过修缮，顺治三年（1646）告竣。



到了清康熙早期，道教的势力已经进入圣莲山，胜泉寺成为道观。康熙十一年（1672），住持道人妙通，见圣莲山路途艰险难行，他得到施主赵莲成的捐助，在阎王鼻子旁的绝崖处修六十余丈的铁锁梯道供朝山的信众攀行。大约在清雍正时期，住持道人高扬名曾对南

庙进行修缮。

清嘉庆十三年（1808），住持道人高永达得到北京顺城门外报子街张景训、刘应乾的施助再次对南庙的菩萨殿、钟楼和禅堂进行了修缮。附近房山门头沟两地二十五村四十八人参加了修缮工程。此时，南庙道观在当地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当年，高永达座下已经有孟元印、林元亮、刘元方、高元柱四大弟子。

南庙由佛寺改为道观以来，原来是佛教殿宇和神像依旧存在，甚至连观名都没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以“圣米石塘”代称，直到清代晚期才有了正式的观名“圣母宫”。

清光绪十九年（1893），清皇宫大内御膳房司事刘厚斋发起重修圣母宫，恰逢北京白云观高云溪道长应圣母宫道士曹理阅、董宗道师徒的邀请，在圣母宫养静，高云溪从中资助，圣母宫得到全面的修缮和扩建。

清末民初，圣母宫有两位道士，女道长杨清风，宛平人，活了一百四十七岁；另一个是男道长牛理先，山西人，活了一百二十六岁。

杨清风、牛理先传了两个弟子，一个是女道士曾义明，一个是男道士蔡义先。这两个人在民国年间鼎鼎大名，行医兴道，将圣莲山道观推向了全盛期。

曾义明，湖南人。任南庙观主后，南庙由圣母宫改称长星观。曾义明门下住山弟子已经近二十位，其中徒弟有乔礼会、阮礼仪、王礼秀、李礼志、李礼妙、邹礼谨等；徒孙有陈智恺、索智和、关智悦、任智祥、张智洞、黄智教、周智普、张智增、郝智禄、连智宽等，小小的长星观已经很难容纳。长星观年久失修，加之道徒日众，曾义明下圣莲山化缘，筹集修缮和扩建道观的经费。她奔波于北京和河北广大地区行医济世，广结善缘，名声雀起，名卿巨儒都归于他的门下。民国十一年（1922），在北京他遇到了浙江钱塘某氏，为其夫人治好了多年不愈的顽疾，某氏十分感激，恰逢其母八十寿辰，一家人决定简办

筹宴，将节省下来的钱捐给曾义明去修缮长星观，曾义明用这笔钱当年便对长星观进行了局部修缮。民国十三年，于是曾义明得到民国大总统曹昆的资助，开始筹筹备修缮位于大石河下游的下院黑龙关龙神庙，供徒众居止。

曾义明的师兄弟蔡义先，更精通医术，云游足迹南至江淮，北迄宣化大同。凡疑难杂症，手到病除，他古道热肠，济世为怀，分文不取，因而道声远播，为圣莲山道教的兴盛营造了广泛的人脉。就在曾义明下山行医化缘营建本院和下院的同时，蔡义先在圣莲山别辟道场，起名为蟠桃宫，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北庙。蔡义先主要得到了民国参谋总长张怀芝的资助，民国十三年北庙蟠桃宫在圣莲山落成，隔险境“南天门”与南庙长星观开成南北对峙之势。蟠桃宫三进规模：一进斗母殿，二进圣母殿，三进西王母殿，南配殿祀观音，北配殿祀关公。蟠桃宫的南面有三座天然石洞：分别为九莲洞、长生洞、聚仙洞，附近还有长春洞、上清。三月三日，举行了盛大的开光典礼。民国参谋总长张怀芝亲笔撰写了《创建莲花山蟠桃宫碑记》。

蟠桃宫的创建，使圣莲山形成了南北两庙并存的局面。而南庙创建在先，北庙蟠桃宫在后，北庙比南庙整整晚了七百零九年。

蟠桃宫落成后，张怀芝经常来此静养。此后不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小楼出资在宫旁建小楼一座，闲暇时便携家眷前来清居。不料，这座小楼被山火焚毁。民国十六年杨小楼又出资在原址上建起一个院落，名为古真堂，成为北庙的重要组织部分。古真堂实际上是北庙的客堂，除杨小楼不时居住外，其它朝山的客人也在此落脚。在创建古真堂的同时，杨小楼还出资两千银元，在峭壁上开辟了一条长达五华里的上山通道，直通北庙，极大地改善了北庙的交通条件。古真堂落成后，北庙统称为长生观。从此，蔡义先主持的北庙长生观和曾义明主持的南庙长星观成为圣莲山的姊妹道观。由于蔡曾两道长的声望，圣莲山闻名于京城内外，为民国时期北京地区最有影响的道观之一，圣莲山成为著名的道教名山。

## 南庙长星观

长星观位于南天门下、莲子峰北。门前两株古油松，寺庙山门额书“胜泉寺”，这是明代胜泉寺留下的遗迹。长星观因寺而观，随然易僧为道，但观内殿宇名称和布局承袭了胜泉寺旧况，这些建筑除改名为长星观，其它没有任何变化。

南庙坐北朝南，以天王殿过厅大门为中轴，钟楼、鼓楼对称东西，侧开两门，正北为圆通殿，东西配殿为弥陀佛和琉璃药师殿。圆通殿东西各有耳庑，为斋堂、僧舍，均为四合院格局，各3间。正大殿有前插廊，台阶5级，护阶坡石刻有鹤鹿同春、丹凤朝阳图案。殿堂均为挑大脊、硬压山顺水脊。大脊两端互为吻兽；顺水脊头有骑凤仙人；正殿顺水脊仙人后有斗牛、押鱼、狮、狻猊4兽。东西配殿以及正阳南门过厅殿均无插廊，顺水脊为三兽追仙，兽为龙、凤、海马。钟鼓楼上下两层，进深间，上层南北有窗，造型钟、鼓图案，顶为四脊攒中，有兽、仙人图案装饰。

圆通殿后为两层楼阁建筑，是寺院中轴线北端最高层建筑，俗称“高殿”，建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楼阁通高6米，长5米，进深3米，楼阁上层依山取势，前为插廊，隔扇，雕梁画栋中有石刻楣扁“万仙洞”。顶为5脊，脊头6兽。该楼阁是圣莲山南、北庙唯一保留下来的古建筑。楼阁一层进门为一山洞，这就是万仙洞，洞内壁有开凿的痕迹，壁有小龕、灯台处。楼阁外观是房，内为山洞，洞堂合一，内供三清主教，墙上壁画是道教的各路神仙。从万仙洞，人们可以寻觅到长星观的影子。

杏林塔院，位于长星观西院墙外。东西走向的青砖牌楼朝南洞开一券拱门，左款“德道昭日月”，右款“杏苑藏灵骨”，门额“杏林塔院”，院内有一片茂密杏林。上、下三堰坡梯立着一片青色塔墓，为胜泉寺和长星观历代僧道埋骨之所。塔院占地约40平方米，原有墓塔40余座，由于屡遭盗毁，墓地荒废不堪。2002年修复6座墓塔，修复时出土一块青砖，上刻“成公和尚灵宝长老之墓正德八年立”。塔院中古杏树，树龄逾百年。

古碾房，位于莲子峰下。坐西朝东，有并排两座房，各为3间。北3间内有一盘石碾，南3间为仓房。房屋大小相同，高2.3米，长6.7米，宽3米。前面为满装修，门窗均为“满天星”图案。石碾盘直径7米，碾砣长0.95米，圆轴直径0.7米，碾盘厚0.75米，为圣米石塘僧人碾米磨面使用，今仍能用。碾盘为青白石，碾砣为石灰石。由于常年使用，砣、盘上开凿的八卦沟槽已磨得十分光滑。神牛在神牛岭下、逍遥谷口北侧。2002年修建神牛台，台上修建一黑色犍牛，犍牛前腿欲跪，后腿紧弓，双眼瞪如铜铃，尽全身之力负重劳动，被称为神牛拉碾。旁有依山而竖铭志：“莲花峰峦升紫烟，摩诃显圣赠石碾，化作住持巧借牛，慈悲大度众生缘。”

圣莲宝塔，位于圣莲山胜泉寺之后、慧普山东侧、南囱崖口左壁绝顶之上，在原旧址扩大而建。塔坐北朝南，塔座为须弥，台阶有5级。因南临深谷虚设

假门，西门洞开，卷拱嵌铭“圣莲宝塔”。塔通高 26 米，六角五级密檐，檐下均有仿木结构的斗拱，二级以上临东南均有窗口。塔尖为金属鎏金，塔身为青砖卧砌，古朴典雅。叠涩檐角均悬铜铃，塔内盘旋台阶而上直至塔顶。塔内墙壁彩绘佛教圣像，形态各异，伴有佛教典故。顶板分别绘有佛教的七珍、八宝图。七珍为金轮宝、女宝、马宝、白象宝、珠宝、主兵臣宝、主藏臣宝。分别象征佛教妙静平和、传播广远、大力无比、园明光莹、克敌制胜、坚守律条。佛教八宝为轮、螺、伞、盖、花、罐、鱼、肠。

## 北庙长生观

北庙长生观有蟠桃宫、关帝祠、药王殿、长仙洞，此外还有圣母塑像和蔡义先墓。

蟠桃宫背靠青山，面临深谷。建有王母宫、圣母宫、斗母宫、三清殿。院内有碑记 2 通。王母宫，位蟠桃宫西端，为三合院，南向正阳大门。正殿面阔 3 间，前插廊，柱高 3 米，7 级台阶。房顶为深黄色琉璃瓦，调大脊两头为吻兽，前后压山顺水脊，脊头有仙人、小兽装饰。东西配殿各 3 间，前插廊，柱高 2.7 米；房顶与正殿一样均用琉璃瓦。正殿西有耳房，东有 2 株古油松，粗壮挺拔，树冠覆盖全院。宫中供奉王母娘娘，两旁有送子娘娘、痘疹娘娘。

圣母宫，位蟠桃宫中央。门楣挂“圣母宫”匾额。庙柱高 2.8 米，面阔 3 间，台阶有 5 级。房顶调大脊，两头互为吻兽，压山顺水脊前后 4 条，脊头有仙人、小兽装饰。装修为前插廊，门窗丹楹刻楠。院中有 1 株古油松，树冠如伞，笼罩圣母宫。圣母宫后有山洞称九莲洞。

斗母宫，位于蟠桃宫东北一天然溶洞前，洞称三台洞。洞内建 2 间房，房外有院，院旁有一水潭。洞前建有斗母宫，斗母宫正殿进深 3 间，两厢房各 3 间，朝南正阳大门。正殿台阶有 7 级，两侧各 3 级台阶。房顶均调大脊，互有吻兽，顺水脊前后 4 条，脊头为仙人、小兽装饰。院前、院右有 3 株高大云杉。斗母宫建于 924 年，供奉斗母元君，宫内壁画是六十甲子星宿神图。

三清殿分上、下两院。大门为砖拱门，进二门入正殿。正殿进深 3 间，前插廊，7 级台阶；两厢房各 3 间，3 级台阶。依山势建有 2 米高 1 米厚护墙，为防泥石流。三清殿为三合院，朝南正阳大门，外有下院，东西各为 3 间。房顶均为调高大脊，脊头互有吻兽，前后压山顺水脊，脊头有仙人、小兽装饰，殿顶为琉璃瓦。殿内供奉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1953 年，殿后山

坡被暴雨冲刷，掉下两块大山石冲破护墙，砸坏正殿，2003年复修。

关帝祠，位于菩萨岩下柏树沟。祠旁红松、桧柏围绕。祠堂坐西面东，门额挂“关帝祠”牌匾。关帝祠建于民国十四年，面阔3间，前插廊，砖石结构，房顶调大脊，脊头互有吻兽，前后压山顺水脊，脊头有骑凤仙人、小兽装饰，祠南端崖头修亭，名忠义亭。关帝祠供奉着关公，早年香火极盛，每年五月十三日关公圣诞之日，附近村民上山祭拜的很多，北京梨园界的人也到此瞻仰、礼拜。

药王殿，位于菩萨岩西斜坡。坐落山坎上，三合院布局，东进西出。正房面阔3间，东西耳房各3间。前有院墙，临谷东开大门。房屋砖石结构，调大脊，压山岔脊，脊头互为吻兽、小兽、仙人装饰。正房为“药王殿”，台阶5级，前插廊，两厢各3级台阶，周围一片苍翠山林，后为直立的峭壁，前临万壑沟谷。寺庙建于民国十四年，原供奉着神农、扁鹊、孙思邈。

长仙洞，位于蟠桃宫后山。为一天然溶洞，称长仙洞，洞口外有一间低矮的小房，洞和小房被一株古松覆盖。小房木石结构，盖青灰瓦，古朴典雅。正中神台端坐蔡义先铜像，铜像高梳发髻，身穿道袍，三缕胡须，仙风道骨，腰挎青锋宝剑。洞内钟乳倒垂，洞中有一天然坐台，为当年蔡义先修道的坐台，溶洞故又称得道台。洞外有一水潭，潭水如镜，山云可鉴。

圣母塑像，位于圣莲山菩萨岩。菩萨岩古称鹤子山，山呈三角形，壁如斧劈刀砍，光滑直立，远望如一尊正襟危坐的观世音，被称之为菩萨岩。菩萨岩半腰峭坎上塑造着一尊圣母像，像高3.8米，圣母手持净瓶，瓶口朝下，如甘露倾泻。塑像两旁侍女像高1.35米，3塑像同站莲花座上，塑像造型端庄典雅，如静如动，栩栩如生。圣母塑像雕于1925年，圣莲山圣母塑像是北庙保留下来的惟一塑像。

蔡义先墓，位于药王殿右侧山坳。背靠菩萨岩，面对莲子峰，林茂幽深。墓室为楼阁式间房，长3米，高3米，进深2米，四脊攒中，灰瓦，青灰涂墙，端庄肃穆。墓室背西北、面东南，南开一券拱门。按临终遗嘱，蔡义先坐化后，尸体用白布裹好，坐在一专门制造的轿子里，轿底下有长方形坑穴，穴中装有石灰和木炭，坑穴用轿为盖，轿外砌砖封实。

# 房山汉白玉

贾 昉

汉白玉是一种珍贵的大理石品种，属白云岩类，古时又称燕石，《山海经》又以“白珉”呼之。《韵会》曰：“珉，似玉而非也。”汉白玉质地坚硬洁白，石体中泛出淡淡水印，俗称汗线，故而得名汉白玉。房山区大石窝出产的汉白玉以其白如雪、坚如玉、面如霜、清润素雅、庄重伟岸而成为吉祥、高雅、富贵的象征，所以在历史上一直属历代皇家御用之品，因此也称为“白御石”。据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记载：“大石窝在房山西南六十里黄龙山下，前产青白石，后产白玉石，小者数丈，大者数十丈，宫殿建筑多产于此”。

房山汉白玉的故乡大石窝镇，蕴藏着丰富的石材资源，仅大理石储量就达2450万立方米。其中汉白玉储量有80万立方米，而以云南大理石而得名的大理石在云南储量也仅为3974.92立方米，可见大石窝镇大理石的储量就全国来说也处于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汉白玉石材储量在全国更是绝无仅有的。

房山大石窝汉白玉以其精良坚硬的质地、洁白细腻的品质、庄重富丽的风格而扬名中外。1998年，国家标准工作组在福建泉州市召开了“天然石材统一编号”国家标准审定会，房山大石窝汉白玉被命名为国标M1101，称之为“中国一号”，并以抗压强度156.4Mpa，抗弯强度19.12Mpa，肖氏硬度42.4度，抛光度102度而名列“中国名特石材品种”之首，从而显示出汉白玉在国内石材行业中的重要地位。

大石窝的石料开采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汉代，大量开采则在元、明、清几代。《元史》记载，元大都设有采石局，专门负责从各地采集名贵石料，其中的汉白玉都采自房山大石窝。明、清，大石窝的石料开采达到惊人的速度，特别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大兴土木，新建皇宫、殿宇，大石窝聚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这里形成了明显的村落，据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记载，至民国初年大石窝人口为其他村落的10倍，已达121户，1093人，多为工匠艺人，姓氏种类繁多，达百余种。从殿基础石至龙凤浮雕，从华表日晷到云龙御路，此外，有据可查的古建筑，如天安门、金水桥、卢沟桥、天坛、地坛、

十三陵、清东陵等，所用汉白玉石料大都取自大石窝。因此在民间有“先有大石窝，后有北京城”之说。而今皇龙山的前后左右留下近千处采石坑塘，大小不一，深浅不同，形状各异。其中最大的是高庄的老矿坑白玉塘，东西长 120 米，南北 40 米，深逾 20 米，是明朝开采汉白玉时留下的遗迹。

明清时期是开采石料的鼎盛时代，朝廷曾调全国各路石匠昼夜开采，成千上万个工匠，驻扎在数十个营地。如何统一行动？据说是以旗为信号：即旗升出工，旗落回营。现在，大石窝西北部的大青山就是当年插旗的地方，山上还完好地保留着夹杆石。两块长方形的石块对立着，高出地面 2.5 米、宽 1.5 米、厚约 50 厘米，上面有四个对列的碗口大的眼，以固杆用。据说当年山下还有两间指挥房，由升、降旗的人所居住。上工即上山升旗，下工即去降旗，风雨无阻。

明朝曾在大石窝设立管理机构“镇”，今天我们在大石窝村仍能看到明朝遗迹。镇中心的街叫官厅街，街内设有监督衙门、监狱等设置。街北原有一拉溜正房七间，均为普通平房。住有朝廷派下来监督官、有采石的管理人员，每天进进出出十分忙碌，监督衙门往西(现今农民李万全家)为高墙深院，四面有卫士把守，此处为监狱，用来关押破坏生产、不服管理的工匠。官厅街不准一个村民出入，更不得居住。

汉白玉的开采十分复杂，难度较大。汉白玉矿第一层是土盖，第二层叫青白石，第三层叫青白底子，第四层叫六蔓子，第五层叫混柳子，第六层叫麻沙，第七层叫花铁，这一层他们称为肉，是一种含铁的汉白玉料，第八层还是麻沙，第九层叫山蔓，第十层还是麻沙，第十一层叫原渣，第十二层叫麻沙，第十三层就是正宗的汉白玉三尺厚，第十四层是麻沙，第十五层叫二尺厚，也是汉白玉。经过多层的各种杂石，开采到真正的汉白玉，距离地表，已经是十多米深了。下面的汉白玉，有浸在水中的，玉润的感觉更好。

石料运输凝聚着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主要采用旱船和链车两种工具。旱船主要用于大型石料的运输，所需人力较多，一般在万人以上，冬天要沿途打井泼水，夏天要铺麦秸。链车是房山劳动人民发明的效率较高的石料运输工具，最多的十六轮车需 500 头骡马拉拽，以锣为号，统一行动。元、明时，运石路主要为房山石窝至京都一线，有百里之遥。至清，运石路有四条：通东陵路，起自石窝，途经长沟、房山、良乡，过卢沟桥，至北京，向东过通县、三河、蓟县到遵化东陵；通西陵路，起自石窝，经南尚乐，越拒马河，穿涞水县境，至易县西陵；通避暑山庄路，起自石窝，至北京，再经怀柔、密云等地，达承

德避暑山庄；山东孔庙碑石料运送线，起点石窝，循至东陵线，再由运河运至山东。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重修故宫三大殿中道石阶，石料采自大石窝，石料重 300 吨，用民夫 2 万余名，造旱船拖运，28 天才将巨大石料运抵京城。为运送石料，专造 16 轮大车，用骡马 1800 匹拖运。清朝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令石匠们将所刻纹饰去掉，重新雕刻云龙图样，流传至今。

新中国建立后，汉白玉又显示了特有的风采，北京的十大建筑有九处选用了汉白玉，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国旗基座石栏板以及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澳门厅和钓鱼台国宾馆的石材装饰，所用石料及石雕艺术品均出自房山大石窝。近年来的云南世博会华表、澳门回归的莲花底座，几乎所有国内大型活动及标志性建筑均采用房山大石窝的汉白玉石材。尤其在我国迎接千年庆典的世纪精品中华世纪坛的建设中，作为中华世纪坛的门户，重达 35 吨的整块汉白玉，象一尊定坛之神，座落在圣火广场的正前方。这块巨石长 8.65 米，宽 1.43 米，高 1.05 米，如此巨大的整块汉白玉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堪称无价之宝。

改革开放之后，房山大石窝的石匠飘洋过海，把中国的汉白玉、中国的石文化带给了世界人民，这个村曾被誉为京郊走出国门施工的第一村，生产的汉白玉雕刻艺术品远销欧洲、东南亚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用于国外皇室、亲王收藏和经典园林雕塑。如日本北海道中国庭院、加拿大枫华园的玉树龙亭、新加坡国家森林公园标志性雕塑，埃及世界公园微缩景观、德国柏林德月园、法国巴黎中国古典汉白玉石雕牌楼等，均有汉白玉玲珑剔透、坚贞靓丽的身影，它为人类留下了灿若星辰的宝贵文化遗产。因石刻文化滋养，大石窝即博得“石雕艺术之乡”、“书画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美称。2004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将大石窝镇列为国家级石雕产业特色小城镇。

# 再说良乡寿因寺

李瑞祥

2009年5月初，良乡梅花庄寿因寺遗址所在的梅花庄温泉游泳馆开始拆除，附近尚未拆除的少量民居和原村委会办公楼，都将一并拆除干净，按规划进行新的建设。

笔者继2008年采访到纪士忠和李淑琴两位老人后，又于2009年3月采访到另一位知情老人蓝凤宇。

1948年1月生于梅花庄的蓝凤宇，曾任村委会副主任。蓝家的房屋紧邻寿因寺遗址，西山墙距良乡火车站最东侧铁轨42米，北墙面距寿因寺创建者体空和尚墓碑仅1.5米。

## 墓塔 墓碑 墓穴

根据蓝凤宇老人回忆，寿因寺西南角的多座墓塔都是砖砌的，只有南端最高大的一座为汉白玉石砌。这座墓塔高约四米，横宽三米多，塔形矮胖。塔顶出一层檐，上有塔刹。塔身正六边形，没有设置假门窗。正面竖排刻有“开山住持郊公和尚塔”字样，楷书，每字宽约十厘米。塔身下部雕有一圈莲花，塔座四周立有不太高的石雕围栏。墓塔前东西两侧各立一通螭首方趺石碑，除西侧碑已摔断埋入铁路工区院内地下，东侧碑即体空和尚墓碑“公碑”。此碑现已风化严重，文字小而模糊不清，采用草书体。经笔者仔细研究辨认，碑文末行文字应为“乾隆十九年岁次甲戌腊月初八日”，撰写并书丹碑文的是一位居士。

因此，寿因寺遗址目前立于地面的三通古碑年代如下（以碑额篆字为碑名）：

三教寺碑

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吉旦

敕建寿因寺碑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夏六月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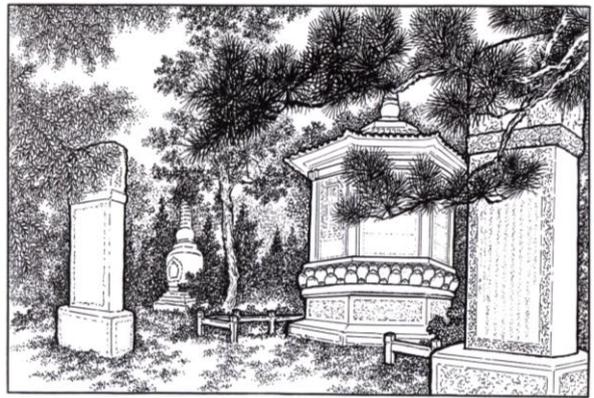
公碑铭

乾隆十九年岁次甲戌腊月初八日

1955 至 1956 年，良乡火车站扩建铁路工区。施工挖除和尚墓塔时，蓝凤宇看到墓穴上盖有条石。搬开条石后，墓穴并非横竖成行，而是呈阶梯状排列。每个墓穴里放有用紫砂泥做成的钵，钵呈圆形，大肚小口，直径约 20 厘米，高约 12 厘米，钵里盛放着骨灰。笔者为此请教一位江西来京参加佛事活动的和尚体行法师，他说墓穴的排列形式是按出家人的辈份决定的。

### 寿因寺的土地和烧法船

寺院一般都拥有土地。良乡地区解放前有个四十八村的“联庄会”，属于地方的自我保护组织，包括现在北到长阳镇的张家场，东到公议庄，南到琉璃河镇的大小陶村等，当时都在其范围内。村民发生有争议的土地纠纷时，当事人如果自己已无望胜算，又不愿意让对方得到便宜，往往就通过“联庄会”把有争议的土地



寿因寺墓塔墓碑（李瑞祥 绘）

捐给寿因寺。所以当时寿因寺拥有的土地，分布范围很广。其实从明万历“三教寺碑”的记载也可以看出，早在该寺创立初期，就拥有不少土地。三教寺碑的碑阴上部是施主名单，右下部有一小块碑面记载文字如下：

官中置买香火地二顷四十七亩五分内：皇亲地一段十八亩，济州卫新添地一段十六亩，又一段□□亩，济洲卫地五段共六十五亩，兴州卫新添地一段五亩，兴州卫地六段共一顷六十四亩五分，以上地为永远焚修。

碑阴左下部署名为：

开山第一代住持真圆徒如秀孙性添

寿因寺在民国时期曾有几个和尚，除土地租给农民可以收租外，一项重要的香火钱就是烧法船。每年农历六月初几，寿因寺都要举办盛大的烧法船超度亡灵法会。法船长三丈六尺，以纸和秫秸为主要制做原料，棚匠来寺里分段糊制，彩画完成后，从寺院较宽的旁门抬出去，在寺南几百米外一处空地上举行焚烧仪式。

## 寿因寺可能驻过外国使节

蓝凤宇回忆，约在 1980 年前后，北京市公路局曾来人寻访寿因寺遗址，说是在英国有良乡寿因寺的记载。

寿因寺在明末清初被战火烧毁，到康熙帝庚子春（康熙五十九年即 1720 年）来寺里巡视时，建成至少已一百二十多年的寿因寺“栋宇倾颓，丹青漫漶”。康熙帝让随同巡视的十六子允禄（庄亲王）负责重修，根据《光绪顺天府志》和《良乡县志》的记载，重修后的寿因寺“院宇清幽，花木繁盛，往来使者多驻节于此”。看来，当年英国的使者往来京城时，可能在此下榻，留下深刻的印象。

# 文殊道场显光禅寺

杨亦武

显光寺位于百花山麓的莲花庵村海拔 1900 米处山顶，与瑞云寺一样是百花山地区重要佛教寺院，也是北京市海拔最高的寺庙。显光寺并不彰显，却是文殊菩萨的另一处道场，所在的云峰碧岫古称佛岩山，有小清凉山之称。清代改称千佛山。

显光寺始建年代失考，辽代称佛岩寺，道宗太康年间已经存在。大康、大安年间，曾主持云居寺辽代晚期刻经的通理大师曾挂锡佛岩寺，戒台寺第三代住持、传戒大师悟敏在大安五年（1089）前后登佛岩山谒通理大师。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僧人本广将寺院重修，开文殊禅林，当年叫文殊寺。当年本广募化十六檀那、居士长者、官吏儒释道，各施资财，铸造铁钟一口，乃悬于寺西的菩萨庵前。

显光寺的寺名始自清代，显光寺所在相传千佛山时常夜间闪光，白天有七色光环笼罩，被视为是佛光显现，故将此寺改名为显光寺。显光寺名称的具体年代失考，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重修时，寺院的名字已叫护国显光寺。当年，只进行了局部修缮，重修了寺院的前殿。历时一百一十余年，至清嘉庆末，显光寺倾败不堪，道光初，传曹洞



显光寺全貌

宗第三十七世讳崑洪和尚来到显光寺，此僧为浙江绍兴栢门村人，到显光寺后，他“驱虎豹，建道场”，重建显光寺，号“重开山第一代”。道光四年（1824），重建的显光寺落成。当年的显光寺两进規制，一进正殿三间，奉燃灯佛，为燃灯佛殿，二进号千佛阁，二层建筑，奉文殊菩萨。显光寺落成后，崑洪在此传戒开坛，为诸方信仰，显光寺山门重光。自崑洪起，显光寺可考的嗣传依次为“法、定、无、真、常、乐、菩、提、道”，共至第十代。

显光寺是百花山麓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显光寺东南建上娘娘庙，东北建下娘娘庙，北建龙王庙。龙王庙北又建关帝庙、菩萨殿。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寺院建筑群。民国时期显光寺破败，抗日战争时期，昌宛房联合县在显光寺内设情报站。庙中的大铜佛像和铜钟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熔铸做了子弹。1944年，该寺被日军炮火毁坏。1945年，庙里最后一代主持吕正春下山还俗，此后寺院荒废。2005年，显光寺所在的莲花庵村复旧崇新，重建显光寺，历进沧桑的显光寺，劫后重光，薪火相传。

显光寺坐西朝东，为典型的辽代寺院坐向。四进殿宇依次为天王殿、药师殿、菩萨殿、千佛阁。千佛阁为双层结构，硬山顶，面阔三间 11.13 米，五架梁，进深三间 9.45 米，高达 15 米。阁内有高达 10 余米的铜铸文殊佛像和铜钟。寺内有碑记 7 通，其中 4 通残碑。残碑中，《三合会例年朝山碑》仅存半截；药师殿前有石碑两通，均于清道光二十年（184）立；《燃灯古佛碑》高 17 米，清道光二十四年立。1999 年 5 月，发现该寺铁磬，上铸“.....在京西百花山护国显光禅寺重修新造佛殿.....开山第一代传曹洞宗第三十七世讳昂洪和尚.....”，落款：“道光四年吉月吉日。”

上娘娘庙坐北朝南，四合院，大殿 3 间，面阔 9.0 米，进深 7.60 米，庙内供奉天仙圣母，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重修。今仅存遗址。下娘娘庙坐北朝南，大殿 3 间，面阔 9.90 米，进深 7.60 米，殿内正中供奉天仙娘娘，左右供奉眼光娘娘、子孙娘娘。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重修。庙前有碑记 3 通。1996 年史家营乡集资重修。2005 年，因寺庙所处地质发生变化，将原庙址拆除重建。

龙王庙坐南朝北，内供奉龙王，庙前有一金鱼池，有泉水涌出。2005 年 8 月修建。关帝庙坐西朝东，大殿 3 间，面阔 8.80 米，进深 6.45 米，供奉关帝。今存遗址。菩萨殿坐西朝东，大殿 3 间，面阔 9.50 米，进深 6.2 米，内供奉观音、文殊、普贤大士像，旁侍立四童子。清康熙五十七年重修。1996 年再次重修。

# 玉室洞天张良洞

张玉泉

房山西部古洞甚多，有些洞贯名老道洞，如十渡镇王老铺村的老道洞，霞云岭乡的四马台的老道洞，这些洞多数在志书上没有记载。《房山县志》上有记载的仅有两三个洞，而称“玉室洞天”的张良洞是其中之一。

张良洞位于河北镇檀木港村白口沟北半山腰中，据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载：“县西北七十里乃张子房辟谷之所，洞中有独桥十八滩，称玉室洞天”。又载：“寰宇通志称黄山有玉室洞天，日下旧闻又谓俗传汉张良微时隐此，亦名叫张良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曾考察过该洞。从檀木港白口沟南口的大河沟向北，一路爬高上坎，穿越荆棘丛林，到达辟谷坡（亦称黄山），需手脚并用攀爬七八十度陡坡，钻草丛越峡谷，爬过七八百米高的山腰上，只见一个大平台。台呈长方形，东西长约有 50 米，宽约 25 米，东高西低，台的北面靠山崖处有一大洞口向南敞开，这便是张良洞。站在平台上眺望，这里三山环抱，山势雄奇。洞前五棵几百年生的古槐，枝繁叶茂。

张良洞洞口开阔。洞厅宽约 70 米，高约 20 米，进深 40 米，厅内能容千余人。洞顶有一块钟乳石悬挂，洞中清净幽深，空气清凉。洞口有道破旧的石墙，西段已坍塌。洞内西侧有坍塌的土灶被烟熏得漆黑。据说，解放前不断有道人或僧人居住。民国初年尚有一老两少僧人居住，洞内北侧有一个高约 1.2 米的神台，上面供着三尊泥塑神像，为道教祖先上清、中清、下清三位神仙，均已残肢断臂，面部模糊。佛台右侧有三口干井，深约 2 至 4 米不等。井口直径约 1.5 米，是僧、道们冬储雪、夏储水用的。最右边的一个井较浅，井底是通往地下的狭窄的洞口，由此可钻往地下的洞穴，继而达到“独木桥十八滩”。

据檀木港村的老人讲，民国初期，村中有一个老秀才和洞中的一老僧，手提油桶和数丈长的葛药做的灯捻，还带一条狗，入洞探险，钻到第八滩时，眼前遇到一条河，河很深只听哗哗的水声，看不见水，这里中间担着一条独木桥，木已腐朽，为了防止发生危险，他们先把狗放过去，狗过桥时朽木突然断裂，



张良洞碑石

狗掉进深不见底的河中，他们不得不折回，几经周折，待油快耗尽之时，才顺利出洞。

那次考察，我们只钻进第二洞内的西北部约 50 米处，这里是一个小厅，厅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约有十多平方米，拐角处有一具动物的腿骨。由此再往北钻，是一道宽窄不一的弯弯曲曲的通道，两侧的石壁上曾发现金元时代的一些文人骚客留下的墨迹，有的隐隐约约很难辨认，有的字迹十分清楚，笔者抄录几首附后。可见早在五六百年前，就有人到此探奇了。

当我们打着火把往前走时，不料洞已经坍塌堵住去路，我们只好返回，天下名山大都有佛、道、儒三家隐居，这里虽不是名山，但却被称“玉室洞天”。洞天，道家称为洞，是群山环抱而成的小天地。因俗传张良在此洞辟谷、隐居修炼成仙故得名。

辟谷山的东侧缓坡上为塔坟。据当地人说解放初期，尚有一座墓塔还完好，人称和尚塔。为灰色覆钵式。砖石结构，塔刹与塔体有九重相轮连接。四周还散见一些大小不一的石堆，似是墓塔塔基遗址。

在张良洞西侧的崖壁下，曾发现一通碑，碑题为：《黄山玉室洞天记》。碑高 1.5 米，宽 1.2 米，厚 0.6 米。碑文阴刻着小楷竖写的文字，字体粗犷，10 余行，仅六七百字，记述内容较为丰富，它给后人揭示了八百多年前玄靖达观大师广阳子在这里举行盛大开洞仪式的状况，提供了金末到元初道教在此活动的一些珍贵史料，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

碑文首先阐明了玉室洞天张良洞所在的地理位置，自然形状，以及洞名来历等。碑中记载“奉先神宁乡玉室洞天的路途险阻，乱石寒洞，升高侧行到六七里无水，人到者稀，所以名不振京师，仙境无尘，故隔绝俗器远甚，亦自然之势”。

文中描述“黄山仙人洞者，气象不凡，穹窿高广，园转宽博，如大幕耸立，可容千顶，顶中悬一钟（石）尺许，击之有声，洞北有穴，复通一洞，形势大如是者七故老相传昔汉张子房栖隐，于是端若玉京兰，台上有玉人琪树之状”，被称为“真仙圣之所居也”。

碑文还记述了举行开洞仪式的盛况：“在甲寅（元宪宗三年）春日清和宫

刘公大师（五月十二日）预为治道完毕。十五日至洞，所路狭而峻，肩舆以登，是日同游者七十余人，莫不欢口赞叹，自叹各有宿缘，皆为仙境中人，即日，肃陈香火明水果食名醮之供，致拜谒之文。三献礼终，因刻‘玉室洞天’四字于门额。盖以追述昔人之旧录也。与众盘醒游览于侧，已而洞口云生，冷浸衣袂夏天无暑。日夕忘归，各以绿叶籍地宿于树下，但觉身栖广漠神清气爽，梦呖不生，恍然若在华口氏之国矣。翌日乃还。”

刘公大师还作诗以记：

仙人玉洞久无传，洞府开时付有缘。  
但迷萦于三十里，数峰突兀几千年。  
弗劳遣欲尘应远，岂假澄心智自圆。  
有客终未能处此，真光无处不朝天。

该碑立于洞西一崖壁下，因年深日久雨水冲刷，壁面泥石坍塌，碑便埋入地下。上世纪 80 年代初，檀木港村为开发旅游找到了此碑，虽经数百年风雨侵蚀，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认。现存于河北镇里。因洞四周乔木阴阴，山花簇簇，四时有景，曾吸引过许多文人雅士，游洞做画吟咏诗篇，以及一批批佛道居此修炼、做法会、传教传道。

在“黄山玉室洞天记”碑中多处出现“刘公大师”的字样，“刘公”是何许人？在 1984 年《黄山玉室洞天记》碑出土之前，房山城关镇文庙附近出土了一块“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制的刊石，是“玄靖达观大师刘公墓志”。该志花岗岩石质，长 123 厘米、宽 63 厘米、厚 23 厘米、志石正面背面一侧均有刻纹。首题为“玄靖达观大师刘公墓志铭”。志文楷书竖刻，正面刻纹 17 行，满文 45 行。背面刻 10 行，满文 45 字。一侧刻刘志厚诗文四首。

该志详尽记录了墓主的身世以及他与《黄山玉室洞天张良洞》的关系。

墓主名叫刘志厚，字伯淳，道号广阳子，元初著名道士，全真教六代宗师尹志平弟子。世居应州(今山西应县)，家世颇富。出生于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少年记识聪敏，长大以后志量豪逸，为时辈所钦。刘志厚通于儒学，尤精老庄，时人以“庄子刘先生”称之。又草隶书，自成一家楷式。刘志厚年轻时期，正逢金末，初步仕途，为“省掾”，在仕途中，他立论说正，举措有方，堪称能吏。后来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频频侵扰金朝疆土，边地吃紧，金王朝以他有筹边之略，授之兵权，命他率领千人，镇守上党(今山西长治市)。不久，他厌于世乱，毅然弃职，隐于上党的辽沁一带(今山西长治市境内)，出家作了道士。

元太祖十九年(1224)，刘志厚从铜川(今陕西铜川市)赵观主为师。这一年，

应诏归元的长春真人邱处机在大雪山朝觐成吉思汗后返回燕京，受命掌管天下道教。赵观主令刘志厚前往燕京，投奔邱处机门下。刘志厚辞别赵观主，从铜川出发，沿黄河北岸，取道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前往燕京。他昼则一食，夜则忘寐，达到专一忘我，神气精妙，淡然无物而通于神明的境界。

元太宗元年(1229)，刘志厚到达燕京。他投奔的长春真人邱处机已于两年前去逝，长春宫道士在继任宗师尹志平的主持下，正在为邱祖师举行葬礼，刘志厚参与其间。奉安邱祖于新落成的白云观后，刘志厚离燕，退隐缙山县(今北京延庆县)秋阳观。

太宗九年，刘志厚因故自缙山来到磁州(今河北南部的磁县)，这时全真教宗师尹志平自沁州(今山西沁源)行醮归来，路过此地，刘厚志便到行馆谒见，求拜为师。尹志平将他收为门下。刘志厚深得尹志平器重。

太宗十年，尹志平将教事付李志常，退居燕京西南大房山龙含峪(今房山区西部山区)的清和宫，刘志厚入清和宫服侍师尊。

刘志厚追随尹志平多年。他能文，不时与燕京城内的士大夫唱和，燕京道教界对尹宗师门下这位高徒非常赞美。不久，刘志厚被保举为燕京西山五华观兼清和宫副提点道职。此后，刘志厚在燕京地区的影响迅速扩大，深得道僧两教的推崇和倚重，门徒日众，他并创立，掌管着魏县(今河北省魏县)重阳观，临彰((今河北省邯郸市临彰县))迎仙观、磁州长春观、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市)清和观房山西山等四座道观。

元定宗三年(1248)，奉诏，在燕京长春宫设普天醮。刘志厚作为特邀的高道之一，随师父尹志平参与盛典，恩例赐金实襴紫服，并赐“玄靖达观大师”的封号。宪宗元年(1251)春，师尊尹志平逝于清和宫，刘志厚和众门人礼葬了师尊，并在清和宫守孝。

全真教继任宗师李志常看到《寰宇记》记载房山西北区有神仙洞府，而路途险阻，人迹罕至。便派刘志厚前往，访查道迹。刘志厚衔宗师之命，不辞劳苦，深入荒绝之地，遍访乡老，先后访查到黄山玉室洞天、仙都山仙君洞、大房山潜真洞三个洞府，而后到长春宫向李志常复命，李志常即命加以修葺，辟为道场，委无华观提点主持工事，五华观提点以三座洞府山高路远、行事艰难修整起来大费周折推之，于是刘志厚受命，再往房山西北山区主持工役。他献出自己多年的积蓄，首先来到仙都山下，在仙君洞前创建道观，又率道俗开凿洞门。一年以后，全真教宗师李志常委任他为“三山洞主”。宪宗七年(1257)三月初三日，当三山营建工程正在继续进行的时候，刘志厚忽然病逝，时年五十九岁。

在张良洞举行开洞仪式之后三年，刘志厚去逝后，门人择仙都山仙君洞（在今房山城关镇北）南葬之。此墓志对于研究元代道教在房山活动的历史提供了可靠史料。

在刘志厚开辟黄山玉室洞为道场之前百余年前就有文人和道家在这里活动，洞壁上留下不少诗文，就是有力的见证。其中有道人诚明子诗一首，以及后人道人张志仙、张才等人留下的诗作如下：

壁立群峰倚碧天，蜿蜒一径入云烟。  
携将紫府清都客，来谒金堂玉室仙。  
妥石乱蒙圣锦密，幽泉杂出镜湖园。  
可怜此地人难到，好倩营□老笔传。

（编修官赵之和诚明子诗韵，己未夏四月成明子题。）

地□清□极高天，真灵胜概倚霏烟。  
□松子去曾为伴，黄石公来已遇仙。  
泉液发源去际远，石钟悬□洞中圆。  
灵书一卷无论毁，依旧张家第□传。  
（甘河王道明继前诗韵。）

汉相神踪故老传，黄山玉室好因缘。  
去都相近百余里，凿经以来三十年。  
环宇记中标对境，宗师碑内记功圆。  
□□峭壁凌霄汉，别是人间一洞天。  
（至元夏四月二日门下张志履书。）

#### 张良玉洞

白云重锁洞内幽，勾引人间万户侯。  
辟谷岂图难老事，运筹原不为身谋。  
一潭明月苍龙卧，万仞晴岚丹凤秋。  
回首长安劳望眼，韩彭何处是荒邱。

（张才）

# 大次洛村云盖寺

李瑞祥

—

房山区石楼镇大次洛村曾有多座古刹，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已荡然无存，只有云盖寺的一部分被修复保存下来。

明嘉靖三年（1524）的《重修云盖寺碑》碑文中记载“及夫断碑之有曰其云盖寺□□□之设也乃贾岛修习之处。”说明 486 年前曾有残碑，上面记载着贾岛在云盖寺修行。又明崇祯八年（1635）刊印的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中，也记载贾岛“初祝发法善寺、一曰云盖寺……今房山有石庵，曰贾岛庵。”这都说明唐著名诗人贾岛与云盖寺曾有密切关系。而从地理位置上看，云盖寺东距石楼二站村原贾岛墓祠遗址仅有 7 里多路，西北距周口店贾岛峪内贾岛庵遗址也不足 30 里路程，因此备受瞩目。

云盖寺的位置即现在大次洛村村委会的院子，前面的山门和建筑等早已消失。为了将村委会办公与寺院佛事隔开，现在云盖寺朝西新开了寺门，并改名为“祥云寺”。



石经幢

进入狭窄的寺院，除修饰一新的殿宇和见缝插针新盖的僧房外，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中间不大的空地上种了花卉和蔬菜，四周平整地铺砌着方砖，甬道旁从西向东立着三块古碑：西面的碑身文字可惜已全部脱落，只有碑额字尚存。东面的原本是无字碑。只有中间一块碑文保存尚好，碑首高 58 厘米，宽 64.5 厘米，厚 19 厘米；碑身高 107 厘米，宽 63 厘米，厚 17 厘米；碑座高 53 厘米，宽 79.5 厘米，厚 38 厘米；通高 218 厘米。碑首图案为浮雕的三朵祥云和下面分立两边的太湖石，中问题额“永垂不

朽”，为双钩大字楷书。碑身楷书小字，全文如下（断句及标点为笔者所加）：

盖闻事人事神，幽明原属一理；善成善作，□先要自同功。故梵舍辉煌，实壮乡邑之色；殿宇圯废，殊貽里闾□羞。士君子触目兴，怀善念，能无感发乎？兹房山县迤南次乐村，有：云盖寺、三义庙、观音庵、七圣庙古刹四所，其建立已久，修补亦不知凡几矣。第历年既深，摧残日甚，且禅室有有无之殊，地亩有多寡之异，其香火亦奉为均平也。有本村信士刘琰、李玉、王凤鸣、王凤歧、徐文德等倡，始重修，捐资募化于乾隆四十二年，将云盖寺大殿、三门配殿、群墙内外，尽为整理。次年于三义庙，大殿高造，新建南禅房三间。又次年于七圣庙，补葺丹 焉。至五十三年，于三义庙新置香火地二十二亩；于观音庵新置香火地十七□，□香火庶得均平矣。至今五十四年，又于观音庵重建山门，增修阶岸，而厥功遂成。夫竭众心之勤苦，积十载之经营，乃使合村庙貌焕然一新，□之始创，夫岂有异乎哉？余不敏，不善于文，谨原实事以志之。特 善功，永垂于不朽云尔。

房山县岁贡生宋成业撰文

房山县邑庠生宋弘沧书丹

计开各庙香火地亩数段落：

云盖寺□香火地四十四亩：寺后□墙地一段三十亩，一段十四亩，坐落村东南。菜园一块。三义庙原香火地八亩，坐落庙南。新置香火地二十二亩：一段二十亩五分，一段一亩半，俱坐村北。本庙□□僧瑞云自置香火地六亩，坐落村西。住持梁本立自置香火地八亩，坐村东南。观音庵原香火地二十一亩：一段十八亩坐落村北，一段二亩坐落北沟，一段一亩坐落何家坟。新置香火地十七亩：一段十二亩坐落村北，一段五亩坐落叶家坟北。七圣庙□□房三间，属观音庵管理。旧有死柏树一株，变价置买香火地六亩坐村北。又本庵自置□□地基一块，坐落本庵对过：东至道，西至□，南至街，北至濠。又本庵□死柏树一株，变价六十千，本村信士刘□□□□四十千，置香火地十二亩。

大清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巳酉仲夏谷旦立

碑阴题额为“万古流芳”，碑身文字为施主名单，最后落款如下：

观音庵住持	黄理明
云盖寺住持	性 海
三义庙住持	梁本立
石匠	刘文登

需要说明的是，碑文中“房山县迤南次乐村”，即现在的大次洛村，而不

包括村南三里外的小次洛村。为什么这样说呢？看看两村的历史渊源就明白了：据北京出版社 1990 年版的《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载，大次洛“辽已成村。因村西北旧有座洛神庙（今无存），庙西侧是次水河，又因人多村大而故名大次洛。”而小次洛“明代成村，原名次渠村，清末称小茨尾村，后以其北有次洛村，遂大、小次洛相对而称”。这说明，立碑时小次洛村还叫次渠村，与次乐村并无关系。

从碑文内容看，清乾隆年间大次洛村有云盖寺、三义庙、观音庵、七圣庙四座古刹。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五十四年（1789），由部分村民发起，捐资募化，经过长达 12 年的努力，修葺和重建了部分殿宇、禅房、山门、石阶、围墙和油漆彩画等，清理变卖了庙里的死树，并有寺僧和信士出资置买了新的香火地。到立碑时为止，云盖寺共有香火地 44 亩，菜园一块；三义庙共有香火地 44 亩；观音庵共有香火地 50 亩和地基一块；七圣庙有香火地 6 亩，房屋三间归观音庵管理。

根据碑文内容，笔者将这块碑简称为“修葺碑”，以区别于云盖寺的庙产碑，此碑距今已有 220 多年。但这三块碑原本是立在观音庵的，2007 年村里建设施工时，在观音庵遗址地下发现，后被移立到云盖寺。

## 二

为弄清云盖寺等古刹的原貌及文物情况，笔者继 2004 年和 2005 年的调查



云盖寺修葺碑

走访外，又于 2010 年 3 月至 6 月连续多次访问了村里的知情老人及村委会干部。

综合几位老人的回忆，大次洛村古刹分布如下：

村东头即现在小学校位置，是原三义庙，供奉刘备、关羽、张飞像。庙坐东朝西，四合院式，二进院。目前仅

存原庙门前一棵大树，仍枝繁叶茂。

村东北即现在村委会院，是原云盖寺，寺坐北朝南，现存后边原十八罗汉殿和王母娘娘庙部分。

村正中即现在健身场位置，是原观音庵及老爷（关帝）庙。观音庵坐南朝北，除观音菩萨外，后面还供奉王母娘娘像。但在上世纪 30 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即将娘娘像移到云盖寺供奉，原娘娘殿改作村学堂。老爷庙在观音庵门口东侧，三间小屋，形似裙房，与观音庵有墙相连，亦朝北开门。庙内供关羽父子及周仓，神像不大，高约一米，村民俗称“泥疙瘩”。

村外紧西头往北，有一处地势稍高的地方，俗称“庙台疙瘩”，应是原洛神庙遗址，村人也称作“镇海龙王庙”。但包括已 80 岁的李坤，都没见过此庙，说明在抗日战争前已毁。但老人们都听说这座庙香火很盛，因为这里有一条通往京城的大道，来往人多。另外庙西临次水河，当年水流量很大，可以行船，村民称这条河叫“小洪江”。1956 年兴修水利时，曾从“庙台疙瘩”附近挖出过泊船用的大铁锚和铁香炉等。

下面以云盖寺为主，详细介绍古刹及文物情况：

云盖寺山门整体用石材发瓮（即拱券）建成，门楣上镶嵌着石刻匾额“云盖禅寺”，楷书，落款小字为“弘治九年壬辰月”（1496），距今已 514 年。

寺门木制，油漆早已脱落，露出木质本色。门前三级石阶，两旁各雕一只石猴，解放前有一年发大水，被水冲走了一只。寺门面对的是村里一条大沟，因此还需再下七层台阶才到路面，所以更显山门的高耸。进得山门，头一层是天王殿，有四大天王等塑像。殿前东边是钟楼，悬挂的大铁钟足有一人高。西边没有鼓楼。天王殿后边有一株大柏树，十分高大。解放初期没有楼房遮挡，站在房山牛口峪的小山坡上往南看，能清楚地看见十多里外的这株柏树。再往后第二层是十八罗汉殿（笔者注：老人们都这么叫，实际应是大雄宝殿），里面北侧正中是如来佛，头顶大鹏金翅鸟，殿内东西两厢是十八罗汉像。殿前两侧各有一间小屋，里面各供一尊小神像。院内立有两座王八驮石碑（螭首龟趺），两个八角形碑（经幢），还有几块小碑。院正中对着罗汉殿门口有一个烧香用的大桌子，桌下立着一个六边形石经幢，高近一米，除文字外，还雕有佛像。罗汉殿西侧往北退几米，就是由观音庵移过来的王母娘娘像所在大殿。再往后就是和尚坟了，有六、七座小塔，一房多高。云盖寺还有一个东跨院，是原来和尚们住的地方，院子朝东也开有拱形院门，木质的大门还能看出酱红色的油漆。大门两旁各有一个圆窗，老人们都叫作“大窟窿窗户”，传说是按照八卦

原理盖的。

云盖寺里的王母娘娘像最特殊，不同于别的泥胎神像，这尊像采用藤胎制做，巧妙地利用弹性原理，内设机关。村里早年有一个青年，曾手摸娘娘像的身体，触动机关，竟被王母娘娘像抬起胳膊，打了一个嘴巴。说到此处，既让人哑然失笑，又让人不得不佩服先人的智慧。这个亵渎神灵的青年三年前去世，年近 70 岁。

紧临观音庵门外东边的三间房小庙，老人们回忆有说是老爷（关帝）庙的，有说是三义庙的，不管是哪个，共同的是都供奉有关羽。根据修葺碑内容，清乾隆时七圣庙的三间房屋属观音庵管理；并且不像另几座古刹那样有较大修缮，而只是“补葺丹雘”，即仅修补了脱落的油漆彩画。另外修葺碑的落款也没有七圣庙的名号及其住持。因此，笔者认为老爷庙就是从原来的七圣庙演化而来。而三义庙有住持，规模较大，不应该是三间小屋，所以位于村东小学校位置的才是三义庙。

大次洛村的文物损毁，是从 1956 年开始的。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之后，百废待兴之时，经济上还很落后。那一年房山县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当时没有机械，完全靠人工打井，需用砖石，上级遂决定拆庙取砖。村民们对神佛还有敬畏之心，在动手前先对神像说上几句：“不是我要拆你，是……”然后拉倒神像再拆庙。

到 1958 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时，云盖寺的大铁钟被毁。但此时云盖寺的天王殿、罗汉殿和娘娘殿仍被保留，如来佛和头顶上的大鹏金翅鸟也还保留了一段时间。各寺庙的神像相继被毁后，只剩下王母娘娘像一直未敢动。原因一是娘娘像不同于别的神像，不但触碰机关能活动，而且胳膊、腿灵活能换穿衣服；更主要的原因是娘娘殿里不时传出木鞋走动的声音，村民们十分迷信没人敢动。

1964 年，农村“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四清”是指“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大次洛村在文革前曾是北京市和房山县的先进典型，这次又是“四清”运动的试点村。为了破除迷信，教育村民，给全县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在上级领导的督促下，由村党支部、团支部带领青年村民，终于将王母娘娘像搬出庙堂烧毁。“四清”时村里开始修路垫沟，需用石材，于是把云盖寺里还保存的两座螭首龟趺石碑和一个经幢，运到村西垫在水沟上，做为桥板供人行走。还有一块记载有唐代字样的古碑，上面刻有一幅简洁的和尚图案，连同云盖寺另一个八角石经幢，弃卧在荒地里。文革后期北京某



“云盖禅寺”匾额

大学师生来村里支援“三夏”劳动，一位大学老师发现后告诉村干部，这是国家文物，应该报告县里保护起来。后来县里通知大次洛村，将古碑运交云居寺保管。村里当年只有手扶拖拉机，就把石经幢运去了。笔者为此除采访了村里的当事人——当年的大队领导王立，王宽外，还采访了云

居寺当时的负责人田福月，并在云居寺现主任云桂荣的大力支持下，三次去云居寺寻访抄录，得到文物科张爱民的有力帮助。该经幢为佛顶尊胜陀罗尼八角直楞幢，汉白玉石质，由盖顶、幢身、基座三部分组成，总高 209 厘米，除一面刻有题记外，其余七面竖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立于辽代大康二年（1076），距今已有 934 年。现该经幢立于云居寺北塔东北侧。村里另外那块刻有唐代字样及和尚图案的古碑，由于碑大太重，手扶拖拉机没法运，县里也没再过问，后来就被弄到村东头垫水沟了。现在连同前面说到运往村西垫沟的古碑，都深埋地下，地上已是水泥路了。笔者大胆推测，此碑极有可能是关于贾岛的碑。目前村里保存的只有明弘治年间云盖寺的石刻匾额及修葺碑。

上世纪 70 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全国进入“备战”状态，掀起了修建地下防空洞的高潮。由于地下挖空，云盖寺的大柏树死了，天王殿、罗汉殿和娘娘殿数年后也都相继坍塌的坍塌、沉陷的沉陷了。

改革开放后，村里的王为民和杨存立两家富起来了。两人一商量，由王为民出钱，杨存立出人，重建了罗汉殿和娘娘殿，即现在的大雄宝殿和观音殿。王为民已于 1997 年去世，他生前曾为村里和镇里的学校盖楼，教师和学生发服装等，捐助过不少钱。

### 三

1993 年，王为民和杨存立等施工修复云盖寺。因原云盖寺前院已建有村委会办公用房，最北端塔院也早已盖上民居，只有后院原十八罗汉殿和西侧的

原王母娘娘殿位置可以重建，因此施工了一百天，将两殿建成。重建时曾考虑过是否将两殿取齐，但认真研究后仍坚持严格按原地原貌重建，只是把罗汉殿整体增高了一米。由于王为民和杨存立都忙于自己的业务，从中央电视台涿州影视基地请了古建施工队后，实际的工程监理主要靠杨存立的爱人郭静霞。

1995年，郭静霞在山西五台山皈依佛门成为居士。1996年去河北省香河县订铸如来佛和观音菩萨铜像，1997年铸成迎回云盖寺。因当时政策不许可，只得将两佛像运到自己家中供奉。十年后的2007年，区有关部门通知郭静霞，佛像可以回庙，遂又从家里运回云盖寺供奉。郭静霞虔心向佛，多次去五台山，延请和尚来寺住持。现在云盖寺的无劫和尚，山西人，俗姓李，1961年生，学美术专业出身。无劫有文化修养，生活上极简朴，尤其绘画、书法、工艺制作均是内行。现大雄宝殿和观音殿里的壁画都是他亲手所绘，将佛、菩萨和罗汉画得形象准确，神采飞扬。无劫还自己动手，依靠简单的工具和不干胶纸、硫酸等，在铜板上绘制、腐蚀、镂空，制作佛像的背光。一朵朵祥云，一条条蟠龙，闪耀着金色的光辉，被雕刻出来。

经历了过去年代对文物的无知和破坏后，现在有个别村民将残存的文物偷去卖钱。郭静霞说：“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在我们手里给毁了。”她发现施工挖出了三块古碑后，就跟村领导说好，立在云盖寺院子里。

笔者以为，村里将来如遇施工，乘知情老人还健在，使深埋地下的古文物重见天日，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如果有关贾岛的碑石现身，将与二站村贾岛墓祠，以及周口店贾岛庵遗址，连成一条完整的旅游线路，为房山的文物事业、人文历史和旅游业做出贡献，为大次洛村民带来福祉。

# 房山碑刻拾遗

张玉泉

据文管部门提供的有关资料显示：房山是京郊文物大区，全区有不可移动文物 302 项，可移动文物 3 万多件，历史年代从旧石器时代至民国时期跨越 15 个朝代。在这些文物中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 处、市级的 15 处、区级的 47 处，一般的文物 234 处。然而在房山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那些边缘角落地带还残存着已发现或消失的文物遗迹，在它们的背后都有着一段段古老的故事、传说。大多是鲜为人知的，颇为有趣。这些不成规模的零零散散的文物古迹故事可称文物碎片，是笔者多年收集得来的。我想这应是对房山文化遗产的补充吧！

## 壮勇 国公墓

在良乡古城西北的丘陵地带有条横跨东西弯弯曲曲的大沟叫吕峪沟，在临近西南的焦各庄村坡前有座神道石门，坐北向南，保存十分完好。门高 1.50 米（部分埋入地下），门柱为 0.40 米，呈正方形。柱顶雕有望天吼。门额长约 1.35 米，宽约 0.48 米，上面阴刻着“壮勇 邠国公墓道”的横题，落款为“弘治丙辰年（1496）三月吉日立”竖写小字，门额顶端雕有火焰球，顶尖与两柱柱顶上的望天吼，做工精细。全部为坚硬白石雕刻。神道门右侧有阳宅遗址，石灰、黄土砸地，尚有零星块石。门北 10 米处为墓地，占地十亩，两侧和前侧曾是虎皮石墙圈，前侧与神道门连接，北侧坡根为弧形坟圈，依然如故。

经查阅有关资料得知：邠国公名叫吴允城，为蒙古人，原名叫都贴木耳，在明英宗征服瓦剌的战争中多次立功，被封为恭顺伯。于永乐十五年（1417）病死。赠为国公，谥号忠壮。其长子吴克忠，蒙古名字达兰，与其子吴克勤一道在“土木之变”的事件中为阻止敌寇的追击，寇占据山头，箭如雨下向他们袭来。吴克忠及弟克勤下马与敌拼杀，杀死数人。最后兄弟二人共阵亡。朝廷封赠吴克勤为凉国公，谥号：忠勇。故此，该墓地为吴允城及其长子、三子共

葬之处，所以，墓地前石门上标有“壮勇邠国公神道”的字样。

## 元代“处士”墓志铭

某年我因公到深山霞云岭乡下乡，在霞云岭小学操场上发现一块元代“燕山处士”墓志铭，是平整操场时刚刚出土的，表面还有湿气。该石刻为青石板制的，长 1.2 米，宽 0.8 米，厚 0.4 米。字迹十分清晰，内容特别简洁，只有姓氏，连名字都没留下，从左至右仅有三行字：“故□燕山处士□刘公之墓 天历三年（公元 1330 年）二月初五日 刘成□刘□刘致立石。”可见此墓据今已有六百多年。

墓志铭阴面刻有“刘公碑记”落款：“元国大都路涿州房山县西南□□乡霞云村。”据有关资料记载：“处士”是我国元代有才德而隐居不仕之人，刘某生前是位读书人，有才华，道德高尚，却淡薄名利，不愿作官，乐意在家隐居隐姓埋名。从这块出土的文字简单的墓志铭中完全可以证明死者的身份。京西属燕山之内地，故称“燕山处士”。

霞云岭小学操场原属霞云岭村刘姓家族的墓葬群，原名叫石碑地，曾因山体滑坡，大多坟墓被掩埋，这里广泛流传着隋末地方割据的刘武周的坟墓也在这里。

## 猪圈墙里的墓志铭

五年前的一个春日，我来到长阳镇朱家岗村寻访，据《房山区地名志》载：“朱家岗明代成村，朱姓人家在此为官府养马，又因附近有片黄土岗，故名朱岗子，后改今称。”明代永乐年间的武进侯朱英（号称“朱大刀”）是朱棣王朝的武将，据说是该村人，该村朱姓百姓大都是他的后人。位于丰台区长辛店西北的朱家坟便是朱家祖坟，墓地庞大，长满郁郁葱葱的松柏，“七七事变”时被日军烧毁后遗为平地，后来建了工厂。

在村内一位 80 多岁老人的指引下，我们来到村子西北一位朱姓的人家，在他家后院的猪圈墙内立着一块墓志铭盖儿，表层露在外面，约 80 公分见方，厚约 13 公分，为汉白玉石质。正中篆书：“大明已故追封武进伯朱公墓志铭”，落款为成化□□，下面就看不见了。墓志铭文的一面被镶在墙里。

据那位老人介绍，该墓志是朱荣孙子的，叫朱英，成化年间的武官，死后

被皇帝追封为“武进伯”

老人家说，朱家坟是朱荣及其他后人的墓地，日本烧了坟墓后，村里有个姓朱的后代，从朱家坟偷偷背来这块墓志，他说这是我们朱家祖先的遗物，就把它供在自己的家里。后被扔进村西的河边上，村人去河边洗衣又拿它当捶衣石。后来另一家朱姓后代怕把它锤坏就背回家后院垒进猪圈墙里保存起来。

据有关资料载：朱荣的儿子叫朱冕，也是明代武官，战死在外，未入祖坟。丰台北台子另有他的墓地。

### 河滩里的古碑

某年4月的一天，我去长阳镇高佃村的朋友家串门，午后我们去大宁水库下河滩中散步，在永定河滩的草丛中发现一块古碑，碑阳朝上，上面散落着杂草和泥土，碑体完好，我们擦净杂草泥土后，发现阳面文字有一片片受损，是推土机的划痕，可能在清理河床时出土的。碑高约170公分，宽约80公分，厚10公分，为青白石质。头向东，尾朝西，碑头有“万古流芳”横写小字。右上角是竖写《休休庵记》碑记，左下是“大明正德己巳（1449）仲春十五日立”的字样，全碑文文字为竖写楷书，文笔流畅，全文570余字。

从片片划损的文字中可以略见庵主的人生轨迹：

《休休庵记》位于都城西南四十里有个高店（佃）村，村中有一巨富发起捐资，“为上人休休筑庵，休者乃直好善之，谓上人……上人名奇。顺天府通州河西杨家，国朝天顺□年割恩爱，投华严寺无德禅师为徒，受佛教正传……日复一日，颇有觉悟，遂入三修兴梢库十五年，伏牛山二年，南都访宝禅师二年，既而叹四力倒□□。”

“东主闻风拜请遂施地建庵。庵中有龛高仅六尺，阔三尺，其中身卧席者五□余。其精力勤苦，必觉悟……”“上人修得真空，是乃真僧者也，其致坛越也宜哉，上人八十有四伶，终当化去，遗留兹乃建塔结庵落成之日，故书此以记岁月云耳□，作文生员程



休休庵碑记拓片（局部）

□□大明正德己巳（1509年）仲春立。石匠：王弘、陈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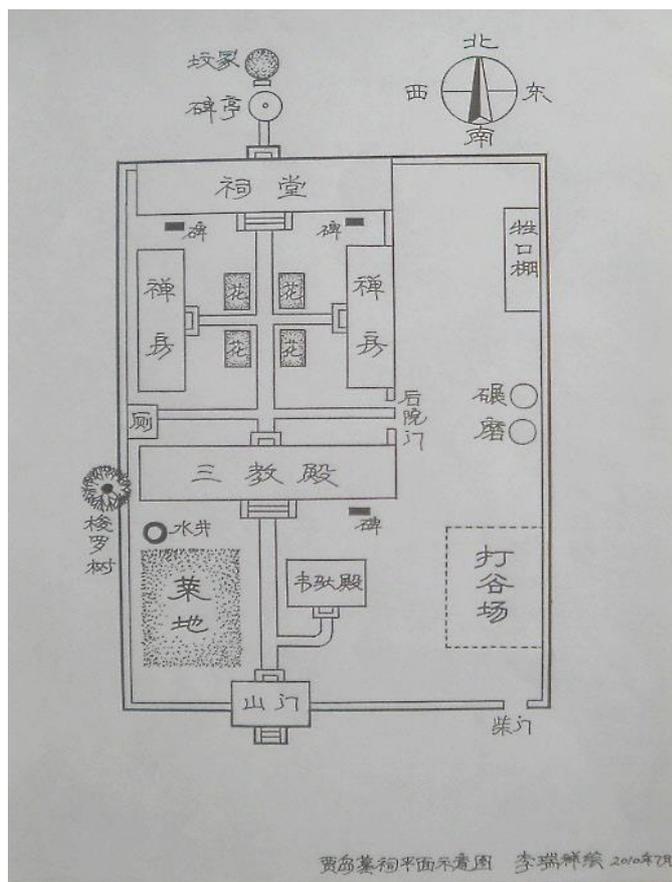
碑阴镌刻着捐款建塔建庵者名录。打头的是高佃巨富刘德福，率妻及子孙捐款最多，其次是善男信女佛教徒捐款名单，约有百余人。

《休休庵记》的发现打破了“高佃村无古庙”的断言。然而休休庵及上人的墓塔建的遗址在何处仍然是个谜。

# 原贾岛墓祠情况补遗

李瑞祥

关于房山区石楼镇二站村原贾岛墓祠的建筑格局和形貌概况，近 20 年来已有区内多位专家的文章涉及，其中不乏记述较详细的珍贵资料。笔者自 2009 年初至 2010 年夏，多次采访一位从小在贾公祠旁长大的老人，反复回忆一些细节，写成此文。文内所记的，或是前述文章没有提及的内容，或是虽有记录却并不详细，还有个别与前述文章有出入的细节。作为补遗或一家之言，笔者以为，对于读者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贾岛墓祠平面示意图

根据二站村村民郑成和房山中学退休教师刘荣等人回忆，贾公祠坐北朝南，围成长方形的黄土院墙，墙顶铺砌一层砖，估计东西宽约 30 多米，南北长约 50 米，高有 2 米多。山门在南院墙中间偏西，一间规制，红漆木门，门旁立有两个圆鼓形石雕门礅。门外约 4 米远曾有一大块紫石，村民常在那儿砸粮食。

穿过山门，是一条南北向的砖砌甬路，连接着北面的三教殿。在山门和三教殿之间，甬路的东侧，有一座一间规制的小殿，里面是身披甲冑的韦驮木雕像，韦驮右手执法器金刚杵，斜搭在横

起的左臂上，面南而立。这与一般佛寺里韦驮立在大肚弥勒佛背后，脸朝大雄宝殿不同。甬路的东侧是场院（打谷场），西侧是菜地，菜地的西北角有一眼水井。

三教殿三间规制，殿内神台上从西向东，供奉有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尊泥塑坐像。释迦牟尼着黄衣，头发黄色捏泥球（老人口语）。孔子穿灰衣，骑着蛟龙。老子也穿灰色衣，手臂上斜托笏筒，留有长发。笔者曾请教位于北京白云观的中国道教协会专家，老子或骑青牛，或坐宝座，手中不应托笏筒，而以拂尘或如意为法物。像前的木制供案足有 1.5 米宽，约三间屋子那么长，上面放有一个铁磬，敲磬的声音悠扬动听，能传很远。

三教殿前东侧立有一碑，西侧紧挨着院墙外有一棵高大茂盛的梭罗树。殿后院落的东南角设有院门，院门外正对着位于东跨院墙根的石碾石磨。跨院的北端靠着东院墙曾有过牲口棚，南头即贾公祠南院墙的东端，开有一个柴门。

由院门进入后面院落，或由三教殿后门进入后面院落，连接三教殿和北端正殿即贾岛祠堂的，是南北向延续的甬路。院里甬路两旁各有两个长方形花池。东西两厢各有三间禅房，有甬路相连，西面禅房住老道，东面的存粮食。院内西南角是厕所，与东南角的院门也有甬路连接。三间规制的祠堂，内祀贾岛泥塑坐像。两旁立童子二人，西面的童子手捧书卷，东面的捧宝剑。据老人回忆，贾岛塑像颇有女相，看来塑像把贾岛儒雅飘逸的气质和神韵刻画得栩栩如生。像前也是充满三间祠堂长度的大供案。祠堂正殿前两侧各立一碑，西面的碑高大，东面的碑略小。

出祠堂正殿后门，来到贾公祠围墙外的田野里，离院墙约 5 米远，有甬路相连，是四柱圆顶碑亭，亭里立着明代大学士李东阳草书七律贾岛墓诗碣（圆头的碑称碣），再往后即贾岛墓坟冢。李东阳诗碣的石料泛黄色，一层一层的，一撬就会掉下一小块。后来村民将其垫在井上当水槽用，最后井废石沉，至今这件重要的文物杳无踪迹。

老人幼年记事时，贾公祠里住着马老道，是小次洛村人，会看病，祠内香火旺，管理得也好。接替他的二老道，不成才，祠堂的 50 多亩地竟被撂荒，村里于是将土地归了学校，交给别人管理，二老道就出去要饭，最后饿死了。后来的三老道，是本村人，叫常景义，他到祠里四年就解放了，所以还俗结婚去女家了。

另外，贾公祠正殿即祠堂的房顶上，曾经加盖过一个小庙形的建筑物，传说是因为祠里供奉的神位顺序不对，祠里不稳定，所以盖个小庙镇住，名为“天

皇知事”。

2010年7月中下旬天气酷热难耐，我采访郑成时，老人一边照顾瘫痪的老伴，一边用芭蕉扇柄在他家院子里的土地上，画出贾岛墓祠各处的平面位置图，我也用扇柄在地上画并跟他讨论。正式图稿完成后，我再去二站村请老人核对，修改了老人又挑出的一些细节错误后，才完成最后的墨稿。

# 前朱各庄名胜

杨亦武

## 雾岚山

雾岚山，在村西北，左俯圣水，右望大房，为前朱各庄村名胜之首。雾岚山属大房山系，乃云蒙山东南之支脉，孤峰特起，俗名南大寨。每逢初夏黎明，熹微渐笼，雾莽前山，丘形影绰，沟壑迷蒙，透过雾霭，如出浴仓；倏然赫朗，旭日高熹，银光遍洒，万顷云波，如片片席展，亦卷亦舒；云日天光，交相辉映，空蔚云蒸。堪称雾岚奇观。

民国之前的《房山县志》记载，山上有呆汉台。县志上说，雾岚山所以得名，是因为山顶常有云雾缭绕。相传，当年曾有两个仙人在雾岚山顶下棋，后朱各庄村有个砍柴的汉子在旁边观看，仙人下完棋，砍柴的汉子这才想起拿斧去砍柴，没想到，他的斧子把已经朽烂了。而今雾岚山上还有石刻的棋盘。说来也怪，登山的人常常无意中遇到，如果你有意去寻找这个棋盘是总也找不到。这是老辈传下来的故事，信不信由你。

## 西河和东河

西河，古称瀑水，因其下游流过丁家洼，又叫丁家洼河。这条河从前朱各庄村西流过，所以村里人叫它西河。西河源于羊耳峪西北诸山，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南源，一个是西源。

南源始于双泉沟合大楼沟、后沟水经小楼南台之间的马槽湾，又经崔家沟至白布渣，又东流前朱各庄村西。北源始于西峪沟，合戏台沟、林桔峪诸山水东流，经东流水村北折而南经东流水村东，又南经后朱各庄西，至前朱各庄村西与南源汇合为一，继续向东南流去，经瀑水岩、丁家洼村东行出山，至马各庄汇入大石河。全长约十五公里。

西河原在村西，后来村庄发展，河西也有了农户，这里便成了村中的一条

河了。这条美丽的河流不仅装点出如画的风光，更造福于村民，很早以前，村里人就用河水种菜园，长出的蔬菜鲜美异常。

西河流到东南，一岭横截河口，两高中凹，如门坎，这就是著名的古迹瀑水崖，又叫瀑水岩。水流到这里从高下泻，高三四丈，形成悬流瀑布，十分壮观。冬如练，春如帛，雨后如雪山排倒，颠而复起，起而复颠，翻腾数迭，风号雷吼，声闻数里。瀑水岩有刻石，共四处，都是汪退谷所书。西侧镌“瀑水岩”，中间镌“留云坞”，南边原有个石台，镌“钓鱼台”，沿流而下约百步，南岸有巨石镌“仙桃矶”。

河水由此而下转而东，注为深潭，三面石岩，一湾潭水，有悬石陡出，镌“卧龙潭”三字。在北岸几十步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岸南石壁镌刻着“磨峡岩”三字。

东河源于雾岚山西麓众山之水，经后朱各庄村，沿羊头岗西麓南下，经本村东，至村东南转而东流，横截羊头岗而过，汇入大石河。当年东河两岸几百亩的菜园，以河水灌溉，村民深得河水之利。东河流经羊头岗段，北岸有两个古迹，西侧为清满保墓，在本村界内，东侧有清诺迈墓，在羊头岗村界内。满保墓建于清雍正年间，后文有详细介绍。诺迈墓建于清康熙中期，坐北朝南，占地十二亩，四周有墓垣，垣内有华表、墓坊，石碑两通，一通为《诺迈谕祭碑》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十一月二十三日立，一通为《诺迈墓祭碑》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三月二十日立。

## 五道庙

五道庙位于村东，始建年代失考。本村东有一个高台，此庙就座落在高台之上。庙坐西朝东，登上十六级台阶，就进了五道庙的山门，庙垣由河光石垒砌，进山门，正殿一间，正殿东与此殿并排有北房三间，正殿西有西配殿一间。院中有古槐两棵，粗过两围，枝叶茂盛，年代甚古。正殿内奉神像五尊，正位神像为五道爷，左为山神，右为土地。在三尊神象稍前，还有两尊神像，左为判官，右为小鬼。

三尊主神为坐像，五道爷头盔衣甲，右手持宝剑一柄，座下绘猛虎一只，用铁链锁在一树古槐下；山神土地两手插袖，配侍左右。判官左手捧生死簿，右手持笔。小鬼手持狼牙棒，面目狰狞。殿左壁有壁画，上绘雷公电母。雷公左手持钺，右手握锤。电母双手持钹，做击状。

往年旧俗，五道庙是报庙的地方。人死后，家人要先到五道庙里烧黄花纸，死后三天内，每天要到庙中报三次庙。临葬，葬仪上用的车马牛等纸活儿，要先抬到五道庙前，这是最后一次报庙，报庙如仪，再抬到村西焚化。

当年的五道庙除了葬习所系之外，还是村民祈祥之所。每逢大年初一，村民纷纷赶早到庙中进香，据说谁第一个进香全年会求财得财，求福得福，所以村民们便早早的来到庙前，争取头香，这叫“赶头香”。

五道庙内还有一尊龙王神像，没有固定的位置，可以随意移动。前朱各庄东西有两河相绕，村民们祈求风调雨顺就要供奉龙王，前朱各庄村又没有龙王庙，所以便把龙王寄祀于五道庙内。每逢祈雨时，村民们便把龙王神像抬出庙内。

五道庙东，紧邻东河之畔有泉水一处，春夏秋冬，四季不竭，在五道庙下汇而成塘，大约亩许，盛夏时节，荷花染墅，藕香四逸。将小小的五道庙装点成一幅迷人的乡情图。

随着时代的变迁，五道庙早已不复存在，但它永远留在村民的记忆中。

## 郑氏家墓

郑氏家墓位于前朱各庄村大件路以南、丁家洼水库以西的位置。这里葬着明代房山名人郑民悦祖父郑安、祖母赵氏，父郑堂及母亲李氏。

由于年代久远，郑氏墓地已经荒废不堪。郑安与赵氏的合葬墓坟冢高不足一米。冢前立清石碑一通，高五尺，厚两寸，此碑立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碑身镌刻着“故考文林郎郑公讳安妣孺人赵氏之墓”，落款：“男儒学生员郑堂，侄郑方、郑荣，孙郑民表、郑民生立。”

郑堂夫妻合葬墓距郑安墓前方十米。此墓与郑安墓相比要大一些，三合土宝顶高约五米，墓碑方首圆角，浮雕云文。碑文：“明诰赠奉直大夫显考郑公讳堂妣封太宜人墓”，落款：“万历岁在戊戌秋七月吉旦不孝男郑民表、郑民生、郑民悦立石”，戊戌为万历二十六年（1589），可知郑堂葬于此年。

郑氏是官宦人家，自郑安至郑民悦，祖孙三代为官。祖父郑安在大明嘉靖朝初授承事郎，升授文林郎，为正七品官。

父郑堂为儒学生员，也是个有功名的人，万历二十四年（1596）也就是郑堂逝世两年前，其三子郑民悦正在河南归德府睢州（治今河南省睢县）知州任上，万历帝嘉念郑民悦德声，特诰赠其父为奉直大夫河南归德府睢州（治今

河南省睢县)知州，诰封其母李氏为太夫人。如今诰封碑尚存于郑堂墓地。此碑为艾叶青石质，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月二十九日立。通高约三米，宽一米二，厚三十公分。碑首为二龙戏珠图案，篆额：“皇之诰命”，碑座高一米，宽一米半，厚六十公分。

郑民悦，别号肖泉，明房山县前朱各庄村人。博学能文，明隆庆元年(1567)举人。初任山西寿阳县(山西省寿阳县)知县，改受河南阌乡(今河南宝灵县)知县。此后历任应州(今山西应县)、睢州(今河南省睢县)知州，归德(今河南省商丘市)、汝宁(今河南省汝南县)知府。卓有政声。告归林泉，筑别墅于房山城郊东北的前朱各庄，诗酒愉志。著述颇丰，可惜均轶不存。

### 清满保墓

清满保墓位于村东南的东河左岸，坐北朝南，居于羊头岗上，以雾岚山为靠，以前小岭为照，左携东河，前俯清流，依山带水，形势十分壮观。墓地南北宽约五十米，东西长约百米，墓地前首夯土为基，中间有单孔石桥，过石桥约十米宽的神道向北而去，神道两侧砌青石，中间铺河卵石，前行大约六十米，一对华表耸立神道两端，华表后是高大的墓碑，螭道龟趺。碑后有宝顶两座。居为正中的藏满保，满保墓东，葬满保之了吉善。两个宝顶稍后，有小宝顶一座，前面立小碑一通，为满保侧室、吉善养母沈氏诰封碑，碑上的文字为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皇帝诰封沈氏的圣旨。此碑立于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初一日。

满保姓觉罗氏，为清王室宗亲，始祖为福满，福满有六子，二世祖索长阿为福满三子，三世祖龙敦，四世祖济伯礼，高祖都赖费扬古，曾祖石达礼，祖父祜章阿，父僧参。

而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曾祖便是福满，努尔哈赤的祖父乃是福满第四子，满保二世祖索长阿的四弟，努尔哈赤与满保和四世祖济伯礼为叔伯兄弟。

满保，字鳧山，满洲正黄旗人。出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国子监祭酒，擢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直经筵，福建巡抚，福建浙江总督，兵部尚书。雍正三年(1725)卒于任所。他一生的主要时间在康熙朝，祖父祜章阿与圣祖康熙为宗族兄弟，父僧参则与雍正皇帝为兄弟行，满保与后来的乾隆帝同辈份。满保子吉善，雍正十三年(1735)举人，乾隆四十二年任国子监祭酒，乾隆五十年，乾隆帝驾

临辟雍行讲学礼。命大学士、伯伍弥泰，大学士管监事蔡新，进讲四书。身为祭酒的罗吉善与邹奕孝，则进讲周易。

满保墓建于清雍正时期，吉善则大约葬于乾隆末。清代但凡王贝勒及官臣人家的墓地都有专人看守，这样的人家叫陵户。满保墓的陵户是傅姓一家，在满保墓东南居住的傅玉海老人，已经八十七岁了，他便是傅姓陵户的后裔，傅玉海老人说，陵户世代相传，子承父业，自满保墓礼成至今的一百八十多年间，傅姓一家子子孙孙，守候在这里，满保墓外留下了十代傅氏遗冢，傅玉海乃是傅姓陵户的十一世传人。自幼就曾攀上高大的龟趺上玩耍的傅玉海，目睹了满保墓的泯灭，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一群人带着炸药来到满保墓，轰然一声，高峻的华表和石碑都化为乌有。

### 赵家宝顶

赵家宝顶为一处清代墓葬，葬者无考，因守候墓葬的后人姓赵，所以称之为赵家宝顶。赵家宝顶位于村北，占地约两亩，宝顶直径约两丈，坐西北，朝东南。宝顶前有方砖铺砌的神道，神道两边为汉白玉条石砌就，宝顶前的碑，宝顶后及左右，是半圆形的墓垣。据宝顶守候人的传人赵强说，他曾在家中见过图经阿的印章，查清代史料，图经阿，姓觉罗氏，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殿试金榜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觉罗氏为满清皇室宗亲，根据这一线索推测，赵家宝顶的墓主或是清皇室宗亲。

# 房山的乡野古迹

张玉泉

## 周吉祥的两座墓塔

在京西南上方山脚下，有个孤山口村。村北那片广阔的岗地中坐落着一座古塔，名叫周吉祥塔。坐北向南，呈八角形，七级密檐式，通高 18 米，塔基高一米，由汉白玉砌成，须弥座。束腰间为砖雕鸟兽、花卉和人物。形象生动、逼真。塔身八个角为砖砌圆柱。东西南北四面为砖雕仿木假门，斜面有假窗，正门顶嵌一方石匾，上刻楷书：“僧录司左善世钦命掌印兼敕大慈仁并大觉寺开山第一代住持周吉祥大师塔”。塔的各层檐均为正反叠涩做法，每个檐角垂挂一长方形铜铃，遇有微风吹动，便有清脆铃声飘扬。塔刹原为一个 3.4 米高的铁针串三个上小下大的珠子，两根对称的铁练对拉着（据说是三对不同形号铁锅扣成），复修后变成砖雕莲花，花心凸出一颗宝珠。该塔始建明弘治 8 年（1495），为周吉祥的衣冠塔。



周吉祥墓塔

塔前十余米处原有两通汉白玉碑。“文革”中有一通被砸碎；另一通尚存，已被推倒，无碑座，碑阳向上，大部分字迹尚可辨认，碑首为篆字，即：“僧录左善世兼大慈大悲并大觉寺住持周吉祥禅师传。”从碑记和有关资料中得知：周吉祥，原名周云端，为顺天之昌平文宁县人，（即今海淀区苏家坨乡后柳林村人），生于明正统六年（1441）二月二日，圆寂于弘治八年（1495），享年 54 岁。他是明英宗（正统年间）周皇后之弟，据《文物词典》载：少时好外出游玩。后到大觉寺削发为僧。常返京城大报国寺寄宿。周皇后劝其还俗，共享富贵，他不从。周皇后便以祝寿为名在大报国寺旁为其弟建大慈仁寺，许为

开山第一代住持并任僧录于左善世。成化二年（1466）奉命兼住大慈仁寺，己丑年（1469）升左觉义，丙申年（1476）升左讲经。戊戌年（1478）升大觉寺住持兼管番汉僧。辛丑年（1481）升入左善世，至弘治戊申年（1488）命僧录司印师，直至圆寂。

据考证，海淀区大觉寺西南里许的高岗上亦有一座周吉祥塔耸立，该塔高15米，比孤山口塔矮3米；建筑年代为弘治五年（1492），比孤山口塔早建3年；该塔正门上方嵌的石匾字迹是“周本师僧录司庄左世兼大慈仁寺开山第一代主兼大觉寺堂上周公云端大和尚灵塔”，落款为“教徒僧司左觉义兼本寺住持性容。弘治五年三月吉日立”。很显然此塔是他的徒弟为其立的墓塔。那么三年后为何又到远隔百华里的西南孤山口村建衣冠塔呢？此地三面环山，前面为上方山溪水流淌。这块风水宝地在当时是大报国寺的庙产，在此建座衣冠塔（亦为纪念塔）据说为便于上方山和上下中院一带的和尚拜祭。

### 陈兴亚在房山的题刻

在我区诸多旅游景点中诸如云居寺、万佛堂孔水洞、上方山、圣米石塘、蟠桃宫以及百花山等地的建筑物或石壁上常常发现有位叫陈兴亚的人题字并刻石，目前已发现约有十余处。

那么陈兴亚是何许人？他的题刻都是什么内容呢？

陈兴亚，号辽东散人，辽宁海城人。东北沦陷后，来到北京，时任国民党陆军中将、宪兵司令、警察总监等职。解放前因镇压“二七工人大罢工运动”，解放初肃反运动中被我政府镇压。该人于1932年至1934年曾游遍了京郊名胜古迹，每到一处，便挥毫题字刻石。字体多为楷书。大概是其信奉佛教的原因，所到之处，多是佛寺、道观名山。



陈兴亚题字“锦簇攒天”

因，所到之处，多是佛寺、道观名山。

在房山境内发现的有云居寺北塔西南角的唐代太极塔东壁，陈兴亚曾题刻《石经山始愿记》，全文约一百三十多字。其原文如下：

《石经山始愿记》县志载石经山纪略云，北齐南岳僧慧思虑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封闭岩密。座下静琬承师嘱，成其事云。今观碑志多言琬

公发愿而不及其师，纵其师不欲居功而独享盛名，又岂琬公之意？兹谨缀数言，俾后之览者，知刻石藏经之功，不仅在琬公而尤在其师慧公也。

宪兵司令警察总监陆军中将陈兴亚撰书，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石经山始愿记》提醒后人不要忘记琬公之师慧思谋划的功劳，也是言之有理，但刻在塔身上，损坏了文物，实不应该。此处落款标明了他的官衔和确切时间，是其它题刻所没有的。

在石经山雷音洞东的两口石井上方岩壁处，题写行书“云居”两个大字。字大约半米，是所见题字中字号最大的。

同年九月，陈兴亚游万佛堂孔水洞，在洞口的汉白玉券石上刻了“壬申重九陈兴亚游此”一行字。

1932年10月，游上方山，在游者必经的咽喉要道的云梯底端石壁上，纵书“幽燕奥室”四个字，十分醒目。

1934年夏，陈兴亚偕夫人刘月贞与辽阳韩麟生、高尚志、北平赵文奎，辽中王树常游览房山区柳林水村北的圣米石堂。在莲子峰北侧小道边的石壁上，题写“莲子峰”三个字。

在蟠桃宫（北庙）通往三星观的山巅险路一侧，镌刻“南天门”三个字，落款为“民国甲戌仲夏，海城陈兴亚题”。

可能是顺路原因，当日又去了百花山，在百花山顶钢架天线旁的巨石上，（此石为史家营村和门头沟区黄坨村的界石。）他题刻了“锦簇攒天”四个大字，赞美百花山五彩缤纷美如画的景观。

此外他还在门头沟、海淀、石景山等地文物景点上留下多处题刻。

### “小卢沟桥”

在长阳镇长阳村东北侧。镇篱笆房村西端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名叫篱笆房河，“发源于房山县朱家坟，东流穿长阳村北长安桥，又折而南入雅河”（《良乡县志》）。每到汛期洪水泛滥难以通过，河上横跨南北的古桥名为永安桥，俗称“小卢沟桥”。建于明代。用料和建筑形式相当考究，完全仿照卢沟桥的样式建的，故有小卢沟桥之称。因建在九省通衢的御道之上，南方的粮食、布匹、丝绸等物资源源不断通过此桥运往皇城。皇上的南巡也必过此桥，作用十分重要。

该桥长约二十米，宽约七八米，为三墩四空。大理石铺就桥面，两侧全部

为汉白玉石雕栏板，不仅雕有梅兰菊竹等花草及瓜果，还雕有树木鸟兽、蝥蛄、蝉虫等动物，栩栩如生。全部为镂雕，做工精细，造型生动。过桥人犹如走在画廊中。桥北端是一对雄狮把守，南端是一对大象迎送，给南来北往的过桥人送来吉祥。据当地老人讲：桥南头西侧曾有一座小庙，三间青砖墨瓦，坐北朝南，三面是青砖院墙，庙内有人说供奉关公的，有说供奉龙王爷的，还有说供看桥人住的。小庙前原有石碑一通，记录了建桥的经过、年代、费用等，已不知去处。

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的更迭，京汉铁路，京广公路的贯通，小卢沟桥的作用大大减弱。现仅供当地村民在夏季洪水泛滥时通过，因此昔日的风采不再，桥上的石雕全无。不过几年前在河床中出土的桥头大象，现已神气十足地站立在篱笆房村委会院里，它似乎向人们讲述着六百年前小卢沟桥的风光往事。

# 房山贾岛墓李东阳诗碑

李瑞祥

石楼镇二站村原贾岛墓前的李东阳诗碑，消失已近 50 年了。幸运的是，国家图书馆一直保存有诗碑的拓片资料，使得我们能够通过拓片窥其原貌。

该拓片通高 124 厘米，宽 70 厘米。碑额篆书“唐贾岛墓”，碑身文字为草书。碑文的前半部分为李东阳所作一首七律诗；后半部分简要记述了监察御史卢某在房山县南十里石楼村访得贾岛墓后，辟地植碑的情况；落款“西涯李东阳”、“正德丙子”，即明正德十一年（1516），说明此碑距今已经有 495 年了。



贾岛墓李东阳诗碑

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祖籍茶陵，幼居京师，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擅书法。他为贾岛墓作的这首七律，在明《帝京景物略》及清《日下旧闻考》中都有记载，且都有相同的两个歧字，但文意一致，仅有细微的差别。《日下旧闻考》在诗后注明录自《茶陵集》，因此笔者认为这是李东阳后来将自己的诗文付梓成书时修订的。

民国十七年（1928）的《房山县志》则是根据实际碑刻文字记录的。近年出版的多种关于房山古迹和旅游的资料中，在引用这首短短 56 字的诗时，竟出现十多个歧字和错字。因此，为了严谨和准确，笔者根据诗碑拓片，逐字查阅核对了草书字体的工具书，兹将李东阳《贾岛墓》诗记录如下：

百里桑干绕帝京，  
浪仙曾此寄浮生。  
葬来诗骨青山瘦，  
望尽荒原白草平。  
无地椒浆供庙祀，

有人驄馬問村名。  
穹碑四尺標題在，  
詞賦風流萬古情。

此詩首先把賈島曾經生活過的故鄉的大環境概略寫出來，然後將賈島墓附近的环境和荒涼托出，用“青山瘦”巧妙地点化出先人对贾岛的评价，而“白草平”不仅衬托了荒原，且更具房山的特点：白草在房山及周边地区广泛生长，贾岛墓东十几里就有白草洼村，西北山区还有白草畔。《房山自然资源与环境》指出：“在土壤、水分状况较好的条件下，以白草、黄背草占优势；在水土流失严重，土壤干旱贫瘠的条件下，以白草占优势。”第五六两句颈联说到卢御史寻访到贾岛墓时，墓地窘迫的状况。尾联提到四尺高的穹碑，即圆拱形的碣，最后一句无疑是点睛之笔，是对贾岛的至高评价。全诗只用“八庚”韵，中间四句颌联和颈联两两相对，可以说择韵严格，对仗工整。

《茶陵集》里本诗出现两个歧字，一是“椒浆”改“椒盘”，二是“风流”换“风余”。椒浆与椒盘都是指祭品，且都是平声，李东阳在此是斟酌诗的吟诵效果，因为“椒浆”二字声母相同，读来不如“椒盘”更顺畅响亮。“风流”二字富有激情，更潇洒倜傥；而“风余”显然平和沉稳，意韵深长。前者可能是诗兴大发时的用词，后者估计是修订时静虑的结果。据史载，贾岛不但是苦吟诗人，书法还颇具水平。李东阳以龙飞凤舞、一气呵成的草书书丹刻碑，正是与贾岛心有灵犀的显示。

李东阳诗碑原立于贾岛墓前一座四柱圆顶碑亭中。据村里知情老人郑成回忆，诗碑的石料泛黄色，一层一层的，这从诗碑拓片的纹理上可以明显看出来，尤其是碑的顶部和下部。在过去曾将一切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视作“封资修”，必予批判打倒的年代，这块诗碑被村民们垫在井台上当水槽用，就不足为怪了。后来井废石沉，这块珍贵的诗碑至今杳无踪迹，确是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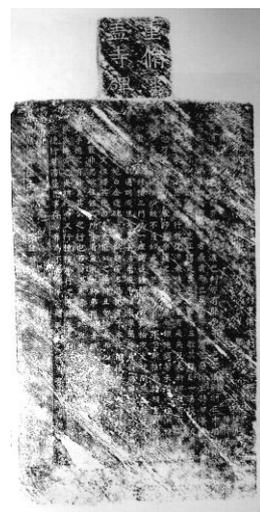
李东阳诗碑既有文学和书法艺术的美学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对后人研究贾岛具有重要意义。

# 贾岛在房山云盖寺修行的碑证

李瑞祥

唐代诗人贾岛在诗歌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执著坚韧的性格品质以及他一生的坎坷遭遇，使得后世留下许多关于他的传说，甚至关于他的故里、墓地和出家地，都有不止一处的说法。正如明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所说：“盖诗人丘里名，岛为多，身后名，岛为久。”

2010年，笔者去云居寺寻访云盖寺散落的文物时，云居寺文物科张爱民曾提供给笔者一个云盖寺碑文的影印件。碑额拓片额长31厘米，宽24厘米；碑身拓片长152厘米，宽80厘米。由于文字模糊不清和缺失之处较多，经过细致地辨认，整理出了大部分碑文。今年又去首都图书馆查阅了相关石刻拓本的影印资料，逐字进行了比对。下面是《重修云盖寺碑》全文：



重修云盖寺碑

## 重修云盖寺碑

顺天府涿州房山县圣□乡赵家庄里次乐村重修古刹云盖寺碑记

顺天府涿州 后学刘旺□□

锦衣卫銮御 隐士杨禄天爵

粤：黄道未分，而无动而亦无静；洪浓已判，亦有声而亦有色。二仪剖则三才明，珠机分而□□化，甚矣哉！人为万物之灵，惟善者最贵而已矣。自分兵农，善恶并立。诗曰：善者可以感□□□善心，恶者可以惩□人之逸志，正谓是矣。且夫世分三教，其理则一；嘉设九流，莫过□□□□事。昔夫如来，立法慈善，周行教化，济众博施，昭然有是矣！及夫断碑之有，曰其云盖寺□□□之设也，乃贾岛修习之处，师家乐道之居，亘古至今，颓补烦繁未□一也。洪惟我□□□□朝成化以来，殿宇复损，以故不获如是者。然□公名能，不忍斯损焉，持□重修□□□□□□殿、伽蓝祖师殿、钟楼三门俱一座，铸造钟磬，修栽松柏，

方丈间，蔬□□□□□□□□□□耆孙处，徐林、刘通、胡成、焦文美、王浩、李俊、牛继宗、李玺、徐□、刘绍、谭□等于寺焚香□□□□祭□遗迹，共施白金，造碑一□，欲题芳名为记者。予本范阳后□□□□□□□□□□不□于文，但绎其德而矣。夫能公之修持且勿论矣，而以□□□□□□□□□□日甘□齏，非思欲佳馐之所味，着簔衣与师弟同寒暑，眠□□□□□□□□□□□□乎，德之有余矣！其公之行也，若曰遇寒者施于与衣□□□□□□□□□□思欲与济济之，是谓行而又行，种种乎行之有余矣！是则公□□□□明造□□□□□□颓施德行甘澹齏，凡事存心靡为不善，噫乎！公之□□之□□有□□万物□□□□。

是为记。

□ 嘉靖三年孟冬 □钟□

从碑文中可知，此碑刻于明嘉靖三年孟冬，即 1524 年农历十月，距今已近 490 年。碑文记载了当时重修云盖寺的情况和捐资人，尤其是失其姓氏的能公，修持有德，对重修云盖寺起到了关键作用。

碑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及夫断碑之有，曰其云盖寺□□□□之设也，乃贾岛修习之处。”这句话说明在近 490 年前，云盖寺里曾保存有一断碑，上面记载着这里曾是贾岛的修习之处，而这块断碑无疑年代更早更久远。

笔者曾在《大次洛村云盖寺》一文中，曾记述了村里多位知情老人的回忆，即村里地下埋有数块古碑，其中一块碑石上刻有一个简洁的和尚图案，并有“唐”代字样，此碑极可能与贾岛有关。

虽然目前古碑还没有现身，但《重修云盖寺碑》拓片足以证明，房山云盖寺确曾是唐诗人贾岛修行之处。

# 明末四大师之真可、德清与云居寺佛舍利

杨亦武

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自隋大业十二年（616）奉安以来，历 976 年，直到明万历二十年（1592）真可的到来才重现于世。记载这件事的有三方明代石刻，分别是万历二十年（1592）德清明的《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涿州西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和明万历二十九（1596）王泽民的《石经寺施茶石记》，而以前二碑较详。

—

真可，字达观，号紫柏，世称紫柏尊者。俗姓沈，江苏吴江人。他与憨山大师德清、莲池大师袞宏、藕益大师际明号称明末四大师。他十七岁时，辞亲远游，欲立功塞上。行至苏州，宿虎丘云岩寺，闻寺僧诵八十八佛名号，内心欢喜；次日晨，即解腰缠十余金设斋供佛，从寺僧明觉出家。

真可出家后，常闭户读书。年二十，受具足戒。不久，至武塘景德寺闭关，专研经教，历时三年。万历元年（1573）至北京。真可在万历初年，为便于信众请经，产生了刻造方册藏的愿望，后来得到陆光祖、冯梦祯等人的资助，开始筹备刻经。

大明万历十四年（1586）真可携弟子道开远赴山东半岛的崂山，为刊造方册藏一事走访一个佛教界赫赫有名的大师，这个人，就是德清。

德清，俗姓蔡，名德清，字澄印，号憨山，全椒绰庙人（今安徽和县）。明末四大师之一。

大师生于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46）。大师满周岁时曾大病一场，母亲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祷告：愿舍儿出家。不久病即痊愈。为此，母亲将大师寄名于本地长寿寺，取乳名为“和尚”。少时宿慧，聪颖过人，经书子史，入目能通，尤喜诗词，虽苦读寒窗，但无意仕途。12岁削发入佛门，19岁受禅法，曾在南京报恩寺为僧，后云游各地。来到山西五台山，在北台时，爱憨山之秀峰，

遂取此为号。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憨山因慕崂山之盛名，由五台山来此。先在崂山那罗延窟修禅，又因此处不可住，该年夏季至太清宫附近树下掩片席为居，历7个月，山民张大心结庐使其安居。憨山认为崂山乃一形胜之地，诚为大观，但对“处处琳宫皆为荆棘”的衰落境况，甚为叹息。他本想长揖山灵而去，但又不舍此处之钟灵毓秀，故淹留崂山，徜徉其间，饱览山光水色。慈圣太后遣使送三千金为他建庵居住，时山东遭灾荒，他即建议将此费全数施与孤苦。

真可来访的这一年，德清正在崂山建设一座宏伟的寺院——海印寺。这座寺院自万历十三年动工，已经建设了一年之久。一年前，德清得到慈圣太后的资助购下崂山太清宫的地产。又得到即墨江、黄两乡绅和泰岩、荫谭诸人的施助，始建海印寺。真可一路赶往海印寺，他还不知道，德清又迎来了一大喜事，这一年，神宗印刷大藏经十五部分送全国名山，慈圣太后特送一部与东海崂山，因无处安置，又施材助德清修寺。真可抵达海印寺后，以刊造方册藏事与德清相谋，逗留二十日。便携锡北归。

途中，真可专程来云居寺参礼，他来到琬公塔前，一见便泪堕如雨，若亡子见父母庐墓，抱幢痛哭，徘徊久之。真可何以到云居寺参礼琬公塔？文献没有说明。但就真可筹造方册藏的背景看，他参禅静琬这位900多年前的刻经大师，必和他筹造方册藏有关，他此行的目的一定是想从这位刻经先贤身上寻求灵感和激励。这是真可第一次来云居寺。

## 二

六年以后，真可再次来云居寺参礼。不知是这位大师有意为之，还是冥冥中的机缘，本次参禅竟然令奉安在雷音洞976年之久的舍利重现于世。

多年来，真可大师为报父母养育之恩一直亲手抄写着《法华经》《楞严经》两部经卷，到万历二十年（1592）刚好完成。这一年四月十五日，真可以弟子道开、如奇随行，从五台山来到北京，托太仆徐琰，造个精美的石函，将《法华经》《楞严经》珍藏其中，然后送到芦芽万佛塔奉安，其间暂栖京西潭柘寺。慈圣太后闻讯，遣近臣陈儒、赵赞送斋供资。五月十二日，陈儒、赵赞随真可一行自潭柘寺来到房山的云居寺，五月十九日前往石经山雷音洞参拜。达观见洞内“像设雍敝，石经薄蚀”，于是命东云居寺住持明亮加以修缮。动工的第二天，僧人们启开雷音洞内的拜石，石下有穴，内藏石函约一尺见方，面刻“大

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36字铭文，内贮四五升灵骨，状如石髓，异香馥郁，其间有一银函方寸许，内盛小金函半寸许，金函内有一个小金瓶，内贮3粒舍利，状如小米，紫红色，按《法苑珠林》所言，这3颗舍利为肉舍利。达观即刻通过赵贇把石经山雷音洞发现佛舍利一事上奏。慈圣太后获悉，欣然斋宿3日，六月初一日，把佛舍利迎入其寝宫慈宁宫，供养3日。

真可逗留云居寺，再次参礼琬公塔，岂料，塔院已被寺僧盗卖给当地富豪，真可悲伤不已，当即拿出慈圣太后的供养金并得到法灯等人的资助，从巨室手中赎回了静琬以下百余座历代高僧的骨塔。

当真可带着如奇、道开，礼拜刻经创如人琬公灵塔的时候，在山西的五台山，真可的弟子们正在刊刻着方册藏，刻藏事体由真可门人如奇等主持，于万历十七年（1589），开始刻在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刊造，到万历二十年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当年山中气候严寒，刻经工作极为艰难。真可再来云居寺参礼，且以主持刻经的如奇随行，其中的用心，不言可知。和第一次一样，他再次来云居寺参礼，仍然是缘于他的刻经情结。而真可大师的刻经情结，无疑是雷音洞佛舍利出土的内因。

时值盛夏，云居寺所在的北方，正是酷暑难耐的季节。真可大师便来到云居寺以北十数里的上方山避暑。此时，崂山海印寺德清大师闻讯赶来，在上方山的兜率寺见到了真可。二位大师自万历十四年（1586）海印寺一别整整六年，久别重逢，真可谈及刚刚在云居寺的一段经历，两人拊掌痛慨。说话间，真可门人道开携同徐琰，手持赎买云居寺塔院券契而来。真可高兴得从座位上站起来。当即拉着德清冒雨一同前往云居寺礼赞。天雨泥泞，两位大师走了一天的路，傍晚才抵达云居寺，真可和德清顾不得一路劳顿，赶到塔院，顶着风雨绕琬公塔三匝礼拜，然后默存伫立。真可委托德清撰写《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刻碑于石，立于琬公塔旁。

佛舍利在皇宫逗留两个月零19天，八月二十日，皇家遣专使将佛舍利放回石经山雷音洞原处安置，上覆以金身如来佛像。海印寺僧德清受真可之命作《涿州西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

德清记云：“乃于小金函外加一玉函，玉函外复加一小金函方一寸许，坐银函内，以为庄严。出帑银五十两，仍造大石函，总包藏之。”。

佛舍利的再次发现即是在1981年。自明万历二十年（1592）至此，历时389年之久。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几为世人淡忘。



舍利石函

1981年11月27日上午，云居寺文物保管所人员在雷音洞内清理地面，见佛座后边地下5公分处有一方石，不觉有些诧异，掀开方石，下有一穴，穴中有一石函。此时现场还有文管所负责人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专家。人们想到了史书上关于石经山藏有佛舍利的记载，于是小心向外发取。经一上午的忙碌，中午12时15分，五重封函全部取出。佛舍利藏于内函中，共两颗，小米粒般大小。现场拍照后，封函及佛舍利被北京市文物局迎往北京保藏。随后，佛教、文物专家逐一

打开封函，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时过5年零5个月，1987年4月28日，北京市政府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才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次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刊，纷纷报道新闻发布会的情况及佛舍利发现的经过。

1981年发现的佛舍利，计五重封函。

外函为汉白玉大石函。长宽各49公分。通高50.8公分，此函为明代增制。函盖刻有172字铭文：

大明万历二十年岁在壬辰夏五月十有九日戊寅，达观可禅师携侍者道开、如奇、□丞、徐琰自潭柘来，见像设瘫敝，命东云居寺住持明亮芟刈之，获启隋大业间所藏佛舍利三粒，悲泣赞礼。会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遗臣陈儒、赵贇送斋供至，以闻，六月朔日己丑迎入慈宁宫供养三日，发帑银加造小玉函一，小金函一，大石函一。于八月二十日丁未，遣陈儒仍安藏，愿住持永劫，生生世世，缘会再睹。东海那罗延窟海印寺沙门释德隋记。

这172字刻铭内容与《涿州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同。不过在函盖的里面还刻有令人注意的愿偈一则，共83字，全文如下：

达观真可禅师愿：藐然孤露子，佛慈所摄受。以大智慧手，拔我出众苦。我感佛恩故，愿护佛舍利。若所藏所出，必经我心目。若违我本誓，更无藏出者。仰求圣凡等，供证我愿力。是力若不坚，当堕无间狱。弟子法灯暨孙元朗等施资携石。

从这则铭文看出，外函乃是由法灯和孙元朗等人放资，由真可监造的。

次函为青石函。长宽各30公分，通高24公分。面刻“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36字铭文，系原隋佛舍利外函。函内原有四五升灵骨，1981年发函时未见，看来

是让明人取出了。

三函为汉白玉石函。长宽各 13.2 公分，通高 13 公分。属明人增制。上部楔状抽屉盖，铭文：“佛舍利。明万历壬辰岁秋八月二十日，慈圣皇太后差官陈儒重安”。

四函为镀金银函。长宽各 3.85 公分，高 5 公分。顶部有莲花，四坡中部饰莲花，两侧为忍冬草花纹。函体四面有线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图案。周边饰莲花及忍冬草，鑿工极精。内藏木质彩绘香珠 1 颗，珍珠 11 颗。此函为隋佛舍利二函，被明人镀金文饰了。函内的木珠、珍珠等物，均为明人安放。

佛舍利内函为白玉函，长宽各 1.2 公分，高 1.7 公分。为明人增制。内有两颗乳白色小米粒般大小的骨舍利及两颗珍珠。

隋内函小金函内，原藏有小金瓶，隋人安置的 3 颗肉舍利即在此瓶内。显而易见，明人再封佛舍利时取走了隋小金函、小金瓶及瓶内的 3 颗肉舍利其中的一颗，而代之以白玉函，并添加了两颗珍珠。

需要指出的是，1987 年 4 月 28 日，新闻发布时，指 1981 出土的舍利为乳白色，为骨舍利。而明万历发现时记载的是肉舍利。后来，这两颗舍利曾回云居寺展出，具亲眼看到的工作人员讲，他们看到的舍利是泛着红色的。舍利颜色的变化令人费解。

以上 5 件，就是本次发现的各种函套和题刻，实物与德清的记载显然出入很大。

达观发现石函时，佛舍利肯定是 3 粒，且为肉舍利。否则德清不会作出这样详细的记述。但是从送往慈宁宫供养以后发生了变化，数量上从 3 颗变为 2 颗。何以发生了这个变化，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将是一个不解之谜。

### 三

发现佛舍利的达观大师真可、为佛舍利作记的憨山大师德清，先后遭蒙冤狱，或多或少，都与云居寺佛舍利的出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一下真可的发愿文。前四句：“藐然孤露子，佛慈所摄受。以大智慧手，拔我出众苦。”是颂佛。接下来六句是真可所发之愿：“我感佛恩故，愿护佛舍利。若所藏所出，必经我心目。若违我本誓，更无藏出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佛对我有恩，所以我发愿护持佛舍利，佛舍利无论

是归安还是出示，必须经过我目视和心证。任何人不得违背我的誓言，不经我而擅自将佛舍利或藏或出。最后四句是自誓自己愿力之坚定：“仰求圣凡等，供证我愿力。是力若不坚，当堕无间狱。”真可要神圣和凡俗人等为自己做个见证，最后他发誓：如果我的愿力不坚的话，就让我堕入无间狱。

何为无间狱？无间狱是佛经中八热地狱之一，为最重之狱。真可在雷音洞佛舍利归安之际发下如此愿力，实属令人费解。细读其发愿文，并结合真可的身份便知。作为一个僧人，哪怕是一位大师，无论如何是无力左右佛舍利命运的，所以他的发愿文实属毫无意义的一纸空文。既然如此，真可又为何立誓？依本人思之，这反映了真可这个佛教徒，面对佛舍利历经周折的惊恐不安的心态，佛舍利经他从雷音洞出世，他惟恐佛舍利有失。无奈之际，借佛舍利归安，发愿铭石以自清。当我们穿越四百年的时空，重新审视这位有明末四大师之号的真可，不难发现，他没能做到佛家理当秉持的“看破，放下，自在”，着实缺失一种大师的心态和胸怀。

真可的发愿文果然没有改变佛舍利遗失的命运，而他为自己立下的重誓竟一语成谶。万历二十八年（1600），真可因对南康太守吴宝秀拒不执行朝廷征收矿税命令而被逮捕表示同情，遭到一些宦官的嫉恨。他的门人为他的安全着想，相继写信劝他出都，真可不以为然。万历三十一年（1603），大学士朱赓发现京城流传着一部名为《续忧危竝议》的书，其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因为皇上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之意。不料此书的出现触痛了郑贵妃的心病，她哭闹着要神宗追查写书的人，于是朝廷大兴冤狱，许多朝臣、百姓为此无辜受害，死于非命，这就是明史上所说的“妖书案”。石经山发见佛舍利后一度为真可提供供养金的慈圣太后，此时竟诬陷真可以滥用帑金之罪，捕之下狱，并诬陷他是“妖书”的制作人，当年十二月十七日真可冤死狱中。

德清比真可早罹冤狱，万历二十三年（1595），神宗不满意慈圣太后为佛事耗费巨资，加之慈圣太后曾派了个大臣所忌的使者送经到崂山，这样就迁罪于德清。恰有进士出身的太清宫道士耿义兰控告憨山强占庙产。明神宗便以私建寺庙罪，将德清充军到广东雷州。万历三十一年（1603），真可在京师因“妖书案”，被捕下狱。原本已在曹溪南华寺常住的德清受到牵连，又被遣还雷州。三年后明廷大赦，德清才得已再回曹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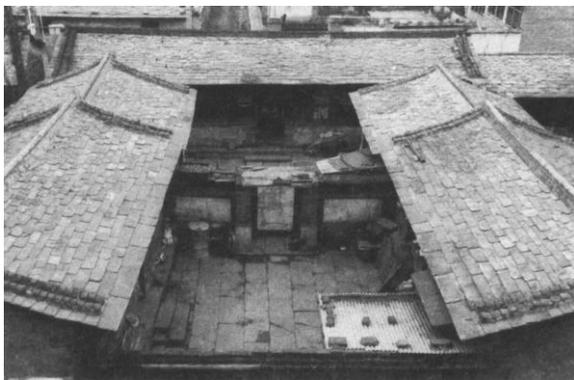
# 保存完好的黑龙关传统民居

张东升

黑龙关村的传统民居竟保存得如此完好：仍是熟悉的旧式街巷，仍是布局严整的院落和青石板覆顶的房子，一切如昨。来到这里的人似乎都有这样的感觉，仿佛久久寻觅的某种东西一下子找到了，就在佛子庄乡，在大石河畔，一个人口不多面积不大的小村。这里，传统文化的积淀是这样浓厚，就像是个化解不开的“核”。站在村头高处，望着一片片错落有致的院落，宛然在静静地欣赏一首古老的歌谣，既感到岁月的沧桑，又有股绵绵不绝的古意。

近些年，北京城的建设步伐快得令人瞠目。然而，一些古建筑学家回到北京，见到北京的旧城墙和一些古建筑被拆掉了，不禁潸然泪下，深感痛心。当然，北京旧城墙该不该拆，城市建设如何布局和规划，也是各说各的理。不过，有一点却不容忽视，就是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旧北京的历史遗存和标识也在逐渐消逝和减少，有一些已经片瓦无存，只能在历史文献中寻找一些轮廓和痕迹了。

这一现象在乡村也很普遍。毕竟北京是首都，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北京城的建设，不仅引起国内专家的注意，也引起国外专家的关注。于是，便有了保护北京四合院和北京胡同的建议和措施，而且只要确定为保护对象，一般人就不敢碰了。在乡村则不一样，没有人为传统历史遗存的保护大声疾呼，所以乡村建设基本处于无序状态。不少村落已面目全非，变成无特色的杂乱无章的一片。比较典型的是长操村。长操的旧村是传统建设的典范，几百年来，街道胡同和院落、房舍的建设都中规中矩，然而，近年来村边的建筑，房子是高大轩敞了，却是对几百年来留下来的传统文化的破坏，成了不城不乡的怪胎。其他



黑龙关村四合院

村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山区是这样,平原也好不了多少。京郊首富韩村河村是全国村镇建设的典型,但像韩村河这样的村子又有几个,恐怕屈指可数。琉璃河镇有个“仿古一条街”,主体建筑却是水泥墙加钢窗,显得不伦不类。

人们惊异黑龙关村传统民居的保存完好,是和内心化解不开的历史和文化情结分不开的。

黑龙关村究竟是先有“关”还是先有“村”?按一般情况推断,恐怕是先有“关”,当然也不排除在设关之前先有人家居住,后来设了关,有兵丁守把,成了军事关隘。当军事设施废弃后,守关军兵后代就成了关下居民。据人讲,有人曾登上村东高山向下观看,发现黑龙关村形状像一条“龙”,整个村子成带状,像龙一样盘在大石河岸。村后是险峭的悬崖,村前是蜿蜒的河流,村民傍水而居,有的院落离河只有十几步远。

黑龙关设关的历史可以上推到五代,据今已有一千多年。村落的形成,据《房山区地名志》记载:“金代此地已有黑龙潭地名,后成村落,因附近山上旧有关城,今仍存城墙遗迹,故名黑龙关”。这段话虽没有明确说出黑龙关成村朝代,但已肯定黑龙关成村很久,现今的村落成于何时,至迟在元明时期。另外,受地形限制,北倚高山,前临河流,大石河属于深山区河流,夏季洪水暴发时,汹涌咆哮。所以,村落向外扩展困难,而且只能向南北两边延伸。南边又是山崖深湾,只有北边龙潭河流拐弯处还有少量滩地,地形的限制和束缚,是黑龙关村得以保存传统风貌的根本原因。

说到民居,不能不提到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民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本。北京的四合院,就是北方传统民居的典型。封建时代讲究一家一户长幼同住,崇尚“几世同堂”,所以才有封闭的四合院。一个四合院,长辈居上房,代表身份和地位,是一家的主宰,儿孙住厢房,在长辈的羽翼下生活。



黑龙关村街道和院落

传统民居的另一特点,是“就地取材”,即建房的材料取自本地。这是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同样是房山区,平原传统民居是土坯墙土皮顶,山区则石砌墙石板压顶。同样是山区,十渡的房子和大石河两岸的房子也不同,两者的差异正是地域性的体现。

黑龙关的传统民居,称得上是大石河谷传统民居的经典。说到传统,至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大石河谷其他村子,

过去不是没有整齐街道和石墙石顶的房舍，可惜能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黑龙关却保存下来了。为了发展旅游业，北京市不少区县都刻意定一两个“点”，名为“民俗村”，靠采摘或民间传统饮食招揽游客。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民俗村”，是从建筑开始的，包括建筑样式、建筑材料及房间内部格局等。所以，大石河谷真正意义上的民俗村就在这里，因为这是仍保留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山村。它所凝聚的是大石河谷的传统文化，从民居开始，到生产生活习俗，乃至祈雨等传统习俗，在黑龙关村都能找到，而且是几百年甚至更远的文化习俗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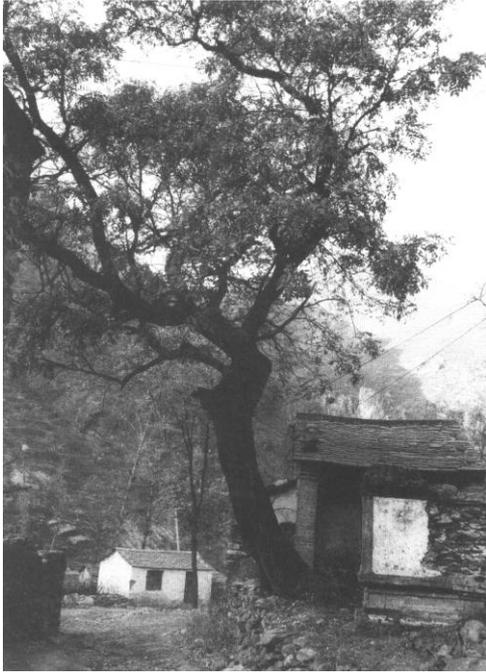
黑龙关的传统民居是独异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即大石河两岸特色。

整个村子从南到北只有一条街，有一二里长。街道很窄，最宽处不到两丈宽。街道两边是一个个院落。院落是中国北方传统的建筑样式，但又有区别。北京的四合院宽敞严整。山区的院子不行，山区地狭，样式有四合院有三合院。四合院又分“大四合”和“小四合”。“大四合”上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迎门三间。黑龙关的四合院以“小四合”居多，也是地方狭窄的缘故。

房子都是梁柱结构，“四梁八柱”。房柁很粗，用结实的山木来做，最结实的要属槐木，榆木，香椿木也可以。杨木很少，因为杨木易断，不宜做柁。桑木不能做柁和檩，因为和“丧”音近，犯忌。传统的雕花窗棂，不管是“步步高”还是“盘肠”，在这里都能见到。垒墙用的是河边的卵石或是从附近山上取的山石，黄泥垒砌，青白灰挂面儿。房顶是又薄又轻又结实的青石板。过去陈家台村产的青石板最有名，是大石河谷特有的建筑材料。西班各庄村的青石板也不错。大石河谷各村的传统民居，差不多都是青石板覆顶，硬山墙，房脊两出水。

同不少村庄一样，黑龙关村传统民居的另一特色，是大门不在小四合院正门一间开，而是从一边开，从正门一间开的很少。面朝西的院子门开在南边，面朝东的院子门开在北边。进门都是向左拐。院子正门里设有影壁是四合院的一个特色。黑龙关村小四合院，有的有“假影壁”，即在迎面的山花墙上做一个“影壁”，上边也有雕花砖檐。

院门多是厚厚的木门，门框和门楣有鏊花。最能体现传统建筑艺术特色的是门里“雕栏”的设计：既然门口要占一间房，有了大门，进门后不能空荡荡直出直入，比较讲究的人家都要在和门相对的一面留出个门供人出入，两侧为了装饰，用精致的木板做“墙”，顶部多是透雕，有的是“喜鹊登梅”的图样，整个门栏仿佛个倒扣的“凹”字。



黑龙关村外的“七圣贤洞”

黑龙关村北有一株古树，树下有个破败不堪的小庙，叫七圣贤祠，俗称“五道庙”。别看小庙破败不堪，过去可是村村都有，只不过现在多数已荡然无存了。过去人们相信鬼神，特别相信人死后有灵魂存在，离开阳间，自然要到阴间去“报到”，五道庙就是鬼魂“报到”的小庙。哪家的老人故去了，孝子们就要披麻戴孝手拿“灵钱”，去五道庙报到。儿女们一路哭着来到五道庙内，用灵钱在庙里的墙上“粘”。灵钱是用毛擦纸剪成的，有巴掌大，形状像铜钱，外圆内方。“粘”时不能用糨子，只能手托灵钱一下下在庙堂或院里的墙上试，灵钱在什么地方粘住了，就说明灵魂到了什么地方，儿女们便在灵钱粘住的地方

烧纸哭祭。按当地习俗，老人故去一般停灵三日后出殡，三日间，每日早晚都要去“报庙”。

讲到民俗，一般讲人生礼俗、生产和生活习俗及节日庆典等几大类。建筑格局和式样及建筑装饰，属于生活习俗。习俗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变迁。民俗的地域性是民俗的主要特征和核心，但变迁又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人不能老按照一种生活方式来生活，而民间文化的价值，又总是通过一些已经消逝的东西来体现的，这就是辩证法。饮用自来水，像北窖、英水等产煤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实现了，但在黑龙关村，不少人家仍去河边取水。凉水泉的水清冽甘甜，每天清晨，村中宿鸟唧唧噪叫，人们便担起水桶，颤颤悠悠去河边担水了。水桶和扁担钩相磨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音，仿佛是一首传唱千百年的歌谣，在向人们讲述着古老的故事。

桔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据史书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民间叫吊杆或吊斗。支脚是几根木头，一般是四根，一边两根，交叉捆绑，中间吊一根横木，一端系水桶，另一端系上石头，提水灌田，节省力气，简便实用。

黑龙关村外河滩地，辟有一方水田，取大石河水灌畦，种植蔬菜，已有很久的历史。没有统计过，黑龙关村外河边究竟有几副桔槔。不过，能在这样环

境优美山灵水秀的山村发现桔槔，就很让人惊喜了。就是这简单的利用杠杆原理发明的提水工具，已延续两千多年。这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今天，甬说城里的孩子们，就是农村的孩子们，有几个见过这东西？更甬说了了解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了。

# 杏园村风景述略

## 潘惠楼

杏园村，自然、社会、人文资源深厚。先民世世代代，筚路褴褛，以启山林。奠基创业，开发建设，使山川更增秀丽，山村更具神韵。笔者生于斯地、长于斯地，耳濡目染，深感家乡之美。1968年至1972年，笔者在杏园村插队。劳作之余，曾将村中景观择其要者，拟为八景。近年社会发展迅速，世事更迭频繁，有的景观发生变化，有的景观荡然无存。然受其熏陶，得其惠泽，岂敢相忘。特别记之，以饗乡人。

## 潘楼大槐

潘楼，因潘氏得名，是杏园村潘氏的主要居住地。横流水沟域内有他窑、口儿、杏园、南道四村，潘楼位于横流水沟域中心。潘楼在横流水西岸，座西朝东，建筑依山势而起，背后层层梯田，前有杏园沟与横流水沟在此交汇。相传，旧时潘氏落户于此时有楼房一幢。楼在今潘惠森院前，不知何时消失，今潘惠森家房后，留有楼的残墙一道。楼前有大槐树一株，在20世纪50年代时，树主干之粗需四成人合抱，树干高约30余米，枝繁叶茂，树冠遮荫斜长面积大过足球场，树根外露部分盘根错节，时有横流水沟域第一大树之誉。其中，树主干高约7米，主干上留有三大主权，一杈直入云天，一杈虬枝横卧，一杈蛟龙探海。三大杈传为杏园潘氏三大门分家时所留，喻为三门同根。潘氏民居，围绕大槐树向四周建设发展，大槐树成为潘家楼中心。游人若经过横流水的潘家楼，第一眼就会见到这棵大槐树。五月春尽，大槐树槐花盛开，满街飘香；八月暑热，大槐树浓荫匝地，令人心爽；十月秋寒，大槐树百鸟啁啾，黄叶缤纷；腊月交年，大槐树积雪凝素，玉挂珠帘。大槐树东西，各有潘姓族人场院一座。平时场院存放潘氏族人物品，秋收或农忙时，场院热闹非凡。白天，大槐树下是人们聚会休憩聊天之所；晚上，大槐树及其附近是孩子们捉迷藏的乐园。大槐树庇荫潘姓族人，泽被横流水沟域。横流水，因有此大槐树而觉历

史深远；潘姓族人，为有此大槐树而倍感自豪。上世纪 50 年代，破除迷信时，拆毁杏园村大庙，有人将庙中古钟移至潘楼，悬于大槐树上。村中每有大事发生时，常以钟声邀集村民。大跃进中吃集体食堂，司专人敲钟，作为开饭信号。

“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刮大风，大槐树常有树枝折断，危及行人及房屋，当时经济匮乏，木材供应紧张，遂有无知之人议论砍树。1971 年夏，杏园第二生产队派人将大槐树砍伐，作价卖给潘氏族人，优先照顾烈军属使用。各家买回后，有的将主干加工做了寿材，有的将枝杈做建筑柁檩柱椽，总计大槐树作价一千多元。当年杏园第二生产队工分值为七分二厘，一个整劳动力一天挣十分，合一天挣七毛二分钱。当年杏园村第二生产队全年总收入两万多元，大槐树的作价收入约占生产队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大槐树被砍伐后，潘姓族人及横流水人家都感到非常遗憾，认为做了一件蠢事，破了潘家楼风水。从此，潘楼大槐的美丽景观成为记忆和谈资。

### 红岭梨花

红岭又名红土岭，位于前面山脚下杏园民居之后，南邻东台，北接麻婆沟。红岭地质结构为石灰岩，土为红壤，土的黏性较大。红岭即因岭上土壤呈红色得名。红岭上原有梨树数十株，分布在峰头岭角及梯田之中。树粗者需二人合抱，树龄达百年以上。每年清明节后，红土岭上梨花盛开，如同香雪海，蜂飞蝶舞。与红土岭隔横流水沟相望，是潘家楼居住点，座西朝东。一排排房舍，沿山势层层升高。居民出得屋门院门，正面对红土岭。眼前雪浪堆涌，梨树下的红土，若隐若现。梨花与红土相映，更显梨花之白，红土之红，风景独有特色。因被誉为红岭梨花，成为杏园八景之一。可惜的是，杏园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划为工业区后，劳动力外出，土地缺少耕种，许多梨树枯死，遗留的寥寥梨树，梨花再盛也难于形成雪海之势。

### 花岭春深

花岭，位于杏园村东部，由相连的三个山包组成，是杏园村与南车营村的分水岭。岭东为南车营村地界，岭西为杏园村地界。花岭南为被阴沟，北邻北大洼。岭上有两条古道，其中南边古道连接上杏园，经茶棚到南车营村；北边古道分为两支，一支通往潘家楼，一支通往口儿村，到东大地汇合后，上花岭

到南车营村。花岭，原名黄花岭，因岭上盛产黄花得名。后因采撷黄花过量，黄花渐少。但花岭地质结构为页岩，蕴藏丰富高岭土，时有石炭纪煤层露头，土壤含水性好，土质肥沃，坡度较缓，适合草木繁衍，植物种类多种多样，野花众多，固被称为花岭。而随着土地开发，花岭上辟出层层梯田，又被人们栽培众多果树。尤其是杏树、桃树，蓬勃生长，漫山遍野。春夏秋三季，花岭上皆有山花绽放。尤其春夏之交，花岭犹如花的海洋，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缤纷。游人沿古道进入花岭，乱花迷眼，香气袭人，如入百花深处，不知春深深几许。如果在花岭对面的潘家楼一带东望，花岭青山似黛，晕染着花的粉红，如观看一幅水墨丹青。故被誉为花岭春深，为杏园村八景之一。

### 桑岭观云

桑岭又名桑树岭，是杏园老村上杏园东面的第一道山梁。岭上的隘口之处，原生长着一株大桑树，桑岭即由此桑树得名。桑岭，是河套沟矿区过杏园村去往房山县城的古驮道必经之处，是三条古道的交汇处。桑岭南往山上行，可达王家洼，再往上翻过山可进入房山城关镇的南台村；桑岭往南沿山腰横走过大槽沟可至风口鞍；桑岭往东下山是大槽沟，再往东上山是风口鞍，下风口鞍即进入平原地区，第一个村庄是房山城关镇的羊儿峪村。这三条古道中，只有此路是驮道，有的路段是经过人工垒砌而成，其他道路只能走行人而不是驮路。进出杏园村的人，多爱在桑岭打尖休息。桑树岭上的桑树，被杏园村民誉为神树，因此地位于山顶，风大土薄，岩石裸露，极不适宜乔木生长。在四周皆是茅草荆榛之中，有此大桑树高标天际，令人费解，认为非神力不能为，因此村中留有大桑树的很多传说。站在桑岭四望，一览众山小，目极百里外。东面，可见良乡古塔耸立，青龙湖水库如镜；西面，可见群山连绵，百花山莽莽苍苍。尤其是早晨和晚间，在桑岭观云，风景不同一般。早晨，东面天边出现亮色，逐渐变红，一会儿云蒸霞蔚，地平线上跃出一轮红日，气象万千。晚上，夕阳西下，远山衔日，霞燃似火，映得众山披金挂银，桑树岭的大桑树，蒙胧中似有一树红花。还有的村民专程在国庆节夜间至此，欣赏观看天安门焰火。故有桑岭观云之说，被誉为杏园八景之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笔者在杏园村插队，经常在桑树岭的大桑树下休息。那时的大桑树主干之粗需三成人合抱，但树中已空，树洞中已可藏人。树根裸露于岩石之上，树高约三丈，树冠并不茂盛，颇有老态龙钟之感。大桑树的根旁，生长有一株梆梆树，在大桑树的荫庇

下，已高出大桑树树冠。2010年清明节前，笔者至桑树岭拜谒老桑树，发现桑树已无，打听看山守林人，得知大桑树已于前几年缺水枯死。但见原生长桑树根旁的梆梆树，在桑树岭上卓然而立，树冠犹如黄山的迎客松，树干已合抱不过来。桑树岭之桑后继又有大树，幸甚；不是桑树，稍感可惜。看来，桑树岭已名存实亡，将来是否改称梆梆树岭，也未可知。

### 壶口冰瀑

壶口是从杏园沟进入老村上杏园的一个关口，两山相对，中开一线。杏园沟水从山上奔来，前受山势所阻，左右被山相逼，沟狭谷深，激流涌湃，冲开山口，急奔而下，形成瀑布。山口宽不足丈，直上直下，深约丈余。平时水流贴石壁漫下，斜风细雨，悬银垂露。夏秋之季，山洪暴发时，从下往上观看，如壶口出水，倾泻如注，声若雷鸣，故称此地为壶口。冬季，此地奇寒，沟水结冰，在壶口形成冰瀑，层层叠叠，银装素裹。清明时节，杏园沟山花盛开。桃花灼灼，冰瀑晶莹，红白相映，刚柔并济，故被誉为杏园村八景之一。有时五月残冰犹存，引得村民到此取冰消暑。壶口西侧山峰，孤柱擎天，状如窝头，又似葫芦，故村人又称此地为葫芦头。因此地是杏园沟水流出口，又被称之为葫芦口。壶口，又是风口，口上与口下温度相差许多，夏季进入壶口，如入清凉世界。背柴背草之人路过壶口，需侧身减少风的阻力通过。进入上杏园的道路，在壶口西侧山崖上凿出，形成之字，蜿蜒而上，仅容驮畜通过。其地势险要，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 盘道蹄痕

盘道，是上杏园至茶棚的驮道，是上杏园去南车营古道中的一段，如玉带缠绕在观子山山腰。上杏园，是杏园村的老村，位于杏园沟的沟头，房屋建筑错落分布于峰头岭角，土地狭窄，石田瘠薄，坡度陡峭，不适宜农耕。然在自然经济时代，上杏园曾是一处繁华所在。民国十七年（1928）房山县编修的县志记载，当时杏园村村民有68户834人，也是河套沟的较大村庄。何以如此，因此地产煤，又是矿区交通要道。旧时，大石河河套沟受河水所阻，从河北镇出山至坨里，要经过七八座桥梁。夏季山洪暴发，交通经常中断，致使河套沟矿区煤炭和山货，造成积压，难以运出。而河北镇南部矿区货物，经上杏

园古道驮运外出，则比走河北镇大石河河谷更为方便。由上杏园往西，有古驮道连接晒台村、口儿村、他窑村，过后山可达英水沟、北窖沟；由上杏园往南，有古驮道过风口鞍即是平原到达房山县城；由上杏园往东，有古驮道经南车营至坨里出山，或走门岭继续往东直入京城。上杏园所在位置，成为过山总路，是古驮道上的交通枢纽所在。盘道，即是杏园村的古道之一。杏园盘道，基本是沿观子山山腰平行开凿出来的道路，里清外垫，低处垒墙抬高，路面砌以片石。路宽一般可达三米，能容驮队相向错过往来。经过数百年的驴骡马驮踩踏，路面山石留有众多蹄痕。有的蹄痕，深达 200 毫米。在观子山西面的古道石壁上，还雕刻有盘肠图案、野雉图案。盘道往东绕过观子山后，有一院落，名为茶棚，原是服务古道商旅往来的店铺，由杏园村李氏族人所有，是东来进入盘道的第一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土地划归集体时，调整各村的插花地，杏园村与南车营村以花岭分水岭为界，将花岭以东的杏园村茶棚划入南车营村，将花岭以西的运煤高线线路下的南车营村土地划入杏园村。1954 年，上杏园被列入房山煤矿采空区，村民全部被搬迁，村庄逐渐成为废墟，杏园盘道也就失去了交通作用。但盘道风景犹存，盘道上的蹄痕、雕刻犹存，沿盘道古迹游览，发思古幽情，仍吸引众多游人。倘若与盘道之下的石花洞旅游景区联成一体，再开辟一个山区古道旅游项目，也许会成为一道新的旅游景观。

## 古庙钟声

古庙是杏园村的娘娘庙，也被称为杏园大庙，庙址在上杏园之南的峰头上，建于何时不详。沿村中庙道往南转过一个山头即是庙前台阶。台阶下方有一小庙，为五道庙。台阶坡度较陡，共有 48 级。有如此之多台阶的建筑，在当地还真是少见。台阶之上是庙门，门前有白石狮一对。台阶两边是垒砌的数丈高墙。进庙院后是一大平地，生长数株古树，其中一大楸树有二人合围之粗，高及数丈。再上台阶才是庙宇建筑，迎面是房屋 9 间。其中，大殿三间，大殿山墙左右各有耳房三间。殿前北厢房两间，影壁一座，在大殿与北厢房之间有侧门楼一座。殿前西侧厢房位置是戏台一座，戏台西也有一侧门，通往杏园村南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殿内部为一明两暗，正中明间为厅，悬挂大铁钟一口，地上放置铁钟一口。两个暗间供奉神像，有娘娘、菩萨、大肚弥陀佛、千手千眼佛等。东耳房为学校教室，西耳房居住老道并存放物品。院中树木花草众多，其中大殿前原有两株大柏树，也高达数丈，一棵枯死，一株枝繁叶茂。

花草有芍药、牡丹等，花朵硕大少见。古庙也是村中办公公所，村中每有要事，鸣悬挂铁钟集合村民。此钟高约一米，直径半米有余，铸于清代，钟上铸有众多杏园村先人和为建庙布施人的姓名。钟声一响，声震山谷。据说杏园娘娘庙香火灵验，大石河河套沟、房山城关镇的羊耳峪一带，经常有到此求子者。解放初期的一次庙会，河套沟许多村庄的花会到此献艺。其中，河北村的高跷会一举夺魁，因河北村的高跷会是踩着高跷登上 48 级台阶进入庙门的，令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1954 年，上杏园村被列入煤矿采空区，村民被房山煤矿搬迁，只留有古庙，供种地、放牧之人和旧村看守之人居住。河北镇成立人民公社时，将杏园村大庙房屋拆除，木料运到河北村的公社大院，做了建房材料。泥塑神像被毁，60 多尊铜制佛像被运到潘楼收购站，可能被回收公司回收了。庙院中的大楸树，在 1958 年盖杏园村集体大食堂时，被砍伐做了房屋的大椽。庙内的大铁钟，被运到潘楼，悬挂在大槐树上，用于吃食堂开饭的敲钟信号。1971 年潘楼大槐树被伐后，古钟存放于生产队部的院中。改革开放后的 80 年代，生产队解散，大钟丢失。2009 年，笔者踏勘杏园大庙遗址，庙址已成梯田，由于无人耕种，已然荆棘丛生。笔者攀藤附葛，终在萋萋荒草之中，发现石狮一个、碑座一个。感到如无知情人指引，恐难到其地，也很难让人知道此地曾是一座显赫的庙宇。

## 东泉石壁

东泉为上杏园老村村东的水泉，位于东沟之下，两山夹角。水泉两侧以片石砌墙，上覆条石盖板，以防雨水和泥土进入。水泉入口高约 1 米，入内下两级台阶。从泉口至水面距离约为 1 米，水面面积约 1 平方米。夏季水大时，水最深处可达 1 米，也曾出现泉水从东泉溢出现象。春季水量最少，水最深处也达半米。上杏园地质结构为页岩，植被丰富，地下蕴藏丰富的侏罗纪煤炭，土壤容易涵养水分，所以水泉众多。尤其是杏园沟中，水泉如串线之珠，连续分布。然水量最大、水质最优者，还是东泉。且东泉就在村旁，住户取水最为方便。因此，东泉成为上杏园村民的主要饮用水源。东泉位置，还是盘道西端起点，旧时在盘道上往来商旅及驮煤、驮货牲畜，也爱在此做出行准备，备水、备草、备料。虽然村民及商旅从东泉取水多多，但东泉之水从来不竭。东泉泉口对面，是一面稍有倾斜的赭色石壁。夕阳晚照，石壁生辉。而每当晚霞西燃时，东泉石壁则被晕染成胭脂色，犹如一幅水墨丹青。而此时也是村民下地务

工归来到此取水的集中时刻，各家住户不约而同，挑担的，背桶的，大姑娘，小伙子，齐集于此，东泉顿时热闹起来。排队取水之人，散坐于石壁之上，聊天侃山，谈论见闻，共话桑麻，东泉石壁成为村民的新闻发布中心，因谓之杏园八景之一。近年来，气候异常，干旱少雨，到处发生水荒，再加上杏园村所在地煤窑众多，极易挖通泉脉，致使上杏园的众多水泉干涸，但东泉之水至今仍然旺盛。很多住在横流水的村民及从上杏园搬出的村民，还不辞辛苦，翻山越岭，到东泉取水饮用，说用东泉之水做饭不容易馊，用东泉之水泡茶别有风味。还说，东泉之水水质甘醇，水质较硬，水温清凉，夏季爬山出汗后，到东泉喝水不可连续超过三口，否则泉水太凉容易噎住喉咙。

# 发掘房山石经 开启旷世宝藏

杨亦武

2012年9月22日，房山区云居寺景区文物部门发布消息，经考古专家4个月的考察研究发现，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殿，距今已1396年。雷音洞四壁镶嵌石刻经145块，房山刻经的创始人正是雷音洞佛殿的建造者静琬。上世纪5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进行发掘整理，使这部历隋唐辽金元明六朝、千年而成的《中华石刻佛教大藏经》浩卷重昭于世。重温当年石经发掘历史，让我们愈感雷音洞这座千年佛殿的文化厚重。



图1：石经山雷音洞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云居寺遗址上出现了一位陌生人。那时云居寺满目苍凉，一片废墟。此人在云居寺劫后余存的北塔和残破的山门前伫立良久。他就是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赵朴初先生。这是赵朴初先生第一次来云居寺，他感怀这座千年古刹的浩劫，建议地方政府积极妥善保护好寺院遗址。没有人会想到，赵朴初这次来访后，云居寺迎来了一个历史契机——历时三年的房山石经发掘以及后来的房山石经整理和研究，由此成为云居寺在新中国成立后走向新时代的起点。后来的六十年间，无论云居寺的修复、绿化，还是景区建设，无不与发掘的石经息息相关。

## 纪念佛祖诞辰 动议发掘石经

1956年，恰逢佛祖释迦牟尼诞辰2500周年。用什么方式纪念这个神圣的日子？中国佛教协会想到了房山云居寺的石经。这是全世界唯一一部石刻佛教大藏经，其宗教价值、佛学价值、文化价值和独特的历史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房山石经的本来面貌，辽太平七年（1027）虽曾开洞

清点，但未能给后世留下科学准确的文献资料，何况太平七年以后至金元明皆有续刻。从新中国的佛教事业出发，有必要将封藏于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和云居寺遗址内地穴的石经发掘整理，加以研究。如果以房山石经的发掘整理来纪念佛祖 2500 周年诞辰岂不是一份独特的献礼？中国佛教协会向国务院呈递请示，不久获得批准。于是，中国佛教协会协同北京大学考古系，开始了发掘房山石经的准备工作。谁来主持这项重大工程呢？协会同仁想到了集佛学家、佛教教育家、佛教文化学家为一身的周叔迦。1953 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于是身为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周叔迦担当起了主持石经发掘整理的重任。

### 骑毛驴购粮 搭建工棚启动

1956 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中国佛教协会派出的工作人员黄炳章、金敏悟，由北京市区乘长途汽车抵达房山县城。此处距石经山还有 30 公里，他们携带行李，乘马车进山，到达目的地地下庄。随后，阎文儒、俞伟超、卢松安等陆续到达。下庄是石经山下的一个小山村，考古发掘人员住在老乡家里，每天到石经山勘查工程。山上没有水，饮用水和工作用水都是用人力由山下河沟里挑上山，生活用品、副食品需要骑着毛驴到 12 里外的石窝、长沟购买，粮食到 15 里外的南尚乐村购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3 月 12 日这天，下庄的乡亲们见到有人在石经山的接待庵遗址上修建 5 间工棚。这是黄炳章、金敏悟等工作人员在做石经发掘拓印的准备工作。石经山面临 3 个村庄，南面是下庄村，东面是三岔村，西面是水头村，水头村的南端就是云居寺。拓经人员分别由北京、南京招聘而来，共计 20 人，其中一名女拓工，只能住在厨房里。负责伙食的工作人员每天骑毛驴出去购买粮食和蔬菜。后来，在当地培养了 5 人参加拓印，工作非常顺利，如期完成了开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 开启藏经洞 取经版拓印

1956 年 4 月 21 日，石经山藏经洞前来了两位陌生人。一位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迦，另一位是北京图书馆金石部的曾毅公。

石经发掘就在这一天开始了。石经山藏经洞分上下两层排列，原无编号，

为便于拓印及整理工作，研究人员按近代考古发掘办法进行编号，下层两洞自右向左编为第 1 洞、第 2 洞，上层自右向左编为第 3、4、5、6、7、8、9 洞，第 5 洞即雷音洞。



图 2：专家对雷音洞进行考察

在周叔迦和曾毅公的指挥下，工作人员首先开启第 3 洞搬出经版，编号拓印。当时山上各洞洞门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第 3 洞洞门破坏最严重，上半部石门已不存在。此洞面积最小，发掘工作就是从这个洞开始的。各洞经版的存放一般都是下层立放，上层横放或平放，无规律地重叠于洞内。工作人员先从上层取出经版，抬到工棚内，洗刷干净，注明洞号，

编号后拓印，每石拓印 7 份。各洞所藏经版大体可分为 3 种类型：大型经碑高 2.50 米，宽 0.60 米；中型经碑高 1.60 米，宽 0.62 米；小型经碑高 0.46 米，宽 0.76 米。经版拓印后，仍放还原洞，最后以原洞石门锢封保存。

### 老乡灶台石头 确认藏经地穴

1957 年 8 月 1 日，正当石经山发掘工作紧张进行时，周叔迦、阎文儒、王去非、俞伟超等来到石经山下的云居寺遗址，从此拉开了云居寺藏经地穴辽金石经发掘的序幕。

经过历年兵燹，云居寺寺院建筑及南塔荡然无存，仅剩残垣断壁，一片废墟。藏经地穴究竟藏在哪儿？史料中有记载，但是没有说明准确的地点。就在工作组苦苦寻觅之际，奇迹出现了。黄炳章在紧张忙碌地发掘整理工作中，时刻不忘地穴石经的发掘工作，每天山上忙完后他都要到山下进行考察，有一天他在考察中忙得口干舌燥，恰好走到一位老乡家门口，就走了进去找水喝。

上世纪 50 年代，农村睡觉休息的不是床而是用土坯砌成的炕，他坐在炕沿上一边喝水一边和老乡聊天，无意间一低头的时候，看到了灶台上有一块被火光映亮的石头，上面仿佛还有文字。出于工作的本能，他急忙凑到灶台边，仔细一看，上边镌有文字，当他看到“……发心磨莹贞石，镌造大藏经，以备法灭，相继至大辽天庆七年已镌了经近三帙，秘于东峰满八石岩。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这时他惊呆了，于是将这块碑的重要价值向老乡做了介绍，老乡毫不犹豫将经碑取下交给了黄炳章，这便是十分

珍贵的《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大辽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载道：“筑台砌甄，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知经所在。”而《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中提到：“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这句话对当时藏经地穴的位置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线索。

黄炳章喜出望外，将这方石刻带回与阎文儒认真研究，最后根据石刻上的记载，于8月1日开始勘测，首先清除南塔塔基上的土丘，8月6日塔基方台全部暴露。塔台十分完整，北面有3个经幢座，周围雕刻佛、菩萨、飞天、花草等雕像。塔基中心有一砖砌地穴，中置石函，函内装藏物品均已无存。由北向下挖掘，并无经版。沿北沿塔台东、南、北三面各掘一道探沟，塔台西面是山崖石根，无需开掘。

### 找到藏经地穴 发现万片经版

8月7日下午，工作人员终于发现了经版，找出了地穴四至。地穴南北长1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面层以方砖铺墁，周围砌砖墙，东墙有一石门。此穴北部占全穴三分之二，南部占三分之一，两穴之间隔有一米宽的土墙。南北两穴的经版排列形式不同，北部经版是一排排顺序排列，南部经版则纵横交错排列，瘞藏经版6层。这就是埋藏了800多年的辽金两代所刻经版。其数量比有关文献记载的要多。志才《塔记》说瘞经版大碑180片，小碑4080片，这显然是最初的数量。其后经乾统至金明昌年间继续刻造的石经亦瘞于地穴中，因此其中所藏经版达到10082片。

地穴发掘工作自8月1日启动到8月7日发现第一块经版，仅用一周时间。当时石经山上各洞经版还未拓完，因此集中力量进行山上拓印。1957年底，石经山9个藏经洞的石经发掘整理工作圆满结束，各洞藏石经数目：第1洞1131石，第2洞1091石，第3洞333石，第4洞164石，第5洞146石，第6洞200石，第7洞285石，第8洞819石，第9洞390石。当山上的石经拓印完毕，山下藏经地穴的发掘也已接近尾声。此时，西山灵光寺正在筹备修建佛牙塔。1958年初，卢松安被中国佛教协会派往西山灵光寺，协助佛牙塔工程。

### 挖出石函宝物 民兵工地值守

石经山石经拓印完成后，转入山下拓印。地穴北部瘞经的发掘出土与石经山洞藏经版的出洞不同，山上藏经洞是先从洞内抬出经版至工棚内，清洗干净，进行编号，注明洞号，再行拓印，拓完仍放还原洞，地穴中的石经则在出土前按经版排列顺序就地编号，然后按序出穴拓印。为保护这些出土的经版，在地穴上面搭起席棚。地穴北部藏石经 6295 片，南部藏 3787 片，共计 10082 片。

1958 年地穴北部经版出土至最底层时，发现一个长 32 厘米、宽 32 厘米、高 24 厘米的石函，正面刻有题记：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此匣内有银净瓶一个，内有释迦佛舍利八粒如粟，白如雪瑜，石香一个，黄香八两，檀香四两，永为供养。愿益四生，俱登觉道。时天庆七年三月一日戌时葬。比丘志兴、比丘法总、比丘善锐。石函内装藏的物品与题记记载不完全相符，实际装藏物品如下：鎏金坐像一尊，菩萨圆铜牌和观音像铜牌各一个，透花铜香炉一个，银净瓶一个，乾元重宝、庆历重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等铜钱数十枚。从这些钱币可以看出，当时在辽代管辖的幽州范阳县，宋代的货币也有流通使用。因为发现了文物，所以临时停工，立即通知乡长，派民兵到工地站岗看守，并通知房山县文化部门派人来现场处理。不久，文物部门来人将石函取走。这些重要文物现在陈列于北京法源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展室内。

### 文化部拨款 建石经库房

发掘工作逐渐进入收尾，发掘后的石经保管问题迫切需要研究解决。地穴石经如何保存，河北省文化局曾提出一个 7 万元建造库房的方案。1958 年 3 月 27 日，房山县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管辖，北京市文化局接替河北省文化局介入房山石经发掘的善后工作。

1958 年 6 月 13 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巨赞主持召开了“房山石经保管问题座谈会”，商谈结果，由北京市文化局与有关方面研究后提出保管要求，佛协根据要求考虑具体措施，共同协作。关于经费问题，国家宗教局郭朋处长表示，如果北京市文化局原来无此预算，可另行申请专款。不久，北京市文化局决定在地穴遗址东面建造 40 间石经库房。经版库建筑资金由文化部拨款，于 1958 年 10 月落成，砖木结构，比较简陋，40 间 600 平方米的库房围成一个四合院，南北屋各 11 间，东西屋各 9 间，南屋中央的 3 间，中间一间为大门，东西各一间门房供工作人员食宿办公之用。历时一年半，到 1958 年底，全部拓印工作圆满完成。

## 雷音洞佛舍利的千古之谜

雷音洞，又名华严堂、石经堂，是石经山上最早也是最主要的石经洞，宽广如殿，四壁镶嵌经版都是静琬早期所刻。洞中有 4 根八棱石柱，石柱上雕镂佛像 1056 尊，每尊佛旁都有名号，刻工精致，是石刻的精品。过去这里还供奉不少石刻佛像，是石经山上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



图 3：雷音洞大殿

雷音洞的建造者，是房山刻经的创始人静琬大师。这座殿堂之所以叫雷音洞，是因为洞里曾供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而舍利奉安的时间正是这座殿堂的落成之日。在洞内奉安舍利的青石函上，铭刻下这样的文字：“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颗，愿住持永劫。”这一铭文向后世传递了一个信息，殿堂落成之日，应是隋大业十二年的佛诞日，即四月八日。这一天，为庆贺殿堂的落成，特意为静琬奉安舍利于殿堂之内，以示嘉许和护持。因为殿堂内有佛祖真身舍利，所以这座由天然石洞加工而成的殿堂被后世称为雷音洞。此后的岁月，石经山雷音洞一向为浴佛节的道场。明万历二十年（1592），明末四大师之一的达观真可来云居寺参礼，发现了隋人奉安的舍利。随后舍利被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迎入宫中，等到重新奉安到雷音洞的时候，舍利由原来的三粒变为两粒。由此演绎出一段雷音洞佛舍利的是是非非，还有永远解不开的千古谜团。当年，发掘人员进入雷音洞后，发现雷音洞已遭到严重破坏，左壁上层静琬最早镌造的《妙法莲花经》等 18 块经版被砸碎脱落下来，殿内杂草丛生。靠石窗处砌有一个土炕，拆除土炕，发现残碎经版用来代砖砌炕，经拆除清理连同洞内外散落的残石碎片，共搜集到 80 余块。清洗后细心拼接，大体还能恢复完整。工作人员专程到石窝村请来高级技师，这位技师过去曾到过香港修整石刻。根据他的要求，配备先进工具和原料，按原来顺序将残损的石经镶还原处，使雷音洞原貌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 “四古”村落水峪

马 垒



图1: 杨家大院

位于房山县城西北方四十五里，南窖乡西南部的水峪村，东南邻三合村，东北邻南窖，北与大西沟、黄石岩隔山相望。水峪虽不如周口店历史久远，也不如大石窝文物古迹众多，但村里那散落在各个角落数不胜数的石碾，古香古色的老宅院，以及那纵横交错的古商道，却构成了这个古村落——道亮丽的风景线。

根据民国十七年线装版《房山县志》记载：民国时期水峪总户数为 118 户，1586 人，当时分为西水峪和东水峪二村。西水峪，城西北五十里有村；东水峪，城西北三十里有村，书中记载涉及到该村的相关地名有：“王位尖，城西北五十余里在水峪西；五岭，在西水峪南；大台岭，城西北五十里，山水峪通石堡；康谷岭，城西北六十里，由水峪通霞岭。”因其地势属高地，这里的人们世代以种地为生，谷物瓜果成了村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 古村里的老宅院

村里的院子大多是因地制宜，随山就势，沿沟两边建造，具有山区四合院的典型特点。根据地势山高往低，山少到多，呈伞状分布。杨姓和王姓是村子里的大户人家，较为富足，其宅院的建造规模也较大。大门楼的台阶一般为七级或五级，带垂踏，房屋屋顶以石板顶较为常见。一般在大门口、屋顶、脊上有雕刻精美的石雕、木雕、及砖雕装饰。普通人家一般是青一色的石板覆盖，不起脊，不饰砖雕，简朴实用。门窗为木质，门有单扇门和双扇门之别，下房大多为双扇、厢房一般为单扇。窗大多为对开窗，其装饰种类繁多，有一马三

箭、正搭正交、步步锦、八锦方等图案。村内门楼使用较多的是如意门，大户人家的门楼装饰较为华丽，雕刻题材融砖雕、木雕、石雕于一体，最具代表性的是杨家大院门楼和西街 22 号院门楼了。

杨家大院门楼在房山区为数不多的古民居中，应该算是最精美的门楼了。门楼占用倒坐房中间一间，为典型的如意式门楼，屋顶为青一色的石板顶，双重檐，其中每一间屋顶各有一清水脊，蝎子尾带盘花。台阶五级垂带式，地基高约一米，用汉白玉条石铺面，左侧有一瓮形排水石槽，雕三孔镂空式，以便于往外排水，门楼两侧有墀头砖雕，靠近门楼两边的是牡丹花篮图案，最外边为富贵牡丹图案。大门两侧左右各一抱鼓石门墩，像两个守门神把守大门。两尊抱鼓石雕刻题材相同，均有缠枝纹和龙鱼海斗图案，下部为须弥座式底座，门楼梁架上有彩绘几何纹，（大部分彩绘图案已剥落，依稀能辨的有回字纹。）门楼两山墙有“寿”字砖雕，大门上方有五组牡丹砖雕图，下边为缠枝莲花砖雕，均采用浮雕雕刻技法。门簪为木质外雕四莲花瓣，中间一圆木，右边雕“福”字，左边雕“禄”字，有幸福与爵禄之意。站在这气势非凡的门楼正前方，暗示人们这是个大户人家的宅院。



图 2: 抱鼓石门墩

登八级青石阶，便是这座西街 22 号院，门楼占用倒坐房最右一间，如意式，木雕花镂空门罩，大门木质双扇对开，上有仿古人物画，内侧更有飘逸流畅的毛笔书法，体现了主人浓浓的书香气质。

水峪村现存古民居中保留较好的主要是地主和窑主的大户人家宅院，其中尤以杨家大院和 22 号院门楼保存较好。而中街 31 号王家大院、中街 30 号、西街 22 号院和西街 21 号院也是村内规模较大、建造较为考究的老宅院，只不过大多已残毁不堪，有的房屋翻修了一遍又一遍，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建筑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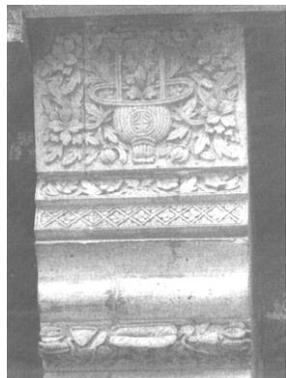


图 3: 墀头砖雕

杨家大院是一座建造在古道边上的四进四合院，占据着村内风顺水流的宝地，这样好的地理位置，自然也是名人辈出，据说杨家院里曾出过新疆军区政委等重要人物。院落坐南朝北，为水峪村最大的宅院。房主杨玉堂和其父是当地煤窑的窑主，在当地较为富裕，算是村里的望族了，具备建造豪宅的物质基础。如今杨家院仍然

保留着清代民居的建筑风格，房屋共三十六间，宅院从一进到四进随地势层层升高，院内各项生活设施齐全，大门楼的左下角设有一个镂空的排水口，融装饰性与实用性于一体，体现了主人的别具匠心。其中在三进院和四进院的左边又设有 3 个小侧门，以方便出入。院落东临山坡，菜窖依山而凿。如今这座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老宅院，在这古老的村落里依然独揽群峰。

杨家大院现存倒座房共三间，中间一间为如意门楼，屋顶为青一色的石板顶，双重檐，其中每一间屋顶各有一清水脊，蝎子尾带盘花。台阶五级带垂踏。倒座房北向两扇窗为大正搭正交方眼装饰，南窗为八锦方装饰，窗下墙体为虎皮石墙。

远远望去，高高的大红灯笼悬挂于门楼两边，使人不禁想起了张艺谋导演的著名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场景。也许在这座古老的宅院里也曾发生了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穿过门楼，便来到了院子的一进院，一进院无东西厢房，正对大门口的是进入二进院的门楼，门楼为磨砖对缝式，墙腿石选用质地坚硬的汉白玉石。大门木质两扇开，四级踏步。筒瓦顶，石板压底，砖博风，硬山清水脊，带盘花，蝎子尾（今无存）与门楼相连的两墙墙皮上有雕花图案，即在青一色的墙皮上，用白灰勾缝呈几何图，中间为一大牡丹花图案。穿过二进门楼，便来到了二进院。正房五间，中间一间为门厅，墙体做法为基础和墙裙及山墙均采用块石，墙面抹灰，硬山皮条脊，屋顶为石板铺顶，四级踏步带垂踏，窗为木质雕蝙蝠图案和套方装饰。东西厢房各三间，二级台阶。过二进院正房门厅，便来到了三进院，正对门厅的是一座影壁墙，朴素大方，虎皮石墙基，磨砖对缝，无雕刻。三进院原有正房 5 间，现仅存左边两间，石板顶，5 级踏步带垂踏，窗为八锦方装饰。正房右边两间和中间门厅已塌毁。东西厢房各三间，三级踏步，窗为套方及正搭正交方眼装饰，虎皮墙基，其中正房与东厢房之间开有一侧门，东厢房与二进正房之间开有一侧门。



图4：龕形排水石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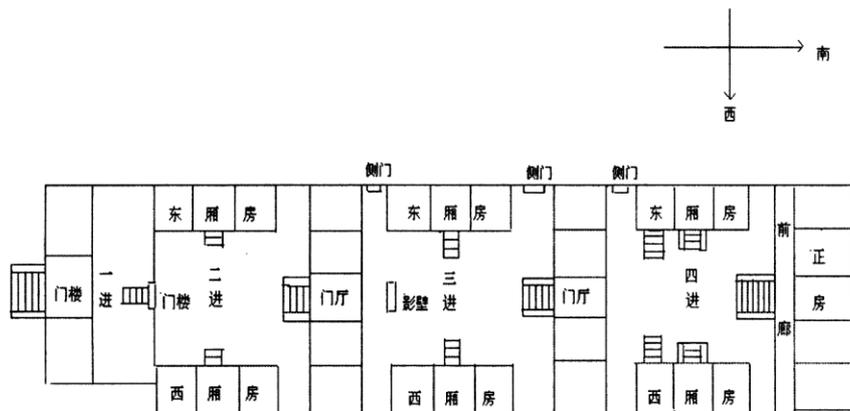


图 5: 杨家大院平面图

过三进院门厅，便来到了杨家大院的最后一道院落。四进院占据地势最高的位置，是这户宅院的年长者和最具威望人居住的地方，因此建造的华丽程度自然是最讲究的。正房 5 间，前出一步廊，带木雕雀替，镂空式梅竹图案。屋顶为棋盘格，石板压底，硬山清水脊，蝎子尾带盘花，砖博风，墀头砖雕梅花鹿与兰花图案，梅花鹿是福禄的象征，而兰花又是高洁典雅与坚贞不屈的象征，其雕刻手法形象传神，将其合二为一是主人追求崇高精神的体现。正房窗为木质，八锦方装饰，窗下更有精美的瓶菊木雕作为点缀，值得一提的是正房左右两边各一抱鼓石门墩，小巧精致，洁白无瑕，右抱鼓石上面雕缠枝莲花纹，侧面雕山石水莲图，下面为须弥座式底座，底部雕牵牛花。基础、裙墙和山墙均为块石垒砌，黄土和白灰抹面，砖抱角。左侧抱鼓石上部雕缠枝莲花纹图案，侧面雕山石菊图案，下部为须弥座式底座，前廊带木质八锦方门罩，下雕梅竹图案，左右两山墙象眼部位有木雕花，右侧雕飘带，左侧雕鱼结、宝瓶和牡丹图案。东西厢房各三间且各开两道门，中间一间一道门，3 级踏步带垂踏，东厢房左侧和西厢房右侧开一道门，四级踏步，顶为棋盘格，石板压底，硬山清水脊，蝎子尾带盘花，砖博风，檐角有垂云砖雕，瓦当有莲花图案，东厢房与西厢房的屋顶上各有两个亭式排烟口，其中正房与两厢房相连的墙体采用传统手工砖单层直檐花瓦顶做法。



图 6: 房顶砖雕

图案。东西厢房各三间且各开两道门，中间一间一道门，3 级踏步带垂踏，东厢房左侧和西厢房右侧开一道门，四级踏步，顶为棋盘格，石板压底，硬山清水脊，蝎子尾带盘花，砖博风，檐角有垂云砖雕，瓦当有莲花图案，东厢房与西厢房的屋顶上各有两个亭式排烟口，其中正房与两厢房相连的墙体采用传统手工砖单层直檐花瓦顶做法。

## 檐角上的垂云砖雕

因为受抗日战争和文革动乱的影响，水峪村大多古民居原有风格都已不存，有的也被后人翻盖，失去了原来的模样。那么为什么杨家大院和西街 22 号院门楼能够保存下来呢？通过调查采访杨家大院一位年近 9 旬的老人，笔者在谈话中找到了答案。在抗日战争时期，水峪村是八路军后方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时常受到日军进村骚扰。据说杨家在东庄子有一个外甥，系伪军，当地人都叫他“水儿”，当日军走到杨家大院时就给他截住了，日军看到屋里有病人躺在炕上，就没敢烧房子，说烧了房子会不吉利，这才保住了杨家大院。

如今我们在水峪村可以看到有几个宅院门楼保存较好，而院里的房子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这又是为什么呢？按常理鬼子进入宅院执行三光政策，要首先从大门门楼进入，因此不会先烧门楼，如果先烧了门楼，鬼子等于说把自己出去的路给堵死了，因此我们今天会发现在水峪村院子里房子一般都被毁，而只有门楼却保存完好。赶走了日本鬼子，新中国成立以后，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破四旧，打倒一切地主豪强，富人家的房子大多被破坏，而杨家人却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把门楼上的砖雕用黄土抹上，如今我们在杨家宅院的门楼上，还能看到抹过黄土的痕迹，才使我们今天能够欣赏到如此美轮美奂的砖雕艺术。

## 水峪村的其它几座古民居

水峪村中街现存有两座古民居即中街 31 号院和中街 30 号院，房主均姓王，遗憾的是这两座院子均于文革时被毁。现仅存中街 31 号院门楼保存完好。因临街而建，当地人故又称“街屋”。

### 中街 31 号院

该院有倒座五间，中间一间为如意门楼，保存较好。大门木质双扇对开，带木制门罩，大门上方有三幅人物山水画，门楼墙腿石阳刻“居仁山义”四字，寓意内怀仁爱之心，行事遵循义理。《孟子·尽心上》解释为：“居仁山义，大人之事备矣。”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居仁由义吾之素，处顺安时理则然，有内心存仁行事循义之义。”一进院东西耳房各三间，各 3 级台阶，内

院门楼一座，筒瓦，石板压低 2 级台阶，硬山清水脊，过门楼正房五间，已改建。五级踏步带垂踏，其中西耳房与倒座房相连处有一小侧门。

### 中街 30 号院

该院坐北朝南，院内大部分房屋都已残毁改建。正房五间，六级踏步带垂踏，东西厢房各三间，内院门楼一座，一级台阶，门楼顶部条石刻“三环套门”图案，周围雕水鳞纹。其中“三环”可代表天、地、人，这三者和谐共处为大吉祥。东西耳房各三间，倒座房五间，中间一间为如意门楼。该院墙腿石雕刻较精细，采用阳刻的雕刻手法，有菱形几何纹，宝瓶花，还有雕刻着“松茂竹苞”四字的刻字墙腿石，《诗经·雅·斯干》记载为：“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比喻家族兴旺繁荣。水峪村以大沟为界，沟以东为东街，沟以西为西街。一称东村和西村。西街现存古民居中主要有西街 21 号院和西街 22 号院。

### 西街 21 号院

该院坐西朝东，原房主姓王。现无人居住，登七级青石台阶，即为大门楼，门楼带二级台阶，为如意门楼，左右各一箱型石门墩，汉白玉石质。倒坐房四间，最右一间为门楼。倒座石板顶，硬山皮条脊，墙群为虎皮石墙，窗为步步锦，一马三箭装饰，上部墙体为块石和黄土垒砌。倒座房设有两道门，中间一道为双扇对开式，左边一道为单扇门。正房四间，四级踏步。石板顶皮条脊，最右和最左房各开一门，门为木质两扇对开，二级台阶，窗为八锦方和拐子锦装饰。南北厢房各 2 间，均为石板顶，前后四个顺水脊，门窗木质为一马三箭，正搭正交装饰，墙裙为虎皮石墙，上部墙体为块石垒砌。

### 西街 22 号院

该院座西朝东，院内大多房屋已不是原貌，这是一座二进四合院，倒座房五间，右侧一间为如意门楼保存较好。登八级青石阶，过门楼就来到了一进院，现存南北耳房各两间，石板顶（已改建）。登四级垂踏式台阶，即为二进院，一素面影壁墙矗立在眼前，黄土和块石垒砌，磨砖对缝包框。正房五间，七级

踏步带垂踏，南北厢房各三间，如意石阶。院内长条石铺地，为这宁静的宅院，增添了几分厚重之感。

### 水峪村古民居的建造特点

以杨家大院为代表的老宅院，无论从建造规模，还是从建造工艺考究上，都说明了杨家显赫地位，是水峪村其它普通人家所不能比拟的。门楼等重要装饰部位的精湛雕刻技艺，在房山区古民居中堪称精品。水峪村的古民居概括起来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正房、两厢房的墙裙均用块石垒砌呈虎皮石墙。

二、村内大部分古民居的正房和厢房的屋顶，均以青一色石板层层插死。有的大户人家屋顶以棋盘格为顶（如杨家大院），即在梁架、屋脊处盖瓦，石板铺面。

三、墙腿石以坚固的石材制成，装饰图案手法以浮雕为主，有植物类、文字类、几何图案。

四、依山而建，打破了正北、正南的传统四合院格局。符合山区四合院的典型特点。如杨家大院，为偏南朝北建造，西街 22 号院为偏西朝东建造。

五、望族宅院常将砖雕、木雕、石雕等雕刻技法用于重要装饰部位。以区别于普通宅院。主要分布在墀头砖雕、门楼上方、墙腿石、门窗、门罩木雕、清水脊盘子、门墩石等部位。

### 敬神、畏神之古寺庙

在过去，水峪村人也有崇信各路神仙的习俗。而建造在村内的小庙，就成了人们敬神、拜神的重要场所。水峪村的古庙不算大，建造也不是很讲究。但它却是这个古村落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娘娘庙，已经成了水峪古村一张很好的名片。

#### 娘娘庙

该庙建于清康熙年代，为水峪村仅存的两座古庙之一。庙早已破败，正殿三间，坐北朝南，已残毁，顶为石板铺面，彻上明造，六架梁，皮条脊，门窗

木质，门为两扇开，步步锦装饰，窗为一马三箭，正搭正交装饰，台阶七级带垂踏，梁架有旋子彩绘和苏轼彩绘，其内容有山水人物图，书画图等，院内有一棵古银杏树，气势夺人。

东西配房各两间，五架梁，石板铺顶，西配房已改建，东配房无存，山门亦无存，门前台阶条石铺砌，共四级，正对山门有一座单孔石桥，黄土和白灰砌筑，其建造年代与庙相同，当地人称此桥为罗锅桥。娘娘庙正殿中央原供奉一泥像，为九莲菩萨，她是中国本土的神仙，可保佑子孙幸福平安。明代万历皇帝的母亲孝定皇太后，自称为九莲菩萨。泥像于文革中被毁。庙内原有一古钟，今不存。

## 马王庙

位于村南边，大沟东侧，建于清代，坐东朝西，正房一间，现已残毁，仅存两山墙，五架梁，黄土和块石垒砌，外抹白灰。庙前有一口古井，过去村里百姓都要到这里来打水，由上向下望去，黝黑至极，深不可测。马王庙因此又被称作辘轳庙。庙内原供有马王爷神像。所谓的马王爷就是灵官马元帅，是一个具有三眼四臂的道教神仙。因年久失修，该庙逐渐破败。

## 东街瓮门

瓮门建于水峪村东街上，坐东朝西，券洞高 3 米，宽 3.35 米，进深 5.8 米。站在瓮门正中向东眺望，可看到纱帽山（南窖村人叫馒头山）。瓮门上面原有一阁，前后相通，村内年长者说是五道庙，过去要是谁家的人去世了，都要来这里报庙。正对西面瓮门上方有一石额，上刻“永宁”二字。据说在过去，因为水峪村房屋大多建在半山腰或河沟两边，地势较低，自东向西有大沟穿村而过，一到雨季，洪水泛滥，村子就会遭殃，于是村民就把祈求永远平安，息事宁人的美好愿望寄托于这座瓮门上。瓮门所用石材为就地取材石料，中间粘合黄土，十分坚固，表面和券洞里抹上一层白灰，如今外墙上的白灰大部分已剥落，而券洞里的白灰却保留了下来。

## 西街瓮门

西街瓮门与东街瓮门形制相同，瓮门坐西朝东，位于西街主道上。均用黄土和块石垒砌，外面涂抹白灰，瓮门上面原建有一阁，实为五道庙，今无存。瓮门相当于村子里的大门口，一般都位于村主街上，是人们进出村子的必经之地，而其一旦关闭，外人难以进入。村内原有老爷庙及龙神庙各三间，今已不存。触摸着老宅子里那一块块精美的砖雕，使人仿佛读到了古村落的历史。一代又一代的水峪人传承着古老的幡会，并将其发扬光大，尽显其独特的人文气息。伴着古老的幡会，徜徉于这座深山古村落之中，古朴悠远之感油然而生。

# 房山城关山顶庙

苏宝敦

山顶庙亦称留台尖，系房山城关八景之一。其“留台夕照”记：“城西不远有一座山，山顶上有一座古庙，两层殿，坐西朝东，学名曰：‘三官庙’，（三元庙），俗名‘山顶庙’。”房山县志记载“留台尖”，整个庙宇建在一个山顶上，其建筑风格可与山东济南的千佛山媲美。山门两侧是钟鼓楼，前殿为释迦牟尼铜像，泥塑的四大天王脚踩八大怪。后殿是“天、地、水”三官。每当春、夏之交，夕阳西下，便把这山上林木百草，殿宇碑楼笼罩一片金光，树影斑驳，百鸟合唱，景色迷人。

山顶庙最早建于何时？据《重修大洪寺村留台尖记》载：“庙焉其上始不知何时，庙有唐时碑已漫灭不可读，盖其迹已古亦。历辽、金、元、明、清代又修葺……”另据石碑《重修三官庙碑记》可知，嘉靖十三年（1534年）当地村民宋公□荣，李公□，张公□汉，并三教堂主人春之师祖，各助资财，以劝厥缘。二月动工，至六月工竣。1958年开始，人们因缺乏文物保护观念，山顶庙山上树林被砍伐建学校，庙宇也被陆续拆毁用于建学校和村民建房、建猪圈、垒围墙、修道路等，直至“文化大革命”彻底被拆毁，只留存地基。然而，江山代有人才出，更有新人换旧人。在中国当代，国民党败亡，共产党兴盛，这是人心所向，历史发展之必然。1948年12月，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军区第7纵队20旅，在刘秉彦旅长率领下，沿平汉铁路乘胜北上，在解放保定、高碑店、涿县后，到达北平西南50公里的房山县城南，将指挥部设在距房山城南2公里的顾册村。房山人民积极支援解放房山城的战斗。房山县委县政府抽调县城附近五区区委书记张进儒、四区区长吕镒专门随军支前工作，积极配合部队作战。解放房山县城，必须率先攻下拱卫县城的三个至高点：第一个是城西南的小山坡；第二个是城西的山顶庙；第三个是城东饶乐府村的齐家坡。12月7日，作战部队包围了房山城，并以顾册为中心，开始向小山坡、山顶庙和县城方向挖战壕、修筑作战工事。当时，驻守县城的张匪保安33团有军丁2800人，大乡队500人，迫击炮23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50挺，在团长张德

祥、副团长陈亚林指挥下，负隅顽抗。最终，小山坡、齐家坡被攻破，1948年12月13日夜，城内张德祥已率匪军逃跑。电话中断，联系不上，山顶庙炮楼敌人仓皇撤离炮楼，随房山城守敌一起出北门向北平方向逃去。房山城解放了，山顶庙炮楼拆毁了。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山顶庙附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时日，当你站在山顶庙遗址向西南方向远眺牛口峪水库，烟波淼渺，微波荡漾，山水风光，尽入眼帘；回首向北，高塔火炬，炼油设备，曲曲弯弯的钢铁管网织就了一座现代化的燕山石化新城。穿插坐落在新城之间的文物古迹，如白水寺、凤凰亭、一佛二菩萨石刻造像……在“修旧如旧” 古建原则框架内，有的焕然一新，有的科学保护，彰显着中华文脉永续传承；放眼向东，古城高楼林立，商业繁华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一派和谐安定景象；向东南方向远眺，田畴沃野，阡陌纵横，距古城近在咫尺的顾册村，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东北大连富商刘凤伟，“兴业发财” 搞旅游，画龙点睛山顶庙。修建山顶庙，天官赐福，福泽城关乡邻，福泽顾册乡亲，福泽南来北往旅游人。“留台夕照” 观美景，登山健身好身心。

